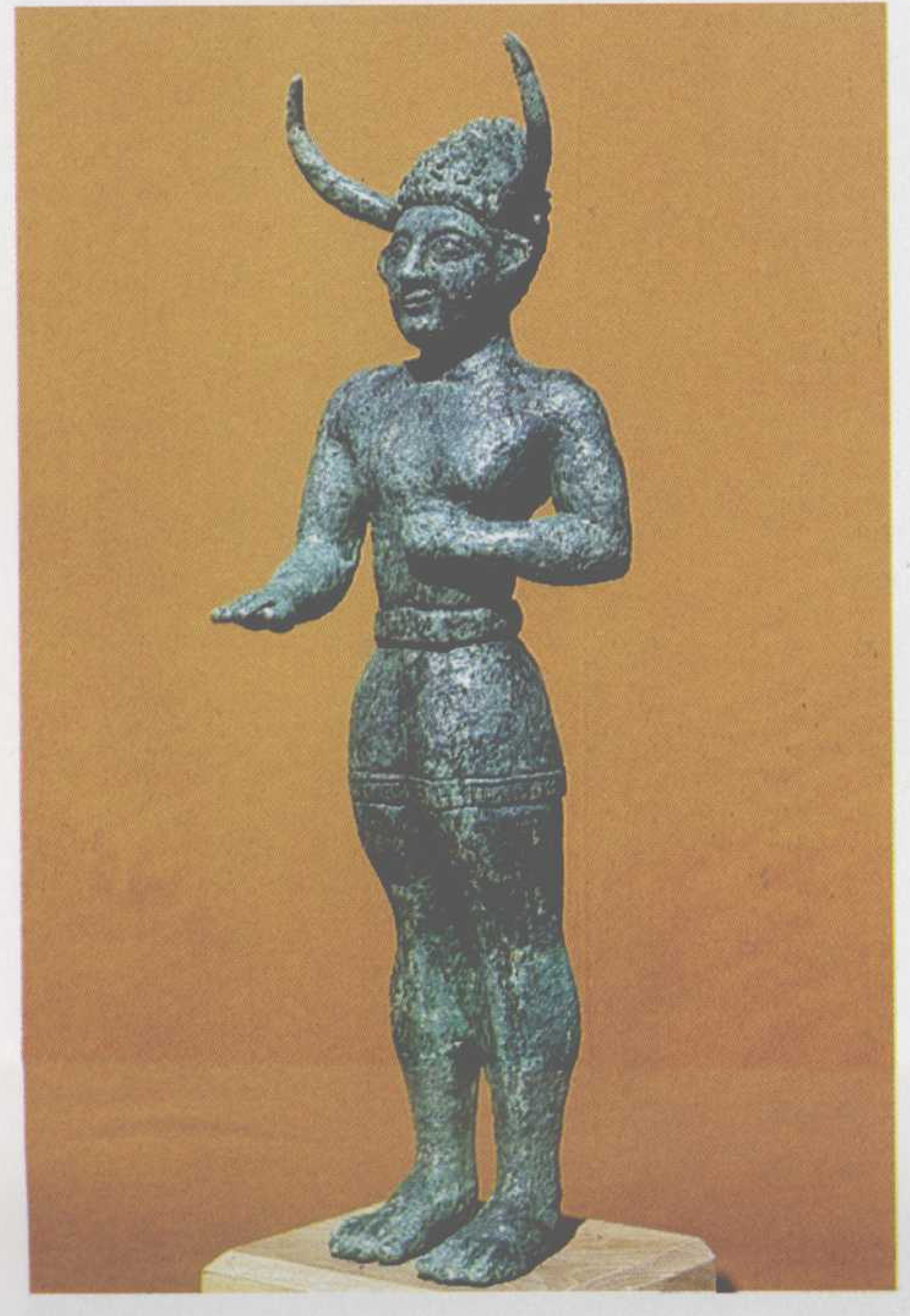
基罗基提亚早期人类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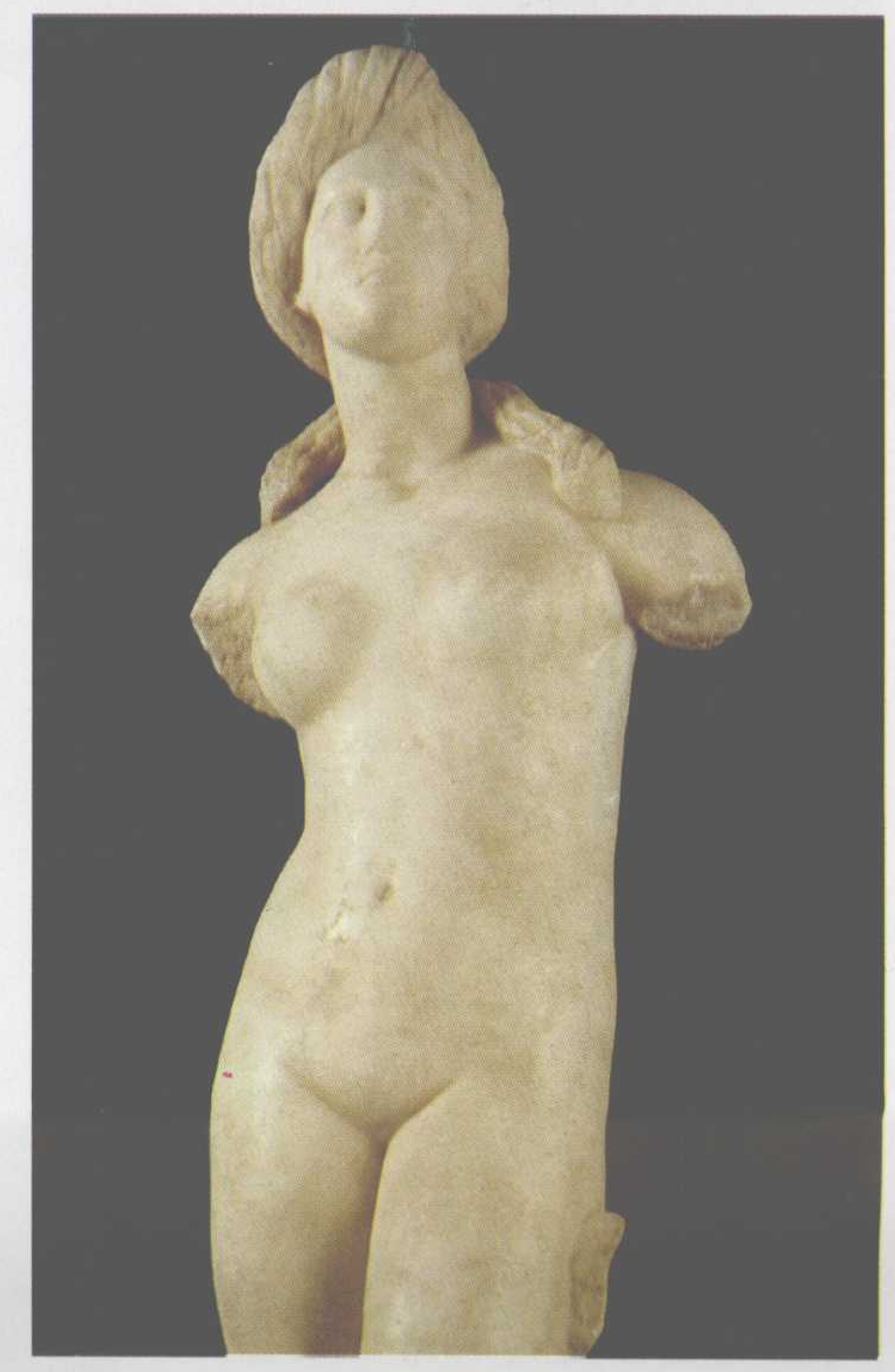
铜石并用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的十字形小肖像

恩科米出土的阿拉西亚
王国用于出口的铜锭



青铜器时期恩科米的牛角神

公元 4 世纪的镶嵌地版图案



希腊化时期的阿佛洛
狄特女神大理石像



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克提昂大剧院遗址（公元50～150年）



十字军东侵时期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修建的科洛西要塞

1567年威尼斯人改建的尼科西亚城的法马古斯塔门



尼奥菲托斯修道院

斯塔洛夫尼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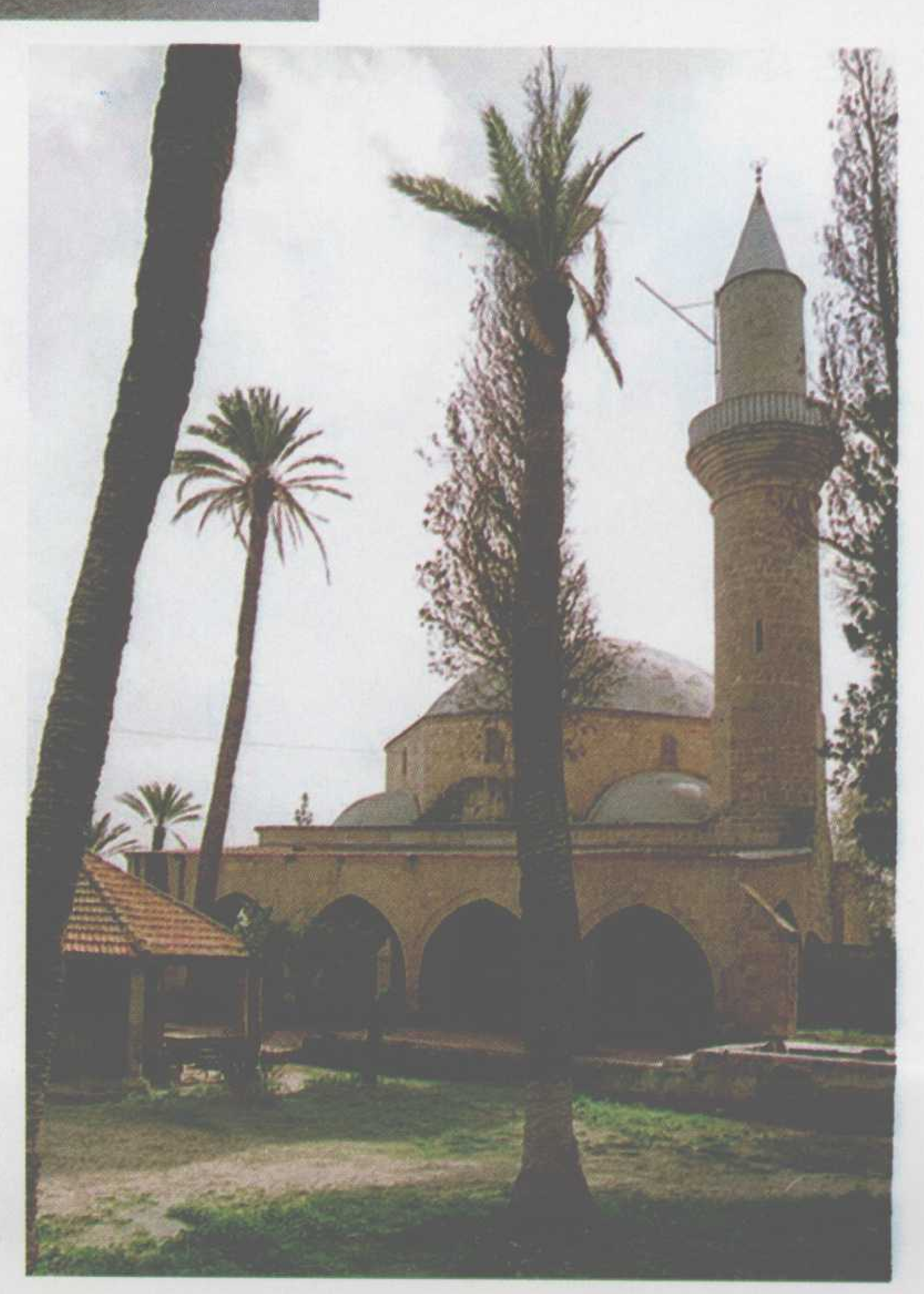
拜占廷时期的阿西诺教堂

拜占廷时期的克里索利波提萨教堂遗址（门前立柱传说是圣保罗受难柱）

罗迪提萨修道院



奥斯曼帝国委派的塞浦路斯专使哈吉·格科尼西奥斯肖像



1816年土耳其人建的哈拉素丹清真寺

1960年英国末任总督福特(中)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左)和副总统库楚克(右)签订塞浦路斯独立协议



塞浦路斯共和国首任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2002 年 5 月 15 日斡旋塞浦路斯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中）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克莱里季斯（左）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右）

2003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帕帕佐普洛斯（左）签署加入欧盟协议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

彭 树 智

我在写《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的时候，想到1964年翦伯赞先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的讲话。他说："凡搞通史的人，似乎都懂得一些历史事件。但搞通史有搞通史的任务，所以对历史上的不少考证，必不可少地要依靠对个案深入研究者的劳动成果。我们搞通史的，向来尊重搞断代的，或搞专题研究的。"

这是指中国通史而言。对于世界地区通史，国家通史个案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础工程。中东地区国别通史，同样是中东通史的基础。用文明交往论对中东各国通史进行个案研究，既包括断代，又包括专题研究，更主要地是在综合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从而理出发展的总脉络。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13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以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在每卷之前，均列叙意如下。

一

现代中东国家体系由整个亚洲西部和北非的埃及共18个国家组成。这个国家体系是《中东国家通史》所述说的范围。

根据完稿计划先后顺序排列，《中东国家通史》包括以下各卷：

1.《阿富汗卷》;

2.《沙特阿拉伯卷》;

3.《以色列卷》;

4.《伊拉克卷》;

5.《也门卷》;

6.《巴勒斯坦卷》;

7.《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8.《伊朗卷》;

9.《土耳其卷》;

10.《埃及卷》;

11.《海湾五国(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卷》;

12.《约旦卷》;

13.《塞浦路斯卷》。

二

《中东国家通史》编写的要求如下:

各卷篇幅约为20~25万字,全书约为240~300万字。

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阐明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通古今之变"是全书努力追求的目标。

各卷遵循的学术风格是"以一贯之"的原则,即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注重"关照现实"与"反思历史"的一致性。

各卷强调各国的综合性特征,它既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

实，也包括宗教与民族、自然与社会、人口与环境，还包括生产力水平、阶级关系、文化传统等等。

各卷一般不设注释。凡对主要著作及资料有必要注释时，可在文内或下页作适当处理；同时，在每卷后附有中外文主要参考书目 50 种左右。

各卷恪守严谨、创新原则，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体现“自得之见”。

各卷力求做到专业研究与大众言说相结合，在“简要、清晰、易懂”的顺、畅、通、达的表达方式中，保持其学术性。

每卷末都有“编后记”。

三

《中东国家通史》采用国家通史的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从而区别于迄今为止的中东地区史著作的框架结构。

认识一个地区的整体面貌，从一般学习过程看，大都通过“一般”—“特殊”—“一般”的递进上升的认识路线。编写地区史，可以是按“大地区”历史发展的纵向编写的“一般”和“特殊”；它也可以是“大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横向编写的“一般”和“特殊”。

我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例如，1991 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和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国家简史》，都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写成的“大地区”纵横结合的通史。1992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则是“大地区”断代史的体例。1997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又从专题方面作了“大地区”通

史的写作尝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种各样的体例都有各自的优点。视角不同，呈现出的地区面貌便各有特点。中东国家通史这个视角的选择，最后的决断是出自1991年我对《阿富汗史》写作的尝试。这个尝试一方面使我感到我国对中东国家的历史知识较为零碎、较为片面，另一方面也很表面和缺乏深刻理解。像阿富汗这样的周边邻国，只是在发生了苏军入侵和旷日持久的内战，我们才去追溯它的历史根源，显示出我国中东领域学术研究的落后。有些国家已有几本阿富汗史，而我国竟然没有一本自己的学者写的有关著作。推而广之，其他中东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学术史和学科史告诉我们，对各国通史的撰著，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研究单位的学术队伍群体的研究水平，也是学科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阿富汗史》写作的尝试中，我还体会到，关注每一个中东国家的现状和历史，不仅可获得系统、全面、深入和厚重的历史知识及智慧，而且在理解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方面，具有一般“大地区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它可以把“大地区史”所忽略或省略的许多历史侧面，纳入读者的视野；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详细地占有材料，更具体和独立地分析历史问题；同时可以对一个个中东国家进行更集中、更具体和连贯性的理解。

《阿富汗史》的写作，也使我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以单纯的逻辑推理作为最后结论。这种历史真实不是以世界某个“中心”为出发点，推导出一个涵盖全体的公式及规律，而是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进而揭示历史真实。

此外，中东各国通史的撰写，对于各个中东国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内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会有系统理解，对于时间、空间的变迁和世代兴衰的更替会有理性认识，从而可以为中东地区史打下更厚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把中东地区各国的通史，集中于一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之中，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撰写的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按照多卷本编著要求，各卷作者都注意世界及中东的宏观背景，并用中观视角，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艺术、科技、地缘环境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这样，可以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丰富中东史的内容，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入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感、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作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通过以上对中东各国通史研究的分工合作，既可以保持每位作者在各自撰写的国家通史中的个人思想、风格的独立性，在体例和角度一致的前提下，各卷之间也可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

四

《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从理论线索上说，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1999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序言中，谈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时，曾引用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 年）关于国家和文明交往的一段话。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述》中写道："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

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往越广，法律也越完备，从而感情越和睦，见闻就越广。文明一词，英语叫作 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 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

诚如福泽谕吉所言，交往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表现，是从血缘、等级的自然联系，进入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广泛社会联系。交往是文明之源，而国家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兴衰和更替，是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结果。

实际上，关于文明交往的理论与国家史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用工业文明、商品交换和武力使世界普遍联系，并把相对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时，已经作了更为系统精深的论述。在他们的视野中，文明交往是以国家为基地向全世界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进而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从而使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并把文明交往视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动力和发展的总线索。我们用这些观点，审视中东国家的历史，就会得出许多新的认识。中东是上古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尔后的伊斯兰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延续至今。不仅古典文明融入伊斯兰文明，而且希伯来文明仍在这一地区复兴。中东各国确有自己文明交往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通过各国发展所表现的，则更加异彩纷呈。《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可以说都是对中东文明交往和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个案分析。

从这些个案分析中，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人类文明交往过程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而生产实践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

往。具体而言,文明交往论有以下诸要点:

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四大部分。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和普遍的社会联系;

人类文明经历了远古、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之后,现在正进入当代时期。与这些时期相对应的内容为:原始工具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知识文明等等为特征的交往;

文明交往的工具——语言文字,是物质在精神方面表现的震动空气层的声音和尔后形成为文字的文明符号,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意识。这种口头和书面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交往服务的思维手段;

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各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文明交往既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人群、集团之间、地区之间,它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是科学技术及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古往今来,文明交往从来就是曲折复杂的过程。它既有和平形式,也有战争形式,不仅存在文明冲突,而且存在文明融合。只有保持开放和进取状态的文明,才能长存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明世界里确定自己国家的民族性文明的位置;

文明交往论是多极主体交往论。一国独霸或几国分霸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全球化发展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

反相成的双重内容，前者是整体性趋势，后者是主体间交往的平等性，必然的趋势是发展主体的多极化与平等化。

文明交往论是互动合作论。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过程中，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特别是今日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文明交往历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互动和多向因素的逐渐增强；

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文明交往的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在趋向上日渐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

文明交往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是怀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襟怀和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全面理解；

文明交往论所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对世界文明交往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现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包括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文明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在进程中表现为文明交替超越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再如，文明交往中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世界文明兴衰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总之，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进程，因此，从广义上讲，它是

一种历史交往。它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融汇和综合。21世纪文明交往是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更加深入化的时代。文明交往的主流是各种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共同发展。人们对文明交往的未来理应持冷静与乐观的历史态度，因为它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总的特征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以文明交往理论为线索，以文明交往的历史主线来贯通中东各国的内部和外部诸多联系，来沟通中东各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来会通各种交往方式，力图勾勒出中东各国的基本历史面貌和国情特征。

五

《中东国家通史》在关注中东各国文明交往活动的同时，也注重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各方面交往活动，为此在每卷的最后，都设有专章来集中叙述中国与各卷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联系。

这是撰写中东史的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事，也是对文明交往的另一个专题性历史个案分析，同时也是这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特色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就随之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不断增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逐渐复杂化，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在古代世界中，特别在一些世界大帝国之间，就出现了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和一些国家关系体系，用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

在这些国家关系中，中国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交往很具有代表性。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以其“华夷一统”秩序原则，与中东地区各国进行了悠久广泛的文明交往。

早在汉代，中东地区就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中介地区。当时与汉帝国处于同一古典文明等级、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同中华文明东西交相辉映，造成了古典丝绸文明交往之路的繁荣。但是，这两大帝国之间的文明交往的中介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波斯(伊朗)帝国和贵霜帝国更处于枢纽和前沿地位。汉王朝与波斯帝国和贵霜帝国之间是三强鼎立的平等友好交往。这东方三强，和西方强国罗马一起，合演世界文明交往四重奏，共同维护丝绸古道安宁与畅通的国际秩序。

到了唐代，中华文明之光，辉煌四射，和中东地区兴起的、地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彼此吸引、互相交往，同时也发生冲突，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合作。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交往，是中国在中东对外交往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国际文明交往史上的重要篇章。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两大文明，都各自在营造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它可分别称之为“华夷一统”与“阿拉伯伊斯兰”秩序。这两种秩序此消彼长，终于随着 751 年(唐天宝十年)怛逻斯之战唐军失败而使“华夷一统”秩序在中东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代之外，基本上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呈守势或防御性攻势的状态。

但是，民间的文明交往，商旅、教旅和文化交流，却通过各种渠道，时多时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进行。这些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越了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特别是 16 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扩以后，中国和中东各国经历着共同的遭遇

和命运,人民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与联系。所有这些,同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交往一起,成为今日中国与中东各国平等、友好、合作的历史基础。

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我编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忽然想起了马克思这段至理名言。我今年已六十有八,是“坐六望七”之年了,放着轻松不享,却要耗费心力去编写这样大部头的书,莫非忘记了年龄,要“入地狱”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七十虽说不稀,也已是老龄阶段的第二个十年了。要说“入地狱”,早该到了“入口处”了。不过,马克思把“科学入口处”比作“地狱入口处”,那是指但丁《神曲》中所描述的由面对现实的“地狱”,经过苦斗的“炼狱”,从而到达理想“天国”的科学韧性追求,其实质是一种奉献精神。惟有奉献,而后方有求实、求真、求是、批判的科学信仰和科学态度与方法。因为科学就是艰辛的创造性事业,它最需要的就是奉献;科学的核心就是奉献人类,奉献社会。

1993 年 3 月 12 日,我在《阿富汗史》的跋语中写过:“《阿富汗史》是西北大学南亚中东史博士点拟议的中东国别史丛书中的第一本。列入计划的还有土耳其、海湾五国、也门、以色列、埃及等国。不料第一本书就遭受磨难,使人慨叹不已……”。在跋语中,

我坚信有历史学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不会被短见所惑。盛世修史，修史资治，普及和提高历史素质，实在是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所必需。我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的话，正好同马克思的“入地狱”比喻意相贯通。在跋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中国学者撰写的系列《中东国家通史》，必将和外国作者的同类书籍并列在我国图书馆的书架上，供莘莘学子们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意识、获取历史智慧、探索历史启示和提高历史素质之用。”

《中东国家通史》似乎应了中国一句名言：好事多磨难。屡经磨难的《中东国家通史》，终于有幸逢遇西北大学进入211工程的良好时机！1997年，它被列入211重点课题项目，被作为标志性成果而给予资助。陕西省“三五”人才建设基金办公室也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把这部近三百万字的《中东国家通史》，列入了选题。我真的宿愿得偿，要“入地狱”了。“入地狱，写中东史”，成为今后四年奉献自己心力的行动口号。

最近我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名叫《活出意义来》的译著。它是奥地利精神病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名著。过去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时，有一种消极的、但又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以苦为乐。如果从这种消极意义上理解“入地狱”，那是很难振作科学精神的。维克多·弗兰克则从积极方面，深刻地指出，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原因，在于“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虚”。人们应当为生命找出意义，特别是要找出某一时期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这就是他的独特着力点。请看他的精彩论述：

“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天

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他具体去实现。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维克多·弗兰克所讲的生命真义的话启示着科学奉献精神。具体的时间段，是成就事业的关键。时光是稍纵即逝于各个具体时间段中。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寿命的长久而在于为世间做出多少；不在于一时的豪言壮语而在于不断持续地抓紧具体时间中的具体任务，恪尽做人的本分，于工作中得到快乐喜悦。这才是最踏实、最幸福的人生！正如他所说，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生命的具体意义，自然容易笑对人生，以乐观的现实态度，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而负起最大责任。这完全是从积极方面、进而把生命的意义具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入地狱，写中东史”，就成了一个科学奉献的积极行动了。

在这里，我引用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序言的结束语，以表明自己的心情：

“我们治阿拉伯史（包括中东史）的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荏苒光阴书边过，花苍白发镜中来。我已‘坐六望七’之年，但心境未衰，体力尚健，学志犹在，追求未了。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许多已经创造了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理应多增添一些新成果。我正在主持编写的 13 卷《中东国家通史》，是《阿拉伯国家简史》的姊妹篇，也是我老来在世界上再留点东西，为中东学再添几块砖石的心愿。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

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史学前列。”

《中东国家通史》的写作始于1997年，终于2002年，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产品。我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面向新世纪，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

根绝一切犹豫，排除任何怯懦，找出生命的具体意义，走“入地狱，写中东史”之路吧！

1999年9月9日写成

1999年12月15日修改

目　录

Contents

绪论:塞浦路斯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与矿产资源

塞浦路斯是个岛国,面积9251平方公里,位于北纬34°33′~35°34′,东经32°16′~34°37′,地中海东南角。东临叙利亚海岸90公里,西至希腊的罗得岛360公里,南到苏伊士运河439公里,北距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海岸仅80公里,与土耳其隔海相望,是地中海中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第三大岛。

塞浦路斯的这种扼东西方交通要冲,毗邻欧亚非三大洲的有利位置,素有地中海"金钥匙"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强国必争之地。正如古斯塔夫·赫希菲尔德曾于19世纪末所说:"谁要想在东方成为一个强国,并保持其强国地位,就必须把塞浦路斯控制在手。"塞浦路斯的历史发展的确如此,它相继经历了亚述、埃及、波斯、亚历山大帝国、埃及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控制,法兰克人的统治,阿拉伯帝国的袭扰和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在塞浦路斯考古发现的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国家的陶器、饰品、钱币、碑文,还有那至今为各国游客所惊叹的罗马时期的剧院、拜占廷教堂

以及阿拉伯人建立的清真寺,无不诉说着塞浦路斯这个人类文明交往的活化石的风雨沧桑。在近代又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至今英国在塞浦路斯还拥有两个主权军事基地。独立后也没有摆脱周围强国的控制和超级大国的争夺,被喻为“东地中海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塞浦路斯赢得了与它的面积极不相称的重要性,这种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得它在 1960 年独立前几乎从未自主过。

塞浦路斯地形犹如一张铺开的鹿皮,西南端的皮特拉托罗米岛颇像鹿头,而东北部卡帕斯半岛顶端的安德烈亚斯角酷似鹿尾。全岛东西长约 241 公里,南北宽 97 公里,海岸线全长 782 公里。位于岛西部的特罗多斯山是塞浦路斯最大的山脉,约占全岛面积的 1/3,其最高峰奥林匹斯山海拔 1,951 米。山上松林密布,风景如画,山麓丘陵中依稀可见古代寺院的残垣断壁,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和灵气,古今文人墨客多有赞誉。达·芬奇在其《笔记》中曾写道:“此处山色秀丽,招惹得漂泊的舟子来到这百花交织的万绿丛中偷闲小憩。熏风拂荡,使岛上及其四周海面充满了馥郁的气息。”古希腊史诗作家荷马、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公元前 480 ~ 公元前 406 年)、英国前首相狄斯雷利(1804 ~ 1881 年)以及在英国统治时期担任过塞浦路斯政治和公共关系处处长的英国作家达雷,都曾描写过塞浦路斯之美。古罗马名将马可·安东尼,为了取悦埃及艳后克里奥巴特拉,还曾将塞浦路斯赠与她。华尔特·迪斯尼正是在塞浦路斯北部群山之中得到灵感,创作了家喻户晓的电影《白雪公主》。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代表韩波(1851 ~ 1891 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悲观失望,也曾到特罗多斯山区寻求宁静。希腊传说中的爱神阿佛洛狄特就出生在塞浦路斯佩福斯的白色悬崖下,一个名叫皮特拉托罗米乌的地方,因而塞浦路斯又被誉为“爱神之岛”。

塞浦路斯的第二大山脉基里尼亚山，沿北部海岸自西向东绵延，山势趋缓，构成了卡帕斯半岛的主脊。特罗多斯山和基里尼亚山之间的东部和南部是肥沃的梅萨奥里亚（意即“山岳之间”）平原。虽然叫做平原，其实地势并不十分平坦，而是由低山丘陵组成，面积约2,057平方公里，是塞浦路斯的主要农业区。

塞浦路斯有丰富的矿藏，其中黄铜矿颇具影响，素有“铜之岛”之称。在希腊语中，塞浦路斯这个词，意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铜是塞浦路斯最重要的矿藏和国际贸易商品，早在青铜器时代已经开始开采，并运往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希腊等地。这也是塞浦路斯虽系蕞尔小国，却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部分原因。由于长期大量开采，到20世纪60年代，铜矿已近枯竭。另外，塞浦路斯还有丰富的石棉矿，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经开采过，他们把这种长纤维矿制成火葬用的薄板。20世纪初，由于国际铜价上涨，英国人又重新开采，其出口量在世界贸易额中名列前茅。此外，岛上还有铬铁矿、赭土等矿产。石灰石和石膏矿也被广泛开采。

塞浦路斯有4个大湖，其中拉纳卡附近的一个湖盛产食盐，冬季海水经由地下渗到湖内，水深达2米左右，到春季渗水停止，而且湖水逐渐蒸发，湖底地面上留下厚厚的盐层。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还将所产食盐进贡帝国素丹。

气候与物产

塞浦路斯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其特征是夏季时间长且炎热干燥，而冬季时间短且温暖潮湿。由于塞浦路斯位于内陆海域的最东端，并且被大片的陆地所包围，因此受大陆影响显著，造成

低压地区的气流向北转移,导致雨量比预期的要少得多。

塞浦路斯面积虽小,但气候差异颇大。特罗多斯山和基里尼亚山区,降雨量大而且日照时间少,1月平均气温-1~5℃,8月平均气温为15~25℃,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而中部地区,由于地势较低,气候炎热干燥,1月平均气温9~12℃,8月平均气温26~28℃,年降雨量仅400~600毫米。塞浦路斯的四周沿海地带,则介于两者之间。塞浦路斯的雨季一般从11月至次年的3月,夏季偶尔也有降雨,但通常都伴随着雷雨和冰雹。岛上盛行西风,所以西部气温比东部低,降雨量也比东部大。塞浦路斯很少见到阴天,素有"340个晴天"之称。

塞浦路斯虽然四面临海,却是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岛上没有一条常年不干的河流,年平均降雨量不足500毫米,旱灾频频发生。1947~1948年曾发生过一次较为严重的干旱,造成某些地区颗粒无收。据记载,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曾发生过最严重的旱灾,干旱持续长达36年之久。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水成为塞浦路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英国统治时期,曾在降雨量较大的特罗多斯山麓丘陵地带修建水坝。独立后,塞浦路斯政府系统地研究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加速建设水坝和海水淡化工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资源的不足,增加了灌溉面积,促进了农业发展。

塞浦路斯曾经是森林茂密、灌木丛生之地。在青铜器时代中后期,岛上发现铜矿并开始开采冶炼,进而大量砍伐树木用作采矿的矿柱和冶炼的燃料。随着移民的增加,许多林地被开垦。同时,由于塞浦路斯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的特殊位置,曾被周围强国轮番征服和占领,成为列强掠夺资源的基地,尤其是铜矿和木材。在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特罗多斯山区住有300多名伐木工人，专门砍伐树木向帝国首都运送木材和木炭。由于过度砍伐和天灾人祸，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岛上本身就缺水，导致恶性循环，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独立后，塞浦路斯政府通过设立工业用途和农民燃料林区，把两大山区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等措施，保护森林资源。目前塞浦路斯的森林覆盖率为18%，在中东地区独占鳌头，为其他中东国家所羡慕。

塞浦路斯树木种类比较丰富，除一般的经济林松树外，地中海丝柏笔直质优，适于做各种竿子。阿勒颇松、特罗多斯松、黄金橡、塞浦路斯杉均为其特产。另外还有橄榄树、棕榈树、龙舌兰、桉树、阿拉伯橡胶树以及柑橘、柠檬、桃树、李树、杏树、无花果树和山楂树等各种果树。

由于气候原因，岛上生长着各种抗干旱的植物群。如中部低地生长的草原植物群，卡帕斯半岛东部和阿卡马斯半岛西部及某些地势较高的地区生长的马基植被。塞浦路斯的植物种类繁多，据调查有1,800余种，其中140余种属塞浦路斯所特有。

塞浦路斯的野生动物种类不多，野羊可谓当地特产。野羊的毛色与普通山羊一样，但体格健壮有力，奔跑速度快，犄角形如镰刀，其肉鲜嫩味美，在古代曾是王公贵族和殖民统治者捕猎的对象。由于野羊的数量不断减少，在佩福斯森林自然保护区内现仅存有百余只。岛上还有山羊、狐狸、兔子、刺猬、蛇和蝎子等。像豹等凶猛野生动物已经绝迹。

塞浦路斯也是许多候鸟往返非、欧、亚三大洲的歇脚地。像画眉、水鸡、知更鸟、水鸭和红鹤等鸟类来岛上过冬，而啭声金丝雀、戴胜鸟、夜莺等夏季来岛上产卵，啭鸟等则在秋季移栖岛上。据调

查，真正栖居塞浦路斯的鸟类有 365 种，其中鹧鸪鸟较为珍贵，但数量已经不多。

塞浦路斯的土壤特别肥沃，曾以“马卡黑亚”（希腊语“得天独厚”之意）著称，长期以来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却干旱缺水也常影响农业收成，岛上居民常以“雨多，粮多”比喻雨水对农业丰产的重要性。塞浦路斯的农业区域主要分布在白垩高原、中央低地和卡帕斯半岛东部。以旱耕作物为主，大麦、小麦、玉米占主导地位。另外也种植甘蔗、棉花和烟草。葡萄是塞浦路斯的重要经济作物。塞浦路斯的葡萄栽培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圣经》上所说的“英加地的葡萄园”，据认为就是指塞浦路斯西南部佩福斯附近的一块葡萄园。塞浦路斯葡萄色美质优，是酿造葡萄酒的优质原料，所酿造的葡萄酒大量销往欧洲。除葡萄外，塞浦路斯产的柑橘类水果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盛誉，用于大量出口。另外还种植桃、杏、香蕉、硬壳果、无花果、石榴、橄榄等水果供应国内市场。

二、社会构成

人口、民族与宗教

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也无论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悠久与否，均将共同生活在国家版图区域内的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肤色统称为“国人”，如“美国人”、“中国人”、“德国人”，或“斯里兰卡人”，即使斯里兰卡国内存在着反政府的地方割据。但如果我们把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居民称之为“塞浦路斯人”，会使他们感到茫然，而且在国际交往用语

中也极为罕见。塞浦路斯居民,按照他们所自愿归附的民族,被称为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或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而且这种用语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使用。与此相联系,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为主要语言,而英语为通用语言。

塞浦路斯是亚洲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没有人口压力的国家,人口增长率相对较低。据2000年统计,总人口884,000,其中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占84.7%,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占12.3%,另外还有3%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是亚美尼亚人、马龙派教徒和拉丁人以及少许英国人。1974年土耳其入侵导致南北分治后,这些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部地区。

亚美尼亚人是公元578年移居塞浦路斯的。当时的拜占廷帝国皇帝查丁尼二世,为了增强塞浦路斯自身抵御阿拉伯人袭扰的能力,将3,350名亚美尼亚人作为"护工人员和小农",迁居塞浦路斯北部。现在岛上的亚美尼亚人便是他们的后裔。亚美尼亚人仍然使用他们的亚美尼亚文字和语言,信仰亚美尼亚教会(属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其组织和礼仪接近希腊东正教。而马龙派教徒则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从叙利亚逃难来到塞浦路斯,他们的语言是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但由于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教徒与希腊人同属基督徒,在希腊人占绝对多数的生活氛围中,与希腊族人密切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使他们逐渐融入了希腊族人社会。曾在英国塞浦路斯殖民政府中任过职,有机会在岛上实地考察的英国人迈克尔·李和汉卡·李在其合著的《塞浦路斯》一书中明确指出,"他们现在已完全被岛上的希腊生活方式所同化。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的马龙派教徒都自愿留在具有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区域内,用希腊语作为同官方和外来人士交流

的语言。"所以,塞浦路斯主要的民族与宗教区别,就是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之间的区别。

尽管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是塞浦路斯的两大主体民族,但他们均不是塞浦路斯最早的原始居民。在塞浦路斯最早持续生存和繁衍者是雅利安人,被称之为"土著塞浦路斯人"或"古塞浦路斯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雅利安人从安纳托利亚大陆逃难来到塞浦路斯。雅利安人的这次移民交往,塞浦路斯获得了先进的冶铜技术。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阿卡亚人相继大量移居塞浦路斯,从此彻底改变了塞浦路斯的人种成分和语言文化传统,给塞浦路斯打上了深深的文明交往的烙印。古塞浦路斯人逐渐被后来者希腊人所同化,岛上建立起了类似希腊城邦的城市诸王国。后来尽管经历了周围强国的轮番征服和占领,但岛上的希腊人一直保持着希腊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和塞浦路斯直属使徒教会的建立,不仅对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起了极大的凝聚作用,而且从此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与希腊半岛的希腊人,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的语言和宗教,对他们彼此民族认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同一种族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因其采用不同语言和皈依不同宗教,有时不但不能相互认同,反而成为世仇者比比皆是,如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因此,"同源同流",即同一民族、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构成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与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之间的特殊情结,也是后来希腊族人长期寻求与希腊合并的主要原因。

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对他们所信仰的希腊东正教颇为虔诚,自觉恪守清规戒律,这与希腊东正教源于希腊文化传统,各种宗教礼

仪均使用希腊语有关。在希腊族人的心目中，希腊东正教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宗教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教会接近人民，人民支持教会，希腊族人始终保持着这种宗教特色。这一宗教传统是在塞浦路斯特殊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塞浦路斯长期遭受强国的统治，在异族统治下，塞浦路斯人的惟一精神寄托就是宗教，关心他们生活疾苦的是教会，而且统治者又往往把对希腊族人的管理权赋予希腊东正教会，这一状况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尤为突出。希腊东正教会大主教，不仅是希腊族人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世俗的管理者——人民的“埃思纳克”。这种传统使塞浦路斯形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正是在正教会大主教马卡里奥斯的领导下进行的。1960 年塞浦路斯宣布独立，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无可争议地当选为塞浦路斯共和国首任总统。1977 年 8 月马卡里奥斯逝世后，都主教克莱索斯托莫斯(Chrysostomos)被选为大主教。虽然从此塞浦路斯直属教会大主教与塞浦路斯政府总统非一人兼任，但教会在塞浦路斯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前，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会设有圣主教公会(由 5 名在职的都主教组成，受大主教领导)，下设 1 个大主教区，5 个都主教区，有神职人员千余人，教堂 600 多座，修道院 10 多座，神学校 1 所，教徒 40 多万人。大主教府设在首都尼科西亚尼，大主教头衔仍延用拜占廷帝国时期的传统，即“新查士丁尼区兼全塞浦路斯大主教”。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比希腊族人而言，可谓姗姗来迟，他们是在 1571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后，作为统治者来到塞浦路斯的，在岛上已经生息繁衍了 400 余年。土耳其族人一直保持着

土耳其民族特征，讲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诚，毫不亚于希腊族人对希腊东正教的笃信，而且把他们的语言和宗教看成是有别于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的显著特征。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共同生活在这个蕞尔小岛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相邻而居，和睦相处，从未因宗教问题而产生过冲突。但在塞浦路斯数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两族人却没有发生民族融合。其主要原因是，首先，土耳其族人来到塞浦路斯时，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都已形成，尤其是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世界两大宗教。两大宗教经过长期的冲突、融合与沉淀，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均视之为他们的民族特征，倍加珍视，各自把保持自己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看成为他们与主体民族——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和土耳其本土的土耳其人联系的纽带。因此，各自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纯洁，严禁与其他民族通婚，从而严重阻碍了两族之间的深层交往。实际上，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和接受对方的语言和宗教，彼此通婚嫁娶，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方式，然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此三方面却壁垒森严。

其次，奥斯曼帝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与其他被征服地区一样，实行的是民族宽容政策。土耳其统治者不仅恢复了曾被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剥夺的希腊东正教会的权威，而且大加扶持和利用，为其统治服务。一方面把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会变成他们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还借以打击天主教会的势力。利用当地人进行统治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基本方式。而且土耳其统治者认为对希腊东正教会的怀柔和利用，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稳定。因为在希腊、克里特，甚至土耳其本土都有众多的希腊东正教信徒，奥斯曼

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的民族宽容政策，直至1821年希腊独立运动爆发前未曾改变。这一政策也就保证了被统治者希腊族人可以继续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承传希腊文化。

再次，人口少而居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族人，既不能将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同化，也不愿被被统治民族希腊族人所同化。在世界民族交往史上，统治民族被被统治民族所同化者为数不少，但其条件是统治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被统治民族先进的文化。中国的清王朝便是如此，落后的满人被融化于广博精深的汉文化之中。而土耳其族人却拥有先进的文化，决不可能弃而皈他。同时，希腊族人在法兰克人统治时期，曾经历了罗马天主教会对希腊东正教会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残酷迫害，使塞浦路斯的希腊东正教会增强了抵御外来文化的能力，希腊文化能在塞浦路斯延续三千余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保持着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并行发展，直至今日仍然如故。这一状况致使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严重受阻，其结果是彼此敌对情绪加深，矛盾不断激化。

行政区划与教育

塞浦路斯全国分为六个行政区：尼科西亚、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拉纳卡、佩福斯和基里尼亚。首都尼科西亚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金融中心，是六大城市中惟一位于内陆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首都不在沿海的岛国首都之一。尼科西亚相传由埃及托勒密王托勒密·索特之子勒夫康于公元前280年所建，当时命名为勒得拉，后来法兰克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相继作为行政首府。1974年后尼科西亚被分割为两部分，中间的分界线即“绿线”

驻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是自柏林墙被推倒后，世界上惟一一个分裂的首都。

利马索尔位于南海岸，是塞浦路斯的第二大城市，现有人口157,500人。1974年后成为塞浦路斯的主要港口、工业中心和旅游胜地。英国的阿克罗蒂里军事基地就在其西南，英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常来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增添了该城市的繁荣。

法马古斯塔位于岛的东部，其辖区包括整个卡帕斯半岛。位于东南部的拉纳卡市，曾是腓尼基人短暂统治塞浦路斯时期的首府，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是欧洲基督教徒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中转站和外交使团的驻地，现在拉纳卡拥有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港口。佩福斯行政区位于岛的最西端，首府佩福斯城曾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定居点，其前身是公元前1180年希腊移民阿加皮诺建立的佩福斯城，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是塞浦路斯的行政首府所在地。岛的最北部属基里尼亚行政区，行政首府基里尼亚市位于塞浦路斯北海岸，为早期阿卡亚移民所建，是塞浦路斯六大城市中最古老的城市。

塞浦路斯的行政区划，基本沿袭了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六大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城市之中。同时这六大城市除首都尼科西亚位于岛的中部内陆外，其他五个行政区首府均是沿海港口城市，这也是塞浦路斯旅游业兴旺的原因之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南北分治，土耳其族人建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控制着37%的领土，其中包括整个基里尼亚行政区、法马古斯塔行政区的绝大部分地区、拉纳卡行政区的北端、尼科西亚市的北部一角和莫富尔及莱夫卡地区。

塞浦路斯教育发达，大学毕业人数占人口比例的23%，基本扫除了文盲，在全球国民受教育程度排行榜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塞浦路斯政府一贯重视教育，教育经费约占政府预算的1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中小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比例为1:15.9。

塞浦路斯的教育分四级：学龄前教育、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其中小学和初中为义务教育。设有私立和公立的学龄前幼儿园，其教员必须具备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历才能执教。学龄前儿童从五岁零三个月起开始进入小学，学制6年，小学毕业后基本全部升入中学。中学按地区划分接受学生，学制6年，初中、高中各3年。除普通中学外还设有私立的职业中学和技术夜校。男生高中毕业后还必须服役26个月才能上大学或工作。近一半高中毕业生可升入本国的高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是塞浦路斯国内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目前有高等师范学校、高等技术学校、高等林业学校、护士助产学校、精神病护理学校、旅馆学校等30所，学制均为3年，为塞浦路斯培养了大批实用专业技术人员。另外每年有近万名学生通过自费、公费和各种基金等到国外留学，主要到希腊，其次是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1992年，塞浦路斯政府建立了塞浦路斯的第一所大学，即尼科西亚大学，从而结束了塞浦路斯没有大学的历史。

三、国家现状

南北分治状态

在塞浦路斯历史上,尽管长期遭受强国的征服、占领和统治,但塞浦路斯岛作为一个整体,从未发生过地方割据或分治的局面,即使在公元7~10世纪阿拉伯人袭扰时期,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也未曾将塞浦路斯分割占领,而是通过签订条约:双方共同管理、均不驻军、税收平分来保持塞浦路斯中立。然而,从1571年至1963年相临而居近4个世纪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因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分别认同各自主体民族——希腊和土耳其为自己的“祖国”,由于在共和国内权力分配问题上产生争执,1963年两族冲突再起,土耳其族人退出了联合政府,成立了自己的临时行政管理机构。这期间尽管有联合国及其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维和与调解,但未能化解两族的矛盾与冲突。1974年希腊军政府策划了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的军事政变,从而引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最终导致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南北分治的局面。

在土耳其入侵期间,原居住在塞浦路斯南部地区的土耳其族人,或由于安全因素,或自愿或被迫逃往土耳其族人聚集的北部地区,而世世代代居住在塞浦路斯北部的20万希腊族人,背井离乡,逃往南部地区,沦为难民。从塞浦路斯西北部的莱夫卡村向东穿过首都尼科西亚,延伸至东部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的瓦罗沙,占塞浦路斯总面积37%的领土被土耳其军队占领。1975年2月,土耳

其族人宣布成立“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土耳其族邦”，1983 年 11 月，又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至此，塞浦路斯的分裂局面形成，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统一已名存实亡。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号召所有成员国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不仅立即对“北塞”予以承认，而且互派大使，保持特殊关系。土耳其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安全为由，长期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控制区驻扎有 3.5 万士兵，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最大障碍。多年来联合国和美国曾多次协调、促和，由于土耳其拒绝撤军，土耳其族反对在领土上做出让步，而希腊族人也不同意土耳其族人提出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以两个独立国家构成塞浦路斯联邦的国体形式，和谈均未取得任何进展，塞浦路斯分裂局面依旧。

塞浦路斯政府长期致力于国家统一，但塞浦路斯国小力微，势单力薄，纵使有希腊的帮助，其军事力量也无法与土耳其抗衡，不敢存有依靠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的幻想。在 70、80 年代，塞浦路斯政府曾希望通过美英等西方国家向土耳其施压，迫使土耳其和土耳其族人做出让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效。90 年代，塞浦路斯政府加强了与希腊政府的合作，希望在希腊的帮助下尽快加入欧盟，再通过欧盟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目前，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愿望已经实现，但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仍遥遥无期。

自 1963 年 12 月土耳其族全部退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后，尽管塞浦路斯政府已完全由希腊族所控制，但由于土耳其拒绝从塞浦路斯撤军和土耳其族在领土方面的毫不妥协立场，使塞浦路斯政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不仅获得大量经济援助，而且

得到政治上的大力支持。除土耳其政府外，所有国家均承认南部由希腊族人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它迄今已与世界上16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支持最大，多次进行斡旋，并提出解决方案，虽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其支持与关注从未减弱，正因如此，使那些企图承认塞浦路斯分裂现状、默认两个国家并存局面的个别国家却步。如果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继续坚持这一立场不变，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是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的地位也将不会改变。

只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国家”

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以其他国家的承认为前提的，他国的承认表明这个国家的存在，也表明这个国家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际交往；否则，可能被国际社会拒之门外，甚至被认为是某一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破坏者。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内，因民族冲突和大国干涉而造就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便是如此，成为国际上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的“国家”。

“北塞”面积3,423平方公里，占塞浦路斯总面积的37%，真正的土耳其族人有12万左右，加上从土耳其过来的移民，人口总共不过20万。但“政府”建制却相当齐全。1983年11月15日宣布独立，成立了由7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议会任命土耳其族领袖登克塔什为“总统”。1985年3月，土耳其族议会通过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独立宪法”。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自土耳其族宣布独立已近20年来，登克塔什一直紧握总统权

杖。总统下设“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领导人担任,并主持“内阁”事务。

虽然土耳其族人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们深受凯末尔主义的影响,在“国家”构建上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实行多党制。主要政党有:民族团结党,成立于1975年,属右翼,忠于“母国”土耳其,持亲西方政策;民主党,成立于1993年;共和土耳其族党,成立于1970年,属左翼,主张亲苏(俄);族社解放党,成立于1976年3月,属中间偏左。“北塞”政府一直奉行依赖土耳其、亲西方和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政策,尤其把土耳其视为维护土耳其族独立和与希腊族抗衡的后盾,在内外政策上与土耳其保持一致。

“北塞”对其独立地位倍加珍惜。土耳其族反对希腊族把他们看成是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与希腊族同为塞浦路斯的主体民族,应享有平等地位。土耳其族人认为,希腊族的偏见曾给他们带来极大精神创伤,只有独立才能使他们享有平等感和安全感,平等和安全是他们心灵深处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近20年来,“北塞”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首先要求得到希腊族的承认,要求希腊族承认在塞浦路斯存在着地位平等的两个国家,然后再通过双方谈判,建立一个政府权力有限的两个独立国家的邦联。这当然不能为希腊族所接受,这也是两族多年谈而不决的主要原因。但土耳其族态度坚决,非要争得与塞浦路斯政府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为了表明“北塞”是个独立国家,土耳其族人在其控制区向南的山坡上,用石块镶嵌成两面巨大的旗帜:土耳其国旗和“北塞”国旗,在南部地区近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极目可见。

“北塞”一直处于封闭状态。1963年底两族发生冲突后,塞浦路斯政府对土耳其族实行封锁。1983年土耳其族宣布独立后,联

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号召所有成员国拒绝承认，实际上，就是要求世界各国不得与“北塞”进行任何官方的政治、经济交往。1994年，欧盟为了向土耳其族施压，决定禁止进口“北塞”产品。塞浦路斯政府和欧盟的封锁使土耳其族人不易出来，外国人也不易进去，使“北塞”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孤立状态。再加上“北塞”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内部产销不旺，因此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完全依赖于土耳其的援助，发展相当缓慢。1999年，人均收入仅为4,553美元，不及同期塞浦路斯政府控制区人均收入的1/3。

“北塞”对土耳其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北塞”的“国家”安全有赖于土耳其军队的保护。自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至今，土耳其在“北塞”仍驻有3.5万军队拒不撤出。土耳其驻军成为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和塞浦路斯实现统一的最大障碍。其次，“北塞”经济完全依赖土耳其的经济援助。其援助金额每年在3,000万美元左右。“北塞”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而是使用土耳其货币里拉。“北塞”向土耳其出口农产品和水果，从土耳其进口各种轻工业产品。90年代，“北塞”与土耳其签订协议，加快双方的一体化进程，土耳其也加大援建“北塞”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土耳其的经济实力较差，多年来一直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挣扎，“北塞”也深受其苦，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5亿美元，人均收入4,000美元，1994年降为2,830美元，年通胀率却高达80%以上，而同期塞浦路斯南部的人均收入在1万多美元。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再次，“北塞”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土耳其的过分依赖，决定了其政治也就不可能自主，必然听命于土耳其政府，尤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成为土耳其政府调节土耳其与希腊两国关系的杠杆。

土耳其为了加入欧盟，可能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但土耳其族人对重新回到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共同经营的大家庭，心情相当复杂，他们羡慕希腊族的经济发展，羡慕塞浦路斯即将加入欧盟的前景，但两族血腥冲突对他们造成的精神创伤难以愈合，"我们人少，容易受欺负"的思想也不易改变，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宁愿过穷日子，但求平安。这一切都成为这个只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国家"继续存在的条件。

中东地区的惟一欧盟成员国

欧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共同防务的地域性综合体，任何国家加入欧盟都必须符合入选的若干条件和标准，这些条件和标准包括欧洲特征、民主制度、尊重人权、开放市场、欧盟满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适应欧盟准则，其中包括执行《马斯特里特条约》的能力。

塞浦路斯虽然位于亚洲，地处地中海东部地区，但与欧洲关系密切，这不仅因为它曾经历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特别是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更重要的是它的主体民族希腊族人与希腊人同宗同源，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与欧洲一脉相承的基督教文化背景。独立后的塞浦路斯仍然面向西方，次年即相继加入英联邦和欧洲委员会，成为欧洲委员会的第 16 个成员国。当今的塞浦路斯，其主体民族希腊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反映出欧洲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正如 1993 年欧洲委员会在对塞浦路斯的评估报告中所言："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两千多年来，使塞浦路斯深深地根植于欧洲文化和文明沃土，欧洲的厚重影响清晰地反映在塞浦路斯人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

行为准则之中，独立后又与共同体在各个层面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这一切使塞浦路斯的欧洲资格和特征更加光彩照人，使所有疑虑黯然失色，塞浦路斯属于共同体。”作为亚洲国家的塞浦路斯，拥有了欧洲特征——入选欧盟成员国的首要条件。

其次，塞浦路斯是在《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基础上，以及英、希、土三国的保证下建立的共和国，《苏黎世—伦敦协定》和三国的保证，不仅保证了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保证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所必须坚持和实行的社会制度——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度。宪法保证每个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各政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自由。人民把平等、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作为保证和促进塞浦路斯社会自由、公正和进步的前提条件。尽管土耳其入侵导致塞浦路斯南北分治，但塞浦路斯政府仍然坚持和执行依据《苏黎世—伦敦协定》制定的共和国宪法，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对于人权观念，塞浦路斯政府与欧盟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欧洲人权委员会还多次指责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侵犯人权，支持塞浦路斯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的立场。

再次，塞浦路斯独立伊始即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经过40年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依附型经济结构，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1991至1999年平均年增长率达4.5%，高出欧盟现有多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加入欧盟的条件，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和财政货币政策，现已基本满足加入欧盟所必须具备的诸多经济标准。1999年，塞浦路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5%，人均收入近14,000美元，相当于现有15个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的77%（葡萄牙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欧盟15国平均水

平的70%，最大的候选国波兰的人均水平只相当于39%)，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仅为1.5%和3.6%。在某些行业，如旅游和建筑业，还需输入外籍劳务人员。塞浦路斯政府长期实行钉住欧元制定外汇政策，以欧盟的法律制定经济法规。塞浦路斯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各成员国。1999年，塞浦路斯与欧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塞浦路斯总进出口额的43.1%和51.7%。塞浦路斯的市场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符合欧盟的要求。

最后，塞浦路斯长期致力于加入欧盟，其目的不仅要在经济上融入欧洲，而且渴望进入欧盟的共同防务体系，尤其在土耳其入侵并长期占领北部后，塞浦路斯政府加快了入盟进程。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尽管塞浦路斯政府仍然奉行不结盟政策，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其对外政策更加倾向西方，依赖欧盟和美国，目的就是要利用欧盟的准则和美国的影响，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撤军，实现国家统一，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塞浦路斯人口的绝大多数认为他们属于欧洲，并坚信塞浦路斯的统一、安全和繁荣，在于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这也是塞浦路斯所有政党的共同愿望。

2004年5月1日，塞浦路斯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战略价值也将更加重要，使欧盟的安全与防务将延伸至地中海最东端，塞浦路斯也将承担《马斯特里特条约》的义务，与欧盟采取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塞浦路斯将再次成为欧洲与中东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桥梁。正如欧盟委员会在1995年1月通过的决议中所说，塞浦路斯的“成员国地位对所有欧盟成员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欧盟成员国的上万家公司选择塞浦路斯，作为与中东地区进行商贸活动的总部所在地，这不仅因为塞浦

路斯与欧洲有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而且他们也看中了塞浦路斯拥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四通八达的交通、完备的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特别是塞浦路斯拥有国际上公认的司法体系。另外，塞浦路斯与阿拉伯国家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凸显了作为中东地区惟一欧盟成员国，在东西方交往中的桥梁作用。

第一章　早期移民和王国时期的文明交往

一、史前移民交往

基罗基提亚文化和索特拉文化

据考古发现表明，在塞浦路斯岛上，人类最早的活动始于公元前 8800 年。在南海岸阿克罗蒂里的一个山洞里，考古发现了该时期人类生过火的遗迹和石器片，还有幼河马、小象、鸟类和鱼的骨骼化石。但人类在塞浦路斯的定居活动，在此后的 2000 多年之后才出现。

公元前 7000 ~ 前 6500 年的新石器时期，塞浦路斯迎来了首批定居者。他们在濒临海岸、河流或山坡上，有永久性水源且便于防御的地方，用石头和土坯建成圆形蜂窝状的房屋——苏利。他们以农耕为主，兼事捕鱼和狩猎，用石头制造器物、石斧及箭头等工具，人死后便埋葬在屋内的地面下。据考古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定居地有 15 个，而规模较大、最具特点者，首推位于南海岸的基罗基提亚遗址，故称基罗基提亚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5700 ~ 前 5500 年，可能是一场严重的自然灾难如地震，使基罗基提亚文化突然消

失了，从而在塞浦路斯历史上，留下千余年人类活动的空档。

首批定居者来自何处，从其遗址中挖掘出的源自叙利亚海岸的一些器物，如红玉髓、珍珠母，以及原产自安拉托利亚中南部的黑曜石看，他们可能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而且他们的圆形蜂窝状房屋，与安拉托利亚地区当时通行的直线形房屋建筑迥然不同。塞浦路斯的第二批定居者，始于公元前 4600 ~ 前 4500 年，他们与基罗基提亚文化毫无继承关系。他们的房屋结构通常呈单体圆形，但也出现了如椭圆形、地下建筑等形体，有些定居地已出现把死者葬于户外山坡上的习俗。这一时期最大的进步是出现了陶器制作，而且制作工艺也有相当发展。在岛的北部，已经知道在白色的陶土上涂上红色，还知道使用一种针状类似刷子的工具。而在南部能用一种多齿的工具，把陶器的表面“刷”成花纹。塞浦路斯此时出现的陶器制作一直延续至今。考古发现表明，该时期的定居地有 30 处之多，其中位于南海岸索特拉的定居地规模最大，类似房屋的建筑约有 50 座，故称索特拉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4000 ~ 前 3900 年，地震将大部分定居地夷为平地，但人类在塞浦路斯的活动仍然继续着。

继索特拉文化之后，约在公元前 4000 ~ 前 2500 年，塞浦路斯社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出现了以埃里米文化为特征的村社群体，定居地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此，塞浦路斯的人类活动，由间断、孤立状态，逐渐步入人口不断增加、各定居点之间频繁交往的连续发展阶段。

安纳托利亚难民带来的变化

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安纳托利亚难民来到塞浦路斯。他们

的外逃可能与原居住于小亚细亚南部的卢维人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科尼亚和奇里乞亚平原的入侵有关。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在塞浦路斯就发现了铜矿，塔马索斯、索利、利姆尼和卡拉瓦索斯都是有名的铜产地。铜很快取代了石器，用来制造兵器、工具和器物。铜的发现对塞浦路斯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岛上的定居点之间虽有交往，但拥有铜矿的西部定居者为了保护铜矿、争夺肥沃的土地和水源，与东部的定居者之间时有冲突发生。安纳托利亚难民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来到岛上，加入了西部定居者的行列。他们的到来，在塞浦路斯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加工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塞浦路斯发现铜矿以后，即开始冶炼和加工铜器。但据考古发现，当时制造的铜器，均为有毒而且难以使用的砷铜（是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所致，还是有意加入砷，炼成砷—铜合金，现在不得而知）。当时的安纳托利亚，已具备较高水平的冶炼和铜器制造技术。难民中不乏能工巧匠，他们来到塞浦路斯后，开始在冶炼铜矿时加入锡，炼成锡—铜合金，即青铜。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塞浦路斯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他们在炼铜中所加入的锡，可能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

墓葬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像新石器时期那样，人们生前住的圆形蜂窝状房屋，死后就成为他们的墓穴，而是开始使用户外公墓。在塞浦路斯许多地区都发现有这种公共墓地的遗迹。塞浦路斯中部的勒德拉（即现在的尼科西亚附近）、北海岸基里尼亚附近的贝拉佩斯（今弗诺斯），都有这类著名的大坟地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该时期的定居点逐渐向塞浦路斯的中部地区扩展，定居地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

在墓葬中发现有十字形的小肖像,说明当时已存在对神祇的某种崇拜。每个坟墓上都有一个洞,是否意味着死者灵魂不死,从这个洞中可以出入天堂。而且女性的坟墓中有更多的随葬品,表明当时可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另外,与崇拜丰产女神有关的一些神话也在此时传入塞浦路斯。最初,这位女神名叫库普里斯,后来则以人们较熟悉的阿佛洛狄特见称。从此,塞浦路斯就和这位女神联系了起来,塞浦路斯也就有了"爱神之岛"的美名。

塞浦路斯的生产、生活的上述变化特征,首先发生在以菲里亚为中心的、安纳托利亚难民定居的西部地区,故称菲利亚文化。实际上,这一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公元前 1900 ~ 前 1650 年青铜器时代中期,逐渐波及全岛。安纳托利亚难民在塞浦路斯引起的巨大变化,与这期间塞浦路斯与外界的交往相辅相成。这一时期,塞浦路斯不仅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等中东地区交往频繁,而且从在色萨利、阿提刻,甚至匈牙利等地发现的源自塞浦路斯的器物表明,塞浦路斯与希腊半岛和中欧地区也有交往。早期人类交往,促进了塞浦路斯的发展。

塞浦路斯著名历史学家 C.斯布里达奇斯博士在其著作《塞浦路斯简史》中认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塞浦路斯人,与很早就有雅利安人部落定居的安纳托利亚大陆上的人属同一种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人,从人种上讲属雅利安人。这些雅利安人,就是所谓的古塞浦路斯人,或称土著塞浦路斯人。

迈锡尼—阿卡亚人成为文化主体

公元前 2 千纪中叶,原居于希腊中南部的迈锡尼—阿卡亚人移居塞浦路斯。迈锡尼—阿卡亚人是在公元前 1600 年前后进入

希腊中南部，公元前15世纪征服了克里特的文化中心克诺索斯并向周围扩张。正如英国历史学教授休特利·达比在其《希腊简史》中所说，“从那时起，迈锡尼人就在爱琴海上居于统治地位，并且不断扩展他们的海外领地。他们的活动遍及地中海东部，特别是以铜矿著名的塞浦路斯岛”。据记载，首批迈锡尼—阿卡亚移民大约有1,200人，他们到达塞浦路斯的时间应在埃及的“牧人王朝”劫掠塞浦路斯之前，即公元前1500年左右，是希腊人移民塞浦路斯的第一阶段。迈锡尼—阿卡亚移民主要定居于恩科米（今萨拉米斯附近）、克提昂（今拉纳卡）和伊达利昂等地。在这些地区都发现有较完整的迈锡尼—阿卡亚人城市的遗址。而且塞浦路斯北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至今仍称作“阿卡亚人海岸”。

迈锡尼—阿卡亚人移民塞浦路斯，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一影响持续至今。首先它开始改变塞浦路斯居民的人种成分，与原居于塞浦路斯的土著塞浦路斯人相比，文化更发达的迈锡尼—阿卡亚人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体，是富有阶层和权贵。从岛上出土的许多迈锡尼人的墓葬遗物，尤其是具有自然主义色彩装饰的古瓶、由迈锡尼人带入塞浦路斯或在岛上制造的金质权杖和王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迈锡尼—阿卡亚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物品，也使得他们的文化在塞浦路斯扎下了根，并且向叙利亚海岸传播，从而改变了塞浦路斯主要与叙利亚、巴勒斯坦交往的局限性，开拓了塞浦路斯与爱琴海地区的交往。移民把迈锡尼物品运到塞浦路斯，又从塞浦路斯向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诸城市和埃及输送。后来由塞浦路斯工匠制作的仿制品，也一并出口到中东各地，而塞浦路斯的铜和木材则源源不断地运往迈锡尼。在土耳其南海岸，发现了一艘公

元前 14 世纪的沉船，船上满载铜锭和其他物品。研究人员认为，该船是在向爱琴海方向航行中沉没的。

另外，塞浦路斯的原始崇拜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岛上居民供奉的是青铜或陶制的肾脏模型，颇具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某些习俗，而现在在神殿里，供奉的是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迈锡尼“牛角神”，而且在铜器和陶器作坊前也供有“牛角神”，意即求神灵保护这些在当时来说最重要的“工业设施”。

阿拉西亚王国与塞浦路斯—米洛斯文字

迈锡尼—阿卡亚人殖民塞浦路斯后，塞浦路斯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时期。塞浦路斯最早的王国——“阿拉西亚”或“阿赛”就存在于这一时期。在埃及的“阿玛尔纳档案”中，发现有阿拉西亚国王写给埃及法老的书信。阿拉西亚国王在信中向法老承诺，用岛上的铜换取埃及的金银饰品和各种奢侈品，如一个镶金的乌木床和一辆金马车。另一封阿拉西亚国王写给埃及法老阿克那顿（或阿孟霍特普四世国王公元前 1379 ~ 前 1362 年）的信表明，埃及是阿拉西亚的盟友，阿拉西亚国王建议法老不要与赫梯人缔结条约，因为赫梯人是阿拉西亚人的敌人。从阿拉西亚国王与其盟友埃及法老和乌加里特国王之间的书信交往，及其之间的商贸关系表明，阿拉西亚既不是埃及的附属国，也不是赫梯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王国。阿拉西亚王国有一个港口，在公元前 13 世纪后期，国王拥有自己的舰队。公元前 13 世纪末至公元前 12 世纪初，阿拉西亚王国被“海上民族”摧毁。

关于阿拉西亚（或阿赛）王国的疆域，有人认为仅指恩科米，也有人认为是包括恩科米在内的塞浦路斯其他地区，或整个塞浦路

斯。现在趋向认同是整个塞浦路斯的说法，恩科米是王国的首都或中心。现在有证据表明，阿拉西亚王国使用的文字，是塞浦路斯一米洛斯文字。

塞浦路斯一米洛斯文字，是克里特的A类线型文字传入塞浦路斯后，在塞浦路斯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字。传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于是从克里特直接传入，还是间接传入，目前尚无定论。因为在公元前2500～前1650年，塞浦路斯与克里特有密切的商贸和文化交往，在塞浦路斯的拉皮索斯和弗诺斯等地，都出土有该时期的克里特的茶杯、古瓶、花瓶、短剑等物品，同样在克里特也有该时期塞浦路斯铸造的金币塔兰特。然而，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塞浦路斯与克里特的交往甚少。但塞浦路斯与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城之间商贸频繁。在乌加里特，生活有许多克里特商人，他们在商贸交往中，可能使用的就是克里特的A类线型文字，通过商人传入塞浦路斯。无论传入方式如何，塞浦路斯一米洛斯文字在塞浦路斯的出现，适应了塞浦路斯社会以使用铜器为标志的“原始工业革命”，以及以大宗铜出口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的需要，是塞浦路斯文明的开端和社会文化的一大进步，也是文明交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例证。

据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塞浦路斯一米洛斯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该文字有80个字母，在全岛通行；第二阶段简化为60个字母，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末的恩科米；第三阶段的塞浦路斯一米洛斯文字，是在乌加里特的一块碑石上发现的。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末的3个多世纪里，该文字在岛上一直通行，直到公元前13至公元前12世纪之交，塞浦路斯遭到“海上民族”的劫掠和破坏，随着阿拉西亚王国的灭亡而逐渐消

失。

希腊移民文化及其影响

公元前 13 世纪末，随着希腊大陆迈锡尼文化的解体，迈锡尼文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要中心迈锡尼、太林斯、皮洛斯遭到严重破坏，希腊人开始向地中海东部地区迁移。东方文献中曾提到的“海上民族”，其中就包括有希腊人。公元前 1225 ~ 前 1190 年，“海上民族”相继摧毁了塞浦路斯的主要定居点恩科米、克提昂、辛达、马阿、皮拉等城市，随后有部分“海上民族”在被他们夷为平地的废墟上进行重建并定居了下来，这就是继迈锡尼 - 阿卡亚人之后，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第二阶段的第一波移民潮。公元前 12 ~ 前 11 世纪之交的特洛伊战争，造成了希腊人的第二波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他们沿着祖辈们的足迹，向塞浦路斯迁徙。实际上，从公元前 13 世纪末至公元前 11 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里，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的移民活动一直持续着。

希腊人移民塞浦路斯，并不像安纳托利亚难民那样和平地来到岛上。希腊人是凭借着他们人多势众，拥有在当时来说很先进的武器——能砍能刺的剑，对于疏于防范、武器落后、各城市和定居点之间不甚团结的塞浦路斯人而言，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各城市相继被毁。希腊人用暴力打开了通往塞浦路斯的移民之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战争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它能达到和平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腊人的这次战争交往和向塞浦路斯大量移民，对塞浦路斯产生了多方面的、极其深远的影响。

希腊人摧毁了塞浦路斯的许多城市并大量移民，最终导致阿

拉西亚王国的灭亡。希腊移民在塞浦路斯建立起了许多类似希腊城邦的定居地。在塞浦路斯和希腊,有许多关于首批希腊移民在岛上建立城市的传奇故事。相传希腊萨拉米斯岛的英雄阿雅克斯之弟托塞,被一场风暴刮到塞浦路斯,创建了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城;卡尔卡诺在塞浦路斯中部建立了伊达利昂;斯巴达的普拉山德罗斯在北海岸创建了拉皮索斯;奇特罗伊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他建立的地方为奇特罗伊;狄摩芬在岛的西北部建立了埃皮亚城;塞浦路斯西部的阿卡马斯,正是由一个叫阿卡马斯的希腊人所建等等。这些定居地逐渐发展成类似希腊城邦的独立的城市王国。从此,塞浦路斯进入了王国时期。

在《荷马史诗》记述的特洛伊战争中,提到过塞浦路斯的佩福斯国王基尼拉斯,曾向希腊的特洛伊远征军首领阿伽门农王馈赠过贵重礼品。希腊抒情诗人提尔泰(公元前 7 世纪)和品达(公元前 5 世纪初),赞颂过基尼拉斯的富有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希罗多德(公元前 484 ~ 前 425 年)和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家,也都记载过当时塞浦路斯居民中有希腊的雅典人、阿吉弗人、阿卡亚人和萨拉米斯人等等。这些都为希腊人大量移居塞浦路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希腊移民彻底改变了塞浦路斯的人种结构,希腊人成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民族,而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土著塞浦路斯人主要是安纳托利亚难民雅利安人,人口稀少;迈锡尼—阿卡亚人,从人种和地域上讲,同为希腊人,他们逐渐被同化。尽管阿马修斯聚集的土著人一直生存到公元前 4 世纪,同样也没有逃脱被同化的命运。在塞浦路斯通行了 3 个多世纪的塞浦路斯—米洛斯文字,逐渐被希腊语所取代,希腊文化渗入到塞浦路斯的各个领

域。

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所讲的是阿卡亚—多利亚方言，是由希腊移民在多利亚人占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前，从阿卡亚传来的。在一些铭文、古代纸草文献和辞书中，尚残存这种古代方言的片段。特别有趣的是，塞浦路斯音节字母，据说系由迈锡尼拼音字母演变而来，岛上迈锡尼时期的文物上已发现有这种音节字母，从迈锡尼发现的一些铭文中，也有许多塞浦路斯文的单词和姓氏。

塞浦路斯的早期崇拜，也更多地受到希腊人影响。远在公元前3千纪，塞浦路斯人就开始崇拜丰产女神，后来一直以希腊女神阿佛洛狄特的名字沿袭下来。阿佛洛狄特本来是从希腊传入塞浦路斯的，但在塞浦路斯的传奇故事里，已完全将她本土化。传说爱神阿佛洛狄特就出生塞浦路斯西南佩福斯海岸的白色悬崖下，一个叫皮特拉托罗米乌的波涛之中。在塞浦路斯的各个角落，都有奉祀阿佛洛狄特的圣所。其他希腊众神也都传入岛上，但各地的崇拜却不尽相同。如萨拉米斯崇拜宙斯，他们对宙斯的崇拜，据认为与萨拉米斯的创建者托塞有关。在索利附近的埃皮亚和伊达利昂两地，人们特别崇拜雅典娜，而库里昂则崇拜阿波罗。塞浦路斯的诸王国，尽管它们相互独立，之间时有争斗和冲突，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高度地一致：他们都到位于希腊中部的希腊宗教中心、阿波罗的圣地达尔斐奉献祭品，这一点与希腊各城邦的情况极为相似。

塞浦路斯的日常生活用品是迈锡尼器物；原有的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已被希腊语所取代；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希腊人；原有的阿拉西亚王国早已灭亡，随之而起的是一些希腊式独立城市王国。诸王国仍采用希腊的王位世袭制度，国王行使最高祭司、法官和军

人移民塞浦路斯，也可能与他们想通过扩大贸易获得向亚述人纳贡的补偿。腓尼基人对主要居住着土著塞浦路斯人的阿马修斯，以及有丰富铜矿的塔马索斯产生过影响，对扩大塞浦路斯与希腊半岛的商贸交往做出过贡献。但从总体上讲，腓尼基人对当时塞浦路斯的物质和文化影响有限，只是后来因其与波斯人联合反对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而在塞浦路斯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亚述的征服和埃及的短暂统治

亚述的宽松政策

塞浦路斯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周围强国征服的对象。公元前 709 年，亚述人为了保护叙利亚和北小亚细亚的亚述西部海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诸王因而丧失了在希腊和腓尼基人移民时所获得的自治，向亚述帝国称臣纳贡。

亚述王萨尔贡二世为了纪念自己的功绩，在克提昂立了一块石碑（现藏于柏林博物馆），记录了当年亚述占领塞浦路斯事件，并提及塞浦路斯的 7 个国王向他表示敬意。大约在公元前 673 至公元前 672 年，萨尔贡二世之孙萨哈拉顿，为了建造宫殿，强迫被征服地区捐资。在捐资名单中，其中包括塞浦路斯的 12 个王国。它们是：萨拉米斯、佩福斯、索利、克提昂、基里尼亚、拉皮索斯、马里昂、阿马修斯、塔马索斯、伊达利昂、奇特罗伊、努里。当时塞浦路斯具体有多少个王国，据现有的资料还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王国早在亚述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几个大王国还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萨拉米斯王国和佩福斯王

国。在萨拉米斯的王室墓葬中，曾出土过三件“镶银”宝座，据认为是荷马在《奥德赛》中所描述过的国王和王后的宝座。在塞浦路斯的南海岸，还发现了一柄属于迈锡尼时期国王的权杖(现存于塞浦路斯博物馆)。这些都说明上述王国的确存在过。

亚述征服塞浦路斯后，腓尼基人聚集的克提昂与其他王国一样，也向亚述称臣纳贡。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之子赛纳克里布统治时期，腓尼基人利用亚述与巴比伦发生战争之机，一度恢复了在克提昂的统治。公元前 671 年，新城国王巴尔联合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策划反对亚述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后来巴尔又举行过两次未成功的起义。亚述为了制衡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大力扶持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在亚述征服了腓尼基人的西顿和推罗城邦后，腓尼基人大量涌入塞浦路斯。

亚述征服塞浦路斯，更多地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所以其统治相对宽松。除了控制与外结盟、签约和宣战之外，一切内政仍归诸王国自己处理。首先，诸王国仍保留了迈锡尼的统治方式，实行王位世袭制度。国王大权独揽，身兼最高祭司、法官和军事统帅。后来实行了公民会议制度。公民会议由国王主持。另外还设有由亲王(阿纳克特)和公主(阿纳赛)等王室成员组成的最高王室会议。实际上，这是一种王室寡头统治。其次，亚述征服并没有毁灭塞浦路斯诸王国的繁荣。考古发现公元前 8 世纪末至公元前 7 世纪初的萨拉米斯和阿马修斯的王室墓葬，其陪葬品的奢侈程度，足以说明其富裕。再次，亚述人对塞浦路斯在建筑、文化上也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塞浦路斯仍保留着浓厚的迈锡尼建筑式样和文化特征。

亚述帝国解体后，公元前 663 年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自由，贸易开始繁荣。塞浦路斯工匠制作的颇具塞浦路斯特点的石灰岩雕

像，出口到周围各国，同时他们还在岛外建立作坊，进行巡回指导，并鼓励当地工匠仿制。

埃及的文化遗存

摆脱亚述帝国的统治，获得近一个世纪休生养息的塞浦路斯，再次成为日益强大的埃及征服的目标。埃及国王霍夫拉（公元前588～前569年在位，希腊人称之为阿普里斯），大败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联合舰队，但没有攻取塞浦路斯。公元前560年，霍夫拉的继承者阿马西斯王攻占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诸王向埃及称臣纳贡，但仍保留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埃及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时间虽短，却产生了一定影响。早在亚述统治时期，塞浦路斯与埃及王夏巴卡（公元前716～前702年在位）联合反对亚述。在这次合作中，埃及的雕刻艺术传到了塞浦路斯。埃及统治塞浦路斯后，埃及王阿马西斯崇拜希腊的传统和文化，在他慷慨捐助下，在塞浦路斯和希腊半岛建起了许多神庙，并把他本人的木质雕像赐赠给这些神庙供奉。这一时期，塞浦路斯与埃及的贸易远远大于腓尼基与埃及的贸易。双方的密切交往，在塞浦路斯形成了独具埃及特色的塞浦路斯雕刻艺术，其特征是脸庞宽大，眼睛大而凸出，嘴唇薄，鼻子硕大。这些塞浦路斯雕刻品还出口到希腊各地。另外，埃及对塞浦路斯的建筑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萨拉米斯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墓葬，其建筑风格颇具埃及特色。

三、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的文明交往

波斯帝国的宽松政策

波斯帝国是中东地区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到大流士时期其版图已包括巴尔干的色雷斯、小亚细亚、列万特、埃及、两河流域、波斯本土及中亚和印度河流域，与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相差无几。公元前6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波斯帝国把扩张矛头指向了爱奥尼亚地区和希腊半岛。公元前546年，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城市王国吕底亚被波斯帝国所灭后，塞浦路斯便成为波斯帝国从海上进攻希腊的必经之地。面对所向披靡的波斯帝国大军，公元前525年，塞浦路斯诸王国主动向波斯帝国臣服。塞浦路斯与腓尼基、叙利亚、巴勒斯坦等被划归波斯帝国的第五省管辖。这一时期塞浦路斯历史的主要特征，就是波斯帝国与希腊对塞浦路斯的反复争夺。

塞浦路斯诸王向波斯帝国纳贡，年贡为350塔兰特(古希腊、巴比伦等国最大的币制单位和重量单位，1塔兰特约等于30千克白银)，并为其对外征战提供军队、船只。作为回报，塞浦路斯诸王国享有比埃及统治时期更高程度的自治权：诸王国内政完全独立自主；王位得到波斯大王的承认；可以完全自由地铸造银币和铜币；自主决定对外政策，甚至包括与外签约时也无需波斯帝国官员的监督，这一点在波斯帝国其他行省均属例外。如萨拉米斯国王与非洲昔兰尼(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在北非建立的一个城邦，现属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省)的一些国王关系密切，并款待过流亡中的非

里蒂姆女王。塞浦路斯人还可以自由前往希腊的宗教中心——阿波罗的圣地达尔斐奉献祭礼，以及参加希腊的各种文化宗教活动。所以，尽管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塞浦路斯仍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在文化、艺术方面，独具特色的“塞浦路斯风格”的雕塑正是出现于这一时期。

奥勒西洛斯起义

波斯帝国统治塞浦路斯后，由于诸王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和波斯帝国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塞浦路斯诸王国逐渐分化成了亲波斯和亲希腊两大阵营。亲希腊者反对波斯帝国把原来规定的向波斯帝国定期捐赠改为固定税收，而且对币制单位和钱币上的标识颇为反感；索利、马里昂、克里昂和佩福斯是亲希腊的中坚；而塞浦路斯最有影响的萨拉米斯王国则与波斯关系密切。腓尼基人的新城——克提昂王国，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观望后，成为波斯帝国最忠实的盟友。

尽管塞浦路斯诸王国获得了高度自治权，但他们对波斯帝国的异族统治仍然心怀不满。公元前 500 年，当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城邦爱奥尼亚举起反抗波斯帝国统治的大旗时，萨拉米斯的奥勒西洛斯推翻了亲波斯的王兄高戈斯国王，联合除阿马修斯以外的其他诸王国，发动了一次反抗波斯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波斯帝国大军在萨拉米斯附近登陆，两军展开激战。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奥勒西洛斯英勇阵亡，起义失败了。奥勒西洛斯成为塞浦路斯希腊人的民族英雄。希罗多德曾对此次塞浦路斯人起义作过详细记述：“塞浦路斯人只过了短短一年的自由生活就又重新沦为奴隶了”（公元前 498 年）。

奥勒西洛斯领导的反抗波斯帝国的起义失败后，塞浦路斯诸王再度向波斯帝国称臣，他们的义务和自治地位也并无多大改变。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大王薛西斯出兵希腊时，塞浦路斯诸王按义务向波斯帝国提供了150艘船只，并参加波斯帝国大军与希腊作战。但对于这一事件史学家有不同解释。希罗多德以薛西斯的盟友、哈利卡纳苏斯（多利亚人在小亚细亚西南部建立的一个城邦，公元前6世纪时归附波斯帝国）的阿尔迪美丝娅女王，曾在薛西斯面前责备过塞浦路斯人为证据，认为塞浦路斯人表面上帮助波斯帝国入侵自己的希腊同胞，而实际上是暗中帮助希腊人。

塞浦路斯为了摆脱波斯帝国的统治，争取独立，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基本上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塞浦路斯的战略地位和与希腊的民族文化渊源，公元前450年，雅典组织了一次解放塞浦路斯的远征。雅典远征军初战告捷，占领了塞浦路斯西北部的马里昂。但在次年围攻腓尼基人占据的克提昂时，雅典统帅西蒙阵亡，雅典被迫与波斯帝国媾和，签订了《卡里亚斯和约》，雅典承认波斯在塞浦路斯的地位，塞浦路斯从此与希腊大陆隔绝。在波斯帝国统治者的扶植下，腓尼基人占领了岛上最著名的城市萨拉米斯。

希腊文化的传播者：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一世

公元前411年，萨拉米斯城的建立者，托塞家族的后裔埃瓦哥拉斯一世（公元前435～前374年），在雅典的帮助下被拥立为萨拉米斯国王。作为回报，埃瓦哥拉斯一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支援了雅典人，雅典人于公元前410年授予埃瓦哥拉斯一世雅典荣誉公民称号，其授誉法令刻在了雅典卫城的一根圆柱上，残存的圆柱

现保存在雅典博物馆。

公元前405年，埃瓦哥拉斯一世再次为遭到斯巴达人重创的雅典将军科农提供避护。公元前399年，科农击败斯巴达人，恢复了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丧失的海上霸权。埃瓦哥拉斯一世在雅典盛誉空前，雅典人把他和科农的塑像矗立在雅典宙斯神庙附近的中心广场，并授予埃瓦哥拉斯一世一顶金叶花冠。

埃瓦哥拉斯一世雄心勃勃，决心以萨拉米斯为霸主，把纷争不和的塞浦路斯诸王国统一起来。他采取和平手段和武力征服相结合。埃瓦哥拉斯一世的行动遭到了克提昂、阿马修斯和索利等王国的抵制，他们于公元前390年投奔波斯大王，请求波斯帝国干预。另外，波斯帝国大王对埃瓦哥拉斯僭越权限，铸造金币，怒不可遏。波斯大军兵临塞浦路斯，从而拉开了埃瓦哥拉斯一世为实现塞浦路斯统一和独立的"塞浦路斯战争"（公元前390～前380年）的序幕。

在"塞浦路斯战争"中，埃瓦哥拉斯一世并没有得到雅典的相应帮助，雅典曾派军支援，但当斯巴达与波斯帝国签订《安塔尔西达斯和约》后，雅典军队撤走了。埃瓦哥拉斯一世并没有完全陷于孤立，他得到了埃及等盟友的援助，曾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公元前382年攻克腓尼基的推罗城，随后又在克提昂附近的一场海战中大捷。由于埃及中止了援助，埃瓦哥拉斯一世从此急转直下，最后不得不放弃他的宏伟目标，承认波斯帝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以保住他在萨拉米斯的王位。这场长达10年的战争，使萨拉米斯贫困不堪，政局动荡。公元前374年，埃瓦哥拉斯一世遇刺身亡，其子尼科克列斯继承了王位，称埃瓦哥拉斯二世。埃瓦哥拉斯二世执政后，曾利用波斯人的帮助企图统一全岛，遭到了其他诸王国的反

对。公元前 351 年，普尼塔普拉斯推翻了埃瓦哥拉斯二世，夺取了萨拉米斯国王的宝座。

埃瓦哥拉斯一世虽然壮志未酬，但他对塞浦路斯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他把希腊拼音字母介绍到塞浦路斯，并在全岛广泛推广。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希腊文化在塞浦路斯广泛传播。他铸造的钱币上镌刻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具有著名的普拉克西特列斯派（雅典人，古希腊雕塑家，公元前 390 年 ~ ？ 作品以将神话传说人物纳入世俗生活为其特征）的特征，其他希腊众神，如阿波罗、赫拉、雅典娜、阿尔迪美丝和阿佛洛狄特等神像，也常见于这一时期的钱币上。同时，也有上述众神的雕像，其中，克提昂著名的阿尔迪美丝雕像，也属于普拉克西列斯派，现收藏于维也纳博物馆。该时期的重要建筑是弗尼（埃皮亚）王宫和库里昂的阿波罗神殿。弗尼王宫的建筑风格，比塞浦路斯以往的任何建筑都更多地吸收了希腊式的建筑艺术特色。遗憾的是，这一建筑可能是在塞浦路斯战争期间毁于兵燹。由于塞浦路斯与希腊保持着密切交往，这一时期塞浦路斯的艺术与审美的发展，与希腊本土不相上下。从现已发现的许多雕刻、花瓶等器物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章　希腊化、罗马和拜占廷时期的文明交往

一、希腊化时期的文明交往

亚历山大大帝与塞浦路斯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统一希腊诸城邦，势力日益强大。当时在希腊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希腊的任何统治者，无论从自身的安全战略利益还是从种族义务出发，都必须把矛头指向亚洲，进攻波斯帝国，拯救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同胞，并打出一个帝国的江山来。而此时的波斯帝国，内讧不断，濒临崩溃。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向披靡，数年之内即灭波斯帝国，从此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西亚、南亚和北非地区进入了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兵临推罗城下。推罗是进入埃及的门户，城防坚固，亚历山大久攻不下。而此时的塞浦路斯，尽管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享有高度自治，但波斯帝国的统治属异族统治，塞浦路斯人时有反抗。公元前332年，塞浦路斯诸王给亚历山大提供了由120艘最好的战船组成的舰队，而且萨拉米斯国王

普尼塔普拉斯、阿马修斯国王安德诺科斯和索利国王帕西克拉茨，率领各自王国的舰队，积极参加了战斗，希望亚历山大把塞浦路斯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亚历山大此次远征的胜利，塞浦路斯功不可没，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继续向埃及进军。

亚历山大大帝给塞浦路斯丰厚的回报，他把塞浦路斯诸王看作自己忠诚的盟友，承认他们的自治地位，而且诸王还可以铸造金币，只是要求在钱币上铸有他的名字和头像图识即可。塞浦路斯诸王享有在亚述、埃及和波斯统治时期是从未有过的特权。允许塞浦路斯诸王国铸造金币，实际上就是把塞浦路斯的流通货币纳入了亚历山大帝国的货币体系之中。在塞浦路斯人看来，亚历山大东征是所有希腊人的事业，他们作为希腊人的一部分，也应尽民族义务。所以，从诸王室成员、贵族、演说家，到水手、船工等都自愿为亚历山大效力，随他远征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有些塞浦路斯人还被委以重任，如索利的贵族斯塔萨诺，对亚历山大在波斯统治制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被任命为总督。塞浦路斯人成为亚历山大远征军中的中东事务顾问。

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塞浦路斯与希腊，特别是雅典，商贸往来异常活跃，塞浦路斯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岛上有萨拉米斯、佩福斯、库里昂、拉皮索斯、基里尼亚、马里昂、阿马修斯、塔马索斯和伊达利昂等王国，而尼科克里昂统治的萨拉米斯和尼科克列斯统治的佩福斯最为重要。

托勒密与安提俄克对塞浦路斯的争夺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故于巴比伦，他所缔造的帝国也随之崩溃，出现了鼎足的三个王朝：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希腊的

安提俄克王朝和统治叙利亚、巴比伦以及东部地区的塞琉古王朝。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既是埃及本土安全的水路屏障，也是希腊爱琴海的门户，同时也是保护海上商路畅通的咽喉，托勒密与安提俄克展开激烈争夺。

公元前321年，托勒密在索利国王帕西克拉茨、佩福斯国王尼科克列斯、阿马修斯国王安德诺科斯，以及他们提供的200艘战船的帮助下，在马里昂消灭了安提俄克的一小股部队。公元前318年，忠于马其顿王室的亚历山大的部将攸曼尼斯，在塞浦路斯招兵买马，企图发展自己的势力，次年即被安提俄克处死。安提俄克得到了拉皮索斯、马里昂、基里尼亚、克提昂等国王的支持。托勒密令其弟美尼拉斯率大军来到塞浦路斯，迫使支持安提俄克的基里尼亚和拉皮索斯屈服，并于公元前312年占领克提昂，杀死了支持安提俄克的克提昂国王普米阿慧，克提昂的著名神庙被付之一炬。从此，结束了克提昂作为腓尼基人王国的历史，成了一个完全由希腊人主宰的城市。美尼拉斯还严惩了曾支持安提俄克的拉皮索斯国王普拉西普斯二世、基里尼亚国王锡米逊和马里昂国王斯塔西奥伊科斯二世。马里昂被夷为平地，其居民被迁往忠于托勒密的佩福斯。

美尼拉斯占领塞浦路斯后，没收了除萨拉米斯王国以外的所有王国的财产，并将这些财产交由萨拉米斯国王尼科克拉斯管理。同时，美尼拉斯彻底消灭了在塞浦路斯存在了10个世纪的诸城市王国，第一次实现了塞浦路斯的统一，把塞浦路斯划归托勒密王朝的一个行省，由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治理。托勒密王朝任命的第一任总督就是萨拉米斯国王尼科克拉斯。但驻扎在塞浦路斯的军队仍控制在美尼拉斯自己手中。后来因尼科克拉斯与阿尔哥斯、

提洛和达尔斐等希腊城邦关系密切，托勒密认为尼科克拉斯与安提俄克秘密勾结，企图反叛，遂将尼科克拉斯及其全部王室成员赐死，王宫化为灰烬。

托勒密占领极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后，安提俄克并不善罢甘休。公元前306年，安提俄克令其子德米特里·波利奥克雷茨夺取塞浦路斯。德米特里率大军直逼萨拉米斯，在萨拉米斯附近大败美尼拉斯的军队，美尼拉斯的舰队在克提昂海域也遭受重创，美尼拉斯和托勒密的另一个儿子及8,000名士兵被俘。德米特里占领了塞浦路斯。

在德米特里统治塞浦路斯的12年里(公元前306～前294年)，塞浦路斯成为安提俄克父子对外征战的军事基地，不仅在岛上驻扎有大量军队，而且在岛上砍伐树木，制造战舰。公元前301年，安提俄克在伊普索斯战役中阵亡。公元前294年，托勒密的军队包围了萨拉米斯，德米特里被俘，托勒密又重新夺回了塞浦路斯。从此开始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对塞浦路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科伊农”制度的传入

埃及托勒密王朝对塞浦路斯的控制和占领，主要出于安全和战略目的。所以把塞浦路斯作为其建造战舰的“兵工厂”和对外战争的“军事基地”。由于萨拉米斯的港口淤泥，而佩福斯拥有丰富的造船木材，且离埃及更近，为了便于利用港口和砍伐优质木材建造战舰，在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王朝统治者下令，将塞浦路斯总督府从萨拉米斯迁到了佩福斯。在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相对和平稳定，经济繁荣，也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

其中有三个城市就是以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弗斯之妻阿西娜的名字命名的。

公元前245年，托勒密三世奥厄葛提斯（公元前246～前221年），以其妹妹（叙利亚安条克三世之妻）贝蕾尼西之子被国王前妻杀害为由，发动了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塞浦路斯自然成为他的舰队集结的基地。从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公元前221～前205年）开始，由于埃及的内忧外患频繁，埃及托勒密王朝强化了塞浦路斯作为军事基地的角色。实际上，自公元前311年塞浦路斯诸城市王国解体后，塞浦路斯就一直处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军事统治之下，除萨拉米斯末代国王尼科克拉斯，作为第一任总督短暂管理外，埃及托勒密王朝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就是托勒密王朝在塞浦路斯驻军的司令官。从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5～前180年）开始改称“大祭司”，兼管全岛税收。托勒密八世奥厄高提斯二世（公元前146～前116年）统治时又改为“大将军”。不论塞浦路斯总督的称谓如何，其职能主要是统领其驻军，而且总督通常都是由埃及托勒密王朝委派的王室成员。另外，在这一时期，在塞浦路斯还设有元老会议（布利）、平民会议（德莫斯）和执政官等制度，这只是埃及统治者为了减少塞浦路斯人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所设立的咨询机构，实权仍掌握在埃及驻军长官的手中。

由于塞浦路斯的重要战略地位，叙利亚的塞琉古国王朝也觊觎已久。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埃皮法尼斯，乘埃及托勒密王朝内讧之机占领了塞浦路斯。但在罗马帝国的强烈反对下，塞浦路斯也站在了托勒密王朝一边，塞琉古王朝军队被迫撤出了塞浦路斯。为了加强防御能力，从公元前124年开始，埃及托勒密王朝在塞浦路斯驻军增加，这些驻军主要是从希腊征召来的雇佣军，这

些希腊雇佣军按他们来自不同的希腊城邦，分别称之为“雅典科伊农”等。“科伊农”，即城邦联盟，在希腊半岛早已盛行，正是希腊雇佣军将这一制度引入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首先是军事“科伊农”，后来逐渐发展到城市“科伊农”和各种行业的“科伊农”制度，如城邦“科伊农”和商业“科伊农”。“科伊农”制度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在罗马统治时期出现的“库普里昂科伊农”（即“塞浦路斯人联盟”），对塞浦路斯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科伊农”之一，受到罗马帝国的保护。

实际上，“科伊农”制度在塞浦路斯的出现，是塞浦路斯诸城市王国解体后，适应塞浦路斯社会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塞浦路斯与希腊文明交往的结果，为塞浦路斯各城市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内部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促进了塞浦路斯社会的发展。

罗马帝国的首次占领和最终兼并

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三个希腊化王朝，由于相互征战不断，王朝内讧频繁，罗马帝国乘机崛起，并于公元前 148 年打败马其顿，公元前 146 年又将希腊作为马其顿的属地并入罗马帝国。公元前 64 年征服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 31 年，罗马帝国名将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战胜安东尼和克里奥巴特拉联军，次年率军侵入埃及，把埃及变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依靠罗马帝国解决内争和排除外部干涉，给罗马帝国可乘之机。早在公元前 168 年，罗马帝国强烈反对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对塞浦路斯的占领，迫其撤出，但该事件为罗马帝国干预托勒密王朝事务，尤其是对塞浦路斯的图谋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前 74 年，罗马帝国吞并了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域外之地昔兰尼之后，公

元前 58 年,罗马帝国终于找到实现亚历山大二世的“遗愿”——把塞浦路斯划归罗马帝国版图的机会。当时东部地中海地区海盗猖獗,罗马帝国以塞浦路斯是海盗巢穴为借口,由罗马帝国臭名昭著的财务官和护民官、恺撒的亲信波布利乌斯·克劳狄,伙同西利西亚海盗占领了塞浦路斯,罗马帝国元老院通过了兼并塞浦路斯的法案,从而结束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对塞浦路斯的统治。

罗马帝国占领塞浦路斯后,将其划归罗马帝国的西利西亚省管辖,由帝国任命的总督治理。尽管罗马帝国对塞浦路斯只是短暂占领,但其统治却是相当残酷。第一任总督卡图在克劳狄指使下,没收了塞浦路斯的金库,仅留了一所作为给驻塞浦路斯的罗马帝国官员发放薪水之用。卡图将没收的财物变卖了 7,000 塔兰特(相当于当时的 15,000 英镑),用于罗马帝国内战。罗马帝国统治者规定在塞浦路斯的贷款利率高达 48%。公元前 51 ~ 前 50 年,著名的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兼任塞浦路斯总督,在其短暂的任期里,对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灾难深重的塞浦路斯人民充满同情,他把贷款利率降到 12%,并要求撤走了驻扎在岛上的罗马帝国军队。

公元前 48 年,罗马帝国名将恺撒到埃及调解托勒密王朝内争,但被“埃及艳后”克里奥巴特拉的美貌和才智所征服。次年,恺撒恢复了克里奥巴特拉的埃及王位,并将塞浦路斯赠与了克里奥巴特拉。公元前 44 年,恺撒遇刺身亡,克里奥巴特拉又倾心恺撒的部将安东尼,被安东尼封为“众王之王后”和塞浦路斯王后。但好景不长,公元前 31 年,屋大维征服埃及,结束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将塞浦路斯并入了罗马帝国版图。从此开始了罗马对塞浦路斯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

塞浦路斯的文化成就

早在荷马时代之初，塞浦路斯就出现了各种体裁的诗歌。史诗产生于公元前8～前7世纪，其标志是诗人斯塔西诺斯的史诗《库普里亚》（库普里亚是塞浦路斯女神阿佛洛狄特的别称），该书作于公元前7世纪，写的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一书中对该书也有评述。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腊抒情诗人品达，在其记述基里尼亚王国事迹的抒情诗中，以及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一诗中，均提及塞浦路斯还出现了抒情诗和音乐。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戏剧非常繁荣，考古发现了该时期的许多剧场遗址。戏剧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滑稽剧作家索帕特。此外，岛上还流行一种被称为“酒神颂合唱队”的艺人班子，在街头村社巡回演出。

托勒密时代晚期，塞浦路斯最杰出的史诗诗人是库里昂的克列昂，他的作品，一度成为罗得岛的著名诗人阿波罗尼奥斯和短长格体诗人赫米亚斯学习创作的对象。散文作家也是人才辈出。史学方面，有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索利的克列科斯。在哲学方面，有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珀苏斯，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朋友，也是马其顿国王御前会议的成员。

但是，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塞浦路斯最有影响的人物仍然首推克提昂的芝诺（公元前335～前263年）。芝诺从塞浦路斯来到雅典，在雅典创立了斯多葛哲学学派，也称“画廊派”，他是塞浦路斯人在传播希腊思想文化方面最杰出代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实际上，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塞浦路斯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埃瓦哥拉斯一世在塞浦路斯传播希腊

思想文化的继续，这一思想文化运动，对塞浦路斯希腊化的最终确立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塞浦路斯与希腊之间的文化交往频繁，希腊的世界文化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有塞浦路斯人朋友或门徒。而且所有塞浦路斯人的古代著述，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承袭着希腊的思想文化传统。

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明交往

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行省

公元前 30 年，塞浦路斯最终成为罗马共和国版图的一部分——直属元老行省。从公元前 22 年，又转为罗马帝国元老院行省。从此，塞浦路斯进入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公元前 27 ~ 公元 180 年）。

塞浦路斯作为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任命的一位元老任总督，任期一年。总督是罗马帝国在塞浦路斯事务的全权代表，也是帝国神圣地位的象征。总督有多重职权。首先是行政管理权。负责全岛的社会秩序、保护帝国、罗马官员和贵族在塞浦路斯的财产和安全；促进公共设施建设，如修路、架桥、修建体育馆、剧院和公共浴室等。其次是司法权。传达和执行罗马帝国皇帝和元老院的法令及司法审判的裁决权。再次是财务管理权。负责税收，并从宏观上控制全岛的财政，严格限制各城市的财政超支。总督之下设有两位助手，一位是专管财务的财务官，另一位是负责行政事务的行政官。这两位助手由元老院任命，任期一年。岛上的所有事务，均由这三人统管和决定。当然，每人都有各自领导的职员。

塞浦路斯总督的宝座并不好坐。因为塞浦路斯是一个很小的元老院行省，总督除了拥有为数甚少的保安人员外，并不拥有军队。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幻想或军事图谋。另外，三人的任期都只有短短一年，防止了他们利用职权搞腐败的机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中有两人不可能在岛上共事半年以上。总督在每年的7月1日任命，而财务官在每年的12月1日任命。从公元1世纪后，塞浦路斯行省的财务官改由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以便更有效地监督和管理帝国在塞浦路斯的利益。罗马帝国在塞浦路斯各港口还设有检查员，严格检查岛上的进出口贸易。尽管如此，后来罗马帝国皇帝还向塞浦路斯各城市委派监督官，控制各城市的财政支出。

除此之外，各城市还有城市委员会，负责该城市的内务。而各城市的城市委员会则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的平民会议(德莫斯)所领导，平民会议的工作由一个秘书、一个掌管财务的库司和管理市场的职员组成。另外，还设有一位体育督察官。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塞浦路斯被划分为四个行政区：东部的萨拉米斯行政区、北部的拉皮索斯行政区、西部的佩福斯行政区和南部(包括中部的特罗多斯山丘陵地区)的阿马修斯行政区。四个行政区下辖12个城市：佩福斯、克提昂、阿马修斯、克里昂、萨拉米斯、卡帕西亚、基里尼亚、拉皮索斯、索利、阿西娜(以前的马里昂)、奇特罗伊(基里尼亚)和塔马索斯。这些城市，除了奇特罗伊建在岛上最著名的温泉附近，塔马索斯位于重要的铜矿附近外，其他城市都濒临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也是塞浦路斯历史上的一个和平时期。塞浦路斯首府仍设在佩福斯，直到4世纪才被君士坦丁亚(萨拉米斯遭地震破坏重建后改为此名)所取代。

罗马帝国的宽容政策

早在公元前146年，希腊作为马其顿的属地归并罗马帝国后，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厚重的希腊文化倾慕不已，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盛赞希腊观众是“他本人和他的才艺的知音者”。大批罗马人前往希腊参观神庙，欣赏艺术珍藏，去雅典求学被认为是非常荣幸的事。希腊文化对罗马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处于“俘虏”地位的希腊正在把它的蛮族霸主变成“俘虏”。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人，在百余年之后吞并了作为希腊人殖民之地的塞浦路斯，对其实行了相对宽容的政策。

罗马帝国兼并塞浦路斯后，并没有在塞浦路斯实行罗马化政策，主要表现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希腊语仍作为官方语言，元老院和皇帝的法令、布告等均使用希腊文，拉丁文仅在帝国早期的里程碑和建筑物的题词中出现过。另外，罗马人未曾向塞浦路斯移民。早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末期至罗马共和国时期，已有意大利商人在佩福斯、萨拉米斯和克提昂等地定居和从事商贸活动。塞浦路斯人对罗马帝国统治者也无恶感，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统治的和平”，把他们从希腊化时期的混乱状态中解放了出来，因而对罗马帝国统治者表示忠诚。在旧佩福斯现存有一份提比略加冕时，塞浦路斯人向这位新统治者表达忠诚的誓言，他们发誓“要像忠于大地和海洋一样，忠诚和敬仰”这位新皇帝。在基里尼亚（即奇特罗伊旧城），考古发现了一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公元193～211年在位）的著名铜像，现藏于塞浦路斯博物馆。另外，出现于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后期的库普里昂科伊农再度活跃起来，但是在这一时期，该组织除组织一些宗教庆典和公益施舍活动外，更多

地举行非常狂热的崇拜罗马帝国皇帝的仪式，而且还编造过歌颂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及其皇室成员的历法，甚至把恺撒尊称为阿佛洛狄特的后代。尽管如此，塞浦路斯人仍没有罗马公民权和任何自由，所有城市都必须缴税。即使在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给生活在罗马帝国版图内的所有男性以罗马公民权，塞浦路斯也没有获得任何自由。

虽然罗马帝国统治者不给塞浦路斯人罗马公民权，但对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仍然是鼓励的。在克劳狄皇帝统治时期（211～217年在位），总部设在旧佩福斯的库普里昂，发行了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第一批铜币，并在其上镌有希腊文“κοινὸν κυπ ρίων”（意为塞浦路斯人联盟）字样。在韦伯芗皇帝时期（69～79年在位），还发行过银币，而且在这些银币上镌有佩福斯的阿佛洛狄特神庙的图案。塞浦路斯发行的铜币和银币，可以与帝国发行的金币和银币兑换。另外，塞浦路斯商贸繁荣，在罗马帝国中心和各行省的商贸往来中，塞浦路斯各港口仍起着贸易中转站的作用。税收也不很高，绝大多数物品都能自给自足，木材和矿藏出口仍是塞浦路斯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矿场属于托勒密王朝所有，现在归罗马帝国所有，由总督管理。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37～95年）在其著作《犹太上古史》中写道，公元前12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把塞浦路斯的索利铜矿租赁给犹太国王希律一世（公元前37～前4年在位）经营，其铜矿收入对半分成（各得约300塔兰特）。据记载，希腊著名医师、物理学家盖伦曾于公元166年考察了索利的矿藏，并采集了各种矿物用以制药。另外，据公元4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姆米勒斯·马塞利勒斯称，当时塞浦路斯完全可以利用岛上的优质木材建造完整的大型舰船。

塞浦路斯土地肥沃，绝大多数人口仍以农耕为主。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其《自然史》中记载，塞浦路斯出产名贵葡萄酒。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公元前63～公元24年)，也曾提到过塞浦路斯出产优质葡萄酒和橄榄油，而且亚麻也是岛上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的确，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得到了较大发展，从考古发现的该时期公共设施的遗址便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

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

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及其以后的多位罗马皇帝，都很关心塞浦路斯事务。公元前15年，佩福斯发生大地震，佩福斯著名的阿佛洛狄特神庙被毁，奥古斯都皇帝曾下令按其原型兼东方和迈锡尼建筑风格予以重建，并赐名"塞巴斯特"(sebaste)。从克劳狄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铸造的钱币上，都镌有佩福斯著名的阿佛洛狄特神庙的正面图。罗马帝国占领塞浦路斯不久，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周游了全岛，在其著作《地理学》中对塞浦路斯作过详尽叙述。他是这样描绘古佩福斯举行阿佛洛狄特庆典的气氛：是日男男女女都从新佩福斯步行六十斯塔狄亚(约11公里)，到那里去参加庆典。

罗马帝国多位皇帝，如提图斯、图拉真和哈德良等都曾在前往叙利亚安条克途中，在塞浦路斯的佩福斯、萨拉米斯等地停留和巡视。公元116～117年，塞浦路斯的犹太人起义，萨拉米斯遭到严重破坏后，正是在图拉真皇帝的捐助下得以重建，并修建了著名的萨拉米斯体育馆。后来萨拉米斯人制作了图拉真和哈德良两位皇帝的雕像，矗立于体育馆前，并在雕像上刻有"塞浦路斯首府"六个

大字。这既是萨拉米斯人对这两位罗马帝国皇帝关心和重建他们城市的敬意，也反映了萨拉米斯人对昔日萨拉米斯辉煌的怀念。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曾大兴土木。最引人注目的是萨拉米斯的大商场工程和引水桥工程。萨拉米斯大商场兴建于公元 1 世纪，全长 230 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罗马式商场。它的建成极大地促进了塞浦路斯商贸的发展。在克里昂、萨拉米斯、索利和佩福斯等地，都建有体育馆、赛马场和剧场。索利的剧场可容纳 3,500 人，但最大的仍属首府佩福斯的剧场。而被称之为著名的"大理石会堂"的萨拉米斯体育馆，内部还陈列有罗马帝国时代部分重要的雕像。

罗马帝国后期，随着罗马文化的变化，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帝国早期的建筑作了某些改建。如在卡拉卡拉皇帝统治时期，克里昂的剧场被改成了角斗场，萨拉米斯的剧场于公元 3 世纪被改成了水上游乐场，并建立起了更多的符合罗马文化特征的公共设施，如萨拉米斯和克里昂的公共浴场，索利和克里昂的体育馆，佩福斯的音乐厅等。这一时期，塞浦路斯还建起了许多神庙，如克里昂的阿波罗·拉茨神庙，佩福斯的狄奥尼索斯神庙和奥菲士神庙等。这些建筑物都装饰有极高艺术品位的嵌花地板、湿壁画和雕塑等。

罗马帝国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塞浦路斯的各城市的供水设施和公路建设。据后来发现的一幅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地图的复制品，以及大量残存的公路里程碑表明，当时塞浦路斯沿海各城市都有环形公路，从东部的萨拉米斯通向北部的基里尼亚，然后经西部海岸和南部海岸返回萨拉米斯。内陆公路从索利经塔马索斯、特里米修斯与萨拉米斯贯通。卡帕斯半岛与其他城市也与公路主干道相连。在塞浦路斯修筑公路干线，可追溯到奥古斯都和

特塔斯皇帝统治时期，当时是用作军用通道，后来逐渐修成普通民用公路。到塞普提摩斯皇帝统治时期，各城市自己筹资修筑公路。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为塞浦路斯的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

犹太人移民与基督教的传播

犹太人移民塞浦路斯，从现有资料研判，最早始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著名的犹太人"马加比起义"前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三世，利用埃及托勒密王朝内乱和巴勒斯坦的犹太统治集团内讧之机，占领了耶路撒冷，杀戮犹太人，劫掠圣殿。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禁止犹太人从事一切宗教活动，并强迫犹太人改宗，从而造成犹太人向外逃难，其中部分犹太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犹太人选择向塞浦路斯移民的原因有二。其一，当时塞浦路斯仍然处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下，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为了争夺领土和霸权，进行了5次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塞琉古王朝占领了巴勒斯坦。事实上，尽管托勒密王朝曾在公元前301年征服了巴勒斯坦，并把大批犹太人作为囚犯迁往埃及的亚历山大，但是，托勒密王朝对犹太人相对友善，给他们在那里划出了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居住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在整个文化领域拥有自治权，并且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就将大部分犹太人释放。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把犹太人看作是"人民中可依赖的人"。其二，公元前168年，即在马加比起义前夕，塞浦路斯曾遭到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埃皮法尼斯（Antioch IV Epiphanes，公元前215～前163年）的入侵，在罗马的干预下，塞浦路斯站在了托勒密王朝的一边。实际上，当时的叙利亚塞琉古王朝是犹太人和塞浦路斯共同的敌人。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塞浦路斯，享有一定程度

的自治。移民塞浦路斯的犹太人主要聚集在萨拉米斯，继续信仰他们的犹太教。从此开创的犹太人向塞浦路斯的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116年犹太人起义时期。

犹太人来到塞浦路斯，并未受到已在岛上生活千余年的希腊人的歧视。因为塞浦路斯本来就是移民之岛，最早的移民是安纳托利亚难民，希腊人来到之后还有腓尼基人，但都被主体民族希腊人所同化，尤其经过希腊化时期后，塞浦路斯完全成了一个希腊人之岛，所以犹太人与希腊人和平相处。罗马帝国统治塞浦路斯后，对犹太人与希腊人一视同仁，而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起义，也没有对岛上的犹太人产生不利影响。

公元1世纪初，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产生后，犹太移民把这一新的宗教思想也带入了塞浦路斯，而且在塞浦路斯继续信仰并在犹太移民中传播，这便是基督教在塞浦路斯传播的开端。这一时期，基督教只是在萨拉米斯的少数犹太人中传播，对整个塞浦路斯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却始终与犹太人密切相关。

塞浦路斯基督教会的创始人，是生于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巴纳巴斯(Barnabas，有译为"巴拿巴"、"巴拉巴斯"、"巴约巴斯"或"巴尔纳伯"等)。据《使徒行记》和《保罗书信》记载，他是耶稣升天后的使徒之一，又名约瑟，原为犹太教中的"利未人"(即供职于圣殿者)。巴纳巴斯早年信仰耶稣，加入耶路撒冷教会，并变卖田产，将其所得全部献于教会。公元40年，在他的帮助下，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领袖们承认曾热衷于迫害基督徒的保罗是自己的弟兄。

公元45年，使徒巴纳巴斯与保罗奉安条克教会差遣，开始了基督教史上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们从安条克出发，首先来到塞浦

它使基督教在塞浦路斯得到地方官员的宽容甚至保护；其次它对塞浦路斯尚未接受基督教的犹太移民接受基督教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再次它促进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向塞浦路斯移民，尤其是已经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这一推动作用的明显例证是，在公元70年，罗马帝国血腥镇压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起义，摧毁了圣城耶路撒冷，其中大量犹太人到塞浦路斯避难，从而使得犹太人在萨拉米斯的人口大增。实际上，在当时的塞浦路斯人口中，犹太人已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而且主要集中在萨拉米斯。

犹太人起义及其影响

公元11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昔兰尼发生的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统治的起义，也波及到塞浦路斯。定居于萨拉米斯的犹太人，在阿尔·迪美昂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大起义，起义者劫掠和摧毁了萨拉米斯，疯狂杀戮希腊人和罗马人。由于罗马帝国在塞浦路斯这一小行省没有驻扎军队，所以未能及时控制局面。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紧急从其他行省调集军队镇压，这又是一场罗马人和希腊人复仇的反屠杀。据当时记载，死亡人数达24万之多。这个数字无疑是过分夸大了，但它却说明了这次大屠杀的程度，也从侧面反映出犹太人在塞浦路斯，尤其在萨拉米斯人口中所占比例。

这次犹太人起义的影响是巨大的，罗马帝国从此下令禁止犹太人移居塞浦路斯，即使犹太人的船只在塞浦路斯海域失事，也不得让犹太人上岸。同时，据史料记载，这次萨拉米斯的犹太人起义后，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据此分析，这次起义只是萨拉米斯的继续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举行的起义，而已经信

仰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并没有参加。其原因有三。

第一,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的起义已司空见惯,罗马帝国对起义者与旁观者区别对待。唐逸在《基督教史》中写道:“公元116~117年,犹太民族起义时,一部分基督徒就袖手旁观了。”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塞浦路斯,但萨拉米斯犹太人起义的情况的确如此。

第二,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实行镇压和怀柔两手政策。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公元37~68年)以基督徒在罗马城纵火为由,对基督徒进行大量搜捕和迫害,并波及到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其他地区。到图拉真皇帝(公元96~117年在位)时期,由于犹太民族起义引起某些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一些地方也因基督徒未参加起义而区别对待。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在公元111年,小林普尼任黑海南岸的佛赛尼亚与庞多行省总督时,有人控告基督徒谋反,他对基督徒进行了搜捕,在审讯中,他发现基督徒并没有触犯罗马刑律,于是就写了一篇向图拉真皇帝请示如何处理的著名奏折:(1)基督徒并未触犯刑律;(2)对匿名控告基督徒是否受理;(3)应如何判罪,应否区别对待;(4)如基督徒当众否认信仰,是否不宜起诉。图拉真皇帝批复道:(1)此事并无先例;(2)不要再专事搜捕基督徒;(3)匿名控告不予受理;(4)基督徒,应按罪判刑。小林普尼总督与图拉真皇帝的问答,虽然不是针对塞浦路斯,但与塞浦路斯的情况也十分类似。

第三,在塞浦路斯考古发现的许多铭文中,都提到在此之后仍有犹太人和犹太教会堂继续存在的事实,这说明仍然有犹太人继续他们的宗教活动,如果这些宗教活动仍然是犹太人所从事的犹太教活动,那么,这一状况与罗马帝国镇压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起义后,摧毁圣殿,焚毁会堂,企图使犹太人希腊化,在广阔的罗马帝国

范围内构建统一的希腊文化的目标相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犹太人基督徒所从事的基督教活动,这样理解也与萨拉米斯犹太人起义后,塞浦路斯继续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的活动逐渐缩小,人数日趋减少,而基督教的传播迅速扩大的事实相一致。

三、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塞浦路斯

行政区划与管理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新罗马城——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在北方蛮族的入侵下于公元476年崩溃,而融合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了一千多年。因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城拜占廷镇的旧址上扩建而成,故此东罗马帝国被称之为拜占廷帝国。

拜占廷帝国融合了希腊、罗马文化,其中在法律、外交和军事方面罗马的习惯占重要地位,在语言、文字和神学方面主要受希腊的影响。具有浓厚希腊文化传统的塞浦路斯,顺应了拜占廷帝国的文化氛围,受到帝国历代皇帝的特别关心和保护。公元326~327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后圣海伦巡幸塞浦路斯,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基督教教堂,其中包括拉纳卡附近的斯塔夫罗弗尼修道院,她还将赴耶路撒冷朝圣时搜集到的圣十字架碎片(据认为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赐给这些教堂。当时,塞浦路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干旱和饥荒,一片荒凉,人烟稀少,圣海伦还带来了许多希腊移民定

居，增加塞浦路斯的人口。

塞浦路斯是一个地震多发地，342 年的地震尤为严重，著名的古城萨拉米斯、克提昂和佩福斯等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正是在拜占廷皇帝的慷慨捐赠和物质援助下才得以重建。萨拉米斯从此更名为君士坦丁亚，但人们习惯上仍然称其原名。萨拉米斯再次恢复了作为塞浦路斯首府的地位，并成为塞浦路斯直属基督教会大主教的驻地。

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作为东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塞浦路斯，属首府设在安条克的东方省管辖，总督由帝国皇帝直接任命，全权负责行政和税收。536 年，查士丁尼一世把塞浦路斯与西基克拉迪群岛、西西亚、摩西亚和卡里亚划分为一个行政区，统治者称为查士丁尼执行财务官。公元 7 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对塞浦路斯的不断劫掠，塞浦路斯又隶属于位于小亚细亚南岸的锡比尔哈奥特行政区，其防御由锡比尔哈奥特的海军司令负责。但不久，马其顿皇帝瓦西利奥斯（公元 867 ~ 886 年在位）又承认塞浦路斯为单独行省，仍由“军事长官”治理。同时在岛上还驻扎了一个特殊军团，其粮饷由岛上居民以“安全税”提供，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有效抵御阿拉伯人的袭扰。

在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划分为 14 个省，它们是：莱夫科西亚（Lefkosia）、阿马修斯、新佩福斯、埃皮斯科皮（Episkopi 在克里昂的遗址附近建成）、阿尔西诺—阿姆莫奇斯托斯（Arsinoe-Ammochostos 位于萨拉米斯附近）、拉莫波欧萨（Lambousa 即拉皮索斯）、里佐卡尔帕索（Rizokarpaso）、基里尼亚、基斯里亚（Kythrea）、索利、阿西娜（Arsinoe）、特里米修斯、塔马索斯和萨拉米斯—君士坦丁亚。萨拉米斯—君士坦丁亚作为大主教府所在地，直到 13 世纪

才迁往尼科西亚。上述这些省虽然是行政区，但实际上它们完全是在基督教教会机构的基础上扩建、发展起来的，每个行政区也是主教区，主教不仅负责宗教事务，而且也负责税收等世俗管理。可见教会在塞浦路斯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公元578年查士丁尼二世时期，拜占廷帝国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亚美尼亚，并将3350名亚美尼亚人掳往塞浦路斯，分给他们土地使其定居，成为“保护人员和自耕小农”。从此塞浦路斯出现了亚美尼亚人。另外，在1136年，拜占廷帝国征服小亚细亚南部的小亚美尼亚，再次将大量亚美尼亚人带到塞浦路斯。现在塞浦路斯的亚美尼亚人便是他们的后裔。

基督教地位的确立

在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对塞浦路斯人本身而言，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基督教在塞浦路斯地位的确立。这不仅表现在塞浦路斯教会独立地位的确立，更体现于基督教已成为塞浦路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16年，萨拉米斯的犹太人发动起义，促进了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313年《米兰赦令》的发布，标志着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从迫害、限制，变为扶持和利用，基督教得到了迅速传播和发展。在库里昂一位主教府邸的嵌花地板上，发现了公元4世纪的一篇铭文，高度赞扬基督教战胜了对阿波罗崇拜的事实。

基督教在塞浦路斯巩固下来以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争取建立独立教会。公元325年，塞浦路斯著名圣徒特里米修斯主教斯布里敦，与佩福斯主教和萨拉米斯主教参加了第一次公会会议——尼西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塞浦路斯提出了建立独立教

会的要求。由于塞浦路斯在行政上曾隶属于首府设在安条克的东方省管辖，所以安条克牧首认为，塞浦路斯教会自然也就是安条克教会的下属。公元 410 年，安条克牧首致函罗马教皇英诺森一世，抱怨塞浦路斯教会违反规定，自封大主教(346 年塞浦路斯教会选出第一位大主教)，教皇下谕要求塞浦路斯教会服从安条克教会的领导，但没有得到塞浦路斯教会的回应。安条克教会也并未善罢甘休，在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上，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求对此问题再次进行讨论，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会议最后做出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如果塞浦路斯教会提出建立独立教会的要求，尽管与其隶属于安条克牧首区的传统相抵触，应按照相关教规，给予塞浦路斯创立独立教会的权利。塞浦路斯争取建立独立教会的努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尽管以弗所会议承认了塞浦路斯教会的独立地位，但安条克教会并未从此罢休。488 年，安条克牧首又致信其故友拜占廷帝国皇帝芝诺，求其向塞浦路斯教会施加压力。在此关键时刻，塞浦路斯大主教安塞米奥斯，从使徒巴纳巴斯的墓中找到了一部《圣马太福音》的手抄本。据作者不详的《使徒巴纳巴斯》记载，使徒巴纳巴斯总是带着这本他亲手抄写的《圣马太福音》布教，在他遇害后安葬时，使徒马可将该书放在了其遗体上。安塞米奥斯立即把这部圣迹呈献皇帝芝诺。芝诺对这一礼物非常高兴，而且很感动，他立即亲自主持了一次教会特别会议，明确确认了塞浦路斯教会的独立地位，并且授予塞浦路斯大主教在正式仪式上身披紫袍，手持权杖以代替教杖，以及用朱笔签署文件等钦赐的特权。当年，只有塞浦路斯教会获得过如此崇高的荣誉。至今塞浦路斯大主教仍享有这些特权，其登位仪式也一直沿袭拜占廷的这一传统。为了纪

念这一事件，尼科西亚的圣约翰大教堂南墙上的壁画，画的就是大主教安塞米奥斯，在使徒巴纳巴斯陵墓中发现《圣马太福音》手抄本，并将它呈献芝诺皇帝，以及皇帝钦赐大主教各种特权的情景。

尽管塞浦路斯教会的独立地位得到拜占廷帝国皇帝的明确确认，但圣油的供给仍掌握在安条克教会的手中，后来再度发生了独立地位问题的争论。公元692年，在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特别会议上，就此问题通过了一项新决议，安条克教会表示接受，才使这一长达三个多世纪的争论最后得到解决。

实际上，塞浦路斯教会独立地位的确立，除了使巴纳巴斯传教和建立塞浦路斯教会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之外，还有两方面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塞浦路斯教会领袖们不畏强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与安条克教会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圣徒，除特里米修斯主教圣斯布里敦外，还有勒德拉的圣特里菲利奥斯、卡帕西亚的圣菲伦、阿马修斯的圣提康以及尼亚波利斯(即利马索尔)的主教、著名作家勒昂提奥斯。这些杰出的教会领袖们，多次代表塞浦路斯教会参加普世教会会议，他们的贤明和虔诚为当时基督教界人士所称道。同时他们也都是当时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另外，像君士坦丁亚的阿卡狄乌斯一世、施舍家亚历山大主教约翰、作家乔治·基普里奥斯、奇特罗伊主教德米特里安诺斯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保罗等，在岛内外长期从事教会活动，颇具影响。所以，塞浦路斯也被誉为“圣徒之岛”。这些著名圣徒的活动，成为塞浦路斯教会争取独立地位的积极因素，同时也给安条克教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在塞浦路斯，基督教已深入民心，成为塞浦路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塔马索斯、库里昂、佩福斯和卡帕西亚的哈吉奥斯菲伦等地，都建有大型的宗教活

动中心，而且这些重要的宗教文化设施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当时塞浦路斯设有 14 或 15 个教区，其中包括塔马索斯、库里昂、克提昂、佩福斯、阿西娜和奇特罗伊等教区。这些教区基本上与塞浦路斯的城镇同时发展起来的。教会不仅是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岛上世俗事务的管理者。因此，塞浦路斯直属使徒教会独立地位的确立，对塞浦路斯的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对塞浦路斯的争夺

从公元 7 世纪中叶开始，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廷帝国对极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展开激烈争夺。公元 7 世纪中叶，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组织了对塞浦路斯的首次远征，由 1,500 艘各式战船组成的阿拉伯远征军，直抵塞浦路斯首府君士坦丁亚，要求塞浦路斯的拜占廷帝国总督投降，拜占廷帝国总督自恃君士坦丁亚坚固的城墙，拒绝投降，阿拉伯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亚，并很快攻入城内，许多居民被杀，财产被抢劫一空。阿拉伯人还掠夺了塞浦路斯的其他地方，拜占廷帝国援军赶到时才撤离。在这次远征中，穆阿维叶总督副手的妻子、先知穆罕默德的亲戚乌姆·哈拉姆，从骡子上摔下丧命，就埋在了这里，随后在这里建起了清真寺，成为穆斯林的圣地。今天，这一历史遗迹已成为塞浦路斯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也是这次阿拉伯人暴力交往的历史见证。

阿拉伯人的这次远征，只是一次掠夺。它一方面是为了迫使塞浦路斯纳贡，另一方面是不让塞浦路斯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基地。653 年，阿拉伯人再次入侵塞浦路斯，佩福斯城遭到劫掠和破坏，塞浦路斯人纷纷从容易遭受阿拉伯人掠夺的沿海向内地逃难，有的甚至逃往山林。今天还偶有发现当年这些逃难者埋藏的

财宝。穆阿维叶还将“登记在册”的1.2万名阿拉伯士兵留驻岛上，并鼓励穆斯林向塞浦路斯移民。同时还在佩福斯附近的马安湾安置了许多叙利亚士兵，命令他们利用岛上的木材建造战船，为攻打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做准备。

公元677年，阿拉伯人攻打君士坦丁堡，失利后撤退了。次年，阿拉伯帝国哈里发与拜占廷帝国皇帝签订了维护塞浦路斯和平的条约。由于穆阿维叶忙于与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争夺哈里发职位的斗争，此次阿拉伯人在塞浦路斯做出了让步，于680年撤走了派驻塞浦路斯的1.2万名士兵，只有少量阿拉伯人在岛上继续定居。685年和688年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廷帝国两度重新签订条约。该条约规定塞浦路斯保持中立；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均不得在岛上驻扎军队，或把塞浦路斯作为军事基地；塞浦路斯的年岁收双方平分，穆阿维叶每年可获得大约7,200迪纳尔。税收由两大帝国派驻塞浦路斯的官员按定居者的户籍征收。拜占廷帝国委派的官员称“执政官”(Archon)，阿拉伯帝国任命的总督称“瓦利”(Wali)。在该中立条约的约束下，两大帝国所派官员的权力有限。另外，条约要求岛上的基督徒区和穆斯林区，当受到外敌入侵时应互相帮助，但双方均不得拥有武装。

公元691至692年，拜占廷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二世违反中立条约，与穆斯林发生冲突，而且把岛上的阿拉伯人劫为战俘，从而招致阿拉伯帝国海军的袭击。为了躲避阿拉伯人的入侵和掠夺，查士丁尼二世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为塞浦路斯基督徒开辟了一个新的居住区，即新查士丁尼区，由约翰大主教管理。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因船只失事和疾病而丧生，直到698年这些避难者才返回塞浦路斯。为了纪念这一流亡时期，塞浦路斯大主教至今仍冠

有“新查士丁尼区兼全塞浦路斯大主教”的头衔。

阿拉伯人认为塞浦路斯基督徒出逃避难，影响了他们的贡税，违反了中立条约，因而不断发动袭击，并把留在岛上的基督徒劫到叙利亚为奴。约翰大主教率基督徒结束流亡返回塞浦路斯后，派三位主教与阿拉伯人谈判达成协议，才将这些被劫掠的基督徒送回了塞浦路斯。同时，查士丁尼二世也将掳为囚徒的穆斯林释放。

随着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政权的巩固，阿拉伯人又恢复了对外征服。阿拉伯人以塞浦路斯人违反中立条约、支持拜占廷帝国为由，于公元743年、747年、773年、790年、806年和911年多次入侵塞浦路斯，其中806年由诃伦·拉西德率领的入侵危害最大，许多教堂被破坏，连同大主教在内16,000多名塞浦路斯人被掳往叙利亚为奴，许多沿海居民纷纷逃至内地避难。后来在北部群山中发现的一个洞穴，可能就是曾经躲避阿拉伯人袭扰的避难所。现在塞浦路斯的著名参观旅游胜地圣赫拉里昂、坎塔腊和布法文托等重要城堡，就是当年拜占廷帝国修建的抵御阿拉伯人入侵的要塞。

公元965年，拜占廷帝国皇帝尼塞福鲁斯·福卡斯，利用阿拉伯帝国衰落之机，派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再次完全置于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在阿拉伯人袭扰塞浦路斯时期，尽管塞浦路斯处于阿拉伯和拜占廷两大帝国的双重统治之下，但由于历史、文化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岛上的希腊人支持拜占廷帝国，反对阿拉伯侵略者。据戴维德·胡特在《塞浦路斯的烙印》中记载，塞浦路斯的实际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拜占廷帝国手中，当阿拉伯人丧失在塞浦路斯的势力后，岛上的大多数穆斯林迁出了塞浦路斯，留下者则皈依了基督教，并逐渐被希腊人所同化。

阿拉伯人对塞浦路斯的入侵,实际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穆斯林,与信仰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基督徒两大势力,对极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的激烈争夺。如果拜占廷帝国完全控制塞浦路斯,将对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构成威胁;相反,如果阿拉伯人完全控制了塞浦路斯,将成为进攻拜占廷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基地。两大势力均无力实现完全控制塞浦路斯,最终相互妥协签订塞浦路斯中立和非军事化的条约。尽管有该条约的约束,但双方均企图对塞浦路斯的完全占领,所以,中立条约不断遭到破坏,而最终受害者是塞浦路斯人民。

阿拉伯人对塞浦路斯的入侵和劫掠,时间长达三个多世纪,给塞浦路斯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以教堂等基督教建筑物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因此在被誉为考古博物馆的塞浦路斯,这个时期的教堂的遗址却很少。在拉纳卡附近的克提昂和卡帕斯半岛的利斯兰科米等地,考古发现的部分教堂遗址,可能就是遭阿拉伯人掠夺和破坏的劫后遗物。

地方总督的独立尝试和外敌的劫掠

拜占廷帝国彻底解除了阿拉伯人的袭扰,恢复了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但是,塞浦路斯并没有从此获得和平和繁荣,相反,内忧外患不断,民不聊生,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首先,拜占廷的税收相当沉重,税额之高在中世纪的其他地区罕见,而且税收制度也非常严格。这一时期,塞浦路斯由君士坦丁堡委派的总督(称 Catapan)治理,另外有两位助手,一位负责岛上的司法和财政,另一位统领拜占廷帝国在塞浦路斯的驻军。这些

地方官员的极权和专制以及沉重的赋税，常常造成地方官员与塞浦路斯教会的摩擦。同时为抵御外敌入侵和海盗劫掠，拜占廷帝国派驻塞浦路斯的军队，经常向岛上居民强行收取保护费，激起了塞浦路斯人对拜占廷帝国统治的不满。

其次，拜占廷帝国为了保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海岸，增强塞浦路斯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在岛上派驻了军队，而这些军队却成了野心勃勃的总督们利用人民的不满，反叛朝廷图谋自立为王的工具。1042年，总督锡奥菲洛斯·埃罗提科斯试图反叛，但他的负责司法和财政的助手拒绝与他合作，并告发了他，君士坦丁九世派舰队前来镇压，锡奥菲洛斯被俘后着女装游行示众。此后，拜占廷帝国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和更加有效地抵御外患，将塞浦路斯首府从君士坦丁亚，迁到了平原地区的中心地带勒夫科西亚（即古城勒德拉，在现在的尼科西亚附近），从此，勒夫科西亚便成为塞浦路斯希腊文化的中心，但大主教驻地继续留在君士坦丁亚直至13世纪中期。

1093年再度发生了类似的独立尝试。11世纪末，崛起的塞尔柱王朝大败拜占廷帝国的军队，相继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总督拉普索马茨利用拜占廷帝国战败之机，在土耳其埃米尔的支持下，联合克里特总督，反对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谋取独立。由于拉普索马茨缺乏军事才能，贻误战机，被阿历克塞皇帝的女婿约翰·迪科斯率领的帝国军队俘获。虽然两次独立尝试均告失败，但它反映出塞浦路斯人民对拜占廷帝国统治的不满，尤其是对塞浦路斯现状的不满。

再次，这一时期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加剧，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不断逃往塞浦路斯。从1099年开始东侵的十字军，在帮助

拜占廷帝国对付穆斯林的同时，也窥视和垂涎拜占廷帝国的财富和广阔的地域。在第一次十字军东侵时，塞浦路斯是十字军的物资供给者和舰队基地，随着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等地拉丁王国的建立，塞浦路斯作为东西方贸易桥梁的地位凸显，十字军的主要支持者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塞浦路斯获得了贸易特权。这一时期，塞浦路斯的商贸活动频繁，法马古斯塔已取代君士坦丁亚成为塞浦路斯的重要港口，北海岸的基里尼亚和南海岸的利马索尔等港口也迅速发展起来，在繁忙贸易推动下，塞浦路斯经济开始复苏。

但是，塞浦路斯的繁荣与稳定不断遭到外敌劫掠的严重破坏。1156年，法国冒险家纳拉尔德，伙同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公国国王索罗斯二世，入侵塞浦路斯，打败并俘虏了拜占廷帝国皇帝之侄、塞浦路斯总督约翰·科穆宁。这伙强盗在岛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许多教堂、修道院和房屋被烧毁，凡能找到的财物，包括牛羊鸡鸭等牲畜家禽皆尽掠夺，以至于抢劫的东西太多而无法运走，又强迫农民用高价赎回。被激怒的拜占廷帝国兵临安条克，纳拉尔德才被迫向拜占廷帝国皇帝表示道歉，但对遭此劫难的塞浦路斯人并无任何补偿。

1158年和1161年，塞浦路斯又相继遭到埃及和安条克舰队的劫掠和破坏。此外，1158年岛上发生大地震，在佩福斯有15座教堂被毁。1176～1179年又发生严重干旱。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塞浦路斯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贫困不堪，当1169年耶路撒冷国王与拜占廷帝国皇帝达成反穆斯林联盟时，塞浦路斯已无力提供足够的供养。

塞浦路斯的拜占廷艺术

所谓的拜占廷艺术，就是指从公元6世纪中叶至15世纪，以拜占廷为中心的东部基督教艺术。其特点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内容，以希腊化时期的艺术形式与东方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而东方色彩更浓厚的基督教艺术。

阿拉伯人的袭扰结束之后，塞浦路斯尽管仍存在着内忧外患，经济形势并未好转，但宗教和文化艺术却出现了新的生机，大量建筑师和艺术家从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来到塞浦路斯，给塞浦路斯带来了帝国首都流行的艺术形式。而拜占廷帝国皇帝一直是塞浦路斯宗教建筑的主要资助者。1092年，拜占廷帝国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宁镇压了拉普索马茨的反叛后，资助塞浦路斯教会在佩福斯山区建成了基克科修道院，该修道院是当时岛上最重要、最富有的修道院，在基督教世界声誉卓著。据传说，收藏在该修道院的圣母画像，是使徒路加所绘的三幅圣像之一。另外，特罗多斯山上的马开拉斯修道院、佩福斯地区的圣尼奥菲托斯修道院和克里索罗亚提萨等修道院，都是12世纪由拜占廷帝国皇帝敕令兴建的。除了宗教事务外，这些修道院都享有独立自主权。由于修道生活的传播和曾经有过许多著名圣徒的缘故，塞浦路斯因而被誉为“圣徒之岛”。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母后圣海伦所建的斯塔夫罗弗尼修道院，以及位于利马索尔阿克罗蒂里的圣尼科拉奥斯修道院，是塞浦路斯最古老的两座寺院。

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最重大变化，就是基督教的地位得以巩固、加强和深入人心。它集中体现在塞浦路斯人的宗教虔诚、圣徒的富有学识、教堂别具一格的建筑和装饰方面，即使

在阿拉伯人袭扰的艰难时期，人们逃至深山老林避难，也还是在那里建造了几所留存下来的教堂。除了在利斯兰科米和克提昂发现有镶嵌艺术的镶嵌画外，在通往特罗多斯山途中的阿西诺圣母教堂、卡科皮特里亚的圣尼科拉奥斯—提斯—斯特吉斯教堂、靠近拉古德拉的皮特西利亚地区的阿卡圣母教堂、特罗多斯山上的莫托拉斯圣母教堂、尼索附近的皮拉科里奥使徒教堂、圣克里索斯托莫斯附近北部山区的科特索文提斯修道院，以及加拉塔附近皮提苏圣母教堂，都是 11 世纪以来所建。这些教堂的建筑规模相对较小，以圆顶为中心，同一类建筑但又各具特色。内部装饰有基督教内容的湿壁画，祈祷者能够看到"道成肉身"故事中最神圣的景象，感觉到绘制在墙上的圣徒与自己近在咫尺。拜占廷艺术主要有两个流派，即宗教艺术和古典艺术。而塞浦路斯的拜占廷艺术，更多地体现在修道院等圣所的建筑及其内部装饰艺术，以及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艺术上。

另外，具有拜占廷艺术特色的许多教堂的遗址，在建筑学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如卡帕索附近的阿芬德里卡教堂、萨拉米斯附近的圣巴纳巴斯教堂、拉纳卡的圣拉扎鲁斯教堂、拉皮索斯附近的阿开罗皮托斯教堂，以及皮利斯特罗纳和叶罗斯基波两地的一些有五个圆顶的教堂，均体现了拜占廷的建筑艺术特色。

艾萨克·科穆宁自立为王

艾萨克·科穆宁，拜占廷帝国皇帝曼努尼尔之侄，曾任奇里乞亚总督，被亚美尼亚人俘虏后卖给了圣殿骑士团，在其姑母劝说和两位君士坦丁堡重要人物的担保下，拜占廷帝国皇帝安德罗尼科斯一世（Andronicus I，1183～1185 年在位）将其赎回。不久艾萨克

纠集了一撮暴徒前往塞浦路斯，用伪造的委任状当上了塞浦路斯总督。艾萨克作为皇亲国戚，拜占廷帝国皇帝安德罗尼科斯一世也就默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但艾萨克并不满足于此，他利用拜占廷帝国受到土耳其人进攻国力虚弱之机，于1184年反叛朝廷，自立为王。气愤至极的安德罗尼科斯一世将两位担保者极刑处死，派军队前去平叛，但平叛军队均被艾萨克打败。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拜占廷帝国，对企图脱离帝国的反叛者已无能为力。

起初，艾萨克脱离帝国谋取塞浦路斯独立的政策，得到了长期经受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以及拜占廷帝国沉重赋税重压的希腊人的支持，而且艾萨克与抗击十字军的英雄、埃及素丹萨拉丁保持友好关系，共同抵御十字军的威胁。当艾萨克在塞浦路斯的权力巩固之后，便露出了凶残的本性，乱杀无辜，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正如编年史学家潘泰利·斯塔夫罗斯在《新编塞浦路斯史》中所写："这个岛在他的蹂躏下呻吟着，塞浦路斯人对他的愤恨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时刻准备迎接只要能够结束这种暴政的任何事情。"

狮心王理查占领塞浦路斯

公元1191年春，英国狮心王理查与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联合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侵。在从西西里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十字军的舰队被风暴驱散，理查的未婚妻贝伦加里娅和理查的长姊、西西里的王太后乔安娜乘坐的船，被迫到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避风，艾萨克得知后迅速赶到岸边，邀请这些贵妇人上岸。但贝伦加里娅和乔安娜担心被扣为人质，拒绝上岸，只要求从岛上获得淡水和供养。艾萨克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并意识到即将来临的

威胁，立即加固岛上要塞。一星期后，英王理查率领的舰队赶到，理查认为艾萨克怠慢了他的未婚妻，率领军队从利马索尔登陆。英王理查的到来受到了岛上意大利商人的欢迎，希腊人也对他表示友善。艾萨克前往理查军营谈判并达成了一个协议：艾萨克给理查一笔补偿金；允许他们在岛上免税购买供养；艾萨克派军队随理查东征；并让自己的独生女作为兑现上述承诺的人质。但艾萨克很快就又反悔了，要求理查及其军队立即离开塞浦路斯。

1192年3月12日，在利马索尔的圣乔治教堂，理查与贝伦加里娅举行了婚礼，这是惟一一次英国国王在海外举行的婚礼。此时，英国的大批舰队已赶到塞浦路斯，巴勒斯坦的名望地主绅士也带着160名武士前来投奔，其中就有后来获得塞浦路斯统治权的法兰克人鲁西格南·盖伊。面对强大的敌人，艾萨克把他的妻子——一位亚美尼亚公主和他的独生女儿送到基里尼亚城堡，希望借机逃往亚美尼亚。艾萨克率兵与十字军在尼科西亚附近的特米修斯展开激战，但寡不敌众，惨败后逃往坎塔腊城堡。理查率十字军进驻尼科西亚，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盖伊率领十字军俘虏了艾萨克及其家眷。艾萨克请求不要给他带上铁镣，理查敬重他的请求，用金银手铐捆绑了他。塞浦路斯的统治权转到了英王理查手中，从此彻底结束了拜占廷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

英王理查统治塞浦路斯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刮钱财，命令十字军进驻所有城堡和要塞。理查任命两位英国人理查·卡姆维尔和罗伯特·特恩汉姆为首席执行法官，统管岛上事务。塞浦路斯人从艾萨克的暴政中解脱出来，并未获得任何好处，甚至连留胡须的传统也被剥夺了，他们在失望中进入了一个统治者频繁更迭、统治更加残酷的新时期。从此，塞浦路斯与其民族、文化、宗教相同的希

腊隔绝了长达 7 个多世纪。

一般认为,第三次十字军东侵因英王和法王"各怀鬼胎、矛盾重重,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但实际上英王理查占领塞浦路斯,以及随后由盖伊建立的鲁西格南王朝,应是此次十字军东侵的最大成果。因为塞浦路斯是通往巴勒斯坦重镇阿克的桥头堡,如果十字军不能有效占领和控制塞浦路斯,十字军不但重新夺回阿克困难,而且防守阿克更不易。在以后的多次十字军东侵中,塞浦路斯成了十字军最稳固的舰队集结地和物资供给者。另外,理查占领塞浦路斯绝非偶然,当理查舰队航行至罗得岛时,理查得知艾萨克与萨拉丁结成抗击十字军的联盟,他已有占领塞浦路斯的计划,以保障从塞浦路斯向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的供给。

塞浦路斯的悲剧是十字军东侵的直接恶果。在十字军东侵中,叙利亚的马龙派信徒纷纷逃往黎巴嫩北部山区、塞浦路斯和阿勒颇,来到塞浦路斯的马龙派信徒主要定居于塞浦路斯的西部地区,从此,塞浦路斯人口结构中也就出现了马龙派信徒。

第三章　法兰克人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交往性特征

一、鲁西格南王朝的建立

盖伊获得塞浦路斯

英王理查占领塞浦路斯后，在塞浦路斯大肆搜刮钱财，筹集十字军东侵的供养。岛上的希腊人丧失了一切权利，甚至连科穆宁统治时期都不如，沉重的赋税激起了塞浦路斯人的反抗，在一位希腊人牧师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异族统治的起义。理查委任的塞浦路斯首席执法官、英国人罗伯特·特恩汗姆，对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这时理查已筹足了供给，准备攻打被萨拉丁收复的耶路撒冷。而且英王理查与共同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侵的法国国王腓力不和，腓力强烈反对理查长期占领极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随后理查把塞浦路斯以 10 万贝占特(拜占廷帝国发行的一种金币，公元 6～15 世纪在欧洲流通，一枚金币贝占特约合 1 英镑)的低价转给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接手后，希腊人的起义仍此起彼伏，圣殿骑士团的镇压则更加残暴，首府尼科西亚血流成河，圣殿骑士团甚至以焚毁村庄进行报复，把村民赶入荒山野

岭。不久圣殿骑士团要求理查取消这笔交易，在理查的撮合下，把塞浦路斯的统治权，最后转让给了曾经帮助他俘获艾萨克的耶路撒冷前国王盖伊·鲁西格南。

盖伊·鲁西格南，1180 年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的遗孀西比拉王后结婚，在西比拉的努力下，1186 年被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1187 年 7 月在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的战斗中被俘，承诺不与穆斯林为敌后获释。1190 年西比拉死后，盖伊企图通过英王理查的帮助再次获得耶路撒冷王位，但没有成功。1192 年，盖伊有偿地获得了塞浦路斯的统治权，成为塞浦路斯鲁西格南王朝的奠基者。

统治阶级的形成和农民的状况

盖伊统治塞浦路斯后，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首先是安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他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向希腊人承诺，不再有任何大屠杀，确保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安全。其次是招募统治阶层，形成自己的统治基础。盖伊深知，依靠西欧封建主所建立的统治，只能是傀儡，其政权不可能稳固，要建立起自己强有力的政权，必须要有效忠于自己的社会力量。他继承了科穆宁、英王理查和圣殿骑士团掠夺的所有土地，号召被萨拉丁剥夺了财产、仍滞留在巴勒斯坦的拉丁贵族、骑士来塞浦路斯，奖励他们肥沃的土地。据记载，最初来塞浦路斯定居者有 300 骑士和 200 骑兵，依据他们所能提供军队的多少，被封赏为男爵领地和骑士采邑，甚至连那些战死的十字军的家眷妇孺，也获得了财物奖励或被安置公职。盖伊收拢人心之目的昭然可见。

盖伊统治塞浦路斯不到两年，也没有称王，1194 年死后，其弟

阿莫里继承了统治权。1196 年，阿莫里为了获得罗马教皇的支持，向罗马教皇表示忠诚，罗马教皇正式承认他为塞浦路斯国王。一年后，阿莫里采取了与盖伊同样的方式，通过与耶路撒冷公国的女继承人结婚，被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从此，塞浦路斯开始了法兰克人鲁西格南王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

鲁西格南王朝的建立，是以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人丧失土地为代价。失去土地的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所有者通常把肥沃的耕地自己占有，其他贫瘠的土地由农民耕种。农民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低层且人数最多的是农奴（Parici），他们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地主分配的土地，收成的 1/3 交给地主，另外每人须交人头税，每周还必须在地主的土地上做 2 天劳役。实际上，农奴就是地主的个人财产，可以随同土地一起被买卖。第二个阶层是佃农（Perpyarioi），他们部分是拜占廷帝国王公的家仆、佣人及其后代，部分是以前的城镇居民、家庭手工业者或工匠。佃农不允许被买卖或交换，但与农奴一样，也必须交收成的 1/3 给地主，并每周为地主做 2 天的劳役。第三阶层是自由民（Lefteroi），他们部分是被释农奴的后代，绝大多数则是通过赎买获得自由者，但他们还须交人头税。自由民主要是城市里的艺人、工匠、王宫和贵族府宅里的仆从，以及教堂等机构的雇工，他们以获取报酬维持生计。总之，希腊人丧失了原有的一切权利，成为法兰克统治阶级剥削和奴役的对象。

西欧封建农奴制度的移植

鲁西格南王朝的社会制度，完全是西欧封建农奴制度的移植。王国的统治阶级是法兰克人，国王是最高统治者，拥有全部军事和

行政大权。王国最重要的权力机构是最高法院，由国王主持，所有贵族参加，它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最高法院对国王的权力也有制约，没有经过最高法院的裁决，国王也不能随意处罚贵族。鲁西格南王朝的行政、司法制度，基本上是根据《耶路撒冷法典》制定的，该《法典》还被译成了塞浦路斯的希腊文。

国王之下设有王朝总管，负责王国的所有行政事务。统帅之职的责任是，平时领导和训练雇佣军，当国王不在时，指挥王国的军队。宫廷大臣负责王宫事务、国王的各种礼仪及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的誓言等。

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所拥有的土地称王室土地。国王封赏的法兰克贵族称男爵，男爵的封地称男爵领地；男爵之下还有骑士，骑士的封地称采邑。另外，自由民拥有的小块土地称份地。实际上，不论是男爵领地还是骑士采邑，仍然由国王控制，他们使用土地的回报，就是当发生战争时，必须向国王提供军队。

鲁西格南王朝的政教完全分离，这一点与中东其他穆斯林王国有所不同。天主教会的大主教由罗马教皇任命，而希腊东正教会的大主教必须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认可。教会拥有土地并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力和宗教裁判权。

罗马天主教会对希腊东正教会的迫害

盖伊之弟阿莫里称王之后，继续接纳和封赏法兰克贵族，加强其统治基础。同时阿莫里放弃了盖伊的宗教宽容政策，大力扶持天主教会，极力排斥希腊东正教会，很快在岛上建立起了4个天主教教会区，而希腊东正教会的独立地位于1196年被取消。阿莫里所奉行的宗教政策，也是罗马教皇发动十字军东侵的目的之一，不

仅煽动西欧封建主以对穆斯林圣战为名，到东方攻城掠地，掠夺财富，而且企图把分裂的基督教重新统一在罗马教皇的权威之下。所以，当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后，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欣慰地说："教会分裂可以停止了"，进而加快了使正教会"回归教会"的步伐。1213年，罗马教皇派特使来到塞浦路斯，用强制措施要求希腊东正教会归并于天主教会，这标志着在塞浦路斯，罗马天主教会迫害希腊东正教会的开始。

1220年10月，罗马天主教会利马索尔会议决定，正教会收什一税的权力归天主教基金会，同时还规定，正教会牧师每周必须在天主教会的土地上劳动2天。正教会牧师的地位已与农奴相差无几。为了彻底使正教会屈服并最终被铲除，1222年塞浦路斯天主教会决定，塞浦路斯正教会隶属于天主教会，正教会主教由原来的14个减少为4个，大主教之职权等现任大主教死后转由天主教会代理。还要求正教会牧师要像忠诚其主人一样忠诚拉丁人。天主教会的迫害，激起了正教会的强烈反抗，但迫害变本加厉。1231年，坎塔腊修道院的13位修士，因拒绝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教义，被当成异教徒施于火刑而殉教。类似的事件在希腊化世界也多有发生。

1260年4月，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颁布《塞浦路斯问题训谕》，禁止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会再选大主教；主教数量严格控制为4个，并置于天主教会大主教的监督之下，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教区内主持教务；主教的选举必须得到所属天主教会主教的认可，正教会主教必须向天主教会主教宣誓。《训谕》规定，希腊东正教必须"坚持和维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遵从尼科西亚的天主教会大主教及其继任者"。亚历山大四世的《训谕》，企图废除塞浦路斯

正教会的长期自治地位，使之处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在1263～1264年，罗马教皇多次致信塞浦路斯的法兰克统治者，要求对那些胆敢蔑视和冒犯天主教最高权威的正教会“异教徒”，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但随着十字军东侵的彻底失败，教皇在塞浦路斯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在正教会和希腊人的顽强反抗下，终于挫败了罗马教皇将塞浦路斯天主教化的图谋，法兰克贵族也开始到希腊东正教堂祷告，指责罗马天主教会和法兰克统治者对希腊东正教会的不公。1448年，鲁西格南王朝的摄政者海伦王后，废除了亚历山大四世的《塞浦路斯问题训谕》，恢复了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会的独立地位。实际上，鲁西格南王朝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对塞浦路斯强制实行天主教化的政策，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实现统一，强化统治基础。海伦王后的宽容政策，只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获得广大希腊人的支持而已，但它在客观上的确帮助了塞浦路斯受尽压迫的希腊人。

二、鲁西格南王朝的对外交往

鲁西格南王朝与十字军

鲁西格南王朝的建立，是第三次十字军东侵的直接结果，东侵思想贯穿鲁西格南王朝始终。在随后的十字军东侵中，鲁西格南王朝统治的塞浦路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197年阿莫里被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自然对保护巴勒斯坦的拉丁王国负有责任，并于1205年死于阿克，年仅几个月的儿子雨果一世（1205～1218年）继位。在1217年德皇腓特烈二世发起

的第五次对埃及的十字军东侵中，年仅 12 岁的雨果一世也率领军队参战，于 1218 年 1 月病死于的黎波里，王朝统帅指挥军队曾一度攻占埃及的达米亚特，但终以失败告终。其后，德皇腓特烈二世以阿莫里曾向罗马教皇表示忠诚为由，要求充当继承雨果一世王位的亨利一世(1218 ~ 1253 年在位)的摄政王，因而与掌管朝政的伊贝琳家族展开激烈争夺，腓特烈二世曾控制了朝政。其后的第六次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就是德皇腓特烈二世为争夺鲁西格南王朝的摄政王，以及为其子获得耶路撒冷王位而来，他通过与穆斯林谈判达成协议，获得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第七次十字军东侵，鲁西格南国王亨利一世与法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商讨和制定入侵埃及的计划长达 8 个月之久，他们最终达成共识：要确保耶路撒冷的安全，惟一办法是摧毁埃及的军事力量。1249 年 5 月，两位国王率军从利马索尔出发，向埃及的达米亚特进军。此次对埃及的入侵与前两次一样，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1286 年鲁西格南国王亨利二世(1285 ~ 1324 年在位)，在推罗被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1291 年，随着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的最后据点阿克的丧失，十字军东侵宣告彻底失败。鲁西格南王朝统治的塞浦路斯，成为地中海地区十字军占领的惟一领地，也逐渐发展成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彼得一世的战争交往

尽管由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发起和领导的十字军东侵以失败告终，但对塞浦路斯的鲁西格南王朝的法兰克统治者而言，十字军东侵和对穆斯林圣战的思想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因为塞浦路斯

已成为抵御日益强大的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最前沿阵地，鲁西格南王朝只有获得西欧封建主的精神和财力支持，才能有效抵抗穆斯林。同时通过东侵和对穆斯林的圣战，统一法兰克统治阶级的思想，淡化和消除日益加剧的王朝内讧。

另外，自 1291 年十字军从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完全退却后，塞浦路斯王国不仅从对耶路撒冷、阿克等十字军据点的保卫中解脱了出来，而且凸显了塞浦路斯作为东西方贸易桥梁的作用。经过一个较长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到 14 世纪中叶，鲁西格南王朝统治的塞浦路斯进入鼎盛时期，以"基督的壮汉"闻名的国王彼得一世(1358～1369 年在位)，大力宣扬十字军东侵和对异教徒的圣战，自认为是解放圣地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其目的，他成立了"佩剑骑士团"，把塞浦路斯的法兰克贵族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吸引了大批年轻男爵。为了显示自己的雄心和实力，1361 年，彼得一世率兵攻占了小亚细亚南岸的重要商港安塔利亚和阿拉尼亚，并得到塞尔柱土耳其埃米尔的承认。彼得一世的舰队在塞浦路斯与安塔利亚之间的水域游弋。

为了获得西欧封建主的支持，1362 年 10 月，在王朝总管菲利普·德·德梅齐埃和教皇特使皮埃尔·德·托马斯的陪同下，彼得一世开始了对欧洲各国宫廷的游说访问。在历时近三年的外交远征中，他先后访问了威尼斯、米兰、热那亚、阿维尼翁、莱茵河诸城、巴黎、伦敦、皮尔多(法国东南部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布拉格和科拉科夫，彼得一世的行动虽然得到了这些欧洲王公的高度赞赏和鼓励，但谁都不愿亲身介入。德国、波兰和奥地利不愿参与这一新的、不可能成功的东侵，而英、法正在进行"百年战争"，根本无暇他顾。彼得一世虽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支持和帮助，但在他旗下却

聚集了一批企图到东方掠夺财物的欧洲暴徒，在罗德岛组成了一支由140艘战船和一万多名士兵的远征军。他选择了疏于防范的埃及商贸重镇亚历山大，发动突然袭击，并很快征服了该城。这些欧洲暴徒在亚历山大城大肆屠杀和掠夺。载誉而归的彼得一世，在塞浦路斯得到了一个征服者应有的一切荣誉。

彼得一世的此次东侵，虽然初战告捷，但西方舆论却不以为然，而且招致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强烈反对。因为被激怒的埃及马木鲁克素丹，下令禁止西方商人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一切商贸活动，威尼斯人经过数月的好言相劝，才使素丹取消了禁令。但彼得一世准备进攻贝鲁特的计划，在威尼斯的压力下，被迫改为对小亚细亚沿岸城市的掠夺和破坏，还曾一度攻陷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城。由于王朝内讧加剧，而且获得了丰厚战利品的士兵，回家之心情比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圣地更为迫切。1367年秋，彼得一世停止了军事行动，再次前往欧洲寻求支持。

彼得一世的第二次游说，不仅没有得到西方的支持，反而遭到威尼斯、热那亚和阿拉贡(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统治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彼得一世恢复和平，保护西方商人在东方的商贸活动。1368年9月，失望而归的彼得一世，因王朝内讧和宫廷矛盾，于次年元月被男爵刺杀。

彼得一世逆潮流而动的圣战思想和行动，其失败的结局不可避免。自1291年十字军从地中海东岸完全退却后，欧洲各封建主，尤其是新兴的各城市王国，一改过去十字军攻城掠地的政策，希望通过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获得在东方国家的贸易特权，大力发展与东方的海上贸易，这自然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当时地中海是东西方贸易的通道，而扼地中海东部咽喉的塞浦路

斯，则是东西方贸易的桥梁。塞浦路斯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如法马古斯塔，已发展成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同样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所以，彼得一世的圣战，必然不会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而且对塞浦路斯的商贸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尤为严重的是，彼得一世对埃及的远征，导致他死后埃及对塞浦路斯的报复性入侵和破坏，成为鲁西格南王朝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鲁西格南王朝的衰亡

热那亚占领法马古斯塔

罗马教皇发起了十字军东侵，而十字军的运送任务却是由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完成。这些商人的目的就是在十字军攻占的城市获得贸易特权。1218 年 6 月，鲁西格南王朝国王亨利一世的摄政王菲利普，给予热那亚人在塞浦路斯的贸易特权，并允许在法马古斯塔和利马索尔购置不动产。1232 年，热那亚人又出动舰队，迫使亨利一世给予其在尼科西亚和佩福斯的贸易特权。

十字军退出地中海东岸后，塞浦路斯的战略和商贸价值更加凸显。1306 年，亨利二世(1285 ~ 1324 年在位)给予威尼斯人几乎与热那亚人同样的特权。在塞浦路斯经商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常常为获得更多的特权争吵不休，甚至以海上舰队相要挟，在王国内建立了“白热那亚”和“白威尼斯”国中之国，国王对这种局面也不得不默认。

1258 年，以威尼斯人、比萨人和圣殿骑士团为一派，以热那亚人、西班牙人和圣殿医务团为另一派，两派之间的仇杀达到了白热

化，经雨果二世（1258～1267年在位）的母后、摄政王普莱桑斯的斡旋，冲突暂时缓解，但双方并不甘心，都在伺机而动。1372年，在彼得二世（1369～1382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典礼上，国王让威尼斯人牵着御骑右缰走在拉丁大主教的后面，这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誉，以前这一荣誉都是由热那亚人享有，此次更改，热那亚人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愤怒很快转化为对威尼斯人的攻击。塞浦路斯人本来就对热那亚人不断攫取特权和海盗行为极为不满，他们站在了威尼斯人一边。威尼斯人抢劫了热那亚人的商店，在冲突中有几个热那亚人丧生。1373年春，热那亚派舰队对塞浦路斯进行掠夺和破坏，10月，攻占了法马古斯塔和尼科西亚，并俘获了国王彼得二世。10月21日，彼得二世被迫接受了热那亚人的苛刻条件：法马古斯塔由热那亚人占领；每年向热那亚进贡40万弗罗林金币；向热那亚付2,012,240弗罗林的战争赔偿，12年内付清，其中第一笔9万弗罗林于同年12月付清，作为热那亚人撤出被占领的塞浦路斯其他地方的条件。

热那亚入侵并占领法马古斯塔，对鲁西格南王朝造成了巨大打击，巨额赔款和贡金自然地转嫁到农民和商人身上，外商纷纷从法马古斯塔撤往其他城市，但仍然受到热那亚人的敌视和排挤。威尼斯随下令禁止其臣民与塞浦路斯进行商贸活动，这一禁令直到1378年才被取消。外商撤离使塞浦路斯的贸易锐减，经济开始萧条。

埃及的入侵及其影响

自彼得一世远征亚历山大后，彼得二世（1369～1382年）和杰纳斯（1398～1432年）国王先后于1370年和1414年与埃及素丹签

订和平条约，但双方之间的海盗式掠夺从未间断。1424 年，埃及的马木鲁克小股舰队掠夺了利马索尔。次年，马木鲁克又从叙利亚出发，对塞浦路斯的南部沿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掠夺和破坏。

对塞浦路斯掠夺的成功，使埃及素丹备受鼓舞。1426 年，埃及派出了一支由骑兵和 180 艘战舰组成的更大规模的远征军，7 月 7 日，在塞浦路斯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基罗基提亚展开激战，训练有素的马木鲁克很快就战胜了国王的军队，并乘胜攻占了尼科西亚，杰纳斯国王被俘，王宫被付之一炬，马木鲁克在尼科西亚大肆屠杀和掠夺一番后，押着国王和 3,500 多名俘虏凯旋而归。

杰纳斯国王在开罗被囚禁 2 年，在罗马教皇、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斡旋下，以 20 万达克特赎回，鲁西格南王朝向埃及素丹称臣，每年进贡 8,000 达克特。

埃及入侵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本来就虚弱的王朝政局更加动荡，人心涣散。塞浦路斯的许多外国雇佣军头领乘机拥兵自重，到处抢劫，加强自己的势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西福尔萨为首的一帮西班牙雇佣军，在佩福斯烧杀抢掠，横霸一方。

向热那亚的赔偿和贡金，已经使王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现在又要向埃及交付赎金和进贡，只有靠增加税收。沉重的赋税最终导致农民武装起义。利马索尔和佩里斯特里拉的农民相继起义，建立起了第一批农民自己的管理机构和指挥中心。随后特罗多斯山区的各村庄也联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另外，在莫尔富和梅萨奥里亚平原的农民，建立了另一个农民起义指挥中心。各地的农民起义组织联合了起来，统一归他们自己的“国王”亚历克西斯指挥。亚历克西斯是位下木里亚村的农奴，他的指挥中心就设在莱夫科尼科。

这些农民起义组织的目标是反对法兰克人的剥削和统治，建立农民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无意把法兰克统治者逐出塞浦路斯，建立希腊人当家做主的社会。所以，农民起义者没有设法攻占要塞，也没有抢劫和屠杀法兰克人。由于农民领袖认识上的局限性，给统治者大肆反扑以喘息之机。农民起义在岛上坚持了8个月后被圣殿医务团镇压。1427年5月12日，起义军头领亚历克西斯被捕后被绞死。

塞浦路斯希腊人农民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的斗志，给鲁西格南王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加速了鲁西格南王朝的灭亡。

詹姆斯篡夺王位

杰纳斯国王因两年的囚禁，身心健康遭到破坏，1432年含辱死去，其子约翰二世（1432～1458年在位）继位。约翰二世怯弱无能，贪婪女色，第一个妻子死后，与情妇玛丽埃塔鬼混并生有一子詹姆斯。为了安抚被统治者希腊人、稳定政局和恢复经济，1441年，约翰二世续娶了拜占廷皇帝之侄女海伦为后。次年王朝最高法院确认海伦王后为摄政王，海伦王后成为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海伦王后给希腊族人诸多帮助，1448年，她下令废除了《塞浦路斯问题训谕》。为保护希腊人的利益，她与罗马教皇及其特使作斗争。海伦王后的事迹至今仍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中传颂。

1458年4月和6月，海伦王后和约翰二世相继去世，他们的独生女夏洛特（1458～1460年在位）继位。在这期间，法兰克统治阶级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夏洛特女王，并得到了热那亚人的支持；另一派支持约翰二世的私生子詹姆斯，阴谋夺取王位，而且威尼斯人

把赌注也下在了他的身上。1458 年 12 月，詹姆斯的阴谋败露之后，带领一批追随者逃往埃及。詹姆斯向埃及素丹承诺，夺得王位后承认其宗主权，并增付贡金，埃及素丹给了他很大帮助。

1460 年 9 月，詹姆斯在 8 艘埃及战舰和马木鲁克的帮助下，攻占了尼科西亚，夏洛特女王和丈夫路易斯逃到塞浦路斯北部的基里尼亚城堡。夏洛特多次向西欧封建主求援，但均未成功。4 年后詹姆斯攻占了基里尼亚城堡，并在威尼斯人的帮助下从热那亚人手中夺回了法马古斯塔。至此，詹姆斯二世（1460 ~ 1473 年在位）完全控制了整个塞浦路斯。

科内罗逊位威尼斯

詹姆斯篡夺王位后，威尼斯人得势，获得了许多特权。詹姆斯二世没有继承其父王为安抚希腊人，娶有希腊血统的女子为妻的传统。1468 年 7 月，在威尼斯人的极力撮合下，詹姆斯二世与威尼斯贵族之女，年方 15 岁的凯瑟琳·科内罗结婚。威尼斯统治者深知这一婚姻的政治意义，便赐姓凯瑟琳为“威尼托”，同时封她为“圣马可之女”（即“威尼斯之女”）。贪图享乐的詹姆斯二世并未察觉威尼斯人的阴谋，而且在他死之前，还请求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塞浦路斯王国的监护者。1473 年 7 月，詹姆斯二世死后，王位留给了他尚未出生的孩子。8 月 22 日詹姆斯三世出生，但一年后神秘夭折。科内罗成了名义上的女王。

在这一时期，鲁西格南王朝统治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统治阶层分化。法兰克贵族逐渐丧失了享有的权力，而夏洛特女王的追随者也在继续活动。另外，曾跟随詹姆斯夺得王位的一伙加泰罗尼亚和西西里暴徒，詹姆斯在位时被封为朝中重臣，他们担心科内

罗会成为威尼斯人的傀儡,因而与那不勒斯国王和埃及素丹秘密勾结,反对威尼斯人,但最终被威尼斯人彻底镇压。威尼斯执政团指派了两位威尼斯人作为科内罗女王的顾问,掌握王国的一切权力。王朝政权实际上已落入威尼斯人之手。

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威胁的增加,威尼斯执政团决定撕掉伪装,直接统治塞浦路斯。威尼斯执政团指使在塞浦路斯周围水域游弋的威尼斯舰队司令弗里西斯·普里乌里与科内罗之弟乔治·科内罗一道,软硬兼施,劝说科内罗主动放弃王位。1489 年 2 月 26 日,在法马古斯塔的圣马可教堂举行仪式,科内罗女王被迫逊位威尼斯。法兰克鲁西格南王朝对塞浦路斯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四、威尼斯统治的特点

威尼斯统治的特点

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后,塞浦路斯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属地,由威尼斯任命的一位总督和两位顾问治理,这三人便组成塞浦路斯地方政府,负责行政、税收、司法和塞浦路斯封建主军队。当发生战争时,军队由威尼斯执政团任命的将军统一指挥。总督和顾问任期均为 2 年,享受威尼斯政府俸禄。总督府设在尼科西亚。另外,为了相互牵制,塞浦路斯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的军政长官,由威尼斯执政团直接任命,俸禄与总督相同,任期 2 年。威尼斯的这种统治特点,虽然抑制了地方官员个人野心的发展,但也严重影响了对塞浦路斯事务的有效管理。

在威尼斯统治下,鲁西格南王朝时期的法兰克贵族已经失势,威尼斯人不断向塞浦路斯移民,形成了新的贵族特权阶层,成为总督统治的基础,而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人仍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农奴。威尼斯统治者与鲁西格南王朝统治者一样,都信仰罗马天主教,尽管承认希腊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但对希腊东正教会和希腊人的迫害和奴役,比法兰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一位希腊东正教会的教士所言:"我们摆脱狼群,又陷虎穴。"

威尼斯人的统治与鲁西格南王朝的统治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西格南王朝统治者把塞浦路斯完全当成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王国进行治理,无论任何天灾人祸都与统治者息息相关。虽然统治者对人民横征暴敛,占有全部土地和希腊人创造的财富,但人民安居乐业和全岛的繁荣与稳定,不仅是人民的愿望,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因素。但对威尼斯而言,塞浦路斯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和垄断与东方贸易的商贸站,一切目的都是为威尼斯攫取最大利益。据估计,威尼斯每年仅从土地、海关和税收就获得50多万达克特(约折75万英镑),而实际流入威尼斯的财富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事事都等千里之外的威尼斯执政团决定。农业荒废,河流外溢,沼泽连片,工业几乎完全不复存在。官员腐败,在短短的任期内尽力为自己敛财。卖官盛行,甚至连天主教的大主教之职也可以买得。塞浦路斯的财富被搜刮一空,接下来便是买卖农奴和原鲁西格南王朝王室拥有的土地和村庄。从1503年至1528年的25年中,有62个村庄及其农奴被卖给个人,而投机商从中牟取暴利。统治者还采取赎买自由、免服军役等手段榨取钱财。潘泰利·斯塔夫罗斯在《新塞浦路斯历史》中,记载了一位在1508年曾前往耶路撒冷朝

圣、在塞浦路斯作过短暂停留的西方基督徒记述:“所有塞浦路斯人都是威尼斯人的奴隶,他们收成的无论是谷物油料,还是牛羊瓜果,都必须将收成的1/3交给威尼斯人。另外,每周还必须给威尼斯人做2天的劳役。如果因自己的农活或生意,甚至患病被耽误,要罚交相同天数劳动所创造的财物。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各种苛捐杂税,人民衣不裹体。”威尼斯统治者敲骨吸髓式的统治,使整个塞浦路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人民起义。

起义是由一位希腊人教师詹姆斯·狄斯奥里诺斯领导,希腊人军官和失去特权的法兰克贵族也参加了起义,而且他们与土耳其人秘密联系,希望得到土耳其人的帮助。后因叛徒出卖,狄斯奥里诺斯被捕后遇害。尽管此次起义失败了,但它唤起了塞浦路斯希腊人的民族热情,饱受异族压迫的塞浦路斯人民,寄希望于早就对塞浦路斯垂涎三尺的土耳其人,把他们从威尼斯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土耳其人的威胁

在威尼斯人统治的整个时期,塞浦路斯一直面临着土耳其人的威胁。威尼斯占领之初的1489年,土耳其舰队掠夺了塞浦路斯东部的卡帕斯半岛。150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素丹签订了和平条约。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埃及,威尼斯派代表向素丹谢里姆一世表示祝贺,并主动将塞浦路斯每年向埃及进贡的8,000达克特,从此转贡素丹。同时,素丹也允许威尼斯人在埃及享有贸易特权。1521年,谢里姆一世击败匈牙利,次年征服罗得岛,欧洲为之震惊。面对战无不胜的土耳其人,欧洲患上了“奥斯曼恐惧症”。

1539年,土耳其舰队掠夺并破坏了塞浦路斯的港口城市利马

索尔。尽管次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素丹签订了新的和平条约，但摧毁利马索尔，预示着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的开始。实际上，威尼斯统治者与土耳其人的和平，是他们通过向君士坦丁堡高官行贿换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公使告诫威尼斯执政团，如此下去，到 1560 年，威尼斯必须向土耳其官员行贿达 30 万达克特，土耳其人不可避免要征服塞浦路斯，提醒政府必须及早备战。

随后，威尼斯执政党团派军事专家到塞浦路斯考察防御工事，但由于重视不够和防御战略思想的错误，把防御重点只放在了首府尼科西亚、商业港口重镇法马古斯塔和基里尼亚，对其他重要要塞，甚至对拜占廷帝国时期修建的抵御阿拉伯人袭扰的著名要塞，赫拉里昂、布法文托和坎塔腊均未修复和设防。所以，在 1570 年，有备而来的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很快征服了塞浦路斯，结束了威尼斯人 82 年的残暴统治。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和统治

一、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征服

征服首府尼科西亚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时期达到鼎盛，建立起了横跨欧、亚、非的封建军事大帝国。土耳其人在向欧洲中部进军受到奥地利人顽强抵抗遇阻后，征服的目标转向了地中海地区。1565 年，土耳其人发动了对位于地中海中部、扼太平洋通往地中海东部和印度洋咽喉的马耳他的战争，激战两个多月，因损失惨重而撤退。1568 年，奥斯曼帝国素丹塞利姆二世，与匈牙利皇帝签订了为期 8 年的休战协定，从而把征服的矛头指向了楔于奥斯曼帝国版图中央的基督教堡垒——塞浦路斯，为日后再次征服马尔他扫平道路。

与塞浦路斯隔海相望的南、东、北已为土耳其所控制，而被威尼斯人占领的塞浦路斯，便成为土耳其人在地中海东部建立绝对权威的眼中钉，马耳他战争失利后，好战的帝国帕夏们力劝塞利姆二世拔掉这个钉子。奥斯曼帝国政府大维齐、亲威尼斯的穆罕默德·索科里，多年来一直斡旋使两国关系不致破裂，但此时，他已无

力制止帝国帕夏们战争的狂热。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被逮捕,商船被扣押。土耳其人在威尼斯控制地区也遭到相应报复。1570年3月,塞利姆二世派特使库巴德向威尼斯执政团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把塞浦路斯尽快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威尼斯自然拒绝了土耳其人的无理要求,战争已不可避免。

奥斯曼帝国在尚未得到威尼斯执政团的答复之前,已经开始实施对塞浦路斯的战争:舰队向爱琴海运送弹药枪械,军队向小亚细亚运动,土耳其战舰从罗得岛向卡斯特洛里佐岛以东的菲尼克湾集结,准备以逸待劳袭击威尼斯增援舰队。1570年7月3日,由350艘舰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运送着5万士兵、2,500匹战马、30门重型大炮和50门大炮,在穆斯塔法帕夏的率领下,在丝毫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从塞浦路斯南部港口城市拉纳卡附近的萨林斯成功登陆。萨林斯与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和重镇法马古斯塔距离相等,对首先攻占何处土耳其军队内部有分歧。同样,威尼斯守军也搞不清土耳其军队的首攻目标,所以决定坚守尼科西亚、法马古斯塔和基里尼亚三个主要城市,其他地方基本处于无防御状态。

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驻军有3,000步兵、1,000骑兵和数千自发民兵组织。另外从威尼斯派出的2,000人增援部队,主帅在途中阵亡,到达塞浦路斯者仅1,500人。所以,岛上威尼斯武装部队总计不过万余人。镇守首府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总督尼科劳·达德劳,“有勇无谋”,不懂军事,犹豫不决,拒不听从部下阿斯特罗夫·巴廖内要求乘土耳其人登陆之机迎击的建议。阿斯特罗夫·巴廖内愤然率其部下投奔了法马古斯塔。

土耳其军队在萨林斯休整3个月后,迅速兵临尼科西亚城下,将该城团团围住。双方展开炮击,但土耳其军队的重炮对坚固的

尼科西亚城墙并不能造成多大破坏。穆斯塔法便命令士兵向城墙挖“Z”字形战壕，土耳其军队从战壕里推进到距城墙 150 米处，这样土耳其人的重炮就可以发挥威力，步枪也提高了准确度。城墙上的威尼斯人不敢抬头，南城墙上的 4 个碉堡被摧毁，但土耳其军队仍无法靠近城墙，甚至威尼斯人还组织了几次小规模反击，迫使土耳其军队后撤。主帅尼科劳·达德劳坚持固守尼科西亚城，等待援军，但他派出的求援密使均被土耳其军队俘获。尼科西亚城内悲观气氛弥漫：“对如此猛烈的攻击，人类的能力已无济于事，只有祈求上帝的拯救。”

两军激战 45 天，均损失惨重。一直准备迎战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联合舰队的土耳其舰队，未等到敌舰到来后，便派出 2 万士兵增援围攻尼科西亚。1570 年 9 月 9 日，尼科西亚城被攻破，但威尼斯人仍顽强抵抗，转入巷战，直到他们借以抵抗的建筑物——被土耳其军队炸毁和被骑兵踏平。土耳其人疯狂地进行报复性的屠杀和抢劫，妻子看着丈夫人头落地，母亲目睹孩子被活活摔死，土耳其士兵甚至竞相用劈开威尼斯人的头颅来证明自己刀剑的锋利。教堂被摧毁，祭坛被拆除，圣像被烧，坟墓被掘，躲入教堂者也无法避免被杀的命运。这样的杀戮持续了 3 天，据说仅 9 月 9 日一天，被杀者就达 2 万人之多。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获得的战利品，是继 120 年前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的天量。穆斯塔法帕夏还特意从俘虏中精选了数百名美女敬献素丹。

攻克法马古斯塔

在尼科西亚屠杀和掠夺后，穆斯塔法帕夏挥师基里尼亚和法马古斯塔。他强迫被俘的威尼斯将军去基里尼亚劝降，基里尼亚

城守将几经犹豫后决定向土耳其人投降。随后尼科西亚总督的头被送到法马古斯塔,恐吓其投降,但野蛮的杀戮更坚定了他们坚守城池的决心。岛上的其他城市已完全被土耳其军队占领,攻占法马古斯塔,便成为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的最后一战。

1570年9月底,土耳其军队包围了法马古斯塔。次年初春,又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调来大批土耳其军队。随军而来的还有大量非武装人员,他们希望在攻克法马古斯塔后掠夺战利品。土耳其人在法马古斯塔城外挖掘了更深更宽的壕沟,骑兵可以在壕沟内驰骋,甚至攻城士兵可以驻扎在壕沟里。而守城的威尼斯将军马坎托尼奥·布拉加狄诺、巴廖内和蒂耶波洛英勇果敢,善于用兵,决心与法马古斯塔城共存亡。土耳其军队在壕沟里用重炮轰击城墙和城内建筑,威尼斯人同样用重炮还击,但威尼斯人由于弹药供给不足,只好规定每天最多打30炮。1571年6月21日,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但经过反复拉锯式的战斗,土耳其军队始终未能攻入城内。6月29日,穆斯塔法帕夏亲自督战,城墙被炸开了另一个缺口,但威尼斯人的顽强抵抗和及时修复,仍将土耳其军队拒之城外。

7月7日,土耳其军队大批弹药运到,更猛烈的攻击开始了。7月29日至31日,土耳其舰队也来增援,进行了连续3天不间断的炮击,据说仅9日一天,炸死守城者3,000余人,土耳其人也付出了5,000伤亡的代价。城内的威尼斯人已弹尽粮绝,马、驴甚至连猫都已吃光。到8月1日,只剩下几百名饥饿难忍、疲惫不堪的士兵和最后7杆枪,在守城已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几位首领商议决定投降。8月1日,法马古斯塔城上升起了一面表明投降的白旗。威尼斯人与穆斯塔法帕夏商定的投降条件是:给所有守城的威尼

斯官兵战争荣誉，允许他们携带武器，用土耳其船只把他们及其家属和财物运往克里特；希腊人士兵或臣民和阿尔巴尼亚人骑兵，如果他们愿意走，同样将他们送到克里特；应保证留在岛上的希腊居民的安全，而且在2年内，他们如想离开，应提供方便。穆斯塔法帕夏除要求威尼斯人所带枪械不得超过5支外，爽快地答应了其他所有条件。1571年8月1日，威尼斯人最终向土耳其征服者投降，结束了对塞浦路斯长达82年的占领。

穆斯塔法帕夏围攻法马古斯塔近一年，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奥斯曼帝国政府给他巨大压力。他曾多次要求威尼斯人放弃抵抗，均遭拒绝，使穆斯塔法对这些异教徒威尼斯人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慷慨地接受了他们的所有条件，但报复的计划却已成竹在胸。

第二天土耳其人向城内送去了食物，4艘运输船停泊在港口。到8月5日，绝大多数威尼斯士兵已上了船，威尼斯主帅布拉加狄诺向穆斯塔法抱怨船上装载严重超员，穆斯塔法立即表示道歉，并希望亲自接见布拉加狄诺及其部下。5日夜，布拉加狄诺率部下及50名士兵来到穆斯塔法帕夏大营，在进帐前土耳其士兵礼貌地让他们放下携带的武器。布拉加狄诺一进帐，穆斯塔法就怒责他杀死了5位土耳其俘虏，不由分说，布拉加狄诺被绑了起来，其他人也都被绑在了帐前的广场上，几位企图反抗的部下当即被砍成了肉泥。布拉加狄诺被当场割掉了耳朵和鼻子。穆斯塔法骂道："基督现在何处？怎么不来救你？"已经上船的威尼斯人遭抢劫后被五花大绑，全被处决。据一位叫格拉齐阿尼的作者，1624年在其《美丽的塞浦路斯》一书中写道，布拉加狄诺"被一个犹太绞刑吏活剥了皮——真是一幅令人恐怖和无与伦比的野蛮惨景。……按照穆斯塔法的法令，他的皮经过醋和盐处理，晒干后，填满了干草，

悬挂于帆桁的顶端，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地区示众”。350名威尼斯官兵被杀，布拉加狄诺的人皮和多名将领的首级，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布拉加狄诺的人皮后来被基督徒从君士坦丁堡盗回塞浦路斯，现保存在塞浦路斯博物馆。

1571年9月22日，穆斯塔法带着大量财宝，许多俘虏和战利品离开了塞浦路斯，但他留下了1.2万名步兵，另外还有数千土耳其人作为殖民者定居塞浦路斯。从此在塞浦路斯出现了一个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它对塞浦路斯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此次战争交往，给塞浦路斯造成的不仅是战争的破坏和土耳其人对塞浦路斯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而且这次交往的烙印至今成为塞浦路斯民族冲突之源。

威尼斯人失败的原因

穆斯塔法帕夏征服塞浦路斯，正值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对异教徒的圣战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兵强马壮，增援部队源源不断，人数最多时达20万人之多，而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不足1万人，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讲，威尼斯人处于劣势。

当时，塞浦路斯的社会矛盾激化。统治者威尼斯人本身就是异族占领者，他们继续实行法兰克人封建农奴制度，曾多次激起农奴和自由民的起义。起义者秘密与土耳其人联系，希望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把他们从威尼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塞浦路斯人不可能与威尼斯统治者同心同德、抵抗土耳其人的征服，这是威尼斯人失败的重要内因。

军事指挥失当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并加速了威尼斯人失败的

速度。在土耳其军队登陆时没有迎头痛击是第一大失误。土耳其军队长途跋涉来到尼科西亚,威尼斯人没有以逸待劳,主动出击,再次失去战机。威尼斯人总督优柔寡断,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当封建主军队利用土耳其人中午休息之机主动出城痛击,打得土耳其军队措手不及时,威尼斯总督却以封建主不听从命令为由下令停战,关上城门,致使土耳其军队重振旗鼓,出城者全部被俘。

援军未到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威尼斯总督的指导思想就是坚守城池,等待援军。威尼斯执政团接到奥斯曼帝国素丹的最后通牒后,教皇鼓动坚决予以拒绝,威尼斯商人也竞相捐钱捐物,支持政府抗击土耳其人。由教皇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组成的250艘战舰,近1.7万人的联合舰队,由于内部矛盾重重,1570年9月17日才迟迟出发,当他们行驶至罗得岛东的卡斯特洛里佐岛时,获悉首府尼科西亚已失守,他们认为此次远征的目的是保卫尼科西亚,既然尼科西亚已经失守,土耳其人将会全力迎战联合舰队,继续前去增援会凶多吉少,而且冬季航行风险太大,便调转航向,把法马古斯塔的命运留给守卫者自己去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法马古斯塔陷落后的1571年10月7日,这只联合舰队与奥地利舰队在勒班陀战斗中重创土耳其舰队,从此土耳其人逐渐丧失了海上优势,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开端。而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小规模战争并未间断,直到1573年,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素丹才签订了和平条约。条约规定,威尼斯把塞浦路斯的统治权让给奥斯曼帝国,而且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偿付征服塞浦路斯的费用。

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特点

统治初期的宽容政策

土耳其人统治塞浦路斯之时，正值世界发生巨变之际。西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技术为特征的近代文明迅速扩展。新航路的发现，太平洋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传统的地中海贸易逐渐萧条，直接影响到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站的塞浦路斯的经济。另外，土耳其人对塞浦路斯一年多的征服战争，农业未能及时耕种和军队的践踏破坏，粮食歉收，饥荒四起，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安抚民心、恢复经济，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宽容政策。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把束缚在封建主领地上的农奴解放出来，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信仰自由，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希腊东正教会得到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承认，失势300多年的正教会大主教辖区重新建立了起来，还允许正教会赎回被土耳其人接管的修道院。这些宽容政策最初由穆斯塔法承诺，随后一个由塞浦路斯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面呈大维齐，最后由素丹恩准。在1572年3月和1573年，素丹两度发布圣谕，要求组成由贝勒贝（总督）、税收财务官和卡迪（法官）负责的塞浦路斯地方政府。素丹告诫地方政府官员，不得在使用宗教法和在税收方面欺压希腊族基督教徒臣民，执法要公正，税收要合理，避免引起异教徒臣民的不满甚至反叛。素丹在圣谕中说："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尽快恢复塞浦路斯昔日的繁荣，每个臣民能自食其力，享受和平安详的生活，异教徒臣民与穆斯林相互信任，和睦相处。"素

丹还要求各位官员要尽职尽责,“如果我听到欺压异教徒或私自征收额外税收,从而导致异教徒不满和影响社会稳定者,将严惩不贷”。后来当土耳其素丹听到某些土耳其士兵,把战争期间没收和掠夺来的房屋高价出售,引起希腊族居民的不满时,素丹传旨地方官,谴责这一行为,要求不得超过房屋的原有价格。

素丹的宽容政策让饱受天灾人祸的塞浦路斯居民看到希望,但浩荡圣恩却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官员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为了中饱私囊随意增加税收,人民生活极端艰难。土耳其民众率先发动了反抗地方贪官的起义,素丹的确也严惩过引起民众骚乱的贪官,直到希腊革命波及塞浦路斯之前,素丹对塞浦路斯的宽容与善意仍未改变。

土耳其人统治的特点

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后,与安纳托利亚大陆的另外四个地区组成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塞浦路斯实际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的总督治理。总督下设有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穆夫提(穆斯林的教法说明官、法律顾问,是人民与法官联系的中间人,有咨询权而无审判权)、瓦克夫(穆斯林宗教寺院等财产的管理者)、3位穆斯林土耳其贵族和2位希腊族基督徒贵族组成。该委员会由总督主持,每周开会一次,对塞浦路斯的财政、税收和管理等重大问题向总督提供咨询,而且会上做出的决定必须由出席会议的成员签名,签署的这种文件被称之为“穆斯巴塔斯”(Musbatas)。该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充分体现了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地位。

在总督治理下,塞浦路斯被划分为17个行政区,到19世纪削减为6个。每个行政区由两位土耳其人管理,一位是掌管行政和

统帅封建军队的土耳其贵族阿迦，另一位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官卡迪。征服塞浦路斯的穆斯塔法帕夏为首任总督，官居三尾旌。总督府设在尼科西亚，另有两位二尾旌帕夏分别坐镇法马古斯塔和佩福斯。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初，据1572年非穆斯林人口缴纳哈拉吉（人丁税）推算，岛上有非穆斯林人口8.5万人，除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外，还有亚美尼亚人、马龙派教徒和极少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拉丁人；另外还有新定居的2万多土耳其人。由于严重的蝗灾、瘟疫和饥荒，除了死于灾荒外，塞浦路斯居民大量逃往克里特和希腊半岛，到1640年，非穆斯林人口不足2.5万人。为了阻止外逃和把逃往岛外的难民吸引回来，土耳其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设在法马古斯塔和佩福斯的两个帕夏辖区，削减尼科西亚总督府的开支。但据当年去岛上的旅游者记述，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1670年，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取消了对塞浦路斯的帕夏管理制度，把塞浦路斯与安纳托利亚大陆的四个地区划归海军统帅治理，海军统帅指派一位代理人，即专使具体负责塞浦路斯事务，其年薪规定为1.5万皮阿斯特（约合3,000英镑）。为了获得专使这一肥差，土耳其人竞相大量行贿，任职后便尽力敛财，曾多次激起塞浦路斯人，尤其是土耳其族人的反抗。

1703年，人民的反抗引起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关注，随后将塞浦路斯转为大维齐的个人领地。大维齐同样也每年委派专使代为管理。专使集行政、军事和税收权于一身，直接向大维齐负责。实际上就是大维齐把塞浦路斯的统治权"租赁"给专使，专使向大维齐缴纳双方商定的"租金"。专使没有固定薪金，其报酬完全根据他在塞浦路斯榨取的多少而定。所以，获得专使之职是实现迅速

暴富的美差。大维齐选派专使的条件当然是出价最高者。据在1744年曾访问过塞浦路斯的英国驻阿勒颇领事记载，当年穆斯塔法（不是征服塞浦路斯的叙利亚总督穆斯塔法帕夏）贝伊为了获得专使之职，向大维齐身边官员大肆行贿，最终以31万皮阿斯特（其中16万归大维齐个人，15万作为哈拉吉上缴帝国国库）租到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权。在短短一年内，穆斯塔法贝伊除去租金、行贿及个人差旅和生活费用外，装入个人腰包者高达31,250英镑，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物品。

1745年，塞浦路斯改为由帕夏治理的独立行省，每年给大维齐一定的补偿。实行这一制度后的第二任帕夏阿布·贝克尔，是整个土耳其统治时期为数甚少的在塞浦路斯享有盛誉的帕夏之一。1747年，贝克尔帕夏个人捐助5万多皮阿斯特，把阿皮拉（Arpera）泉水引到了拉纳卡，整个工程长达10公里，至今在拉纳卡附近还可看到引水渠的遗迹。

1849年至1861年，塞浦路斯归并到首府设在罗得岛的爱琴海帕夏辖区。在这一时期，总督更换频繁，平庸无能者居多，即使有能力者，因任期太短也无所作为。1861年又再次恢复为由总督治理的独立行省，但仅7年后，又转归新设置的达达尼尔行政区，总督府设在克拉克，对塞浦路斯的管理更是鞭长莫及。1871年，又一次恢复了爱琴海帕夏辖区对塞浦路斯的管理，直到1878年素丹下诏将塞浦路斯交由英国治理。

无论作为独立行省，还是其他帕夏辖区，为了便于管理和征收赋税，按宗教信仰把塞浦路斯划分成了两个区，即穆斯林区和雷亚区。穆斯林区主要由奥斯曼帝国委派的地方官员、士兵和土耳其定居者构成，是塞浦路斯的统治阶级。非伊斯兰教信仰者即异教

徒“雷亚”(Rayahs 是土耳其人对异教徒的称呼),归雷亚区,主要是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马龙派信徒和少量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雷亚是毫无政治权利的二等公民,必须缴纳人丁税(哈拉吉),作为他们继续信仰原有宗教、免服军役和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保护的代价。除此之外,还有土地税、盐税,某些地区还有特别地区税,如莱夫卡(Lefha)和埃皮斯科皮(Episcopi)地区,因有供水设施而收取水税。所有这些税收都由帕夏委派的专使或大维齐的代理人负责,下达具体征收数量。具体征收办法是:穆斯林区的各村庄,由土耳其村民推选或土耳其官员指定的负责人负责收取,然后逐级上缴。雷亚区由大主教、主教负责征收。正因如此,在土耳其人发动的起义中,他们不仅反对土耳其地方官员,而且也反对大主教和主教,认为他们是土耳其地方官员贪赃枉法、超额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的帮凶。其实大主教为制止土耳其地方官员超额征税,曾多次前往君士坦丁堡,向素丹面述人民的痛苦,要求素丹约束地方官员的暴政。

西方势力企图恢复对塞浦路斯统治的努力

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后,某些西方势力并不甘心,纠集岛上失势的封建贵族,企图恢复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萨沃伊的夏尔·埃马纽埃尔(1580~1630年)和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一世(1587~1609年)。

夏尔·埃马纽埃尔,自称是鲁西格南王朝末代女王夏洛特的亲属,以流亡者代表自居,呼吁奥斯曼帝国素丹把塞浦路斯割让给他,作为他的“合法领地”。1600年,夏尔派密使弗兰西斯·阿哥达斯潜入塞浦路斯,与大主教接触,传达他的“收复”计划。该计划包

括:约定大主教组织起义;屠杀土耳其人;夏尔率兵攻占岛上要塞;出高价雇用土耳其士兵。这是一个十足的冒险计划,大主教勉强表示同意,但要求必须保障希腊东正教会的权威和已释农奴的自由,而阿哥达斯向夏尔汇报时谎称,大主教承诺组织8万希腊族人准备起义。

1601年9月,夏尔再次派三位密使潜入塞浦路斯,给大主教带去了他的亲笔信。夏尔在信中承诺,完全答应大主教的一切要求,并给大主教及其亲属免税及给予贵族身份等特权,同时还计划将新教义信仰者,如马丁·路德教、胡斯信徒等逐出塞浦路斯。在他的"政府"中,西班牙人没有任何职位,热那亚人不得拥有地产、城堡和税收等权力。显然,他把大主教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夏尔的这张空头支票,也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西班牙、热那亚的衰落。夏尔的计划并未实施就胎死腹中。

1607年,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一世,与叙利亚的德鲁兹教派埃米尔联合,反对土耳其素丹,企图占领塞浦路斯。他命令弗兰西斯·德尔·蒙特指挥17艘战舰,远征塞浦路斯。5月24日,蒙特抵达法马古斯塔港,由于舰队在途中走散,蒙特兵力不足,两次登陆未果后撤退。虽然岛上土耳其驻军不多,但地方政府号召居民组织起来抗击入侵者,费迪南德原以为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会配合他反对土耳其人,但这一情况并未发生,最终以失败告终。

大主教兼任埃思纳克

在被征服地区扶持和利用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民族进行统治,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突出特点。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后,为了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宽容政策,恢复

了在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统治时期饱受迫害和奴役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奥斯曼帝国307年的统治中，塞浦路斯正教会不仅保护了希腊族基督徒，防止被统治阶级土耳其人伊斯兰化，而且保持了希腊人的语言、文字等希腊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开展的希腊文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希腊族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同时，正教会的主教们为了保护希腊族人（常常也包括贫苦的土耳其人）的合法权益，阻止土耳其地方官员私自增加税收，反对暴政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逐渐树立了正教会世俗的领导地位。正教会大主教被公认为是人民的代言人和领导者，可以直接向素丹面陈人民疾苦。1660年，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大主教尼科弗罗斯（Nikiforos）及其继承人负责穆斯林区和异教徒“雷亚”区的税收，标志着大主教不仅是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成为塞浦路斯世俗事务的管理者。在随后的90多年里，大主教多次前往君士坦丁堡，陈述人民的疾苦，请求大维齐减轻赋税和阻止土耳其总督的暴政。

起初大主教和主教们只是秘密前往君士坦丁堡，求见素丹和大维齐，控告土耳其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后来逐渐变成了公开的行动，这无形中把正教会的教职人员凌驾于土耳其地方官员之上，引起了土耳其地方总督的不满，土耳其地方总督千方百计阻挠和干涉大主教的行动。1752年，土耳其地方总督以干预塞浦路斯事务为由，怂恿奥斯曼帝国政府驱逐了希腊人主教和口译官（初为素丹宫中的口译官，后逐渐演变为重要官职），企图切断塞浦路斯大主教与素丹和大维齐沟通的渠道。两年后，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了消除人们对沙皇俄国的恐惧（1736～1739年土耳其人在与沙俄的战争中遭到了一系列的失利），增进与希腊民族的关系，召回了

被驱逐的主教和口译官。在大主教菲洛伊奥斯的努力下,排除了总督的干扰,大维齐还恢复了三位塞浦路斯的主教之职,他们是佩福斯主教约阿基姆、克里昂主教马卡里奥斯和基里尼亚主教尼塞福诺斯。

为防止地方总督私自增税,大主教争取把塞浦路斯应缴的税收总额,按1745年人均21.5皮阿斯特计算,固定为10,066万皮阿斯特。这也意味着无论塞浦路斯的人口增加或减少,塞浦路斯应缴纳的税收总额不能改变。如果人口增加,人均税收相对会减少,但如果人口减少,大主教也必须设法征收到应缴的税额,无形中人均税收将会增加。为了确保税收的完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大维齐任命大主教为"人民的代表和政府的监督者",从此,正教会不仅是宗教事务的权威,而且拥有了世俗政治权力。大主教从单纯的宗教领袖,变成了塞浦路斯的政教合一的领导者——人民的埃思纳克(Ethnarch)。次年(1755年)修道院的4,000皮阿斯特额定年哈拉吉由主教征收,然后转交土耳其地方总督。

教职人员拥有合法的官方职位,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利益,阻止土耳其地方官员的暴虐行为。但是,由于他们直接负责税收,成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其中也不乏有些教职人员沦为统治阶级的帮凶。但从总体上讲,正教会为保护希腊族人的利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在保护希腊文化传统、激发希腊族人的民族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教会所获得的这种权力,对塞浦路斯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土耳其人奥格鲁、哈利起义和巴基之乱

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后，尽管土耳其素丹对希腊族人表示了极大的宽容，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管理却相当混乱。土耳其统治者内讧频繁，率先激起土耳其族人的反抗。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18至19世纪，发生了土耳其人梅赫梅特·奥格鲁起义、哈利起义和巴基之乱。

17世纪80年代，随着拥有大片土地的土耳其封建军事首领阿迦财富的增长，个人势力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各个阿迦专权，地方封建割据的局面。阿迦对土耳其总督在塞浦路斯的疏于管理，尤其是枉自增加税收极为不满。1680年，梅赫梅特·奥格鲁阿迦率先举起了起义大旗，反抗安纳托利亚海军统帅(即"海上贝勒贝")擅自增加赋税。奥格鲁在其所控制地区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负责管理和税收，俨然像一个独立王国。但奥格鲁与500年前的艾萨克·科穆宁不同的是，他继续如期向君士坦丁堡上缴税收。奥斯曼帝国政府派乔拉克·梅赫梅特率领少量士兵来岛维持秩序，不久即被奥格鲁强迫到田间劳动。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认定奥格鲁的行为是反叛。平叛大军包围了尼科西亚，奥格鲁逃出后被抓获绞死。奥格鲁起义持续7年之久，它是自1571年土耳其人统治塞浦路斯后，在塞浦路斯首次发生的土耳其人反对土耳其总督的起义。这次起义仅限土耳其人，岛上的希腊族人并未参加。

18世纪60年代的塞浦路斯一片萧条，饥荒四起、瘟疫流行、人口锐减，但奥斯曼帝国政府仍按1754年的固定税额收税。1764年，新任总督希尔·奥斯曼为了获得总督之职，曾大量行贿，上任时已债台高筑，急需从塞浦路斯获得补偿。他把规定的异教徒"雷

亚”的人头税 21.5 皮阿斯特加倍征收，并增加其他赋税。而且要求土耳其居民也必须缴纳 21.5 皮阿斯特的税收。短短 5 个月，他就为个人榨取 35 万皮阿斯特。主教们试图阻拦希尔·奥斯曼的暴政，却被奥斯曼软禁在了大主教府，防止他们前往君士坦丁堡向素丹和大维齐告发。

希尔·奥斯曼的暴行也激起了许多土耳其贵族的反对。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大维齐立即下令停止奥斯曼超额征税，并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塞浦路斯调查。1764 年 10 月 25 日，代表团召集土耳其地方官员、军事首领、正教会大主教、主教以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头面人物 300 余人，在总督府聆听特使宣读大维齐的法令，众多居民也在总督府外静候佳音，希望帝国政府制止希尔·奥斯曼总督的暴政。但希尔·奥斯曼指责大主教不切实际地向帝国政府控告他，随即总督府地板坍塌，主教们掉入地下室。虽然主教们并无重伤，但围观群众认为这是总督设计谋杀主教，异常愤怒的群众冲入总督府，杀死了总督希尔·奥斯曼和他的手下，抢劫了财物，并将总督府付之一炬，愤怒的群众才逐渐散去。

杀死了素丹委派的总督，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宗教领袖和大主教都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报告事件真相，把责任归咎于奥斯曼的暴政。素丹最终接受了该报告，认定希尔·奥斯曼有罪并委派了新总督。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承诺筹资重建总督府，并对被抢劫财物和被杀者的亲属进行补偿。新总督估算其费用共需 50 万皮阿斯特，由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分别按 14 和 7 皮阿斯特的比例缴纳。希腊族人已开始交钱，但土耳其族人认为估算的费用太高而拒交。1765 年 4 月初，梅萨奥里亚平原和法马古斯塔地区的 300 多名土

耳其族人,发动了反对缴纳重建总督府和补偿费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基里尼亚,切断了从基里尼亚的水磨坊向首府尼科西亚的面粉供给,要求总督取消缴纳该费用。土耳其总督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答应了起义者的要求。起义的土耳其人才相继散去。

1765年8月7日,总督下令继续征收总督府被焚和对被害者补偿的费用,基里尼亚城堡司令哈利发动了起义。在哈利周围很快聚集了3,000多名武装人员,哈利下令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把税款交给他,宣称尼科西亚的总督和正教会主教是这次事件的制造者,应当受到惩处。哈利控制了大部分农村地区,起义者发展到5,000余人,并两次试图占领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但均未成功。

大主教佩西奥斯和基里尼亚及佩福斯主教设法逃往君士坦丁堡,将情况报告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素丹派了一支部队前来镇压,被哈利打败,又派了2,700名士兵增援,才将哈利围困在基里尼亚城堡,后来哈利投降并被绞死。哈利起义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

哈利起义得到了许多土耳其族居民的支持。他们不仅反对土耳其地方统治者,也反对正教会主教,认为大主教和主教是地方统治者巧立名目、欺诈百姓的帮凶。这也反映出正教会在当时塞浦路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起义平息后,50万皮阿斯特照缴,管理不良依旧。1771年,塞浦路斯农民出身的土耳其族人哈吉·巴基,通过行贿被任命为财税官。这位独眼、目不识丁的伐木工,曾因敲诈、欺骗、抢劫和残害多人而被禁止进入塞浦路斯。巴基上任后,首先除掉了影响他实现野心的希腊族人口译官。1775年,他又通过总督的医生毒死了刚到任的总督。奥斯曼帝国政府另派了一位总督也遭同样命运。然

后巴基贿赂土耳其显贵和主教，唆使他们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他为总督。巴基如愿以偿后，其贪婪本性毕露，他不仅成倍地增加税收，而且以平价收购生丝、棉花、小麦，然后再按市价出售，不久便家产万贯。大主教及主教们拒绝与他合作，企图秘密前往君士坦丁堡，巴基知道后千方百计阻挠。巴基还乘主教不在之机，企图重新任命大主教和主教，遭到了希腊族人的普遍抵制。

1784年，克里昂主教终于秘密到达君士坦丁堡，控告了巴基的暴行。大维齐宣布巴基有罪，没收了巴基非法所得35万皮阿斯特入帝国国库。另外大维齐还通过对巴基严刑拷打，又榨出40万皮阿斯特装入了大维齐的个人腰包。主教们反对巴基的斗争胜利了，但巴基从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钱并没有回到人民手中，人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塞浦路斯人民，特别是希腊族人，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不满正在与日俱增。

三、希腊革命对塞浦路斯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素丹的大屠杀

19世纪初，欧洲各地相继爆发了反对专制统治，要求建立议会制政府的起义，动摇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821年，希腊爆发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民族起义，对塞浦路斯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814年，希腊民族主义者的秘密组织“友谊社”(希腊语称“菲力克·希特里亚”)在俄国的敖德萨成立。1818年，“友谊社”派代表来到塞浦路斯，与大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建立了联系，并介绍

他参加了该组织。基普里亚诺斯大主教坚定支持希腊的民族事业，承诺对领导希腊起义的“友谊社”给予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持。但他认为此时在塞浦路斯发动起义，时机尚不成熟，贸然行动可能会立即遭到土耳其军队的血腥镇压，故其行动极为谨慎。当希腊革命在伯罗奔尼撒、希腊中部、马其顿和爱琴海诸岛风起云涌之际，基普里亚诺斯还发表文告（1821 年 5 月 16 日），规劝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保持镇定。在这期间，“友谊社”的代表多次潜入塞浦路斯，宣传希腊革命。

在希腊爆发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革命，自然会引起帝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密切关注。尽管基普里亚诺斯大主教行动谨慎，并多次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效忠，土耳其政府还是发现大主教正在秘密参与即将波及塞浦路斯的希腊革命。土耳其人秘探发现塞浦路斯某修道院院长锡奥洛斯·锡苏斯，不仅是“友谊社”成员，而且还将大量宣传希腊革命的书籍带入塞浦路斯，并在塞浦路斯秘密宣传希腊革命。土耳其人确信，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即将卷入希腊革命。奥斯曼素丹认为，帝国属地人民起义是大逆不道，对之进行防范和惩罚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大屠杀。当希腊革命爆发后，素丹即下令处死了在君士坦丁堡担任重要官职的希腊人。年迈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格雷瓦里，被绞死在宗主教府的大门上。一年之内，大屠杀从君士坦丁堡扩展到多瑙河公国、罗得岛、克里特等地。在开俄斯岛，大屠杀演变成了种族灭绝，1822 年 5 月全岛有 11,300 名居民，到 8 月只剩下 1,800 人。奥斯曼帝国素丹正在对整个希腊化世界进行血腥报复，塞浦路斯难免此劫。

塞浦路斯总督库楚克·梅赫梅特，预感希腊革命即将波及到塞浦路斯，立即请求素丹向塞浦路斯增派军队，同时请求素丹同意他

解除希腊族人的武装，处死从大主教、主教到各级希腊族头领及普通居民共486人。素丹下令库楚克召集土耳其各封建军事首领立即行动。1821年7月9日，库楚克把黑名单上的人召到总督府，这些希腊族人原以为是总督要求他们前来向素丹表达忠诚，而听到的却是他们的死刑令。

第一个遇害的是大主教基里普亚诺斯，他镇定自若地走到早已备好绞索的桑树下，自己套上绞索，划了三个十字，然后大义凛然地对刽子手说："执行你们暴君的命令吧。"副主教被绞死在他旁边的树桩上，接下来依次是佩福斯主教克里散索斯、克提昂主教梅莱提奥斯、基里尼亚主教拉夫里提奥斯和其他教职人员及市民头领。据一位法国驻塞浦路斯领事写道："首府尼科西亚每天都有人被绞死、勒死或屠杀。"这种杀戮很快就扩大到岛上的其他地方。因为土耳其人终于等到了报1804年仇的机会，也是他们掠夺被杀者财产的良机。

此次血腥屠杀，奥斯曼帝国素丹是为了把可能波及到塞浦路斯的希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而土耳其总督及封建军事首领，对素丹的旨意执行得不折不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更多地是为了合法地杀人越货，没收财产。有多少人遇害无据可查。大主教作为希腊族人无可置疑的政治领袖的地位，从此宣告结束。虽然12年后恢复了大主教的领导地位，但已与以前无法相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主教作为人民的埃思纳克的地位才再次得到加强。

这次大屠杀，在希腊族人心中埋下了对奥斯曼帝国素丹，甚至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仇恨的种子，成为希腊族人要求回归主体民族，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重要因素。

塞浦路斯人民的抗税起义

1830年1月3日,希腊终于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获得独立,给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极大鼓舞。但大屠杀的打击使塞浦路斯尚未恢复元气,人民生活极端痛苦,而在此时,土耳其总督要求补缴拖欠的税收,引发人民多次抗税起义,其中三次影响较大。第一次是由尼古拉斯·提秀斯在1833年3月4日领导的起义。总督要求缴纳拖欠的税收,在拉纳卡引起了人民的抗税示威,几天之内,示威者由数百人发展到3千多人,其中有些人拿起了武器,在尼古拉斯·提秀斯的领导下,他们占据斯塔夫罗弗尼修道院,并以此为大本营,公开与总督抗衡。起义者中既有土耳其族人也有希腊族人,还有少数外国人。后来欧洲各国驻塞浦路斯领事向土耳其总督施加压力,总督撤回了征税命令,起义者的目的达到后相继散去。其后土耳其总督背弃承诺,进行报复,处死了提秀斯等多人。

第二次起义同样发生于1833年3月,是由土耳其贵族吉奥·伊玛姆在佩福斯领导的抗税起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前往利马索尔准备攻打首府尼科西亚。此时,第一次埃土战争结束,素丹腾出手来增兵塞浦路斯镇压起义。在此期间,塞浦路斯东部的卡帕斯半岛爆发了由乔尼科奥斯领导的起义。乔尼科奥斯是一位牧师,曾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受提秀斯起义的影响,在16位阿尔巴尼亚士兵的支持下,于1833年7月15日发动起义,他声称为"自由和独立"而战,许多村民聚集在他的周围。起义失败后乔尼科奥斯逃往埃及,被遣回后处死。在这一时期,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系列起义,均被奥斯曼帝国政府残酷镇压,奥斯曼帝

国政府不仅残杀起义者,还对无辜的居民进行报复。

坦齐马特时期的塞浦路斯

大屠杀的阴影和抗税起义的失败,使塞浦路斯居民极度悲观失望。1853年沙俄重创土耳其军队的消息,使希腊族人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俄军解救同为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然而英、法为了遏制沙俄,转而扶持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不至解体。在内忧外患和英、法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走上了改革之路,史称"坦齐马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对塞浦路斯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规定,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其生命和财产均应得到保证。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应享有与土耳其族人平等的权利。取消了祸害塞浦路斯居民近三个世纪的总督职位拍卖和税收承包制度。同时,为了抑制总督的专制,在总督下设地方会议(Divan),其成员通常是由总督、4位或更多的土耳其官员、大主教、1至2位希腊族人代表、1位亚美尼亚人代表和1位马龙派教徒代表组成。地方会议由总督主持,主要处理如什一税和关税等与税收有关的财政问题。在第二个改革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公布后,取消了包税制,在英、法的压力下,还取消了包括希腊族人在内的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素丹还承诺允许基督徒参加军队和进入政府管理部门。根据新诏书规定,地方会议由规模更大的中央会议(Mejlis)所取代。中央会议常设在尼科西亚,由总督主持,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其成员由9名土耳其官员、大主教和3名基督徒代表组成。它是岛上处理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的最高内政会议。各地区还设有地区会议,其中,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非官方成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地区会议无权请

求召开中央会议。

奥斯曼帝国素丹颁布的改革措施，对塞浦路斯的管理无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就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整个统治而言，帝国政府不够重视，管辖权变更频繁，地方总督贪赃枉法，常常把塞浦路斯作为个人发财的摇钱树。帝国政府只是从塞浦路斯攫取资源，运走钱物，从不关心岛上居民的生存环境，道路失修，干旱和蝗灾造成的饥荒不断。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常把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比作塞浦路斯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尽管这种比喻与后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关，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疏于管理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在坦齐马特改革时期，塞浦路斯人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这也是 1878 年英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后，希腊族人欢迎英国统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章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和统治

一、从占领到直辖殖民地

英国占领的背景

英国的全球战略和向中东地区的渗透，是占领塞浦路斯的最重要动因。早在 16 世纪中叶，英国商船已驶入奥斯曼帝国各港口。1553 年，第一位英国商人安东尼·詹金森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特权。1566 ~ 1568 年，波斯准许英国公司在其境内进行贸易活动。18 世纪中后期，由于英国丧失了在北美的殖民地，为了确保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通往英属印度道路的畅通和在中东获得利益，英国加紧了向中东地区的战略渗透和扩张。1798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通过签订条约，把波斯湾的诸多小公国置于英国的“保护”和控制之下。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英、法在埃及展开激烈角逐。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埃及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英国通过向埃及政府贷款和购买运河股份，于 1875 年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公司。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不只如此，它企图控制整个中东，把英国本土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与英属印度连

成一片。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为英国向中东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从17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封建制度解体，经济崩溃，军队失去战斗力，对外战争不断失利，被征服地区人民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昔日曾让整个欧洲患上“奥斯曼恐惧症”的封建军事大帝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国竞相蚕食和瓜分的“欧洲病夫”。俄国一直向巴尔干地区扩张，企图控制黑海出海口，南下进入地中海。奥地利极想拥有亚得里亚沿岸和多瑙河流域。英国和法国也力图确立对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对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控制。欧洲列强的这些企图，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衰落进一步得到加强，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也愈加激烈。但是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均无力攫取奥斯曼帝国的所有“遗产”，列强的激烈争夺反而使保持奥斯曼帝国垂而不死成为必要，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列强签订的《巴黎条约》中，规定了战后中东现状和大国势力的平衡，并保持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大国地位。

1877年的俄土战争打破了欧洲均势，奥斯曼帝国战败为英国向中东渗透提供了契机。1875年7~8月，奥斯曼帝国西北边陲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的基督徒农民，因不堪忍受土耳其人的政治歧视和经济压迫，发动了反抗土耳其专制统治的起义。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立即对起义给予同情和支持，尤其是两个具有自治地位的小国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1876年夏，土耳其军队血腥镇压保加利亚人起义，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决定对土宣战。但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对土出师不利，直接影响到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1877年4月24日，俄国对土宣战。军心涣散的奥斯曼帝

国无力抵抗俄国军队的强大攻势,1878 年 1 月,奥斯曼帝国被迫求和,接受瓜分其领土的《圣斯蒂法诺条约》。俄国军队距奥斯曼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仅 13 公里。俄国军队越过巴尔干山脊迅速南下,直逼君士坦丁堡,引起了英国的极大关注。英国命令地中海舰队迅速进驻距君士坦丁堡 16 公里的穆达尼亚湾,与俄国军队形成对峙,并火速从印度调集军队,进驻地中海东岸的亚历山大勒塔和马耳他,以便控制海域并抵消俄国在亚美尼亚的势力。

英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使得占领塞浦路斯成为必然。在英、俄军队对峙,英、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欧洲大国,尤其是与其中东利益密切相关的英、俄、奥三国,展开频繁外交。而在欧洲大国解决此次近东危机的柏林会议前夕,一直反对英国军队占领奥斯曼帝国领土、持和平立场的英国外交大臣德比辞职,接任其职的索尔兹伯里使英国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索尔兹伯里与首相迪斯累里密切合作,主张有限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以抵御俄国的扩张。所以,英国坚决反对《圣斯蒂法诺条约》,认为该条约把“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政治独立压迫到了完全屈从的地步”,近东地区将被俄国独家控制,这对英国在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英国对该条约的反对已经不再是要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而是立足于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寻求补偿”,遏制俄国南下。英国把目标锁定在位于地中海东部,扼地中海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地中海的金钥匙”——塞浦路斯。

英土《塞浦路斯条约》

英国为了平衡俄国在土耳其亚洲领土上取得的利益,决定通过与土耳其缔结一个秘密条约,保障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1878年5月24日，英国要求土耳其立即同意签订租让塞浦路斯岛的条约。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莱亚德的指示中，解释了英国政府决定获得塞浦路斯的必要性："除非英国在靠海岸的地区占有一个据点，否则就不可能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必要的保护，也不可能及时集结所需要的军队和战争物资，抵御俄军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他要求莱亚德向土耳其政府转告，这样的安排有利于保护土耳其亚洲领土的安全，土耳其如果希望保持英国的善意，应予立即接受，否则英国将没有力量继续为维护土耳其利益而努力，拒绝这项安排的直接后果是"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和帝国遭到瓜分"。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在给英国女王的报告中，把塞浦路斯誉为"西亚的钥匙"。

奥斯曼帝国迫于无奈，只有接受英国的"善意"安排。6月4日，英、土签订了《英国与土耳其关于保护土耳其亚洲省份的防御联盟条约》，通常称之为《塞浦路斯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俄国得到巴统、阿尔达汉、卡尔斯并企图进一步占领帝国素丹陛下的亚洲领土，英国以武力保卫土耳其；相应地，土耳其政府承诺在亚洲臣民中实行必要的改革，保护基督徒和其他臣民的利益。同时，为了让英国能够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把塞浦路斯交由英国占领和管理。"这是《塞浦路斯条约》的第一条，也是其核心内容。

1878年7月1日，英、土双方又签订了保证和限定上述条约实施的6条补充条款。其中第3条规定，英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后，应向奥斯曼帝国给予一定补偿："英国每年应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支付塞浦路斯岁收与行政费用的盈余，其额度按最近五年的平均数估算。"每年大约87,676英镑，外加4,166,220奥克的食盐。

同时,第 6 条规定了英国归还塞浦路斯的条件,即“如果俄国归还卡尔斯和在最后战争中所占领的亚美尼亚的其他领土,英国应撤出塞浦路斯,废除 1878 年 6 月 4 日签订的条约”。实际上,由于塞浦路斯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英国并没有认真考虑还要将它归还给奥斯曼帝国。1921 年 3 月 16 日,当俄国把其所占领的三个亚美尼亚领土中的两个,即阿尔卡汉和卡尔斯(但不包括巴统)归还给土耳其时,英国也没有根据该条约撤出塞浦路斯,反而在 1923 年迫使希腊和土耳其承认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并于 1925 年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塞浦路斯条约》公之于众后,在英国朝野引起不同反响。执政的保守党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有力地维护了英国的海外利益。迪斯累里首相在对议会的讲话中称:“占领塞浦路斯,其意义不在地中海,而在印度;我们采取了我们认为对保护我们帝国的利益与和平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如果这是我们考虑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就是发展这个国家。”1879 年 10 月 17 日,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曼彻斯特的一次讲话中,把英国的对外战略说得更加明确:“占领塞浦路斯,是英国政府长期奉行的传统对外政策的一个举措。当欧洲的利益集中在与西班牙争夺时,英国占领了直布罗陀;当欧洲的利益集中在与意大利冲突时,英国占领了马耳他;既然现在欧洲的利益将集中在小亚细亚或埃及,英国就占领了塞浦路斯。”占领塞浦路斯,真正实现了把地中海变成远离英国本土的英国内湖。尽管在野的自由党领导人,对保守党政府强迫奥斯曼帝国素丹签订的《塞浦路斯条约》严加指责,但当自由党上台执政后,也同样坚持不能把塞浦路斯归还给奥斯曼帝国。塞浦路斯对于英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878年7月1日，英土补充条约签订后，英国海军部立即密令驻扎在克里特岛苏达湾的英国皇家舰队副司令约翰·海将军，迅速调集舰队开往塞浦路斯。由于《塞浦路斯条约》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谈判时间极短，除英土双方的最高层外，其他人员皆不知晓。7月4日，约翰·海将军率领50名海军陆战队，乘皇家“弥诺陶洛斯”号旗舰，来到塞浦路斯东南部的拉纳卡湾，次日在拉纳卡湾已集结了6艘英国战舰。约翰·海将军率军上岸，发现当地人“平静而有序”，但首府尼科西亚的居民中，“笃信他们的宗教和忠于他们素丹”的土耳其人有些“狂热”。

7月10日，英国皇家战舰“萨拉米斯”号，把素丹的特使萨米帕夏和英国君士坦丁堡二秘沃尔特·巴林送到塞浦路斯。萨米帕夏带着素丹把塞浦路斯交由英国占领和管理的诏书，巴林拿着英土《塞浦路斯条约》的副本。12日，在尼科西亚土耳其总督府，萨米宣读了素丹的诏书，土耳其总督贝塞姆正式向约翰·海将军移交了塞浦路斯的管理权。约翰·海将军简要解释了英国接管塞浦路斯政权完全是依据英土条约，并承诺英王陛下政府将使塞浦路斯实现公正、进步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约翰·海的英语讲话使围观的希腊人不知所云，但当他们听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希腊族历史学家乔治·克皮安迪斯接着表达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喜悦之情，以及在英国的统治下实现塞浦路斯繁荣与自由的愿望。

1878年7月22日，英国首任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加尼特·沃尔斯利率1,500名英军赴塞浦路斯就任。次日，沃尔斯利用英、希、土三种文字向全岛发表通告，表示英王陛下政府要采取措施发展塞浦路斯的商业和农业，促进塞浦路斯繁荣，使塞浦路斯人民享

有自由、公正、安全的生活。克提昂主教基普里亚诺斯代表全岛对英王陛下政府的善意和承诺表示欢迎,并表达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民族愿望。

在塞浦路斯人毫无知晓的情况下,统治和奴役他们的权力发生了更替,从一个即将解体的“欧洲病夫”转到了最强大的英帝国手中。无力自主的塞浦路斯人曾多次欢迎过新统治者:支持过艾萨克·科穆宁反叛拜占廷帝国的沉重赋税,欢迎英王理查尽快结束科穆宁的暴政,渴望奥斯曼帝国早日赶走残暴的威尼斯人。现在他们再次欢迎英国人来终结长达三个世纪的“奥斯曼幽灵”,但是,在这个列强纷争的世界里,等待他们的命运又将会怎样?

英国占领初期的改革与困境

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看来,这是继 1191 年英王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时占领塞浦路斯之后,英国人第二次占领和统治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欢迎英国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曾于 1863 年把爱奥尼亚群岛送给了希腊,所以,他们把英国的统治看成是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与希腊合并的第一步。他们相信,英国将会支持和帮助他们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大主教索弗里尼奥斯在欢迎沃尔斯利的致辞中明确表示:“我们接受这种政府管理权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英国政府会像把爱奥尼亚群岛送给希腊一样,将会帮助塞浦路斯与血肉相连的祖国希腊合并。”另外,希腊族人认为,他们与英国人同为基督教徒,因而不会受到英国统治者的宗教歧视。而且英国是民主政体国家,他们希望得到公正、合理的统治。

英国统治后,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制定了系

统的税收制度。取消了农业税,代以按不动产征收。1906 年又取消了奥斯曼帝国一直实行的免除兵役税。1926 年废除了谷物税。同时,1882 年英国当局完成了对塞浦路斯的人口和土地普查,作为税收的基础。另外,像绵羊税、烟税、酒税、食盐专卖税和关税仍继续征收。为了有效管理和杜绝腐败,由高级专员、司法专员和一位副专员组成高等法院。英国统治后塞浦路斯人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

1878 年 7 月英国接管塞浦路斯政权后,一直由外交部管理,从 1880 年转归殖民局。殖民局制订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建议英国政府增加对塞浦路斯的公共建设投资,以改善交通状况,修建港口,打钻自流井,植树造林,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建议设立农业银行、增加教育设施等。但英国国会否定了从英国财政部拨款对塞浦路斯进行改革的建议,要求当地政府通过调节税收实行改革。由于缺乏资金,改革方案并未付诸实施。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管理又走上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老路:不投资,求回报,放任自流。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这一管理政策,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1882 年英国占领了埃及,埃及是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枢纽,英国把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重点自然放在了埃及。英国占领塞浦路斯,本身就不是为了把它作为东西方贸易的桥梁,而是作为军事基地,既然有了更具战略价值的埃及,塞浦路斯就被搁在了一边。另一方面,英土《塞浦路斯条约》规定,英国对塞浦路斯只是占领和管理,其宗主权仍属于奥斯曼帝国。所以,英国认为对塞浦路斯的管理还不“合法”,因而也就不想进行更多的投资。然而,塞浦路斯严重缺乏发展资金的最主要原因,却是塞浦路斯资金大量外流,即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纳的“补偿金”。

1878年7月1日英土双方签订的补充条约第3条规定,英国政府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纳塞浦路斯年收支的差额部分,作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放弃对塞浦路斯的管理权后财政损失的补偿,其数额根据1878年前5年的平均数确定。最初确定为87,676英镑,外加4,166,220奥克的盐。后来双方对此产生分歧,经协商于1879年2月3日确定,塞浦路斯每年再增加5,000英镑作为塞浦路斯的物产收入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酬劳。所以,每年应向素丹政府支付的补偿金为92,799英镑。

塞浦路斯人认为,《塞浦路斯条约》是英土双方签订的,塞浦路斯人毫无知晓,也未参与,补偿金自然应该由英国政府承担。但英国当局每年都从塞浦路斯税收中支付,而且这笔款项并没有付给奥斯曼帝国,而是进了英国的国库,用来偿还奥斯曼帝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向英国的贷款。对于蕞尔小岛塞浦路斯而言,这笔“补偿金”绝非小数目。1878年塞浦路斯人口18万,岁收14万英镑,第二年岁收增至17.4万英镑。也就是说,塞浦路斯年税收的一半多流入了英国国库。塞浦路斯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实际上成了奥斯曼帝国债务的偿还者。

1907年,补偿金降至每年5万英镑,但直到1910年英国当局才按调低后的数额支付。1914年土耳其加入德奥同盟与英国作战。作为报复,同年11月5日,英国宣布吞并塞浦路斯,废除英土《塞浦路斯条约》,从此英国成为塞浦路斯的“合法”统治者。但是,英国不仅没有因此而增加对塞浦路斯的建设投资,而且继续要求塞浦路斯支付补偿金,直到1927年才停止,其原因是“塞浦路斯是奥斯曼帝国债务的自然承担者”。在英国统治的前48年里,塞浦路斯总收入1,500多万英镑,其中作为补偿金流入英国国库的就

达430多万英镑，而同期英国财政对塞浦路斯的“援助金”只有174.7万英镑。

显而易见，造成塞浦路斯经济发展资金缺乏、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是“补偿金”问题。塞浦路斯希腊族立法委员会成员多次要求英国政府解决该问题，英国政府均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塞浦路斯经济雪上加霜，出口锐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经济问题增加了希腊族人对英国的不满，也成为1931年希腊族人反对英国人起义的原因之一。

英国、希腊族、土耳其族三者关系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和管理受到了希腊族人的欢迎。希腊族人认为，它不仅结束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的专制统治，而且是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开端。所以，当1914年英国宣布吞并塞浦路斯，废除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享有的宗主权时，希腊族人兴奋不已，认为这是向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希腊族人的愿望与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并不相容。当时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塞浦路斯条约》，不仅仅是为了抵御俄国的扩张，保护奥斯曼帝国在亚洲领土的完整，而更主要的目的是为英国在中东地区开拓战略空间，为自己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创造条件，迫使素丹把塞浦路斯交由英国占领和管理，就是英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迈出的第一步。4年后英国又占领了更具战略价值的埃及。希腊族人一相情愿的民族愿望与英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也就决定了希腊族人对英国人的欢迎很快又变成了不满和斗争，并导致1931年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

对于土耳其族人而言，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和管理，意味着

他们丧失了作为统治民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降为与曾经受他们统治的希腊族人一样的被统治者。1914年英国宣布吞并塞浦路斯，从此结束了塞浦路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宗主权关系，给土耳其族人又一沉重打击，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奥斯曼帝国的愿望彻底破灭了。另外，土耳其族人与英国人存在着宗教、文化上的距离感。尤其让土耳其族人感到不安的是希腊族人广泛宣传和推动的“意诺西斯”（意即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运动。土耳其族人认为，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人口占绝对少数的他们将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少数民族，即使在英国统治下在塞浦路斯成立塞浦路斯自治政府，对土耳其族人也十分不利。所以，当英国政府于1882年宣布在塞浦路斯成立立法委员会时，希腊族人正教会大主教立即向英国政府致电表示感谢，而土耳其族人却忧心忡忡地向英国当局递交备忘录，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土耳其族人在该备忘录中认为，“作为管理基础的立法委员会是过渡到自治政府的开端，这是希腊族人日思夜盼的目标之一，在未来的自治政府中，必将以他们为中心……我们恳请英王陛下政府在制定塞浦路斯的法律时，应考虑各方的要求……不要损害我们拥有的权利和现在享有的安全……否则，我们将会被迫离开塞浦路斯”。

在英国人接管塞浦路斯政权伊始，土耳其族人深为不满，但这是他们无力改变的现实，昔日攻城掠地、战无不胜而令欧洲恐惧的奥斯曼帝国，今日已成为欧洲列强竞相宰割的“欧洲病夫”，君士坦丁堡的精英们尚无能为力，屈屈数万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又能为之奈何。土耳其族人从愤怒、失望中逐渐转为正视现实。他们希望英国维持在塞浦路斯的直接统治，反对成立自治政府，认为自治政府的成立将是通向塞浦路斯实现自治，最终走向希腊族人所

盼望的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第一步。

无论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对英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的态度如何，英国政府自有其长远的战略利益，在签订《塞浦路斯条约》时，英国就无意将塞浦路斯归还给奥斯曼帝国。1914 年英国以奥斯曼帝国参加德奥同盟与英国作战为由，废除了《塞浦路斯条约》，完成了对塞浦路斯的吞并。而且英帝国有一套堪称精湛的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方法，那就是“分而治之”。英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不久，就注意到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的隔阂与不和，而且希腊族人不断宣传的“意诺西斯”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长期存在，危及英帝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不和正好为英国所利用，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利用土耳其族人来遏制希腊族人“意诺西斯”的发展，达到长期占领和统治塞浦路斯的目的。

英国“分而治之”政策在塞浦路斯的实施，最早体现于英国当局在塞浦路斯成立的昭示其民主的立法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之中。立法委员会成员由 6 名英国政府官员和 12 名选举产生的塞浦路斯人组成，其中 9 名希腊族人，3 名土耳其族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名额分配的依据是两族人口比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按照人口比例，因为当时希腊族人占总人口的大约 80%，而土耳其族人仅占 18%。同时英国、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三方代表的分配也颇有用意，英国和土耳其族双方代表之和恰好与希腊族代表相等，在立法委员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的意见总是相左，而土耳其族人又总是与英国人保持一致，从而在立法委员会中形成了“英国—土耳其族阵线”和“希腊族阵线”。最终的裁决权仍然掌握在主持立法委员会的英国高级专员手中。

立法委员会内“英国—土耳其族阵线”与“希腊族阵线”的形成，标志着英国在塞浦路斯统治模式的基本确立，也预示着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关系的未来走向。

早期“意诺西斯”运动

“意诺西斯”，即与希腊合并运动。当1830年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实现独立时，在希腊周边以希腊人为主的各个岛屿，普遍存在这一思想，当然也包括塞浦路斯。早在1863年，丹麦王子当选为希腊国王，英国同意归还其所占领的爱奥尼亚群岛。爱奥尼亚与希腊合并，对其他希腊人口居多的岛屿产生较大影响。克里特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要求与希腊合并，最终于1912年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所以，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思想，应当起源于希腊独立战争时期，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为希腊独立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只是在英国接管塞浦路斯政权之后，他们才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要求公开地提了出来。

1878年7月22日，塞浦路斯大主教索弗里尼奥斯，在欢迎英国首任高级专员加尼特·沃尔斯利的致辞中表示：“我们接受这种政府管理权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英国政府会帮助塞浦路斯，就像当年帮助爱奥尼亚群岛一样，实现‘同它有天然联系的希腊祖国的合并’。”1881年10月，希腊族人递交给英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称：“塞浦路斯人民尊重历史，从未忘记他们的希腊血统，基于英国的慷慨，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愿望给予积极的考虑，我们的惟一愿望就是像爱奥尼亚群岛一样，与我们的祖国合并。”1895年，塞浦路斯立法委员会中的希腊族成员认为，“自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的第一天开始，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就表达了我们珍藏数世纪的民族独

立愿望。我们决不放弃任何表达这一愿望的机会，相信公正、慷慨的英国人会给予我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合法权利”。同年，利马索尔的希腊族人提出了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案。该合并案称：“利马索尔的希腊族人今天郑重要求，我们与塞浦路斯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其他希腊族人一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希望与希腊合并；而且只与同我们有着同种族、同血缘的希腊合并。”为了同样的目的，1898年，希腊人乔治·夫拉霍德斯发起成立了“塞浦路斯爱国者联盟”，号召其成员无论何时何处，只要遇到英国人，就向他们表达要求与希腊合并的愿望。曾任英国高级专员私人秘书和法马古斯塔专员的英国作家亨利·卢克，把该组织称为“希腊民族主义极端派的先驱”。

不难看出，在英国人接管塞浦路斯政权初期，希腊族人就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人表达他们要求与希腊合并的民族愿望。这一时期，尽管希腊族人对英国政府把向奥斯曼帝国缴纳的“补偿金”转由塞浦路斯支付极为不满，但他们仍然坚信英国人的公正、慷慨和富于同情心，而且把实现他们民族愿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此。

1900～1910年，希腊族人经历了因克提昂主教和基里尼亚主教争夺大主教之职的十年内讧之后，1911年，意大利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了其属地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该事件再次唤起了希腊族人要求与希腊合并的热情，塞浦路斯的许多重要城市爆发了要求与希腊合并的群众集会。1911年12月1日，希腊族立法委员会成员向英国高级专员递交的提案中称：“作为希腊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以无法抗拒的民族之情，强烈要求与祖国希腊王国合并。如果我们的愿望与英国政府的某些利益相抵触，我们

只能表示遗憾，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慷慨的英国民族的秉性。”在该提案中，希腊族人不仅把实现其民族愿望的希望寄托于英国的慷慨，而且提出“这是我们的民族权利”，这在希腊族人对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认识上，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1912 年 4 月，当英国政府拒绝了上述提案后，希腊族立法委员会成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而且希腊族人开始把宣传的范围从城市扩大到了农村，成立了中央民族委员会，组织和领导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912 年 10 月，克里特终于回到了祖国希腊的怀抱，再次增强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斗争的信心。当希腊参加巴尔干同盟对土宣战后，塞浦路斯希腊族立法委员会成员赫里斯托祖卢·索诺斯，率领数百名希腊族自愿者参加了希腊军队。由此可见，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要求与希腊合并，不仅源于共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而且希腊民族与土耳其民族长期积怨，也成为“意诺西斯”的强大推动力，而且这一点在塞浦路斯以后的政治发展中体现得更加突出。

希腊族人强烈要求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尽管有其复杂的历史成因，但它不顾在岛上生息繁衍了三个世纪的土耳其族人的民族感情，多少带有民族利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它不仅促使土耳其族人倒向英国殖民统治者一边，而且成为两族长期冲突的最主要根源。正如英国学者史蒂芬斯所言：“民族主义是塞浦路斯悲剧的根源。”

英国对“意诺西斯”的立场

希腊族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英国政府表达他们希望与希腊合并的要求，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极大关注。1881 年，英国首

相格莱斯顿，通过英国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对希腊族人的要求表明了立场："我收到了从拉纳卡、利马索尔和尼科西亚等地寄来的要求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大量请愿书，我想告诉这些希腊族人，英王陛下政府真切希望塞浦路斯繁荣，但你们必须记住，根据与奥斯曼帝国的条约，塞浦路斯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只是占领和管理，所有违反条约的类似建议不予考虑。"1907 年，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巡视塞浦路斯，也持这一观点。所以，在 1914 年英国吞并塞浦路斯之前，英国拒绝了希腊族人要求将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要求，并且巧妙地把原因推到了奥斯曼帝国一边，不仅把希腊族人因不能实现合并而产生的愤怒转嫁到奥斯曼帝国身上，而且使希腊族人对英国人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事业而感激涕零。

但是，英国把《塞浦路斯条约》作为拒绝希腊族人"意诺西斯"的借口，终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为了达到长期占领塞浦路斯的目的，必须找出更"合理"的理由，从根本上彻底瓦解希腊族人的民族要求。所以，英国人对希腊族人的民族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民族混合的产物"、"腓尼基人的后代"，甚至从颅骨学的分析认为，"他们除了不是希腊民族之外，任何民族都可能是。"这一观点的鼻祖是英国人赫普沃思·狄克逊。狄克逊在英国占领后游访了塞浦路斯，并于 1879 年在伦敦出版了他的游记《英国的塞浦路斯》。狄克逊认为，希腊族人"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希腊人，更不是两者的混合物"。狄克逊的观点代表了部分英国官员的立场，其中包括殖民局次官德文希尔，其目的在于彻底否定希腊族人的希腊民族性，进而否定希腊族人要求与希腊合并的合法性。

荒谬的论证毕竟掩盖不了历史事实，部分英国官员对希腊族人是希腊民族的一部分毫不怀疑。丘吉尔虽然以塞浦路斯的宗主权仍归奥斯曼帝国为由，推托合并问题，但他明确认为“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是希腊人的后代”。曾任总督6年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后来写道：“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是希腊人的后裔，在我看来是无可争辩的。”

无论希腊族人要求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是否合理，但就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是希腊人后裔这一事实而言，是任何人也无法推翻的，翔实的历史胜于一切雄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塞浦路斯

20世纪初德国崛起，向英、法、俄等传统强国提出挑战。为遏制德国的扩张，英、法、俄三大国抛弃前嫌联合了起来。1908年，法、俄两国认为，必须把希腊和土耳其拉拢到它们一边，以增强抵御德国的能力，因而建议英国允许克里特与希腊合并，作为对土耳其失去克里特的补偿，英国把塞浦路斯归还给土耳其。英国没有接受法、俄的建议。英国认为恢复土耳其对基督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塞浦路斯的统治，可能会造成第二个“克里特问题”，而且英国认为塞浦路斯人更倾向于由英国统治。另外，推翻了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上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断绝了与英国的关系，而与德国更加亲近。这更加增强了英国拒绝把塞浦路斯归还给土耳其的决心。1912年10月，克里特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实现了与祖国希腊合并的愿望。克里特的合并对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塞浦路斯的命运，再一次与英国的战略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土耳其已经完全依赖德国的经济援助和武器供给,公开加入德奥同盟对英、法、俄协约国宣战。作为报复,1914年11月5日,英国宣布废除1878年英、土签订的《塞浦路斯条约》,吞并塞浦路斯。同时,为了争取希腊加入英、法阵营,英国首次提出,如果希腊加入英、法、俄协约国,对德、奥、土、保同盟国宣战,英国愿意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1915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兹·格雷明确表示,英国对希腊在小亚细亚海岸将做出"重要让步"。希腊首相维尼齐罗斯,这位克里特与希腊合并的功臣,力谏国王康斯坦丁积极回应英国的建议,参加协约国对土耳其宣战。但是,1915年3月6日,希腊国王罢免了首相维尼齐罗斯。希腊政府没有对英国的建议做出回应。

英国提出把塞浦路斯让予希腊换取希腊参战,这绝非希腊族人所希望的英国人的慷慨,而是英国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因为保加利亚为夺回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丧失的领土,于7月3日参加了德、奥、土同盟,德、奥、保军队随时可能占领塞尔维亚,控制巴尔干,打开通往土耳其的道路。如果同盟国实现其目标,不仅切断了俄国与协约国的联系,而且威胁到英国在中东的整体利益。因此英国为保护在中东的整体利益,不得不忍痛割爱。

1915年8月23日,被罢免的希腊首相维尼齐罗斯,通过选举重新组阁,他立即重申将帮助塞尔维亚抵御保加利亚的进攻,同时要求英法紧急派兵援助塞尔维亚。10月4日,与德国皇室保持密切关系的希腊国王,再次罢免了维尼齐罗斯,拒绝英国的建议,继续奉行中立的对外政策。希腊的立场丧失了一次难得的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机会。

其实,包括康斯坦丁国王在内的希腊领导层,并不是不想接纳

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而是出于更重要的自身安全的考虑。首先,节节胜利的德军使希腊相信,协约国无力保卫希腊本身的安全;其次,装备差、缺乏弹药的希腊军队,不可能抵御德、奥、保军队的强大攻势;再次,协约国派往紧急增援希腊萨罗尼加的军队还不到承诺的一半。另外,希腊认为,即使希腊参战,也只能延缓而不可能抵御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而且要承担希腊本土被占领的危险。在希腊拒绝了英国建议数日后,英国收回了割让塞浦路斯给希腊的建议。

1917 年 6 月 12 日,在协约国的压力下,希腊国王康斯坦丁逊位其子亚历山大。第三次上台的维尼齐罗斯立即向德、奥同盟宣战。但此时,希腊和英国均未提及割让塞浦路斯的问题,只是在战争结束后的 1919 年 7 月 29 日,在希腊与意大利签订的一个条约中规定,意大利把 1919 年占领的多德卡尼索斯群岛划归希腊,同时规定,在英国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后的 15 年内,由公民投票决定罗德岛的归属问题。但该协定并没有说明英国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的具体时间和条件。其实,在此之前,英国割让塞浦路斯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早在 1916 年 3 月,英、法、俄三国签订《塞克斯—皮科协定》,其中规定,没有法国的同意,英国不得割让或放弃塞浦路斯。因为法国担心塞浦路斯归属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该条约也给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增添了一个新的制约因素。

在这期间,在塞浦路斯和希腊广泛流传着英国要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的消息。英国政府还用军舰把塞浦路斯大主教塞里罗斯二世送到雅典,使其说服康斯坦丁国王和泽米斯首相接受英国的建议,但这些努力均未使希腊改变其中立立场。1915 年 11 月,当

大主教率代表团拜访英国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时，高级专员明确告诉大主教，在英国让予塞浦路斯的建议被希腊政府拒绝后，英国已经将建议收回。而且高级专员进一步警告大主教，“作为英国臣民，从今以后应避免制造事端，在公众集会上不要表演歌颂希腊的歌曲”，并指出“塞浦路斯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伦敦，而不是雅典”。不难看出，英国割让塞浦路斯的建议完全是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当不符合其利益时，它的“慷慨”似乎又变得如此吝啬。

尽管英国拒绝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但当1917年希腊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同盟宣战后，塞浦路斯成立了“泛塞浦路斯希腊人大会”，派代表前往希腊慰问“为民族和自由而战的英勇将士们”，并请求英国高级专员允许他们为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祖国希腊而战斗。

战争结束后，在世界性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英国的许多媒体也要求本国政府把战时民族独立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在瑞士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上，英国工党代表麦克唐纳提出了塞浦路斯问题。1919年1月25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麦克唐纳的发言：“除了欧洲的大事外，还有许多急待解决的小问题，其中包括我们特别关注、我们负有特殊责任、我们至今还占领着的塞浦路斯问题……近40年来，我们顽固地拒不允许他们成立地方自治政府，又对他们请求与希腊王国合并的要求充耳不闻。今天他们再次提出请求，该是我们的政府给予他们自由的时候了。”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也利用这一时期媒体广泛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有利时机，积极活动。1919年1月，大主教塞里罗斯三世和希腊族立法委员会成员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表达他们的愿望。英国殖民大臣迈纳接见了代表团，尽管迈纳对希腊族人要求

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愿望表示理解和尊重,但仍以他初任殖民大臣为由搪塞,未作任何明确答复。希腊族代表们在伦敦活动半年之久,向英国议员表达他们的要求,通过媒体宣传塞浦路斯人民的愿望,但仍空手而归。这是对希腊族人要求实现民族愿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打击终于使希腊族人认识到,以前英国人所谓的“塞浦路斯的主权仍归奥斯曼帝国,因此英国政府不能考虑合并问题”等原因,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其真正目的是企图把塞浦路斯作为军事基地而长期占有。希腊族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

1920 年 12 月 8 日,遭到英国政府冷遇的希腊族立法委员会代表,回到塞浦路斯后集体辞职,以示抗议。面对“意诺西斯”运动的不断高涨,英国当局在塞浦路斯首次实施戒严法,并将两名希腊籍的“意诺西斯”活动分子逐出塞浦路斯。1921 年,在希腊革命 100 周年之际,大主教塞里罗斯三世发起成立了“民族事业中央委员会”,广泛宣传希腊族人的民族事业,激发希腊族民众的斗志。1921 年 12 月,希腊族民族主义者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民族大会”的政治组织,号召希腊族人在政府和立法委员会内,拒绝与英国当局合作。这一时期,希腊族人的各种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虽然其组织形式不同,斗争方式各异,但在实现与希腊合并这一民族目标上却是高度的一致。

此次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运动受挫,也与希腊国内的情况有关。1917 年第三次上台的维尼齐罗斯,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对希腊族人要求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事业不予鼓励和支持,惟恐影响希腊与英国的亲密关系。而当时维尼齐罗斯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尽可能多地侵占即将解体的奥斯曼帝国的领

土，企图“对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设下一道屏障，并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建立一个避难所”。所以，希腊政府也就不可能利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有利时机，向英国施加压力。1920～1922年，希腊发动的入侵土耳其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更加削弱了希腊在协约国中的发言权。亲英的维尼齐罗斯首相下台后，亲德的康斯坦丁国王一度复位，也增添了英国对希腊的不信任，英国更不愿把颇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让给希腊，这些因素都对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产生了不利影响。

土耳其在《洛桑条约》中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主权

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奥斯曼帝国捆在了德奥同盟的战车上，1918年战败后协约国占领了土耳其，并争相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迫使奥斯曼帝国素丹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胜利的协约国终于为处理这个病夫留在人间的财产做出了最后的安排”。该条约非常苛刻，使“土耳其将陷入绝境和支离破碎，变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仅能依靠吞并了它的最富庶地区的那些列强及其人民的宽容来过活”。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该条约。在协约国的纵容下，希腊入侵土耳其。此时协约国内部出现了分歧。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政府，公开支持土耳其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希腊的入侵以失败告终。英国开始担心苏联可能会通过支持土耳其向土耳其渗透，进而通过土耳其南下，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利益。所以，为了防止苏联向土耳其渗透，英国对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变敌视为拉拢。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签订的《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简称《洛桑条约》，完全取消了《色佛尔

条约》中肢解土耳其的苛刻条件，对土耳其比较有利，"实际上也就是国际间对于土耳其国民公约中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的承认"。《洛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土耳其的诞生。

虽然《洛桑条约》不是因塞浦路斯问题签订的，但它却对塞浦路斯的主权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20条规定："土耳其兹承认1914年11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兼并塞浦路斯。"第21条规定，1914年11月5日前定居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有权选择加入英国国籍或12个月内离开塞浦路斯，或加入土耳其国籍。《洛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的合法化，从此，从国际法上真正结束了土耳其与塞浦路斯的宗主权关系。

1925年3月10日，英国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以前的高级专员现在改称为总督。至此，英国完成了对塞浦路斯从占领和管理到单方面宣布吞并，最后到合法地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的全过程。塞浦路斯完全被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也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惟一一个直辖殖民地。

二、1931年希腊族人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

起义的原因

英国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并不像在1878年英国接管塞浦路斯政权和1914年英国宣布吞并塞浦路斯时那样，在塞浦路斯引起积极回应。1926年，曾任耶路撒冷军政长官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受命为塞浦路斯总督。斯托尔斯是为数不多的热衷于塞浦路斯事务的总督之一，他努力改善塞浦路斯的经济、交通和

通讯设施,是首位在英国为塞浦路斯产品做宣传的英国人。他还对塞浦路斯的考古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

在罗纳德·斯托尔斯任总督期间,对塞浦路斯农村状况做了全面的调查,出版了《塞浦路斯的农村生活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所反映的农村的贫穷程度令人吃惊。为了减轻塞浦路斯的经济负担,在斯托尔斯的努力下,1927 年英国政府最终取消了塞浦路斯每年向英国国库支付的"补偿金"。从客观上讲,尽管斯托尔斯在塞浦路斯有许多有益之举,但其真正目的不是为塞浦路斯人谋幸福,而是为了塞浦路斯社会的稳定,让民众感到满足而忠于英国。所以,当希腊族人不断提出与希腊合并的要求时,斯托尔斯怒不可遏,认为在民主、强大的英帝国的统治下,塞浦路斯繁荣兴旺,怎么还坚持要求与贫穷弱小、政局长期不稳的希腊合并,他认为这是塞浦路斯的教育体制和过于民主惹的祸。因此,他着手整顿教育和限制民主。

斯托尔斯把教师规定为公务人员,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禁止教师向希腊族学生和土耳其族学生讲授希腊历史和土耳其历史,限制学者对希腊语言和希腊传统文化的研究,企图从教育这个源头上割断塞浦路斯与希腊和土耳其的联系。同时,斯托尔斯认为,过于民主不仅不利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而且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所以,他建议殖民当局修改塞浦路斯宪法,扩大立法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其目的是让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会成员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从而把英国给予塞浦路斯人的民主,主要体现在毫无决策权的立法委员会内,相应地对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限制。为此,斯托尔斯修改了塞浦路斯的刑法,还把原来由村民直接选举村社领导,改为由殖民当局任

命。塞浦路斯人的民主、自由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

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也影响到塞浦路斯。由于铜矿和石棉矿的出口锐减，数千名矿工被解雇，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征用贫穷民工的数量也大量减少，造成失业人口大幅增加。1930 年，塞浦路斯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在职者工资相当低，无法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农产品价格一降再降，而税收却因政府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这时期的税收项目有耕地税、牲畜税（包括绵羊、山羊和猪）、盐税和对普通日用品征收的进口税。塞浦路斯人民在饥荒的死亡线上挣扎。

塞浦路斯的政治发展出现了新特征。为了改善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组织开始在塞浦路斯发展起来。商业界成立了商会，经济条件最差的农民也成立了农民组织。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是从原来的"政治组织"发展而成的"民族组织"。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团结所有希腊族成年男子，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实现与希腊的合并。主席是大主教塞里罗斯三世，所有希腊族立法委员会代表为理事会成员，其中克提昂主教尼科迪默斯·米洛纳斯和基里尼亚主教马卡里奥斯·米里安修斯，是该组织的关键性人物。另外，在 1930 ~ 1931 年间，更为激进的"民族青年俱乐部"成立，并在全岛各地建立起了分支机构，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经济环境的日趋恶化，也促使普通民众关注和参与政治活动。直到 1931 年希腊族人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爆发前，英国殖民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改变可怕的贫穷问题。民众对殖民政府彻底失望了。

起义的经过

尽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政治目标不同，但塞浦路斯经济条件的不断恶化，使它们共同遭受贫困之苦，为它们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前文已提及，在立法委员会中，希腊族成员是英国官员和土耳其族成员之和，而且土耳其族成员的立场总是与英国人保持一致，对任何提案的表决，希腊族人都不可能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因而最终还是由英国官员决定。然而，1931 年 4 月 28 日，在对总督提交的一项增税议案的表决中，一位土耳其族立法委员会成员站在希腊族成员一边，投票反对该增税提案。他的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持续多年的在立法委员会内的权力平衡。最后总督斯托尔斯不得不使用“法院命令”，强行实施增税提案。总督的这种独裁行径，立即引发起媒体的猛烈抨击，希腊族人也开始行动起来。

1931 年 9 月 12 日，希腊族立法委员会成员在一个叫萨塔(Saitta)的村庄里秘密开会，讨论他们未来的行动计划，准备采取与英国当局不合作政策，号召民众拒绝纳税，抵制英货。该政策得到了“民族组织”的支持，随后分别在 10 月 10 日、11 日和 17 日三次开会讨论，由于各方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强烈程度上存有分歧，在达成最终决议无望的情况下，克提昂主教尼科迪默斯·米洛纳斯宣读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宣言，号召民众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要求英国撤出塞浦路斯。参加会议的代表原则上同意克提昂主教的宣言，但希望在下次会议上再做细节上的讨论。在次日的会议上，克提昂主教公开发表了他的宣言，同时宣布辞去英国殖民当局主导的立法委员会代表之职。10 月 20 日，克提昂主教米洛纳斯在利马索尔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号召民众不要遵守不合法统治者

起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塞浦路斯的各个角落，象征自由的希腊国旗到处飘扬。在农村，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组成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城市的局势已失去控制，警察只能保护政府办公部门和公共设施。在尼科西亚，共产主义组织异常活跃，积极活动，努力建立各种民族组织的联合阵线。

起义爆发后，总督立即宣布全岛处于戒备状态，实行宵禁，并从埃及紧急抽调军队。英国战舰也驶入塞浦路斯水域待命。英国政府将发动这场起义的克提昂主教和基里尼亚主教等十多位希腊族领导人强行送往英国，依“涉嫌动乱的特殊罪行”将近 2,000 多人被判处监禁。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

1931 年希腊族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是英国占领和统治塞浦路斯后，在塞浦路斯首次爆发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斗争，是塞浦路斯民族觉醒的体现。在此次起义中，塞浦路斯人首次提出了只有斗争，才能摆脱困境，获得自身解放，要求英国统治者撤出塞浦路斯的政治主张。与以前完全寄希望于英国统治者的“慷慨”和“富有同情心”相比，是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上的飞跃，从此开创了塞浦路斯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新篇章。

此次起义的失败，英国殖民势力的强大和民族主义力量的过于弱小是主要的客观原因。但就主观因素而言，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领导层内意见不一，没有结成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没有统一领导，斗争目标不甚明确等，使本来就很弱小的斗争力量更加分散和混乱，所以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它与同时期在南亚次大陆和埃及爆发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自治的“印度协定”和“英—埃条约”相比，这次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起义所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

起义失败后总督的独裁统治

英国政府彻底镇压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后，不但没有调查导致起义的政治、经济原因，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反而变本加厉地采取高压政策。1931 年 11 月 12 日，英国当局下令解散立法委员会，终止执行宪法，同时赋予总督所有立法权，开始了总督对塞浦路斯的独裁统治。所有政治组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市政选举也被废除。虽然土耳其族人没有参与这次起义，但也没有幸免独裁统治的压迫。

在随后的几年中，英国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为了切实执行这些法律，警察有权随时进入居民家中或对街上行人进行搜查。严禁媒体刊发任何有关塞浦路斯和国际问题的新闻，就是转载《伦敦时报》和英国国会的文章，也必须接受审查，有些文章照样被封杀，塞浦路斯许多报刊被迫停办；拥有或携带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会受到严厉惩处；禁止将希腊等国家的报纸带入塞浦路斯。

教育在殖民政府的严厉控制之下，禁止学校向学生讲授希腊历史和土耳其历史，在学校或公开场所不得张贴有关希腊和土耳其英雄人物的画像。任何形式的游行和集会均被取缔。凡超过 5 人的聚会，也必须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所以，超过 5 人的一场婚礼或家庭宴会，也需要报请当局批准。1937 年，一位被“任命”为拉纳卡市副市长的塞浦路斯人，申请举行一个大约 12 人的家庭宴会，英国当局以不能保证不谈政治为由而未予批准。英国当局的这些法律，不仅扼杀了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且严重影响了商贸洽谈和经济合作等经济活动的开展，阻碍了塞浦路斯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岛外的“意诺西斯”运动

在英国当局的高压统治之下，塞浦路斯的民族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但岛外塞浦路斯人的“意诺西斯”运动却异常活跃。

1931年，被迫流亡希腊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雅典成立了“塞浦路斯中央委员会”，主要从事向希腊国会议员做宣传工作，同时向塞浦路斯难民提供援助。被驱逐出塞浦路斯的察戈里迪斯和克洛卡西迪斯，在雅典建立了“塞浦路斯学生联合会”。被英国殖民当局强行送往伦敦的基里尼亚主教马卡里奥斯·米里安修斯，后来到了希腊，在雅典成立了“塞浦路斯友谊社”。这些组织都积极宣传“意诺西斯”，但他们的活动也都受到希腊梅塔克萨斯政府的限制。在美国也有“纽约塞浦路斯兄弟会”组织，利用美国的希腊文媒体，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塞浦路斯问题，促进该问题早日解决。

但是，在塞浦路斯岛外从事宣传“意诺西斯”运动的组织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伦敦塞浦路斯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其成员主要是由埃夫多罗斯·乔安尼迪斯领导下的一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他们利用在英国首都的便利条件，不仅宣传“意诺西斯”，而且对塞浦路斯的政治、经济、公民权和自由等诸多问题进行广泛宣传，向英国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该委员会还多次向英国政府提交报告，建议在塞浦路斯成立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为基础的联合自治政府，要求给予塞浦路斯人民民主和自由。但是，英国殖民当局拒绝接受任何改变塞浦路斯现状的建议。1938年6月29日，英国殖民当局在对该委员会的答复中，再次重申了塞浦路

斯现状不容改变的顽固立场。但该委员会并没有气馁，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国会质询等渠道，从各方面引起英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关注。1939年，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宪法议案，经过向塞浦路斯的相关组织和个人征询修改意见后，最后制定了塞浦路斯自治政府《宪法草案》，并呈送英国政府。尽管英国政府并未采纳，但它对于世界人民，尤其是英国民众了解塞浦路斯问题，推动塞浦路斯的民主进程，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塞浦路斯的影响

希腊首次要求合并塞浦路斯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塞浦路斯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这次战争对塞浦路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期间，德国对塞浦路斯的宣传异常活跃。德国电台的“亲爱的希腊听众”节目，重点做策反希腊族人的宣传，号召希腊族人反抗英国统治，接受纳粹思想，加入德国阵营，并承诺将帮助希腊族人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民族愿望。在1940年9月18日意大利进攻希腊之前，希腊一直保持中立。希腊与德国的贸易关系密切，德国是希腊烟草的大宗出口国。德国正是利用希腊的中立和与希腊血肉相连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对英国统治的不满，煽动希腊族人反抗英国统治。但纳粹的宣传并没有在塞浦路斯产生重大影响，相反，当意大利加入纳粹阵营进攻希腊后，英国当局号召希腊族人“为自由和希腊而战”，塞浦路斯希腊族

人积极响应,3,000多名希腊族青年参加了英军和盟国军队对德、意作战,其中不少人壮烈牺牲,但他们的鲜血并没有换取"意诺西斯"的实现。

针对德国的煽动性宣传,英国保持高度警惕,极力劝说希腊参加英 法同盟。意大利进攻希腊才使希腊政府放弃中立,参加英法同盟对德意宣战。1940年12月,英国驻雅典大使迈克尔·帕勒里特建议,作为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关键时刻对帝国的忠诚和希腊参战的鼓励,把塞浦路斯割让给希腊。但帕勒里特的建议遭到英国外交部希腊事务专家菲利普·尼科内斯的强烈反对。1941年3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与希腊首相亚历山大·科里季斯,在雅典讨论英国远征军在希腊登陆问题时,科里季斯要求英国把塞浦路斯割让给希腊,或者至少应该做出一个有步骤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承诺,以便给抗击德、意进攻的希腊人道义上的鼓励,但艾登认为讨论这一"敏感且复杂的问题",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3月底,德军进攻希腊在即,科里季斯再次向艾登提出:既然希腊即将遭到德国的进攻并可能被占领,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希腊半岛,对于希腊国王和他的政府来说已经很不安全,因此,必须把塞浦路斯或它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这样希腊政府就可以在希腊领土上继续行使权力。4月6日,德军进攻希腊。在4月9日和11日,希腊首相科里季斯和国王乔治,再次分别向英国政府和英国驻雅典大使帕勒里特提出上述要求。希腊国王还建议,从伯罗奔尼撤调4万希腊军队随他前往塞浦路斯,可供盟军调用。希腊驻英国大使在伦敦重申了国王的这一建议。4月1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给雅典的英军司令威尔逊将军的电文中,赞同希腊国王和他的军队前往塞浦路斯,但4月14日英国

外交大臣艾登又否定了这一建议，认为希腊"国王可以在塞浦路斯行使的权力，就像任何外国元首在那儿的权力一样"，在塞浦路斯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司法权。当天晚上，丘吉尔召开内阁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希腊的建议，决定对希腊做出让步。英国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希腊政府，但希腊政府不知何故没有及时做出回应。5月1日，已撤往克里特的希腊政府继任首相艾曼努尔·特索德洛斯建议，塞浦路斯"应当作为国王的个人礼品赠与"希腊，艾登拒绝了该建议，并指出塞浦路斯不会比克里特更安全，而且在战争时期考虑割让塞浦路斯问题不适时宜。最后，英国对该问题的处理意见，集中体现在1941年5月31日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的两份备忘录中。该备忘录建议，塞浦路斯的未来，等战争结束后作为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英国与希腊进行讨论。这两份备忘录强调了塞浦路斯在英国战略上的重要性，要求必须防止任何影响和破坏英国地位的敌对势力在该地区的出现。同时该备忘录还提出，英国考虑到战争结束后把塞浦路斯主权转归希腊的可能性，希腊必须向英国提供一个有期限的或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这样既可以改善英国与塞浦路斯人的关系，也能使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然而，丘吉尔同时强调应考虑"被移交给希腊的塞浦路斯穆斯林"的感情。

英国政府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为了鼓励希腊协同作战，为了从塞浦路斯征募兵源和得到希腊族人的支持，向希腊政府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表示某些割让塞浦路斯的姿态，但毫无实际举措，真正关心的仍然只是英国的战略利益。然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显著不同的是，希腊政府首次主动提出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要求，尽管这一要求不是出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民族

愿望，而是基于“希腊政府能够在希腊领土上继续行使权力”，但客观上对希腊人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抗击德、意法西斯主义起到了鼓励作用。

土耳其首度关注塞浦路斯问题

《洛桑条约》迫使土耳其放弃了对塞浦路斯的主权，塞浦路斯的全部事务完全交由英国处理。随着土耳其国力的恢复，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期间，英、法同盟和纳粹德国都极力拉拢土耳其，土耳其也乘机向双方政府讨价还价。1936 年 7 月 20 日的《蒙特罗公约》，土耳其实现了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1939 年 6 月 23 日，通过与英、法谈判，土耳其最终又吞并了与叙利亚有争议的亚历山大勒塔。1941 年，希腊被德、意法西斯占领后，土耳其首度关注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塞浦路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参战各国已开始讨论战后安排。1941 年 9 月 29 日，希腊流亡政府提出战争结束后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1942 年 6 月 12 日，希腊国王乔治再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这一要求。当希腊首相特索德罗斯将希腊的要求公之于众后，土耳其对此反应强烈，致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英国并未就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进行磋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还建议特索德罗斯，不要公开提及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还曾对 1912 年被意大利占领的多德卡尼索斯群岛提出主权要求，英国首相丘吉尔明确表示拒绝。丘吉尔担心如果战后承认土耳其对多德卡尼索斯群岛拥有主权，可能会使土耳其进一步对英国占领的塞浦路斯提出主权要求。1942 年 12 月 1 日，希腊流亡政府首相帕那伊俄提

斯·卡涅罗波罗斯向英国政府提出，战后塞浦路斯和多德卡尼索斯的主权应归希腊。英国拒绝过早地做出这种承诺，担心会引起土耳其的不满，英国希望仍在观望中的土耳其尽快参加英法反德同盟。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政党的出现

希腊与英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由于英国保持低调，并劝导希腊不要公开张扬，这一方面为避免引起土耳其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希腊要求英国割让塞浦路斯的消息一旦传入塞浦路斯，可能会激起希腊族人"意诺西斯"运动的高涨，给全力抗击德、意纳粹势力的英国政府造成不利影响。实际上，希腊政府一反过去不赞成、限制和反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意诺西斯"运动，转而强烈要求英国割让塞浦路斯主权，希腊政府立场的转变，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并不知晓，希腊政府也没有利用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英国政府为了获得塞浦路斯人的配合和支持，逐步取消了 1931 年起义后在塞浦路斯实行的独裁统治措施，塞浦路斯也逐渐出现了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开始向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塞浦路斯政治多元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政治中，不仅仅存在着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和土耳其族人的反"意诺西斯"思潮，而且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超越狭隘民族利益的政治潮流，它不仅主张民族团结、共同发展，而且既反对德、意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在塞浦路斯的独裁统治，要求恢复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关注由于塞浦路斯经济不断恶化所造成的劳动阶级日益贫穷问题，设想塞浦路斯早日步入工业化

和城市化道路，最终使塞浦路斯实现“人民的民主”。这一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就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通常简称“劳进党”，A.K.E.L)。该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26年8月的塞浦路斯共产党，1931年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1941年4月改组后为现名。其领导层主要由各商会、农民和专业组织的代表构成。劳动人民进步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着“泛塞浦路斯劳动者联盟”（简称P.S.O，后更名简称为P.E.O)。由于劳动人民进步党主张不分民族和宗教，所有塞浦路斯人平等和团结，吸引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民众和组织的积极参加。到二战结束时，土耳其族工人绝大多数参加了“泛塞浦路斯劳动者联盟”，甚至到1958年，在土耳其族人自己的政党相继建立后，许多土耳其族人仍然是该联盟的成员。实际上，在英国总督的独裁统治时期被取缔的塞浦路斯共产党组织的再度活跃，与英、法、美联合抗击德国，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组织得到英、美的默认和支持有关，而塞浦路斯的共产党组织与希腊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

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出现及其政治主张，遭到了塞浦路斯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42年，尼科西亚市长埃米斯托克利斯·泽尔维斯建立了“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党”。在该党的组织和领导下，1945年又成立了“塞浦路斯工人联盟”（或称“新商会”，简称S.E.K.)。1943年，阿西埃努村的“农村社会主义者”还成立了一个“意诺西斯”主义者的右翼组织——“泛塞浦路斯农民协会”（简称P.E.K.)，这些希腊族人的右翼民族主义组织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劳动人民进步党要求实现塞浦路斯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主张，积极推动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

随着“意诺西斯”的日趋活跃，土耳其族人的政治组织也随之

出现。1943 年,“土耳其族工人联合会”成立。1944 年,土耳其族主要领导人法狄耳·库楚克,建立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民族党”。这一时期的另一土耳其族人组织是由法泽·卡马克领导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民族组织联盟”(简称 KATAK)。这些土耳其族人组织自然是反对“意诺西斯”,主张维持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但该时期要求塞浦路斯回归土耳其的主张还不多见。

英国的宪法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英国当局取消了某些独裁统治措施,但还不能满足塞浦路斯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战争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意诺西斯”运动的高涨。而在战争中受到重创而实力大减的英国,为了平息民族运动,稳定塞浦路斯局势,抛出了宪法改革方案。

1946 年 10 月 23 日,新任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在英国众议院宣布,英国政府决定在塞浦路斯建立更加自由和进步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塞浦路斯内部事务,其中包括一项改变塞浦路斯经济状况的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同时宣布废除禁止选举新的正教会大主教的 1937 年基督教法,但只字未提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所普遍关心的“意诺西斯”和塞浦路斯的前途问题。

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对琼斯的讲话反应强烈。“伦敦塞浦路斯人委员会”近水楼台,对琼斯的讲话最先提出批评,并向英国首相艾德礼提交公开信。该信从民族问题、宪法问题、英国当局限制民主以及把塞浦路斯作为军事基地等方面,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批评,指责英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疏于管理,对塞浦路斯人民的民族要

求置若罔闻，呼吁“如果英王陛下政府怀疑塞浦路斯人民要求与希腊合并的普遍性，你们可以用自由公正的投票来进行验证”。1946年12月，由埃思纳克委员会成员芝诺·罗西德斯、商会主席德米特里厄斯和新当选的尼科西亚市长约翰·克莱里季斯组成的塞浦路斯代表团，在代理大主教勒昂提奥斯的率领下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表达塞浦路斯人民不赞成其宪法改革计划，而要求“合并而且只与希腊合并”的愿望。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理会希腊族人的反对呼声，继续推行其宪法改革计划。殖民大臣琼斯要求塞浦路斯代表们在英国政府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给予合作。同时，由于“意诺西斯”运动的广泛发展，琼斯也认识到推行该改革计划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当他们满脑子都是民族意识的时候，任何理智的理由都不会为之所动”。他明确告诉希腊族代表们，希腊族人追求民族复兴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放弃“意诺西斯”，要求实行塞浦路斯自治，英国政府会认真考虑。但代表们除了“意诺西斯”外，拒绝讨论任何其他方案。

虽然英国推行的宪法改革与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目标相去甚远，但二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但是希腊族人却认为，如果接受宪法改革，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实现“意诺西斯”的民族目标。另外，英国人更加关注和利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土耳其族人既反对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也反对塞浦路斯实行自治的立场，成为英国拒绝希腊族人要求的更加现实的理由。

1947年，英国政府任命温斯顿为塞浦路斯总督，在塞浦路斯实施宪法改革计划。温斯顿的到来遭到希腊族人的抵制，但却受到土耳其族人的欢迎。1947年6月20日，大主教勒昂提奥斯号召希腊族人抵制温斯顿的改革计划，而且提出“合并，只与希腊合并”

的口号。“合并，只与希腊合并”成为“意诺西斯”主义者的至理名言。但新任总督温斯顿并没有理会希腊族人的反对，邀请塞浦路斯各界人士，设立咨询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由塞浦路斯人直接参与管理岛内事务的政府”。埃思纳克领导的右翼组织拒绝了邀请，左翼组织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参加。左翼组织认为，通过塞浦路斯自治政府更容易实现与希腊的合并。但右翼组织指责左翼组织的妥协，认为这种妥协实际上是对英国殖民者对塞浦路斯人奴役的永久化的支持。

尽管遭到右翼组织的抵制，1947 年 7 月 11 日，仍有 4 位右翼人士、7 位左翼人士和 7 位土耳其族人，参加了由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杰克逊召集的咨询委员会会议，总督温斯顿在会议开幕词中要求代表们在规定的范围内提出他们的建议。代表们惊讶地发现，所谓规定的“范围”，不仅不允许提“意诺西斯”，而且也拒绝建立自治政府。实际上就是不给选举产生的代表任何真正管理塞浦路斯事务的权力。会议很快陷入僵局。

1948 年 1 月，希腊族委员联合拟定了一份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的建议，由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和拉纳卡市长萨塔玛斯转呈英国政府。英国政府经过数月的研究，决定拒绝接受该建议。紧接着英国政府推出了殖民大臣琼斯的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成立立法委员会，其成员 22 人，以民族为基础选举产生，其中 18 名希腊族人，4 名土耳其族人，另外还有 4 位英国官员，他们是殖民大臣、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高级专员。英国政府认为，让“这些官员参加立法委员会，他们能更直接地听取塞浦路斯立法委员会成员的意见。立法委员会主席由总督从非立法委员会成员中任命。立法委员会的辩论和立法权，应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塞浦路斯的

地位问题不能讨论，对于提交的任何财政、修改宪法或涉及塞浦路斯的防御、外交或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的提案，总督拥有最终裁决权。也就是说，如果总督不同意上述提案，立法委员会会议就不能讨论；总督拥有"广泛的立法保留权，即对于立法委员会通过的法案或动议，或被立法委员会会议拒绝或否决的法案，如果总督认为该法案或动议对公共利益、民众健康和政府运行有益，有权宣布生效实施。总督还拥有将法案退回立法委员会，要求立法委员会按照他的意见重新修改的权力；作为英王陛下的代表，总督在行政委员会中应享有特权，总督不一定必须听从行政委员会的忠告，但当总督的行为与行政委员会的忠告冲突时，总督必须向英国国务大臣说明缘由。另外，行政委员会中也包括如立法委员会中提及的4位英国官员，以便于国务大臣对行政委员会工作进行直接指导。

英国殖民大臣琼斯的建议，实际上把未来宪法框架内成立的塞浦路斯立法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仅仅当作表达塞浦路斯人民意见的讲坛和咨询机构，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3月20日，咨询委员会的所有希腊族成员拒绝接受该建议，再次要求建立自治政府。但是，总督以个人名义邀请的其他3位委员与7位土耳其族委员构成了咨询委员会的多数，通过了琼斯的建议。

尽管琼斯建议获得了咨询委员会的通过，但总督温斯顿深知，如果没有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的支持，在塞浦路斯实施任何一部新宪法都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8月12日，总督温斯顿宣布解散讨论制定宪法的咨询委员会，但没有收回琼斯的制宪建议。温斯顿同时还宣布，英国政府无意改变塞浦路斯主权。表明英国政府决不会满足希腊族人"意诺西斯"的要求。

英国当局在塞浦路斯实行宪法改革的努力失败后，"左翼劳动

者联盟”(P.E.O.)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自治政府—合并”,即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然后过渡到与希腊合并。1947年1月,塞浦路斯最大的政治组织劳动人民进步党,放弃了建立自治政府的要求,转向了毫不妥协的支持“意诺西斯”的政策。从此结束了塞浦路斯的多元化政治局面,逐渐出现了希腊族人要求实现“意诺西斯”,而土耳其族人反“意诺西斯”的二元政治格局,而且这种二元政治间的相互对抗性也日渐明显。1948年10月3日,希腊族右翼民族主义者在尼科西亚举行大规模“意诺西斯”群众集会,紧接着在11月28日,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领导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民族党”,发动了1.5万土耳其族人参加的反“意诺西斯”大游行。

希腊族人团结了起来,“意诺西斯”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意诺西斯”,在英国统治之初,希腊族人曾寄希望于英国人的“慷慨”,但7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富于同情心”的英国人并不那么慷慨,一再拒绝希腊族人的要求。左翼民族主义者开辟中间路线,企图通过建立自治政府,然后过渡到“意诺西斯”。而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塞浦路斯自治权,势单力薄的希腊族人难以唤起国际社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关注。他们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又寄托于祖国希腊,要求希腊政府向其盟友英国施加压力,以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

这一时期的希腊政府,对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事业,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战期间希腊饱受纳粹德国的占领和破坏,战后又经历了1947~1949年的内战,其经济和军事完全依赖于英国和美国的援助。真是吃了人家的嘴软,希腊政府不便向英国政府提出棘手的塞浦路斯问题,担心影响与英国的密切关系,但对于同宗同源

希腊族人的要求,希腊政府也不能无动于衷。1948 年 2 月 28 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英国人民帮助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满足他们的要求。英国政府对希腊的呼吁未予理睬。所以,左右为难的希腊政府只好采取中立政策,对于希腊族人的要求,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也充分理解希腊的困境,未曾向希腊政府过分施压。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的英帝国,其殖民地也不断丧失。1947 年撤出了印度,1948 年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而凸显了塞浦路斯在英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1948 年 10 月,英军将设在塞浦路斯的皇家空军军事基地提升为中东空军司令部。所以,英国更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块在中东地区仅存的殖民地。相应地,由于塞浦路斯战略地位的提高,塞浦路斯人民的民族斗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结束英国在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有着积极影响。

四、"意诺西斯"的发展

希腊族"意诺西斯"全民公决

经过激烈论战团结起来的希腊族人,开始寻求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民族愿望。1949 年 8 月 9 日,"伦敦塞浦路斯人委员会"向联大特别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希望增进联合国对塞浦路斯这一非自治地区的了解。虽然联大特别委员会无权受理像塞浦路斯这样的非托管地区的提案,但联大秘书处还是把该备忘录的内容简介分发给了各成员国代表。

“伦敦塞浦路斯人委员会”的行动，得到了塞浦路斯希腊族民众和组织的大力支持，为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实现“意诺西斯”开辟了新的途径。1949 年 3 月 17 日，劳动人民进步党下属的“民族解放联盟”（简称 E.A.S.）发表宣言，宣布在为“为解决经济问题坚决斗争”的同时，接受“意诺西斯”路线，并决定发起征集支持“意诺西斯”者的签名活动，后来将签名分别寄给了联合国和希腊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塞浦路斯问题，要求把战后联合国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应运到塞浦路斯，让塞浦路斯人就“意诺西斯”问题举行全民公决。面对“意诺西斯”运动的高涨和要求民族自决呼声的日益强大，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二世接受了埃思纳克委员会的建议，于 1949 年 12 月 8 日发表通谕，号召民众就“意诺西斯”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希腊族人的所有政党和组织对大主教的通谕立即表示全力支持。

1950 年 1 月 15 日至 22 日，在大主教的领导下，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就是否赞成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问题，举行全民公开签名投票活动。224,747 名 18 岁以上有投票权的希腊族人参加了投票，其中 215,108 人投票赞成，占参加投票人数的 96%。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限制，所有政府公务员（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均未参加此次投票。27 日大主教正式公布了投票结果，希腊族人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和希望与希腊合并的愿望，其结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 月 4 日，大主教把希腊族公民投票的结果通知了总督安德鲁·赖特，殖民当局对该结果不予理会，认为英国政府已不再考虑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问题，该问题早已被“封杀”，并尽力淡化公民投票所造成的影响。殖民大臣温斯顿在对上院的讲话中还暗示，

此次公民投票没有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存在着不公正，因此不能真正反映希腊族民众的意见。实际上，1949 年 12 月 12 日，大主教请求英国殖民当局对公民投票进行监督，但遭到了总督的拒绝。因为总督十分清楚，不论什么人监督公民投票，其结果都是几乎所有的希腊族人赞成与希腊合并。

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希腊族人的心声，扩大公民投票结果的影响，塞浦路斯派出了两个代表团向相关政府及其民众宣传塞浦路斯问题。由基里尼亚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塞浦路斯知名人士拉尼提斯和埃思纳克委员会驻雅典代表萨沃瓦斯·洛伊齐季斯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希腊、法国和英国，然后前往美国联合国总部，与参加第五次联大的各国代表进行了接触，表达塞浦路斯人民的要求。最后还访问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民族解放联盟”率领的代表团，由法马古斯塔市长阿扎罗蒂奥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秘书长帕帕约安努、“伦敦塞浦路斯人委员会”的埃夫多罗斯·乔安妮狄斯组成，也先后访问了英国和法国，并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了宣传小册子《塞浦路斯向世界展示其事业》，向两国国会议员、知名人士和有关组织散发，增进他们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了解、关注和支持。

此次公民投票的结果，充分表明了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希腊族人的民族愿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盟国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的集中体现，为希腊族人要求联合国将这一原则应运到塞浦路斯提供了国际法基础，对塞浦路斯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卡里奥斯的崛起

在塞浦路斯历史上，没有哪位领导人像他那样获得如此殊荣。他的名字即意味着“希望”、“解放”、“民主”。但也不乏把他称之为“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疯狂的合并主义者”、“意诺西斯的背叛”，甚至还有“赤色牧师”和“无辜英国人和土耳其族人的谋杀者”。但这一切都无法泯灭他是一位为数不多的，甚至赢得他的敌人尊重的领导人，他就是被他的“敌人”——美国著名外交活动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喻为“太高大、蕞尔小岛无法容纳”的塞浦路斯著名领导人——马卡里奥斯。

马卡里奥斯原名米海尔(Michael)，1913年8月13日生于塞浦路斯西部佩福斯地区一个叫上帕纳伊亚村(Ano Panayia)的中产阶级家庭。11岁丧母，小学就读于本村的教会学校，初中进入英国在塞浦路斯办的世俗学校学习，随后在著名的基克科修道院度过了他的高中学习阶段。马卡里奥斯的家庭与当地牧师关系密切，他的内弟就是一位乡村牧师，对马卡里奥斯后来的成长和事业有较大影响。

在修道院的学习和生活，对马卡里奥斯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931年，塞浦路斯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旱灾，经济恶化，民不聊生，英国殖民当局对此视而不见，人民要求改善经济环境，实现“意诺西斯”的起义被当局血腥镇压。当局还加大了对教会的压制。当时塞浦路斯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使年满20岁、即将从基克科修道院毕业的马卡里奥斯认识到，英国统治者既不代表塞浦路斯教会的利益，也不代表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是塞浦路斯教会和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1933年，高中毕业的

马卡里奥斯进入了泛塞浦路斯预科学校深造。该学校是塞浦路斯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学校，由前大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因参加和领导1821年起义被奥斯曼帝国杀害)创建，完全采用希腊式教育体制，主要教授希腊传统文化和1821年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革命史。学校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教学氛围，自然对马卡里奥斯坚决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积极投身"意诺西斯"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6年，马卡里奥斯回到母校基克科修道院任教，次年被任命为该修道院委员会秘书。1938年被荣升为位于佩福斯的圣锡奥多罗斯教堂执事。同年，该教堂资助他去雅典大学学习神学。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希腊，马卡里奥斯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继续在该校学习，1942年完成学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内战期间，马卡里奥斯作为一名牧师在雅典的教堂工作。1946年，经其尊师推荐，获世界基督教委员会资助到美国的波士顿深造。1948年，马卡里奥斯当选为克提昂主教，这是塞浦路斯历史上首次把一个学生选为主教。同年6月，马卡里奥斯回岛任职，并建立了"正教会运动"组织，激励青年人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

马卡里奥斯任克提昂主教，还有一层特殊意义。1931年时任克提昂主教的尼科迪默斯，在利马索尔向群众发表了题为"合并、坚决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的著名演说。尼科迪默斯认为，"从各方面看，与祖国希腊合并，是实现我们民族解放的惟一出路，我们决不屈从于邪恶的、可恶的、可耻的、非法的英国统治，争取实现与祖国希腊的合并"。现在，马卡里奥斯站在了同一讲坛上，勇敢地继承了尼科迪默斯的事业。1949年10月3日，马卡里奥斯在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说："让我们在埃思纳克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

我们的崇高斗争，直到神圣的自由之光普照大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之舟抵达胜利的彼岸。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呐喊，伟大的希腊万岁！与祖国希腊合并万岁！”1950年10月，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二世逝世，米海尔当选为大主教，立为马卡里奥斯三世，从此开始了他领导塞浦路斯教会和人民，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战斗的征程。

希腊族要求民族自决

70多年的殖民统治和对希腊族公民投票结果的漠然视之，使希腊族人丧失了对“慷慨”的英国人的信任，不再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英国政府。公民投票之后，埃思纳克委员会制定了实现其民族愿望的奋斗目标。一方面争取联合国各成员国代表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了解、关注、同情和支持，争取联大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另一方面，争取希腊政府的支持。只有获得希腊政府的支持，才能把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因为只有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向联大提交议案，而塞浦路斯只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另外，希腊族人的目标是要与祖国希腊合并，如果没有希腊政府的同意和支持，这一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为了获得联合国和希腊政府的支持，1952年10月至1953年7月，大主教马卡里奥斯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希腊，与各国政要、联合国代表和新闻媒体会谈，解释希腊族人的民族夙愿——“意诺西斯”。在雅典，马卡里奥斯受到了希腊陆军元帅帕帕戈斯首相的接见，马卡里奥斯请求首相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事业给予支持，要求希腊政府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但帕帕戈斯对此未置可否，没有任何明确表态。

在争取希腊政府支持的同时，希腊族人也注重对同宗同源的希腊民众的宣传，并得到了希腊民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在希腊出现了许多声援和支持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事业的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希腊大主教斯皮里宗领导的“为塞浦路斯而斗争泛希腊委员会”。希腊教会和民众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使希腊政府再也不能对塞浦路斯问题等闲视之。1953 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雅典，帕帕戈斯首相试探性地向艾登提及塞浦路斯问题，艾登立即断然拒绝。艾登认为，“为了对盟国负责和确保英国在中东的利益，继续占有塞浦路斯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殖民主义，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基本责任”。艾登拒绝了希腊政府提出的对塞浦路斯地位问题进行双边谈判的建议。

1954 年初，英国国会对塞浦路斯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议员们普遍反对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建议在塞浦路斯尽快实行宪法管理，然后逐步过渡到建立自治政府，直到自治政府有能力决定塞浦路斯的未来。这也是英国政府为了获得塞浦路斯人的支持和安慰希腊民众所采取的一贯立场，绝大多数希腊族人对这一立场一直寄以厚望。针对希腊族人要求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7 月 28 日，英国殖民大臣霍普金斯在众院的讲话中认为：“英帝国的某些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霍普金斯的言论与英国一贯坚持的模糊立场相抵触，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府企图永远不让塞浦路斯脱离英国统治的真正目的，从而在英国和塞浦路斯引起强烈反响。在野的英国工党和自由党猛烈抨击保守党政府的塞浦路斯政策，虽然这是英国政党之间为选举所进行的政治性表演，但也反映出在战后世界民族独立

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不仅遭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同样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指责。英国政府的顽固立场，更让其盟友希腊政府深感失望。

在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民众的压力下，1954 年 6 月 20 日，希腊政府向联合国首次提交议案，要求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9 月 23 日，联大程序委员会以 9 票赞成、3 票反对、3 票弃权，同意把希腊的议案作为第九届联大的议程，随后联大也以 30 票赞成，19 票反对和 11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英国坚决反对联大讨论塞浦路斯问题。英国驻联大代表皮尔逊·狄克逊在联大辩论中指出："塞浦路斯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属地，对其事务联合国无权干涉，因为它完全是英国的内政。"在英国的唆使下，新西兰代表提交了反对将塞浦路斯问题作为联大议案的动议，并于 12 月 15 日得到联大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通过。17 日，联大会议支持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决议，取消了在本次联大会议上讨论塞浦路斯问题。1955 年，希腊再度向联合国呈递议案，但在英、美和土耳其的强烈反对下再遭否决。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政府争取联合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

联合国两度拒绝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因

联合国两度拒绝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有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首先，英国的极力反对和阻挠是关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在战争中受到重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崛起，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冷战"。在中东地区，不仅"冷战"的气氛渐浓，而且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也开始激烈争夺。

1948年，美国在沙特建立了军事基地，而且向极具战略价值的波斯湾地区渗透。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两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更多地依赖美国，而英国于1948年被迫撤出了巴勒斯坦。随着50年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国有化运动，英国逐渐丧失了对中东战略资源石油的控制，尤其是1956年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使英国失去了在苏伊士运河的军事基地，美国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力量。但英国并不心甘情愿地退出中东这一全球能源基地和战略中心，塞浦路斯便成为它在该地区继续发挥影响力和保护其利益的最后屏障。所以，英国把原设在苏伊士运河区域的陆、海、空司令部也迁往塞浦路斯，要把塞浦路斯建设成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因此，英国多次重申，反对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决不放弃对塞浦路斯的统治。

其次，希腊政府态度暧昧。由于战后希腊在军事和经济上长期依赖英、美的援助，自然影响到希腊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为了保持与盟友英国的友好关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希腊政府尽可能采取淡化、回避、不介入或婉言拒绝的政策。希腊两度向联大提交塞浦路斯问题的议案，是在马卡里奥斯和希腊国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1950年希腊族公民投票之后，埃思纳克委员会立即把结果通报希腊政府，但希腊政府充耳不闻，马卡里奥斯要求给予支持，也遭婉言拒绝。马卡里奥斯还曾威胁要请求叙利亚帮助，并于1952年访问了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三国对他领导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表示支持。在联大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中，叙利亚代表还曾称“塞浦路斯一直是叙利亚领土的一部分”，这也使马卡里奥斯产生过依靠叙利亚帮助的想法。希腊政府得知马卡

里奥斯的这一想法后，立即改变了对该问题的态度，主张在不严重影响与英、美关系的情况下，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事业提供外交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塞浦路斯问题直接关系到英国的战略利益，有关塞浦路斯主权的任何变化，必然要影响英国与希腊关系。希腊政府考虑把这种影响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其主导思想是：希腊只管向联大提交议案，至于联大如何处理，那就是联大的事了，反正希腊政府已尽到了义务，可以向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民众交待了。因此，当联大政治与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新西兰代表的动议，反对联大继续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希腊驻联大代表纳丁的反应是："我国政府并不希望把塞浦路斯这一毫无意义、而且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列入议程，既然联大已决定采纳新西兰代表的动议，我国政府准备接受它，因为该动议理由充分。"希腊的提案连希腊代表都不能始终坚持，连遭联大拒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美、苏两霸都不支持，也是遭联大拒绝的重要因素。战后联合国的建立，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又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联合国，双方总是针锋相对，最后又相互让步达成妥协。但是对于极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双方也都颇为关注，立场却惊人的一致，都不支持希腊的提案，反对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这是由美、苏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塞浦路斯与希腊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一方面，尽管美国和英国在中东地区激烈争夺，美国不断蚕食英国的传统领地，但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仍然支持英国。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塞浦路斯的重要战略价值，苏联不希望塞浦路斯实现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使塞浦路斯落入已是北约重要成员国的希腊手中，增强北约的东南翼，所以，苏联在联大也不支持希腊的提案。而且在当时，塞浦路斯岛内反对英国

殖民统治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的势力颇具规模,这也是各方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英国和希腊政府均过低地估计了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领导下,希腊族人为实现其民族愿望的决心,以及希腊民众对同根同宗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义无反顾的支持。联大两度拒绝希腊提案后,塞浦路斯爆发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以及希腊民众的强有力声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章　塞浦路斯的独立历程

一、"埃欧卡"的武装斗争与土耳其的介入

"埃欧卡"的建立

1954年7月28日，英国殖民大臣霍普金斯认为塞浦路斯"永远不能完全独立"的讲话，不仅受到在野党的猛烈抨击，在塞浦路斯也引起了强烈反响。长期支持、配合英国政府的希腊族人，对英国政府公开蔑视盟国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企图长期占领塞浦路斯的言行愤怒不已。希腊人英国人之间的关系骤紧。

为了扑灭日益高涨的"意诺西斯"运动，8月2日，英国殖民当局的司法部长宣布，凡提倡、书写、宣讲赞成"意诺西斯"，或主张改变塞浦路斯主权者，将构成煽动罪，处以最高达5年的监禁；刊载此类文章的报刊将被停办3年。消息传开后，塞浦路斯工会宣布进行24小时罢工；13家希腊族人报纸宣布停刊一周，以示抗议。埃思纳克委员会、正教会和其他组织都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取消这一践踏民主、限制新闻自由的《反煽动法》。英国的媒体也对殖民当局的做法提出批评。8月5日的《每日电讯报》指出："在塞浦路斯，……禁止提倡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粗暴践踏

新闻自由的法律复活了，编辑们即使引用或转载英国国会或英国报纸上的观点，也将招致麻烦。”8 月 3 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对英国政府如此“肆意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感到十分震惊”。希腊族人对英国政府失去了信任，对英国政府能够像把爱奥尼亚群岛赠与希腊那样，和平地允许他们实现“意诺西斯”的民族愿望不再抱任何幻想，希腊族人被压抑了 76 年的不满和愤怒与日俱增。

对英国人失望后，希腊族人把实现民族目标的希望又寄托于联合国，希望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但在英、美的极力阻挠和反对下，联合国两度否决了希腊政府的提案，再次失望和极度愤怒的希腊族人，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国和美国的示威活动，民族主义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示威者与英国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面对反对英国统治的示威活动的迅速发展，大主教马卡里奥斯紧急前往雅典，与希腊政府商讨塞浦路斯局势。在雅典期间，马卡里奥斯会见了格里瓦斯。

乔治·西奥多勒斯·格里瓦斯，1898 年生于塞浦路斯东部重镇法马古斯塔的特里科莫，父亲经商，母亲是位内科医生。1909 年，格里瓦斯进入著名的泛塞浦路斯预科学校学习。1919 年毕业后考入雅典皇家军事学院。在该学院学习期间，他参加了“意诺西斯”的一个希腊民族主义组织，并于同年取得希腊国籍。在1922～1923 年希、土战争中，格里瓦斯任希腊陆军少尉。1925 年去法国凡尔赛陆军学校学习，1928 年回到希腊后被提升为希腊军队参谋。1932 年再次前往法国，在巴黎的高级战争（游击战争）学校深造。二战期间，他参加了一个被称为“X”的秘密抵抗组织，抵抗德

国占领军。1946 年，格里瓦斯把该组织改造成了一个政党——“泛希腊党”，该党在 1950 年和 1951 年还参加了希腊议会大选。此次马卡里奥斯与格里瓦斯在雅典会晤，促使格里瓦斯决定回塞浦路斯建立武装，反对英国的统治，为“埃欧卡”(希腊首字母的缩写 EOKA，意为“全塞浦路斯战斗者组织”)的建立开始进行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格里瓦斯回到塞浦路斯后，立即把马卡里奥斯领导的两个青年组织的成员，改编成了“埃欧卡”的主要战斗人员。这标志着希腊族人的第一支武装“埃欧卡”的正式建立。格里瓦斯自然是“埃欧卡”的军事总指挥，而它的政治代言人则是马卡里奥斯。塞浦路斯教会积极为“埃欧卡”筹备经费，购置装备。“埃欧卡”成员还利用 1946 年英军倾倒在法马古斯塔海岸的废弃弹药自己制造武器。

从 1955 年 4 月 1 日开始，塞浦路斯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英国官员、警察机构和政府设施的炸弹爆炸事件，这标志“埃欧卡”争取自决的 4 年(1955 年至 1959 年)武装斗争的正式开始，这是希腊族人第二次以暴力方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如果说 1931 年的希腊族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是在缺乏组织和领导核心及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具有较大偶然性的起义，那么，此次“埃欧卡”的武装斗争，是在大主教马卡里奥斯的统一领导下，在格里瓦斯将军的军事指挥下，向英国殖民者发动的真正具有军事性质的武装斗争。尽管这一斗争的目标是要实现“意诺西斯”，与人口居少数的土耳其族人的目标不一，但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自我解放的意义却值得肯定。

英希土三国伦敦会议与土耳其的介入

"埃欧卡"的军事行动使塞浦路斯局势骤然紧张，土耳其族领导人公开要求英国政府对恐怖活动进行镇压，从而造成警察部队中的希腊族人全部退出。在"埃欧卡"继续采取袭击行动的同时，马卡里奥斯再次前往雅典，要求希腊的卡拉曼利斯政府，把塞浦路斯问题再次提交联合国讨论。

面对十分严峻的塞浦路斯局势，英国又想起了已经在巴勒斯坦和南亚次大陆等地多次使用过的，堪称手法精湛的灵丹妙药——"分而治之"政策。制造双方力量均衡，相互遏制，然后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权威协调人和仲裁者，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1955 年 6 月 30 日，英国首相艾登邀请希腊和土耳其举行英、希、土三国伦敦会议，讨论"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和防御，其中也包括塞浦路斯"。这是自 1923 年签订《洛桑条约》，土耳其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一切权利之后，英国政府首次邀请土耳其政府参与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的介入，使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也是导致该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主要因素之一。

希腊对英国邀请土耳其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极为不满，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应当由塞浦路斯代表与英国政府双方谈判解决，反对土耳其介入，但是为了支持英、美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略联盟，希腊政府几经犹豫后最终参加了三国会谈。

土耳其政府爽快地接受了英国的邀请。尽管土耳其在《洛桑条约》中放弃了对塞浦路斯的一切权利，但并未放弃对塞浦路斯的关注。因为塞浦路斯不仅生活着与土耳其人同宗、同族、同文化的土耳其族人，而且塞浦路斯距土耳其南海岸仅 80 公里，对土耳其

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而且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德军占领、战后又发生内战的希腊相比，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意和英、美左右逢源，获得大量援助和支持，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才正式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争得参加盟国处理战后安排的特权。土耳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均比希腊强大。希、土两国的长期不合也驱使双方争夺对塞浦路斯的控制权。希腊族人要求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要求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但土耳其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如果英国撤离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应当归还给土耳其。所以，土耳其的介入，一方面是英国玩弄"分而治之"伎俩的结果，另一方面，土耳其早就在等待时机，介入塞浦路斯问题，遏制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

1955 年 7 月 16 日，马卡里奥斯发表声明，反对英、希、土三国伦敦会谈，认为它是"旨在阻挠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到联合国的陷阱，塞浦路斯人民决不接受伦敦三国会议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它与塞浦路斯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愿望背道而驰，即使希腊政府赞成那些协议"。

1955 年 8 月 29 日，伦敦三国会议在马卡里奥斯的反对声中开始了。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简要介绍了英国制定的"塞浦路斯新宪法"的基本内容。新宪法规定，在塞浦路斯成立自治政府，成员由选举产生，而且塞浦路斯成员将占多数；各部长由塞浦路斯人担任，向议会负责；政府职能将逐渐移交给塞浦路斯人。麦克米伦还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英、希、土三国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共同监督塞浦路斯自治政府的运作。他还邀请希、土两国参加英国利用塞浦路斯对三国的共同防御。麦克米伦的"塞浦路斯新宪法"，完全否定了塞浦路斯人民的自决权。

在伦敦会议期间，塞浦路斯爆发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包括教会、农民和商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代表纷纷发表演讲，表达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极大愤慨，“意诺西斯”的呼声处处可闻，暴力事件亦日趋频繁。位于首府尼科西亚市中心的梅塔克萨斯广场的英国学会大楼被付之一炬。在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民众的压力下，希腊代表坚决要求依据麦克米伦新宪法成立的自治政府，必须向塞浦路斯人的自决过渡，进而实现希腊族人所期望的“意诺西斯”，英、土两国代表断然拒绝希腊的这一要求。土耳其提出，一旦英国退出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应归还土耳其。土耳其外长佐卢称，土耳其的要求是基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长达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希腊代表坚持，只要排除“合并”的可能性，就不接受任何其他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而土耳其则坚持，只要不排除“合并”的可能性，任何解决方案也不接受。英国则狡诈地认为，如果希腊和土耳其谈妥了条件，英国就让塞浦路斯实行自治，但在主权问题上不承担任何责任。希、土两国首次公开表达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立场，其对抗性不言而喻。

1955年9月6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爆发了反希腊人骚乱，杀害希腊侨民，掠夺希腊人财产，反对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希腊政府对在土耳其发生的针对希腊人的暴力事件非常愤怒，决定停止参加同盟国之间的一切活动，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以示抗议。北约理事会出面调解，但毫无结果。9月7日，伦敦三国会议终因各方立场大相径庭，陷入僵局而结束。

9月1日，希腊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联大讨论的请求再次被联大拒绝。联合国担心联大对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辩论，可能会引

发新的冲突。但联合国的拒绝反而使其担心变成了现实，塞浦路斯局势进一步恶化。

面对不断恶化的塞浦路斯局势，1955 年 9 月 25 日，英国政府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哈丁爵士为塞浦路斯总督。英国政府任命一位前陆军元帅为塞浦路斯总督，预示着将在塞浦路斯实行严厉措施。哈丁上任后立即宣布，在塞浦路斯实行紧急状态、宵禁和建立新的负责治安的保安部队，该部队由一万名英国士兵和主要由土耳其族人把持的警察部队组成。屠刀和镣铐已经准备就绪后，哈丁宣布“埃欧卡”为非法组织，开始大肆搜捕和绞杀“埃欧卡”成员。紧急状态文告中规定，凡私自携带武器或弹药者，将被判处死刑。尽管如此，针对英国人的暴力事件仍然有增无减，仅一周内就有 5 名英国士兵被杀。街头巷尾处处可闻呼喊“狄亨尼斯”(格里瓦斯的外号，袭用了拜占廷英雄之名)的声音。马卡里奥斯指责殖民当局的这些措施，完全是“极权的法西斯主义”。英国政府正试图用武力使希腊族人屈服。

英国政府在以武力消灭“埃欧卡”的同时，继续挑拨土耳其族人制衡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英国殖民大臣博伊德在众议院表示：如果希腊族人有自决权，那么土耳其族人也应拥有这些权利。英国希望通过鼓动土耳其族人向希腊族人施加压力，使他们放弃“意诺西斯”，由英国继续占领和统治。

博伊德的讲话以及英国殖民当局的所作所为，使土耳其政府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受到鼓舞，而且立即行动了起来。土耳其开始向土耳其族人提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迅速建立了土耳其族人的准军事组织——“火山”，与希腊族人的“埃欧卡”相抗衡。英国殖民当局还有意让主要由土耳其族人组成的警察部队驱

散希腊族示威者，拘捕“埃欧卡”的同情者，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流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对立情绪。“火山”组织领导人要求英国当局必须对土耳其族人进行保护，防御“埃欧卡”恐怖分子的袭击。同时，拉乌夫·登克塔什(Rauf Douktash，后来的土耳其族领导人)等人组建了“土耳其族人抵抗组织”(简称“TMT”)，保护“毫无防御的土耳其族人”免受希腊族人的攻击。“土耳其族人抵抗组织”还决定把土耳其族人与希腊族人隔离开来。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日益明朗。英国拉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的目的，一方面就是利用土耳其制衡希腊，另一方面是支持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使土耳其族人壮大而制衡希腊族人的“意诺西斯”，达到一箭双雕，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长期占领塞浦路斯的目的。其结果是希、土两国均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对塞浦路斯展开激烈争夺，而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矛盾激化。伦敦三国会议对塞浦路斯问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英国放逐马卡里奥斯

马卡里奥斯拒绝接受英国在伦敦三国会议上所提出的塞浦路斯新宪法，这使英国政府确信，只要马卡里奥斯在岛上，塞浦路斯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且自1955年4月1日“埃欧卡”发动武装斗争以来，给英国军队和殖民当局的警察部队造成很大损失。岛上的英国人日夜心惊胆战，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甚至连戒备森严的哈丁爵士的总督寓所也不再安全，侍者从他的床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哈丁幸免于难，但停放在阿克罗蒂里机场上的英国军用飞机却被炸成了碎片。成员只有数百人，配备自制武器的“埃

欧卡”,竟能使3万英军和4,500名警察部队疲于奔命,处处遭受袭击。总督哈丁认为,马卡里奥斯一定是“埃欧卡”的幕后总指挥,要彻底剿灭“埃欧卡”,必须首先除掉其头目——马卡里奥斯。但是,哈丁也不能不考虑马卡里奥斯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他作为大主教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心中的地位。另外,尽管土耳其族警察与英国人积极合作,但自“埃欧卡”发动武装斗争以来,“埃欧卡”袭击的目标仅限于英国人和殖民当局的警察机构,没有一起针对平民或土耳其族人的暴力事件。据统计,1955年至1959年间,在暴力事件造成的数百名死亡者中,希腊族人178人,英国人142人,土耳其族人84人,其中只有22人是土耳其族警察。

1956年2月,总督哈丁和殖民大臣博伊德与马卡里奥斯举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英国提出了一个建立有限自治政府的新建议。这个新建议的出笼,与当时中东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有关。1955年底,约旦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反对英国把约旦纳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6年3月,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突然解除了阿拉伯军团司令——英国人约翰·格拉布的职务,进一步降低了英国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影响力。所以,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塞浦路斯就显得更加重要。英国为了尽快恢复塞浦路斯局势,任命行武出身的哈丁为塞浦路斯总督,彻底剿灭“埃欧卡”,但哈丁的严厉镇压措施,不仅没有恢复塞浦路斯秩序,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为此英国又改变了策略,紧锣密鼓地与马卡里奥斯进行谈判,但马卡里奥斯拒绝接受有限自治,坚决要求自决,双方谈判破裂。

其实在谈判后期,马卡里奥斯已经预感到英国殖民当局将对他采取行动。6年之后马卡里奥斯总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每次谈判结束后我与哈丁都同时离开,但这次我注意到,我离开后,

哈丁还留着，我相信他们已决定那天晚上就要放逐我，然后把那个建议送往伦敦”，强行在塞浦路斯实施。1956 年 3 月 9 日，马卡里奥斯与基里尼亚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和另外两名希腊族人秘书，准备乘飞机去雅典访问，一行四人在尼科西亚机场被英国安全部队拘捕。英国人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岸，然后乘船经亚丁到肯尼亚的蒙巴萨，最后英国人用军舰把他们送到了塞舌尔群岛——一个位于印度洋中部，专门用来放逐政治犯的英国殖民地。

马卡里奥斯被放逐后，哈丁迅速调集新组建的安全部队，按照紧急状态法所赋予的特权，大肆搜捕“恐怖分子”，企图彻底剿灭“埃欧卡”成员。同时，哈丁下令查封宣传“意诺西斯”的报纸和电台，要从媒体宣传上和希腊族人的精神上彻底消灭“意诺西斯”。

马卡里奥斯被放逐的消息传开之后，在塞浦路斯和希腊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希腊政府立即召回了希腊驻英国大使巴兹尔·莫斯特拉，以示最强烈的抗议。英国政府对殖民当局在塞浦路斯的武装镇压和放逐马卡里奥斯态度坚决，认为为了确保英国在中东的利益，首先必须确保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不受任何干扰。美国对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也深表关注，督促英国政府恢复与塞浦路斯领导人的谈判。

英国政府不惜其亲密盟友希腊召回驻英大使的强烈抗议，坚决放逐马卡里奥斯，还有其更为重要的军事目的。1956 年 7 月 6 日，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直接影响到英、法在中东的利益和地位。随后，英、法与以色列勾结，计划联合入侵埃及。塞浦路斯自然就成为英、法入侵埃及的重要军事基地。但是，英国深知马卡里奥斯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交往甚密，1952 年曾访问过埃

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得到过这些国家的大力支持,如果马卡里奥斯继续留在岛上,他决不会允许英、法利用塞浦路斯基地入侵自己的友好邻邦埃及,必然会制造事端,干扰英军的行动。所以,放逐马卡里奥斯也为英军入侵埃及扫除了障碍。

二、两族冲突与寻求解决方案

拉德克利夫建议

马卡里奥斯被放逐后,1956 年 8 月,"埃欧卡"宣布休战,愿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总督哈丁错误地认为,这是马卡里奥斯被放逐后他们愿意投降的表现,便要求"埃欧卡"成员迅速缴械,接受审讯,并派大批安全部队加紧搜捕,致使"埃欧卡"的武装斗争不久又重新开始了。英国当局则继续实行宵禁,大设集中营,更加严厉地进行镇压,而且还采取了"联保制"。这是法兰克人统治塞浦路斯时期,为防止村民弃村而逃所使用过的惩处方法,就是在发生袭击事件的城镇或村庄,实行集体罚款。在法马古斯塔,英国殖民当局曾一次就罚款 4 万英镑,摊派到每个家庭,最高者竟达数千英镑。

在此期间,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巴分治专家的拉德克利夫勋爵为塞浦路斯制宪专员,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拉德克利夫最后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在新成立议会和自治政府各部中,希腊族人占多数,但同时应当妥善保障土耳其族人的权利;岛内治安仍然由英国人负责。1956 年 12 月,该建议被提交英国议会讨论,殖民大臣博伊德解释说,倘若希腊族人继续要求"意诺西

斯”，那么土耳其族人也有权选择与土耳其合并，其结果必将导致分治。

希腊政府拒绝接受拉德克利夫的建议。希腊舆论普遍认为，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塞浦路斯问题最终会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对博伊德的讲话立即表示赞赏，认为土耳其族人也有权要求塞浦路斯与土耳其合并。土耳其媒体也大加宣称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不能生活在一起，岛上也有人遥相呼应，指责“受屈辱的土耳其族人”成了“埃欧卡”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在此值得强调的是，自 1955 年 4 月 1 日“埃欧卡”发动武装斗争以来，“埃欧卡”袭击的目标一直是英国人，从未发生过一起针对土耳其族平民的暴力事件。即使在 1955 年 6 月 9 日土耳其发生严重的杀害、抢劫希腊侨民的暴力骚乱，以及英国当局故意利用土耳其族警察驱散甚至殴打希腊族示威者，拘捕“埃欧卡”同情者，也未曾导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英国当局为了实施拉德克利夫建议，也没有忘记去征求远在塞舍尔群岛的马卡里奥斯的意见。遭马卡里奥斯断然拒绝后，哈丁总督加大了对“埃欧卡”的打击和清剿力度。1957 年 3 月，英军包围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位于特罗多斯山麓小丘上的马开拉斯修道院附近，当时“埃欧卡”的副总指挥雷戈里斯·阿弗森蒂奥正在洞内，英军要求其投降，遭到拒绝后英军炸毁了洞穴，阿弗森蒂奥被炸死。阿弗森蒂奥成了为希腊族人事业献身的英烈。此后，当地的一些街道改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这个洞穴也成了希腊族人祭奠英烈的圣地。

“几尼耶利村事件”两族开始全面冲突

拉德克利夫建议被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政府拒绝后，塞浦路斯局势进一步恶化。1957 年 2 月，联大通过了一项并无实质性内容的决议，要求双方通过谈判“和平、民主和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英、希、土三国一致表示同意，但对该决议的意图却有不同理解。希腊认为该决议要求英国与“塞浦路斯人民”之间进行谈判，而英、土两国则认为是要求英、希、土三国政府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虽然希腊与英、土两国对联合国决议中的谈判主体有争议，但“埃欧卡”总指挥格里瓦斯对该决议做出了积极回应。格里瓦斯发表声明，如果英国政府释放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并允许他参加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埃欧卡”就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英国政府经过两周的讨论，有条件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即释放马卡里奥斯，但不允许返回塞浦路斯。1957 年 3 月 28 日，马卡里奥斯正式获释，希腊航运大王奥纳西斯派船将他接回了雅典。

1957 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当选英国首相。10 月初，英国政府任命 H.富特为塞浦路斯总督。富特尽力表现出善意和信任，部分解除了紧急状态措施，圣诞节前还释放了被前任总督哈丁拘捕的许多嫌疑犯。他外出从不带武器和警卫，在大街小巷随意与普通人交谈。为了建立互信，他还请求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1993年当选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出面，调解他与“埃欧卡”领导人格里瓦斯的关系。面对抗议他赴任的示威人群，富特高喊：“如果我不是英国士兵，我很可能就是一位‘埃欧卡’领导人”，表示对“埃欧卡”斗争的理解。格里瓦斯与富特会面后，接受了福特的

善意，开始约束“埃欧卡”的军事行动。

为了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途径，富特前往土耳其，试图说服土耳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但让富特意想不到的是，土耳其迎接他的是要求塞浦路斯分治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甚至拒绝与他会晤。与此相反，当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和“塞浦路斯是土耳其的一部分党”（简称 CPT，以“要么分治，要么死亡”为宗旨）领导人内贾蒂·扎格尔从伦敦回到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涌上街头向他们致意。就在同一天，塞浦路斯发生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的“几尼耶利村事件”，标志着两个民族之间全面冲突的开始。

几尼耶利村位于首都尼科西亚与北部的基里尼亚市之间，这一天，英国军警在该村拘捕了 50 名希腊族人，将他们带到土耳其族聚居区后又释放了，结果造成 9 名希腊族人死亡，5 人重伤的严重事件。而且两族之间的冲突很快蔓延到两族散居的阿莫尔菲塔郊区。这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首次因塞浦路斯未来地位问题而发生的暴力冲突，从而拉开了自 1878 年英国占领塞浦路斯以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暴力冲突的序幕。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波及面进一步扩大。“土耳其族人抵抗组织”散发传单，向希腊族人发出警告：“在此之前，我们只向希腊族人中我们的敌人开枪，今后我们将向任何一个希腊族人射击。”连续不断的暴力冲突似乎要表明，“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不能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富特极力营造的互信与和谈氛围顷刻丧失殆尽，“埃欧卡”又恢复了军事行动，现在他们不只是针对英国人，也开始袭击土耳其族人。富特不得不走上他的前任哈丁爵士的老路：实行宵禁和紧急状态，命令安全部队进行大量

拘捕。

在此期间，希腊政府把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仍寄希望于联合国，为了获得联合国更多成员国的支持，希腊政府积极展开外交活动，恢复和发展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甚至接受苏联外长访问雅典的要求；扩大与不结盟国家的联系。尽管希腊对英、美不支持其"意诺西斯"极为不满，但由于在经济和军事上仍然有赖于英、美，故与其关系不冷不热。英、美、土、希均系北约成员，英国曾与希腊政府接触，希望在北约范围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希腊政府拒绝该组织的干预，坚持必须让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返回塞浦路斯，并废除在塞浦路斯实行的《紧急状态条例》后才能开始谈判，而且还坚持这种谈判只能在英国政府与塞浦路斯人的惟一代表马卡里奥斯之间进行。

英国拒绝了希腊政府提出的英国政府与马卡里奥斯直接谈判的要求，双方再次陷入僵局。1957 年 7 月 15 日，希腊再次呼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1958 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日益加剧，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号召有关各方寻求一项民主的解决方案，麦克米伦方案便应运而生。

麦克米伦方案

1958 年 6 月 19 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邀请希腊和土耳其，共同讨论他提出的塞浦路斯自治方案，通称麦克米伦方案。该方案规定，塞浦路斯自治政府由英、希、土三国"共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自治政府内分别设立议会，两族内部事务分别由两族自行管理，外交、国防和岛内安全由英国负责。除此之外，英国允许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积极参与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自治政府的事

务，允许希、土两国派代表与英国和塞浦路斯希腊族及土耳其族共同制定一部塞浦路斯新宪法。随后麦克米伦穿梭于雅典和安卡拉之间，向希、土两国政府解释他的新方案。

土耳其政府赞成麦克米伦方案。尽管 1955 年土耳其应邀参加了英、希、土三国伦敦会议商讨塞浦路斯问题，但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有多大发言权尚无明确规定，而此次麦克米伦方案规定，土耳其与英国和希腊三国共同管理塞浦路斯自治政府，而且土耳其与希腊和英国及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共同制定塞浦路斯新宪法，麦克米伦方案首次赋予土耳其与希腊平等参与塞浦路斯问题的权利，自然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积极回应。同时，土耳其认为，该方案中建议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成立议会，各自独立地管理其内部事务，允许希、土两国参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自治政府的管理，既保护了土耳其族人的利益，也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有利。但希腊政府认为该方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而拒绝接受。

英国在极力劝说希、土两国政府接受麦克米伦方案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埃欧卡”的围剿，“几尼耶利村事件”使全岛骤然笼罩在恐怖之中。格里瓦斯被迫就范，取消了一直恪守的禁止袭击土耳其族人的命令。“土耳其族人抵抗组织”开始袭击希腊族人，同时还警告土耳其族人，不要吸希腊族人制造的香烟，也不要到希腊族人经营的商店里购物，不听劝告者遭到殴打。甚至还威逼由劳动人民进步党领导下的商会中，继续支持两族密切合作、反对英国统治的土耳其族人辞职，并暗杀了劳动人民进步党中的土耳其族领导人艾哈迈德·萨迪等人。“土耳其族人抵抗组织”散发的传单称：“自治政府建立之日，便是整个塞浦路斯陷入血海之时。”“要么分治，要么死亡”，已成为土耳其族极端分子的

座右铭。

劳动人民进步党公开谴责所发生的暴力事件，认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冲突，只能有利于英国殖民统治者，成为英国分治塞浦路斯的证据。劳动人民进步党还宣布支持马卡里奥斯作为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代表，参加未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谈判，号召两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平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的塞浦路斯政府，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不懈的斗争。

50 年代中后期，中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伊拉克在 1958 年 7 月革命后退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希腊为抗议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土耳其人屠杀和抢劫希腊侨民的事件，撤回了希腊驻土耳其北约司令部的希腊代表，这些事件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塞浦路斯继续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对于北约显得更加重要。所以，美国公开欢迎麦克米伦方案，并向接受该方案的土耳其政府提供了 359 万美元的贷款，还免除了土耳其政府 800 万美元的债务。在得到美国和土耳其的支持后，英国政府不顾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政府的反对，宣布将从 195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麦克米伦方案。饱受强国占领和统治的塞浦路斯，再次面临着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

三、《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形成

《苏黎世—伦敦协定》的背景

50 年代中后期中东形势的变化，对希、土两国和英、美大国均产生较大影响，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苏黎世—伦敦协定》的签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各方妥协的产物。

就土耳其方面而言，1956 年苏联势力进入中东，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叙利亚和埃及结盟，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接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此，土耳其深感其南部安全受到来自叙利亚的威胁。1957 年 8 月，叙、土双方发生边界冲突，从而引发叙、土关系危机。苏联也向土耳其发出警告。尽管经多方斡旋，叙、土危机暂时得到缓解，但土耳其认为来自北部苏联和南部叙利亚的威胁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希望尽快解决严重影响土、希关系甚至可能导致两国爆发战争的塞浦路斯问题，改善与希腊的关系，毕竟土耳其和希腊都是英、美的盟友，北约的重要成员。此外，1958 年伊拉克“7 月革命”后退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其总部(此后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迁到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从此土耳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美、英向土耳其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也不断增加，这也迫使土耳其必须考虑美、英西方阵营的整体战略利益。因为，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希腊已经撤回了驻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北约代表，拒绝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而且还威胁要退出北约，已经有向苏联阵营靠拢的趋势，这是美、英绝对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美、英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其做出相应让步，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增强北约内部团结，应对苏联的威胁。在此情势下，土耳其希望在确保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塞浦路斯问题一直严重地影响着希腊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不断宣传的“意诺西斯”，得到了希腊民众

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希腊民众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看成是“大希腊化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希腊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但历届希腊政府对此问题都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主要担心会影响与英国的密切关系。1958 年初,卡拉曼利斯政府的倒台就与塞浦路斯问题直接相关。希腊民众和反对派公开指责卡拉曼利斯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过于软弱和听命于英、美的压力。此外,在希腊,共产党的势力也有较大影响,共产党要求卡拉曼利斯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退出北约相要挟,甚至要求退出西方盟国,发展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希腊共产党的强硬立场,顺应了希腊民众的呼声。但是,希腊民众的这种情绪并非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而是希腊民众普遍认为,英、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一味地偏袒土耳其。在联合国,英、美、土相互呼应,一再坚决反对希腊提交的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民族自决的提案,因而在希腊形成了反对英、美的民族情绪。所以,再度执政的卡拉曼利斯政府进退维谷,担心一旦采取强硬立场,如果英国毫不妥协,不仅塞浦路斯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使希腊陷入孤立,甚至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尤其是在与比希腊实力强大的宿敌土耳其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更需要谨慎从事。但是如果屈从英、美的压力,现政府可能会在民众和反对派的反对声中重蹈上次倒台覆辙。因此,希腊卡拉曼利斯政府迫切希望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改善和恢复与英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在稳定的国内政治中加快希腊的经济建设。

麦克米伦方案遭希腊政府拒绝后,英国政府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宣布将强行实施该方案。这使希腊深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紧迫性,因为强行实施该方案的结果将是塞浦路斯分治,希腊的处境将更加被动。所以曾拒绝在北约内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希腊

政府，现在同意北约秘书长斯帕克的建议，在北约内部协调解决，而且希腊政府请求斯帕克向英国施加压力，延缓实施麦克米伦方案。另外，希腊政府不仅要求英、希、土三个北约成员国参加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同时还要求《洛桑条约》签字国中的其他北约成员国，也参加北约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会议。希腊一方面企图在此次会议上指责土耳其违反了《洛桑条约》中所确定的土耳其放弃在塞浦路斯所有权利的规定，把土耳其踢出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另一方面，希望其他成员国了解塞浦路斯问题的真相以及英、希、土三国的立场，避免因英、土的误导，从而在联大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中给希腊造成不利影响。但是，此次北约的调解，因各方分歧太大而未能取得成功。英国提出如果希腊政府撤销向联大提交的塞浦路斯问题议案，英国可以暂缓实施麦克米伦方案，但拒绝彻底取消该方案的实施。而土耳其则坚持必须彻底实施该方案，并拒绝对该方案做出任何修改。北约的调解失败后，已临近英国宣布的1958年10月1日开始实施麦克米伦方案的日期，希腊政府如坐针毡，仍在做挽回灾难性后果的最后努力，即再次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除土耳其和希腊希望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外，英国和美国也希望及早解决该问题，但英、美的意图却不尽相同。当1878年英国占领塞浦路斯时，英国的目的就是把塞浦路斯作为其军事基地，但是，自1955年“埃欧卡”发起武装斗争以来，英国在塞浦路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英国国内舆论的指责。在此背景下，1957年，英国派代表团对其在塞浦路斯的利益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和评估，其结果是英国无需

继续占领整个塞浦路斯，只需在塞浦路斯设有军事基地即可。另外，英国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已成功地把英国与塞浦路斯人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代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利益的希腊和土耳其两国之争。现在作为仲裁者的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利益，即在塞浦路斯设立军事基地已是囊中之物，尽快放弃塞浦路斯的主权已成为朝野的共识。英国的这一政策转变也符合美国既在中东地区排挤英国，积极向中东地区渗透，同时也支持英、希、土三国加强美国主导的北约内部团结，抵御苏联的威胁，开拓美国的全球战略，从而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在此背景下，马卡里奥斯独立思想的产生，打破了谈判僵局，为真正的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马卡里奥斯独立思想的产生

从塞舌尔群岛回到雅典的马卡里奥斯，密切注视着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深感危机迫在眉睫，迫使他对塞浦路斯的未来做深入的、历史性的思考。首先，他认识到实现希腊族人的民族愿望“意诺西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目前的形势下基本上已不可能。虽然“埃欧卡”自 1955 年 4 月 1 日发动武装斗争以来，给英国当局和驻塞浦路斯的英军制造了诸多麻烦，但是，单凭“埃欧卡”的军事行动，不大可能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目的。其次，希腊政府希望联合国把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塞浦路斯，但在塞浦路斯进行民族自决，实际上就是“意诺西斯”，因而必然遭到英美尤其是土耳其的坚决反对，同时，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予支持。因此，通过联合国实现“意诺西斯”的可能性也不大。再次，土耳其的介入使“意诺西斯”基本上走入了死胡同。土耳其族人一贯反对希腊族人

的“意诺西斯”，要求维护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由英国人保护他们的利益。随着土耳其的介入和对土耳其族人的支持，土耳其族人提出了与“意诺西斯”针锋相对的要求，如果英国撤离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应归还给土耳其，或者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塞浦路斯分治。

由于上述因素，马卡里奥斯认为，如果继续坚持“意诺西斯”而不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可能会失去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时机；造成某些国家直接介入、干涉塞浦路斯事务的悲惨结局。而且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已不允许他犹豫，因为实施麦克米伦方案，就意味着向英国和土耳其分治塞浦路斯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他绝对不愿看到的后果。形势已不允许他一味消极被动地反对英国政府接二连三提出的方案，必须积极主动地提出基于现实、又能被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独立——一个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的独立的塞浦路斯，在马卡里奥斯的脑海里油然而生。9月，在雅典，马卡里奥斯与英国工党议员巴巴拉·卡斯尔女士会谈时，明确表示他现在的立场是宁愿独立，而不是“意诺西斯”。对于马卡里奥斯立场的突然转变，他自己的解释是：“美国的立场与英国的政策完全一致，我们只有向联合国提出基于独立的解决办法，才是成功的惟一希望……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英国方案的实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治，或者，将会给土耳其赋予以后无法取消的权利。”其实，马卡里奥斯思想的转变，也符合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和不结盟国家的立场。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实现独立，而不与北约成员国希腊合并，会得到更多联合国成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马卡里奥斯实现塞浦路斯独立的呼吁，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

约的主持下，有关各方进行"静态外交"，直接谈判才能有机会取得实质性进展。联大政治委员会最终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伊朗的提案。希腊再次站在了美、英、土和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对立面。希腊对美国未能信守中立的承诺感到愤怒。实际上，联大政治委员会对伊朗提案的通过，意味着希腊在联合国的努力可能再次成为泡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弹指间。12月4日，在伊朗提案通过的当天晚上，土耳其外长佐卢主动与希腊外长阿维罗斯在政治委员会大厅会晤，双方交换了各自对本国安全利益的基本看法，并约定继续接触。5日，墨西哥代表起草了英、希、土三国代表私下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并以57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联大会议的通过，即联合国第1287(ⅫⅡ)号决议。该决议并无实质性内容，只是重申了1957年2月26日联合国通过的第1013号(Ⅺ)决议的内容，主张各方积极努力，制定出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民主、公正的解决方案。但希、土两国代表私下的会谈仍在进行。6日，希、土两国外长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谈，决定恢复英、希、土三国在巴黎北约总部会议期间的谈判。同时双方为了表明继续会谈的诚意和缓解塞浦路斯紧张局势，共同请求英国殖民当局释放了一批在押犯。

随后希、土两国代表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突破。土耳其方面愿意放弃分治，但坚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内部事务必须最大限度地分开，确保土耳其族人超过人口比例地参与未来塞浦路斯政府的管理工作，同时土耳其坚持必须在塞浦路斯驻军，以保障土耳其南部海岸安全和保证土耳其族人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希腊原则上接受了土耳其的要求和建议，并与马卡里奥斯进行磋商。

实际上，此时希腊已经开始与土耳其谈判在英、希、土三国保证下，塞浦路斯实现独立的问题。希、土两国正在为塞浦路斯的未来做出安排。

1959年1月18日至20日，希、土两国外长在巴黎欧共体会议期间进一步进行私下会谈。2月10日，希腊首相卡拉曼利斯和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在苏黎世会晤。11日，希、土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最终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国外长立即飞往伦敦，向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汇报双方达成的新协议。同时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也分别向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通报了该协议的基本内容。马卡里奥斯仔细地阅读了希、土两国达成的协议后心存疑虑，要求对协议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原封不动地接受协议，要么予以拒绝并准备承担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马卡里奥斯深知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只好无可奈何地全部接受。

1959年2月19日，在英国伦敦的兰开斯特大厦，召开了有希腊、土耳其两国和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参加的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由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主持的四方代表的签字仪式，因为协议已由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核定，根本不允许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对其表达不同意见或修改建议。最后，希腊政府代表卡拉曼利斯首相、土耳其政府代表外交部长佐卢、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代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代表库楚克博士，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标志着《苏黎世—伦敦协定》的正式形成，也表明即将诞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的基础获得了“一致”同意。

《苏黎世—伦敦协定》共有27条，列入塞浦路斯宪法，并载入

相互关联的《保证条约》、《联盟条约》和《设立军事基地条约》之中。条约规定即将诞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为总统制;总统由希腊族人担任,副总统由土耳其族人担任,分别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通过选举产生;副总统对外交、国防以及财政事务享有否决权,其他一切事务由部长会议的多数票决定。规定设立 10 名部长,希腊族占 7 名,土耳其族占 3 名,分别由正、副总统任命。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全部公职人员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按 7:3 的比例分配。设一院制议会,议员 50 名,其中希腊族 35 名,土耳其族 15 名,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选举产生;众议院下设两个民族院,分别处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宗教、教育、文化和其他民族事务;在 5 个主要城镇分别设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单独市政机构;在警察、宪兵和最终建立的塞浦路斯军队中,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比例是 6:4。另外还规定设立一个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数各占一半的高等法院。

由英国、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四国签订的《保证条约》规定,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禁止塞浦路斯作为整体或一部分与他国合并。由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三国签订的《联盟条约》规定,希腊和土耳其可以在塞浦路斯分别驻扎军队 950 人和 600 人,“帮助训练塞浦路斯军队,同时作为维护两族间良好关系的促进因素。”《设立军事基地条约》因涉及殖民统治结束后,保留英国军事基地的主权以及在共和国领土上的军事设施,以及财政、国籍等复杂的管理和法律问题。同时,马卡里奥斯向希腊政府明确表示,《设立军事基地条约》应由即将诞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与英国政府直接谈判,因此直到《苏黎世—伦敦协定》签订时,还未开始谈判,但其基本原则已在协定中确定。英国对塞浦路斯境内的两个军事基地——利马索尔以西的阿克罗蒂里

空军基地和拉纳卡以东的德克利亚陆军基地，作为永久性军事基地保持主权；对岛上的其他军事和民用设施享有使用权。

《苏黎世—伦敦协定》签署后，有关各方均表示满意。希腊首相卡拉曼利斯对媒体说："此时此刻，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保证国，我们对这个新国家的诞生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赞扬了高级别外交活动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这一模式应被运用到解决更大的国际争端中去。土耳其外长佐卢充分肯定，"所达成的协议是对塞浦路斯问题平等、公正的解决"。随后马卡里奥斯宣布："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坚信今天是和平、自由、繁荣的塞浦路斯新时代的开端。"同一天，马卡里奥斯还向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要求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国家。马卡里奥斯说："经历数世纪外国统治的塞浦路斯，终于自由地奔向自己的未来。"

《苏黎世—伦敦协定》的达成，实际上是以牺牲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的利益，实现了英国、希腊、土耳其三国在塞浦路斯利益的平衡。英国获得了设立永久性主权军事基地和战时利用塞浦路斯各种公共设施的权利；希腊和土耳其可以在塞浦路斯驻军，保护其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三大国的胜利，尤其是英帝国，当年迫使奥斯曼帝国素丹将塞浦路斯交由英国占领和管理，随后将其吞并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塞浦路斯问题原本是塞浦路斯人民要求英国殖民者撤出塞浦路斯，英国却使之成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及其"母国"希腊和土耳其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希腊和土耳其两国艰难地进行谈判，英国却置之度外，只是作为权威的仲裁人主持了四方的签字仪式，并且毫无疑义地拥有永久性主权军事基地，我们不能不为大英帝

国的狡诈惊叹。但惊叹之余，也不能不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而悲哀，正是由于他们冲突的鲜血，染红了各大国在塞浦路斯利益的花环。保证塞浦路斯独立的协定签署了，它是否就意味着塞浦路斯从此告别了流血与冲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能否和睦相处、共同管理好自己的国家，真正走上自主、自信、自由发展的道路，还需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互信、互让，共同做出更大的努力。

四、艰难的独立历程

马卡里奥斯面临的挑战

《苏黎世—伦敦协定》是大国在塞浦路斯分配利益和向马卡里奥斯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该协定签署后，马卡里奥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希腊族人内部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首先来自曾经是他的密切合作伙伴的"埃欧卡"军事领导人格里瓦斯。

1959年3月9日，格里瓦斯号召"埃欧卡"成员和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接受《苏黎世—伦敦协定》，并强调要用"和平、团结、博爱"取代"战争之歌"。随后他离开塞浦路斯回到了离别4年之久的雅典。在雅典机场，雅典大主教和希腊外长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希腊议会授予他"民族骄子"的最高荣誉，希腊国王保罗授予他英雄勋章和乔治一世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将军。但不久，格里瓦斯开始指责马卡里奥斯"背叛"了"意诺西斯"和希腊族人的民族事业，向英国和土耳其做出了太多让步。尽管马卡里奥斯、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希腊首相卡拉曼利斯和外交大臣阿维罗斯均发表声明，否认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但格里瓦斯的指责越来

越强烈。7 月 20 日，格里瓦斯称他“将尽其所能准备斗争”，“坚定地为塞浦路斯的解放而战斗”。

为了应对格里瓦斯的挑战，马卡里奥斯在一次万人群众集会上，号召“人们不要理会某些政治家的煽动，他只是企图利用我们的斗争谋取个人私利，并在塞浦路斯人民中制造纠纷”。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也向格里瓦斯发出警告，对马卡里奥斯表示支持。9 月 15 日，马卡里奥斯第一次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格里瓦斯。10 月 6～9 日，两人在罗得岛会面，马卡里奥斯劝导格里瓦斯应以大局为重，指出他的言行只能对土耳其有利，但格里瓦斯充耳不闻，继续发表颇具挑衅性的言论。

格里瓦斯公开反对马卡里奥斯，拒绝接受《苏黎世—伦敦协定》的言行，在塞浦路斯也拥有一批支持者，其中包括基里尼亚主教基普里亚诺斯。基普里亚诺斯四处发表演说，谴责甚至要求拒绝接受《苏黎世—伦敦协定》，号召希腊族民众继续争取“意诺西斯”，支持格里瓦斯的行动。另外，在 1959 年 5 月，塞浦路斯出现了一个叫“塞浦路斯意诺西斯阵线”（简称 K.E.M）的地下组织，散发传单指责马卡里奥斯和希腊政府，并宣布所有反对“意诺西斯”和狄格尼斯者为“叛徒”。

与此同时，《苏黎世—伦敦协定》签订后，随着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即将建立，按条约规定，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开始进行选举新国家总统和副总统的准备工作。前“埃欧卡”成员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其中右翼分子组成了“民主联合战斗者阵线”（简称 EDMA），支持马卡里奥斯接受协定，后来马卡里奥斯将其改组成自己的竞选政党“爱国者阵线”（简称 PF）。而“埃欧卡”中的左翼分子则成立了“民主联合青年组织”（简称 EDON），与“民主联合战斗者

阵线"针锋相对。

后来，塞浦路斯著名人士约翰·克莱里季斯和以尼科西亚市长德尔维斯为首的塞浦路斯六大城市市长，组成了民主同盟联合会（简称 D.U），并推选克莱里季斯作为候选人与马卡里奥斯竞争总统。另外，1959 年 12 月 4 日，总督福特取消了自 1955 年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活动合法化，公开支持民主同盟联合会的候选人克莱里季斯。实际上，这一时期希腊族人政治斗争的特点就是支持马卡里奥斯及其签署的协定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

1959 年 12 月 13 日，希腊族人进行总统选举，90.53%的选民投了票，马卡里奥斯以144,501对 71,753 票的绝对优势当选塞浦路斯共和国首任总统。但据分析家认为，马卡里奥斯的支持者中，有 66.82%的人并不赞同《苏黎世—伦敦协定》，而是认为不论塞浦路斯形势如何发展，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都是他们的最佳领导人。所以，尽管马卡里奥斯顺利当选总统，但希腊族内部反对协定的势力仍然存在，而且不时激化并导致与土耳其族人关系紧张，这也是 1963 年马卡里奥斯修宪的重要原因之一。

"狄尼兹号"偷运武器事件

《苏黎世—伦敦协定》签署之后，希腊族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和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分别发表讲话，要求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团结合作建设新国家。1959 年 12 月，他们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后，再次强调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长期形成的民族对立情绪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化解，需要时间和双方的共同努力来弥合。而且协定又将本来是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现在划分为政治经济利益不同的两个实体，无形中制造了新的

更广泛的矛盾和纠纷。另外，希腊族人中反对马卡里奥斯和协定的强大势力，也使土耳其族人忧心忡忡。

从1959年8月27日至9月28日，不明身份的枪手相继杀害了3名土耳其族人和一名希腊族人，协定签署后所迎来的和平氛围日渐消失。

10月18日，塞浦路斯巡逻艇在塞浦路斯东北部水域查获了一艘土耳其人的摩托艇"狄尼兹号"（该艇的注册地是土耳其的伊兹密尔），3位土耳其籍船员被抓获，但他们在被捕之前已将载运的武器扔进了水里。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法院以非法偷运武器罪对3人提出指控（后来查明3人确实偷运武器，但总督为了淡化其不利影响，将3人逐出塞浦路斯而了事）。21日，马卡里奥斯认为，"狄尼兹号"偷运武器事件表明，土耳其族人缺乏诚意和善意，使希腊族人深感不安。马卡里奥斯还责令正在与希腊族人共同制定共和国宪法的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停止宪法的制定工作，要求严肃查处偷运武器事件。对此，库楚克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族人不能为"某些不负责任的人"的行为负责，号召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和平相处。另一位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指责马卡里奥斯中断了制宪工作，同时还认为马卡里奥斯对希腊族持枪极端分子视而不见，而在该事件上小题大做。土耳其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土耳其从不鼓励向塞浦路斯偷运武器，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安卡拉电台称"狄尼兹号"是土耳其渔民的"捕海豚船"。

"狄尼兹号"偷运武器事件表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间的和平相处是如此的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相互指责甚至新的冲突的开端。1960年4月1日，在"埃欧卡"成立五周年纪念会上，马卡里奥斯高度评价了其功绩，称"'埃欧卡'解放斗争的光辉历程

是民族自由的基石……在《苏黎世—伦敦协定》的框架下，不可能实现我们的希望和目标”。马卡里奥斯的讲话，立刻引起了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的强烈反应，库楚克告诫土耳其族人要提高警惕，防止希腊族人把《苏黎世—伦敦协定》当成“一场新的战争的桥头堡”。所以不难看出，不论希腊族人还是土耳其族人，从普通民众到最高领导人，并没有从内心真正消除相互猜疑，两族再次发生冲突的因素仍然存在。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诞生

尽管马卡里奥斯遇到来自希腊族人内部的前所未有的指责，和对他所签署的《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反对，也尽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仍然相互猜疑、指责甚至时有零星冲突，但是，马卡里奥斯和库楚克仍然继续合作，依照《苏黎世—伦敦协定》的要求，为建立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按照《苏黎世—伦敦协定》要求，自 1959 年 2 月 19 日该协定签订之日起的 18 个月内，实现塞浦路斯的完全独立。1959 年 3 月 27 日，马卡里奥斯与库楚克就临时政府的部长之职达成协议。内政、司法、财政、通讯、工商业、劳动社会服务部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由希腊族人担任，国防、农业、健康部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由土耳其族人担任，马卡里奥斯兼任外交部长。上述各部部长及副部长与马卡里奥斯、库楚克和总督福特共同组成了 14 人的临时过渡委员会。

宪法的制定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9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一次制宪会议，1960 年 2 月 11 日在洛桑完成了宪法草案，4 月 6 日在尼科西亚宣布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完成。该

宪法体现了《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即将诞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法律基础。

宪法包括199条和6个附件，完全是对《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具体化。根据宪法，1960年7月30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举行了众议院的议会选举，尽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弃权率高达36%和26%，但还是顺利地选出了各族的议员。在分配给希腊族人的35个席位中，马卡里奥斯领导的“爱国者阵线”获得了30个席位，劳动人民进步党获得了5个席位。在土耳其族人的议会选举中，库楚克领导的民族阵线党（NEP）包揽了分配给土耳其族的全部15个席位。至此共和国建立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惟独与英国关于设立主权军事基地条约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

根据《苏黎世—伦敦协定》，英国继续享有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的主权，但所占面积应由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英国最初要求440平方公里，而马卡里奥斯只同意给93平方公里，为此英国强令推迟建国日期，经过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为277平方公里，占塞浦路斯总面积的3%。

1960年7月1日，英国和塞浦路斯双方代表宣布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8月16日，英国向塞浦路斯共和国移交政权。同一天，马卡里奥斯宣誓就任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库楚克任副总统。塞浦路斯共和国正式诞生了。8月24日，塞浦路斯成为联合国的第99个成员国，1961年2月16日加入英联邦，同年5月24日成为欧洲委员会的第16个成员国。塞浦路斯终于摆脱了英帝国78年的殖民统治，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

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了，但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塞浦路斯民族，即“国族”尚未形成，还需要两个主体民族——希腊族和

土耳其族的共同努力，加强两族之间的交往，增强互信，只有当“塞浦路斯人”出现之时，塞浦路斯才能真正走上和平、团结、繁荣和发展之路。

第七章　共和国权力分配之争

一、共和国宪法危机

建立单独市政之争

塞浦路斯共和国建立后，总统马卡里奥斯和副总统库楚克继续配合，领导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新国家的事业之中。但是，两族之间长期形成的矛盾一时难以化解，随着共和国宪法的实施，由于相互猜疑，缺乏互信，极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当对宪法的某些条款产生不满，或对某些条款出现不同解释时，两族之间的矛盾便急剧加深。

在安排政府各级公务人员的过程中，根据共和国宪法第 123 条规定，“公务人员的 70%应为希腊族人，30%应为土耳其族人”，“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应适用于公务人员系统的一切职级”。但希腊族人认为，土耳其族人所占比例太大，而且根据土耳其族人所受教育程度，当时也不可能提供如此比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职人员，同时也会造成更多的希腊族人失业，因此要求按两族实际人口比例进行分配。据 1960 年统计，全岛人口为 571，225 人，土耳其族人占 17.4%，希腊族人占 77.4%，其他少数民族占 5.2%。土耳

其族坚持依据宪法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而且对希腊族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报复。1961 年春，在众议院审议税收法时，由于土耳其族议员的坚决反对，共和国税收法没有得到通过，致使马卡里奥斯总统不得不使用总统令进行征税，马卡里奥斯的这一措施在宪法中没有规定，因此 1965 年最高宪法法院裁决其不符合宪法。此外，在组建共和国军队问题上，两族意见相左。按宪法第 129 条规定："共和国应有一支由 2,000 人组成的军队，其中 60% 为希腊族人，40% 为土耳其族人。"总统马卡里奥斯主张依此比例组建一支统一的共和国军队，但是副总统库楚克坚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按此比例分别组建军队。马卡里奥斯气愤之下宣布不建立军队。两族分歧不断扩大。但是，真正引起新生共和国宪法危机的核心问题，还是关于是否建立单独市政机构之争。

按照共和国宪法第 173 条规定："在本共和国 5 个主要城市，即尼科西亚、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拉纳卡和佩福斯，应由当地的土耳其族居民建立单独的市政机构。"其实，早在 1958 年英国统治时期，土耳其族人曾以希腊族人把市政议会当成宣传"意诺西斯"的"政治温床"和忽视土耳其族居民为由，退出了统一的市政机构，建立起了单独的土耳其族人市政府。1959 年，英国殖民政府承认了土耳其族人市政府的既成事实，通过了《1959 年土耳其族人市政法暂行草案》，赋予了土耳其族市政府对其本民族事务的管理权。希腊族人曾多次向殖民当局提出抗议，但无果而终。1959 年签订的保证塞浦路斯独立的《苏黎世—伦敦协定》规定，为了保护土耳其族人的利益，应在 5 个主要城镇单独设立土耳其族人市政机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在制定共和国宪法时，对该问题产生过激烈争论。由于协定规定自协定签订之日起的 18 个月内实

现塞浦路斯独立，时间紧迫，希腊族方面做出了让步，协定对该问题的规定也就成了宪法的基本条款。现在，随着宪法的具体实施，该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争执、最具爆炸性的导火索。

总统马卡里奥斯认为，在5大主要城市设立单独的土耳其族人市政机构，将出现管理功能重叠的两个市政机构，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损害两族的利益，也可能使中央政府的政令难于畅通实施。因此坚持建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统一的市政机构，并提出了在统一的市政府领导下，确保土耳其族人利益和权利的三项具体措施。但是，副总统库楚克认为马卡里奥斯的建议“不现实”，要求严格执行宪法。另外，宪法中只要求“应由当地土耳其族居民建立单独的市政府”，但没有规定是建立只是处理土耳其族居民事务的市政机构，还是要建立具有明确地域辖区界线的土耳其族人市政府。因为在许多城市，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杂居，很难明确划分族界。但是，土耳其族人认为是要建立有明确族界的市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在共和国内拥有与希腊族人平等的权利。

关于是否建立单独市政机构之争使两族关系逐渐恶化。希腊族人指责土耳其族人坚持建立单独市政机构的目的，是向他们的长期目标——实现塞浦路斯分治迈出的第一步，而土耳其族人则指责希腊族领导人破坏共和国宪法，企图逐渐剥夺宪法所赋予土耳其族人的合法权益，将塞浦路斯引向“意诺西斯”。

由于两族意见不一，土耳其族无法按宪法要求建立单独市政机构。1962年12月27日，众议院中的土耳其族议员提交议案，要求将现行的《1959年土耳其族人市政法暂行草案》延长至1963年

底，在此期间双方寻求解决方案，但土耳其族的提案遭到希腊族议员的拒绝。12 月 29 日，总统马卡里奥斯宣布，从 1962 年 12 月 31 日凌晨起，现行的殖民统治时期的城市法终止执行，共和国内的所有市政机构不复存在，其行政职能由即时成立的共和国地方政府接管。同一天，为了应对马卡里奥斯的总统令，“维护土耳其族市政秩序，不给共和国政府插手的机会”，土耳其族民族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从 12 月 31 日凌晨起，现行的土耳其族人市政机构就是土耳其族人根据宪法建立的合法市政府。土耳其族人市长也纷纷发表声明，宣布土耳其族人市政府将继续行使其职能，视一切“不符合共和国宪法条款的规定为非法”而不予执行。

两族相互指责不断升级，两族领导人已不可能坐下来直接讨论解决分歧。1963 年 4 月，两族分别向共和国最高宪法法院提出申诉。塞浦路斯最高宪法法院由 1 名希腊族人、1 名土耳其族人和 1 名中立法官组成，中立法官由非英、土、希、塞浦路斯四国国民担任，中立法官任院长。最高宪法法院有权对共和国正、副总统、众议院、各民族院提交的争讼进行裁决。1963 年 4 月 25 日，最高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宣布双方的“立法”均属越权，马卡里奥斯总统规定在城市实行的“农村管理和发展法”无效，土耳其族人民族院通过的城市自治法也无效。但是，早在最高宪法法院做出裁决之前，马卡里奥斯就公开表示，在单独建立土耳其族人市政机构方面，他决不服从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两族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内部协商解决的范围，动摇了宪法的基础，对保证共和国独立的《苏黎世—伦敦协定》提出了挑战。

英国高级专员支持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

由于建立单独市政之争以及其他问题导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关系急剧恶化，造成塞浦路斯直到1963年还未能制定出诸如税收法等迫切急需的各种法规，中央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以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为首的中央政府中的希腊族领导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土耳其利用《保证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干涉塞浦路斯内政，以及土耳其族领导人利用宪法中某些“不切实际”的条款，阻挠中央政府正常运行的结果。希腊族人希望建立一个多数民族统治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不受外部势力干涉的、真正独立、自由、统一的共和国，因此便产生了从根本上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修改共和国宪法的思想。

要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必须征得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个保证国的同意。希腊族领导人认为，希腊政府的工作好做，即使希腊政府反对，那也是由于担心会引起土耳其政府的强烈反应。最大的障碍是土耳其，而土耳其的工作只能依靠英国劝说和施压。所以，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1963年5月，共和国外交部长希腊族人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访问英国，向英国官员表达了塞浦路斯所面临的困难，而解决困难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希腊和土耳其退出《保证条约》。基普里亚努认为，既然塞浦路斯已成为英联邦成员，其独立和安全应该完全由英国保证。随后，基普里亚努与英国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阿瑟·克拉克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英国高级专员对塞浦路斯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这些现实困难，应该找到解决的办法。

英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使马卡里奥斯信心倍增。同时，1963 年 6 月希腊的卡拉曼利斯政府辞职，希腊政局不稳，也使马卡里奥斯有机可乘，再次把希腊拖入塞浦路斯争端之中。希腊族领导人认为，即使因塞浦路斯问题爆发了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届时作为保证国的英国也必然会介入干涉，最终彻底废除捆绑希腊族人手脚的《苏黎世—伦敦协定》，摆脱土耳其的束缚，塞浦路斯与英国单方面签订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的条约。所以，从 1963 年 8 月开始，希腊族领导人不断公开发表废除《保证条约》、修改宪法的言论，招致了土耳其族人和土耳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和谴责。尤其是希腊族人外长基普里亚努有意蔑视土耳其，声称"我们不准备与外国势力讨论塞浦路斯内政"。马卡里奥斯在接受伦敦记者采访时态度更加强硬地说："如果土耳其不同意谈判修改宪法中的某些条款，我甚至决定采取单方面行动修改宪法。"9 月 18 日，马卡里奥斯宪法修改的草案已经出现在希腊族人报端。他再次对雅典记者说："我们认为修改宪法是内政，某些所谓保证国无权干涉，土耳其的干涉和使用武力将构成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侵略，联合国将会干涉。"

希腊族领导人颇具挑衅性的言论使希、土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此时英国高级专员克拉克对英国政府的报告称："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主权军事基地的安全，完全取决于与塞浦路斯的合作，现在看来，即使不危及至军事基地的存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可能将破坏我们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西方联盟的团结；如果塞浦路斯问题再度提交联合国，我们将因在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上继续拥有主权军事基地，而受到许多联合国成员国的强烈指责，甚至可能丧失主权军事基地

……因此,我们惟一明智之举:那就是接受修改宪法,才能够避免更大的麻烦;阻止希腊族人单方面行动和废除条约;鼓励他们对宪法中那些引起纠纷的条款提出修改的充分理由(我们觉得他们的建议是相当公平和慷慨的);劝说土耳其政府同意对宪法作必要的修改;在1964年促成一次各方会谈,最好在1965年塞浦路斯大选之前。"克拉克对塞浦路斯局势的分析和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建议表明,英国高级专员认为,英国必须支持希腊族领导人修改宪法,只有这样才符合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利益。英国政府基本采纳了克拉克的建议。英国政府的立场对马卡里奥斯铤而走险,单方面修改宪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英国政府为何支持希腊族人修改宪法?我们可以从英国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的工作目标中得到说明。塞浦路斯独立后,英国政府取消了殖民时期的总督,改派高级专员处理英国与这个新的英联邦成员国的一切事务,其主要目标是:维护业已达成而且以相关条约为基础的已经生效的《苏黎世—伦敦协定》;保持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友好关系,避免塞浦路斯对英国继续拥有阿克罗蒂里和德克利亚军事基地的主权产生质疑;维护协定中所规定的英国军队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境内的某些设施享有自由使用权。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英国高级专员认为必须保持与塞浦路斯政府的友好关系,而塞浦路斯政府中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不和,英国一反过去殖民统治时期,支持土耳其族人制约希腊族人的做法,保持与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在塞浦路斯政府中处主导地位的希腊族的密切关系,作为维护英国在塞浦路斯利益的主导思想。另外,希腊族一再声称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之后,塞浦路斯将与英国单方面重新签订保证条约,也对英国颇具诱惑力,成为英国支持

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改宪法的动因。

马卡里奥斯的“十三点修正案”

在英国驻塞浦路斯高级专员的支持下，马卡里奥斯的修宪工作一切准备就绪。1963 年 9 月 18 日，希腊族人报纸上已经出现了马卡里奥斯修改宪法的基本框架。10 月 31 日，英国高级专员告诉马卡里奥斯，英国政府将尽力影响土耳其政府认真考虑他的修宪建议，并认为马卡里奥斯的宪法修改草案不是脱离了《苏黎世—伦敦协定》，而是具体实施宪法三年来对存在的问题的补充和发展，它将有利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使“复杂的宪法”能够便于实施，“它是伟大的政治家的举动”。1963 年 11 月 30 日，马卡里奥斯正式提出了他的修改共和国宪法的“十三点修正案”。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废除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的否决权。

2. 共和国总统暂时不在或不能行使职责时由副总统代理行使总统职权。

3. 众议院希腊族人议长和土耳其族人副议长由众议院统一选举，不再按以前分别由希腊族、土耳其族议员的绝对多数选举产生。

4. 当众议院议长暂时不在或不能行使其职责时由副议长代理行使议长职权。

5. 废除宪法中关于众议院分别以希腊族或土耳其族议员的绝对多数通过法律的条款。

6. 废除宪法中关于在五个主要城市单独建立市政机构的条款，相应的条款应该是：

1)上述五个城市的市政议员应按这些城市中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的比例分别选举产生。

2)上述五个城市的财政预算中扣除公共服务开支后,应根据这些城市中土耳其族居民的人口比例,留出相应比例的平衡资金,其用途根据土耳其族市政议员的要求而定。

7. 统一司法权。

8. 取消对保安部队中警察和宪兵的区分。

9. 共和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员额由法律决定,而不能由总统和副总统决定。

10.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构成共和国公务人员的比例和军队组成比例,由原来的7:3和3:2改为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口的实际比例计算。

11. 公共服务部门的数量由原来的10个减为5至7个。

12. 公共服务职能部门的决议以简单多数通过。

13. 取消民族院,建立新的行政体系。但是,如果土耳其族人要求保留土耳其族民族院,应当允许保留。

显而易见,马卡里奥斯的"十三点修正案"很有针对性,旨在把实施宪法过程中,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产生争执的涉及建军、税收、公务人员比例和单独市政机构等问题的宪法条款进行修改。马卡里奥斯在公布该修正案的同一天,也将其送到副总统库楚克手中。库楚克讥讽地称:"'意诺西斯'比它都好。"库楚克对采访他的记者言辞非常坚定地说,"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不容改变"。

12月7日,土耳其外长发表讲话,对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改宪法感到十分震惊,认为马卡里奥斯修改宪法,意味着废除了国际条约对土耳其族人所提供的保护,"把土耳其族人降为任凭希腊族

人摆布的单纯少数民族的地位”，宣布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十三点修正案”，并于16日向马卡里奥斯递交了正式拒绝函。马卡里奥斯也拒不接受土耳其政府的拒绝函，认为他是将该修正案送给共和国副总统请求回复，并没有送给任何外国政府征询意见。12月20日，在英国政府的协调下，英国、希腊、土耳其三国外长在巴黎商讨塞浦路斯局势。希腊、土耳其两国建议，首先应由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直接商谈，而且土耳其政府还坚持，两族之间的谈判必须在宪法范围内进行。

在此期间，马卡里奥斯派外长基普里亚努前往西欧寻求支持，并试图实施该修正案。基普里亚努指责库楚克是“土耳其政府的工具”，强调塞浦路斯问题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与希腊合并，另一种就是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退出相关条约，塞浦路斯作为英联邦成员单独与英国签订条约，并认为后一种方案更切实可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相互指责不断升级，塞浦路斯自《苏黎世—伦敦协定》签署以来，两族和平相处的局面正面临严峻考验。

“赫姆斯街事件”土耳其族退出联合政府

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相互猜疑，实施宪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使之不断积聚，两族领导人偏激言论使积怨急剧膨胀，终于在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宪的强烈刺激下，1963年12月21日发生了“赫姆斯街事件”，两族冲突再起。

此日清晨，一支希腊族武装警察巡逻队在尼科西亚的赫姆斯街（现在的两族分治界线），拦住一批土耳其族人要求检查，结果双方发生争执并开枪射击，冲突造成土耳其族人2死1伤和希腊族人1伤的严重事件，冲突像瘟疫一样很快向全市蔓延。马卡里奥

斯和库楚克联合发出停止冲突的呼吁，但是冲突仍在继续。第二天，在尼科西亚北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杂居的阿莫尔菲塔和特拉乔拉斯地区，两族发生了激烈战斗。在佩福斯警察局，马卡里奥斯和库楚克与两族部长们会晤后再次联合发出和平呼吁，但冲突者对他们的呼吁已经充耳不闻。当天下午，土耳其族警察撤离岗位，与土耳其族人一道，在土耳其族人居住的各街区入口处设置路障，进行驻守，共和国各级政府中的土耳其族公务人员也全部撤出（希腊族人称之为“退出”，而土耳其族人认为是被希腊族人“驱逐”）。与此同时，散居于希腊族人中的土耳其族人纷纷逃往土耳其族人聚集区。这一切都预示着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新一轮冲突的全面展开。

赫姆斯街事件引发的两族冲突，与1959年《苏黎世—伦敦协定》签订之前的两族冲突相比有显著不同。首先，其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的冲突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希腊族人狭隘的“意诺西斯”民族主义，在英国人的挑唆下引起土耳其族人的强烈反对而发生的冲突。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过程中，英国军队一直竭力清剿希腊族人武装“埃欧卡”，实际上是希腊族人与英国人和土耳其族人双方之间的冲突，其中土耳其族人有被英国殖民者所利用的一面。而此次冲突是在塞浦路斯实现独立后发生的，其深层原因是大国强加给塞浦路斯人的《苏黎世—伦敦协定》，以及以此为基础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宪只是导火索而已。

其次，冲突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前次冲突因希腊族人为实现“意诺西斯”，而土耳其族人坚决反对，甚至宁愿维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也不能让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当然，土耳其族人也提出

了分治或与土耳其合并的要求。但此次冲突双方可谓是有备而来，希腊族人希望通过修改宪法和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排除外国势力尤其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干涉，实现由多数民族——希腊族人统治的、土耳其族人单纯作为少数民族而得到特殊政策保护的、真正独立的共和国。对于人口不及希腊族人 1/4 的土耳其族人而言，他们是在坚决捍卫协定和宪法所赋予的与希腊族人平等的权利，当他们的这些权利因希腊族人单方面修宪而受到侵害时，他们发誓“土耳其族人决不能成为少数民族，也不容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他们要在塞浦路斯的某些地区形成相对多数民族，为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实现分治或联邦制打下基础。所以，当新一轮冲突发生后，散居于希腊族人中的土耳其族人，或出于安全或由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压力，舍弃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搬进土耳其族人居住区，增强土耳其族人的整体势力。这一现象在 1959 年以前的冲突中未曾有过。

最后，冲突的范围不同。以前的两族冲突主要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中的极端势力，如希腊族人的“埃欧卡”，土耳其族人的“土耳其族人抵抗组织”等组织，这些组织主要以孤立的爆炸或枪击事件警告土耳其族人不要阻碍“意诺西斯”，或表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不能生活在一起”，冲突所涉及的范围小。而此次冲突几乎涉及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所有居民，双方攻击的对象是普通民众，在冲突中伴随着大量人口迁移。实际上，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较大范围的冲突。但是，尽管两次冲突有多么大的不同，其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有英国、希腊、土耳其三个大国的参与，这也是产生冲突的核心因素。而在此次修改共和国宪法中，英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各方调解与维和

英希土三国维和

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新一轮冲突爆发后,美、英两国极为担忧,要求希腊和土耳其分别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施加压力,尽快制止冲突。1963 年圣诞之夜,英、希、土三个保证国经过紧急磋商后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立即停止战斗,并提出由三国驻塞浦路斯分遣队组成维和部队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马卡里奥斯和库楚克的一致同意。在前 4 天的冲突中,由于希、土两国分遣队的部分介入,严重伤亡有所增加。实际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已经发展成为两族相互争夺地盘的战争。12 月 27 日,三国维和部队成立,由英国的杨格将军统一指挥。

英、希、土三国的维和行动最初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立了隔离冲突的中立区,基本上沿着 1959 年以前防止"埃欧卡"与土耳其族人冲突的梅森—狄克逊线。杨格将军用绿色粉笔画了一条临时隔离线,以制止尼科西亚市内的冲突,这条线后来一直称之为"绿线",至今仍是两族的分界线。

在三国维和部队中,由于希、土两国分遣队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关系密切,不可能真正中立地进行维和,所以,维和的任务实际上完全由英国军队承担,而且冲突双方根本无视英国军队的存在,激烈战斗有增无减。土耳其政府要求马卡里奥斯立即停止这种"灭绝种族的屠杀",否则土耳其将根据《保证条约》和《联盟条约》

去干，但无论如何英国决不会与自己的重要盟友土耳其开战”。马卡里奥斯终于屈服了，仅隔3个小时，他再次向各国领导人致电：“在我今天致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文中，我宣布我们已经决定废除《保证条约》和《联盟条约》，这可能会造成我们已经废除这些条约的印象，我希望对此澄清。它只是传递一个我们寻求通过适当方式终止这些条约的愿望。”

但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冲突再次升级，到1963年底，除双方的大量伤亡之外，有103个村庄的近3万土耳其族人被迫离开家园，两族杂居的阿莫尔菲塔此时已空无一人。英国指挥的三国维和部队，已经没有能力阻止两族愈演愈烈的冲突。

伦敦会议

英国主导的英、希、土三国维和行动日显疲态，英国担心局势失控。1963年12月26日，英国提议召开有关各方参加的伦敦会议，并经过外交努力，确定英、希、土三国外长和希腊族及土耳其族代表在伦敦讨论塞浦路斯局势。

英国从主导三国维和到倡导伦敦会议，其主要目的有三。首先，塞浦路斯局势的不断恶化可能使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冲突演变成希、土两国的战争。如果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不仅影响西方盟国的内部团结，削弱北约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势力的抵御能力，而且最后闹到联合国，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各国和亚非不结盟国家，必将矛头指向英国，指责英国过去对塞浦路斯进行殖民统治，现在仍然在塞浦路斯拥有主权军事基地，是塞浦路斯冲突的真正根源，这样可能迫使英国放弃其军事基地，这是英国绝对不愿看到的结果。其次，尽管美、英之间在与苏联阵营对抗方面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但也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英国对美国不断排挤其在中东的势力深感不满，美国已表示希望由北约部队接替在塞浦路斯军事基地的英军，实际企图是由美国控制塞浦路斯军事基地，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所以，英国在主导三国维和不利的情况下，又建议召开伦敦会议，其目的就是确保英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绝对发言权。再次，苏联势力积极向塞浦路斯渗透，也促使英国尽快恢复塞浦路斯和平。自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发生冲突后，苏联不断指责美、英和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内政，明确支持马卡里奥斯。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向土耳其政府发出警告，反对土耳其政府干涉塞浦路斯事务。同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积极支持希腊族领导人，并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援助。英、美担心如果塞浦路斯局势进一步恶化，塞浦路斯很可能成为“地中海的古巴”。

尽管希腊族领导人接受参加 1 月 15 日召开的伦敦会议，但仍希望该问题在联合国解决。参加伦敦会议者除预先商定的英、希、土三国外长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外，马卡里奥斯还派希腊族人外长基普里亚努，以塞浦路斯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基普里亚努在伦敦机场对记者说，他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并不乐观，认为希腊族人惟一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是废除条约，建立由多数民族主导的国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伦敦会议召开的同一天，苏联与亚非团结委员会在尼科西亚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指责“某些北约国家干涉塞浦路斯内政”。伦敦会议的内外氛围预示其结果不容乐观。

在伦敦会议上，基普里亚努和克莱里季斯坚决要求废除条约和修改宪法，而土耳其族代表登克塔什则认为，三年来的事实证

明，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不能生活在一起，要求在联邦制政府的基础上划分族界，两族分治。由于双方观点相去甚远，会议于2月10日以失败告终。

其实，正如登克塔什所言，在伦敦会议之前，鉴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流血冲突不断，新仇旧恨加深，有些英国官员也产生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确实不能和睦相处的想法，外交官弗朗西斯·瓦莱特就曾向宪法专家H.G.达尔文咨询，在塞浦路斯实行联邦制的可行性。达尔文建议通过人口交换，形成两族之间的明确边界，然后建立联邦制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各自的国家，并提出土耳其族人国家的首都设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基里尼亚。但英国政府担心该方案会激起希腊族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不但在会议上未提及，而且当土耳其族代表提出分治时，英国也没有给予支持。自塞浦路斯独立后，英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保持与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的密切合作关系，以确保在塞浦路斯的根本利益。

英美"桑迪斯—鲍尔方案"

伦敦会议失败后，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冲突更加频繁和激烈，土耳其族人逃离希腊族人聚集区的人数剧增，占塞浦路斯总人口17.4%的土耳其族人，逐渐聚集到仅占塞浦路斯领土2%的地域，基本处于希腊族人的包围之中。而且希腊族人对土耳其族人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土耳其族人的基本生活用品严重匮乏。

面对这种局面，土耳其政府表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人民负责，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安全"。而希腊政府对土耳其干涉塞浦

路斯内政的威胁做出了强烈反应，希、土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达到极限。对此美国非常焦虑，担心一旦希、土两国爆发战争，将成为苏联向塞浦路斯全面渗透的绝佳时机，英国的军事基地很可能将不复存在，北约的东南翼也将遭到沉重打击，塞浦路斯可能成为“地中海的古巴”。在此背景下，一直在幕后督促英、希、土三国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美国，终于走上前台，直接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伦敦会议失败后，英国终于屈尊请求美国向塞浦路斯派遣军队，作为北约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参与塞浦路斯的维和行动。1964年1月28日，美国总统约翰逊任命北约欧洲部队司令莱曼·L.莱姆尼策为总统特使参与斡旋。莱姆尼策先后访问了雅典和安卡拉，警告两国政府他们之间爆发战争的严重后果，并让土耳其政府保证在英、美方案实施之前不得单方面采取行动。1月31日，英、美制订出了塞浦路斯维和方案，后来通称“桑迪斯—鲍尔方案”。该方案建议美国向塞浦路斯派遣1,200人的分遣队，并提供1万名北约多国维和士兵所需的后勤设施和装备；维和时间3个月，在这期间，由联合国协调员制订出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的方案。

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英、美提出的维和方案。2月4日，马卡里奥斯也原则上表示接受，但他坚持多国维和部队必须在联合国的领导下，这实际上是对英、美方案的婉转拒绝。因为马卡里奥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一贯坚持塞浦路斯问题应在北约组织内解决，其目的就是要将塞浦路斯北约化，把塞浦路斯作为北约的军事基地，使希、土两国军队和北约长期占领塞浦路斯，最终形成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既成事实。就在同一天，尼科西亚学生在美国驻塞浦路斯使馆前示威，指责“桑迪斯—鲍尔方案”是北约的

干涉方案。而与此相反，这些示威者还来到苏联使馆前，苏联驻塞浦路斯大使在阳台上微笑致意。当晚，美国大使馆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英、美方案受挫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鲍尔先后访问了英国、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又提出了对前一方案的修改意见，希、土两国表示接受，但马卡里奥斯寸步不让。2 月 7 日，苏联担心实施英、美方案可能导致塞浦路斯北约化，赫鲁晓夫向英、希、土、法和美国政府就北约维和建议提出抗议，称该方案是“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又一次十字军入侵计划”。

在马卡里奥斯毫不妥协的抵制下，英美企图以北约部队在塞浦路斯维和的方案彻底破产了。塞浦路斯局势继续恶化，在南部城市利马索尔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土耳其政府对马卡里奥斯彻底丧失了信心，对由英国领导的维和部队制止冲突的能力也不存幻想，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倾向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不断与英、希、土三国密切磋商的同时，派第六舰队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海域游弋，防止土耳其的单方面行动可能导致希、土两国战争。

在此期间，希腊族领导人与苏联高层接触频繁，苏联的军用物资不断通过埃及运往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反美亲苏情绪不断增强。2 月中旬，英国政府终于无可奈何地决定同意塞浦路斯政府(实际上是希腊族人)将塞浦路斯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英国的决定也得到了美国的赞同。英、美两国认为，在联合国，即使有苏联等国的帮助，塞浦路斯也不可能获得足以废除《保证条约》和《联盟条约》的支持，为了避免希、土两国发生战争，让联合国主导维和行动也不失为上策。

联合国派驻维和部队

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爆发后，联合国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963年12月28日，应塞浦路斯政府要求，安理会讨论了塞浦路斯局势，并通过决议要求英国制订解决方案。1964年1月13日，同样是在塞浦路斯政府的要求下，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派代表调查塞浦路斯问题。1月17日又任命印度人古亚尼考察英、希、土三个保证国的维和效果，而且派特使参加了由英国主持的伦敦会议，听取各方意见。2月下旬，塞浦路斯政府正式请求安理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安理会经过征询英、希、土三国和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意见后，于3月4日通过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安理会第186号决议。

安理会186号决议号召所有成员国，"制止可能使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任何行动或威胁"，要求塞浦路斯政府"承担起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职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塞浦路斯的暴力和流血冲突"，同时呼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及其领导人，"最大程度地保持克制"。186号决议还建议成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该建议得到了塞浦路斯政府的支持。3月6日，古亚尼将军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总司令。维和部队由来自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瑞典、爱尔兰、英国的6,238名维和武装部队和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新西兰、瑞典的173名维和警察部队组成。由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日益激烈，3月26日芬兰分遣队率先赶赴塞浦路斯，开始了联合国规定的为期三个月的维和行动。由于塞浦路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致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行动一再延长，至今还在继续

维和，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普拉萨给联合国的调解报告

在联合国维和的同时，安理会 186 号决议还建议派遣调解人员，寻求政治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的途径。3 月 12 日，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危地马拉人罗尔兹·贝内特为塞浦路斯冲突调解员，因土耳其政府的反对，3 月 25 日又重新任命芬兰驻瑞典前大使萨木里·杜米奥雅为调解员。1964 年 9 月，杜米奥雅突然病故后由加洛·拉索·普拉萨接任。杜米奥雅和普拉萨前后用了一年时间调研和听取各方意见。1965 年 3 月 26 日，普拉萨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调解报告。

普拉萨的调解报告共分五大部分，其中第四部分详细叙述了自 1963 年 12 月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以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现状和他们的根本目标。报告认为希腊族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共和国政府的各个机关，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事实上的承认，希腊族人企图通过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对土耳其族人的经济封锁，迫使土耳其族人屈服；希腊族人不接受 1959 年《苏黎世—伦敦协定》作为塞浦路斯政府建构的基本框架；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建立有军事组织，表明双方严重不信任，这对政治解决该问题产生了不利影响，希腊族人的军事组织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装备上都远远胜过土耳其族人；希腊族人在经济条件上也好于土耳其族人，希腊族人直接接受国际社会对塞浦路斯的所有经济援助；"意诺西斯"虽然受到希腊族领导人的鼓励，但正在丧失其吸引力，这与塞浦路斯独立后经济条件大为改善有重要关系；冲突使希腊族人内部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军事派别，其中有些反对马卡里奥斯对"希腊化事

业”的折衷政策，称其为“古罗马的执政官”，而马卡里奥斯对“意诺西斯”的真实态度尚不明确。报告指出土耳其族人完全处于若干孤立的区域，土耳其族人认为这是为了安全和防卫，而希腊族人则指责其目的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显示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根本不能和睦相处，为实现分治制造条件；孤立无援的土耳其族人完全依赖于土耳其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因而土耳其族领导人也就完全听命于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族人准备通过两族直接谈判恢复1960年宪法，同时要求把两族从地域上分开；土耳其族人紧密团结，库楚克是他们无可争辩的领导人。普拉萨的报告并非完全真实，但他根据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现状和各自目标以及各方意见，进而向联合国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1)排除“意诺西斯”。(2)实现塞浦路斯非军事化，限制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英国的军事基地问题待以后考虑。(3)排除分治。(4)联邦制应被排除，因为没有建立两个联邦制国家的边界基础。(5)不应恢复1963年前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因为土耳其族人不可能也不应希望得到1960年协定中所赋予他们的权利。(6)土耳其族人的权利应该得到特别保护，对于那些希望迁往土耳其的土耳其族人，应得到支持和补偿。(7)土耳其族人应享有自治权。(8)联合国应对塞浦路斯达成的任何协议负有保证的责任。(9)塞浦路斯人应对任何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完全赞成，要么完全反对，不能够部分接受或者部分拒绝，因为这样可能使一个复杂的方案失去平衡。

普拉萨在给联合国的报告中，虽然否定了“意诺西斯”、分治和联邦制的解决方案，但他主张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统一，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因而该报告得到了塞浦路斯

希腊族人和希腊政府的肯定，但他把土耳其族人当作少数民族对待，也就决定了该报告被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和土耳其政府拒绝的命运，表明联合国此次对塞浦路斯问题调解的失败。

约翰逊书谏

安理会第186号决议并没有给塞浦路斯带来所期望的和平。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在基里尼亚附近的两个村庄发生战斗，造成土耳其族人2死2伤。冲突随即波及阿莫尔菲塔、尼科西亚、基里尼亚等地，土耳其族人有较大伤亡。1964年3月12日，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向联合国对希腊族人提出指控。13日，土耳其政府向马卡里奥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土耳其族人的屠杀行动；释放所有被扣押的土耳其族人质，归还被害土耳其族人遗体；恢复土耳其族人行动、交通和通讯的自由，否则土耳其政府将采取“单方面行动”。希腊政府对土耳其的威胁做出了强烈反应，声称希腊将参加保卫塞浦路斯的战斗。4月，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与马卡里奥斯会晤后决定，为防止土耳其人侵塞浦路斯，希腊向塞浦路斯派遣大约2万名希腊官兵。希腊的这一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希、土两国都有军事调动迹象。为了防止一触即发的希、土两国战争，美国第六舰队驶往东部地中海，在希、土两国海域游弋。根据有关报道，当时苏联潜艇也在该水域活动。事态的发展促使安理会又通过了第187号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执行第186号决议，避免采取可能使塞浦路斯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任何行动。

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使美国极为忧虑，国务卿鲍尔再次访问希、土两国，并邀请两国总理访美。6月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致信土耳其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信中指出：(1)土耳其的军事干

涉不明智且充满危险。(2)干涉的结果将导致塞浦路斯分治，这与《保证条约》背道而驰。(3)干涉行动将违反许多国际承诺，其中包括采取任何行动前与美国磋商的承诺和与其他两个保证国磋商的承诺；破坏北约的稳定，造成苏联介入的危险；与联合国致力于塞浦路斯和平的努力相抵触。(4)“我严肃地告诉你，美国决不允许利用美国提供给土耳其的武器装备，在当前形势下干涉塞浦路斯。”约翰逊总统甚至警告土耳其政府，如果土耳其采取单方面行动，当苏联进攻土耳其时就不会得到北约的帮助。随后，虽然希、土两国总理先后访问了美国，缓和了希、土两国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但是，这封约翰逊书“谏”，成为美、土两国自 1947 年以来“蜜月期”终结的分水岭，美、土关系开始转向冷淡，土耳其国内出现反美浪潮。

美国的“艾奇逊方案”

虽然约翰逊书谏制止了土耳其可能采取的单方面军事行动，但是，塞浦路斯问题不解决，希、土两国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缓和，东部地中海地区局势就不可能真正稳定。为了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1964 年 6 月 20 日，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前往塞浦路斯，与联合国调解员杜米奥雅、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共同商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后，艾奇逊提出了解决冲突的“艾奇逊方案”。该方案建议：(1)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作为对土耳其的补偿，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拥有一个为期 50 年的军事基地，其大小相当于塞浦路斯领土的 1/5；同时希腊将其位于爱琴海的小岛卡斯特洛里佐岛让与土耳其。(2)在塞浦路斯划分两个行政区，两族分别设立平行的政府机构。(3)希、土两国在塞浦路斯建

立联合军队司令部。(4)对所有希望迁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给予补偿。

"艾奇逊方案"出笼后,土耳其看到该方案实际上是分治的变种,愿意接受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但核心问题是土耳其族人行政区的大小。出于同样的理由,该方案遭到希腊族人和希腊政府的断然拒绝。希腊族领导人坚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而不是"意诺西斯",而且坚持只有联合国才能在塞浦路斯维和并作为塞浦路斯独立、完整的保证者。

1964年6月,原"埃欧卡"的创建者和总指挥格里瓦斯返回塞浦路斯,对希腊族人的各种武装组织进行整合,预示着新一轮更大规模冲突的开始。8月6日,希腊族武装人员企图攻占位于塞浦路斯西北部蒂利里亚区的土耳其族人控制区科基纳。科基纳是土耳其族控制的主要出海口,占领了科基纳,既可以切断土耳其族人从海上获得土耳其的军事装备和战略物资,也可以防止土耳其军队登陆。因此,双方发生了自冲突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土耳其政府要求希腊族人停止攻击,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7日,土耳其战斗机轰炸了该地区的希腊族人阵地,最后在安理会第193号决议的要求下才实现停火。土耳其认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不能保护土耳其族人的安全,轰炸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希腊政府宣称,如果土耳其不立即停止其军事行动,希腊政府将"不会袖手旁观"。

希、土两国已处于战争边缘。苏联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大加指责,声称要帮助塞浦路斯抵御外国入侵。苏联向塞浦路斯的渗透,使美国极为忧虑。8月20日,艾奇逊与英国磋商后,对他早先提出的"艾奇逊方案"进行了修改,建议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然

后北约在塞浦路斯设立军事基地，土耳其任该军事基地北约军队的司令，若干年后把该军事基地租给土耳其。修改后的“艾奇逊方案”同样遭到希腊族人和希腊政府的拒绝。希腊族人寄希望于联合国的调解，标志着“艾奇逊方案”的流产。但 1967 年上台的希腊军政府接受“艾奇逊方案”，希望以此为基础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希腊军政府的立场遭到了马卡里奥斯的坚决反对，并导致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关系恶化。

三、1968 ~ 1974 年的两族和谈

“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村事件”

尽管联合国的调解失败了，美国的“艾奇逊方案”“流产”了，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也尚未缓和塞浦路斯紧张局势，但在此期间，塞浦路斯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

自本次冲突土耳其族人退出共和国政府后，塞浦路斯政府实际上完全由希腊族人控制，尤其当马卡里奥斯宣布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后，曾一度产生了塞浦路斯是否还存在合法政府的质疑。土耳其族人和土耳其政府认为，在塞浦路斯只存在分别代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利益的机构。但是，英国为了其自身利益，而联合国的调解也必须由塞浦路斯政府提出请求，为了尽快结束冲突，联合国也就事实上承认了马卡里奥斯政府的合法性。马卡里奥斯根据其“十三点修正案”建立了行政和立法机构；1964 年建立了警察和宪法部队；通过了征兵法，征召 1 万名希腊族人建立起了国民警卫队；组成了完全由希腊族人构成的最高法院；通过了曾引起希

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的城市自治法;1965年设立教育部以取代希腊族民族院,原来的希腊族人司法机构也转为共和国法院;而且为土耳其族人制定了一部《少数民族权利法》。马卡里奥斯已真正建立起了一个由多数民族统治的塞浦路斯政府。

随着土耳其族人逐渐从两族散居地撤出,两族之间出现了掘壕固守的界线。土耳其族人在尼科西亚与基里尼亚之间的最大聚集区成立了临时管理机构,建立了独立的公共服务体系、警察部队和电台。由于希腊族人对土耳其族人实行经济封锁,库楚克领导的土耳其族人临时管理机构,完全依赖于土耳其政府每年1,000多万英镑的援助。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各自为政的状况,为各方调解,结束冲突增添了诸多障碍。

尽管马卡里奥斯和希腊帕潘德里欧政府拒绝接受"艾奇逊方案",但以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为首的部分高层领导人,主张以修改后的"艾奇逊方案"为基础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首相和国王的矛盾导致帕潘德里欧辞职,在希腊出现了军人独裁政府。希腊军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向马卡里奥斯施加压力,企图接受"艾奇逊方案",实现"意诺西斯",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希腊军政府宣称,"希腊与土耳其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在这一基本利益面前,所有分歧都是次要的"。1967年9月,希、土两国首脑两度会晤达成如下共识:塞浦路斯必须纳入西方盟国防御体系,保护土耳其大陆的安全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利益,遏制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的威胁。两国首脑还讨论了"艾奇逊方案"。但是,希、土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没有给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带来和解,相反,两族继续加紧掘壕固塞,扩大各自的控制区,从而导致"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村事件"。

对“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村事件”，希、土双方各执一词，说法不一。科菲努村是一个土耳其族人聚集区，位于尼科西亚与利马索尔主干公路的中间地带，科菲努村以南约5公里处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散居的圣锡奥多罗斯村，再往南便是土耳其族人的莫里村。在1967年7月以前，圣锡奥多罗斯村从未发生过两族冲突，希腊族警察一直在该村巡逻。7月该村发生了枪击事件，希腊族警察暂停巡逻。9月秩序恢复后，进入该村巡逻的希腊族警察遭到了土耳其族武装人员的阻挠，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斡旋下，两族开始了长时间的谈判。11月14日，在谈判尚未达成一致时，希腊族警察擅自进入该村巡逻，也未遇到土耳其族人的阻拦。次日，当“埃欧卡”前军事总指挥格里瓦斯带领希腊族巡逻队再次进入该村时，遭到了土耳其族武装人员的射击，双方发生战斗，增援的国民警卫队很快占领了该村，战火蔓延到了科菲努村。11月16日，在联合国的及时调解下双方同意停火。此次冲突，造成了22名土耳其族人和1名希腊族人死亡的严重事件。

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村事件，看起来与4年来两族之间的无数次冲突并无特别之处，但它给复杂的塞浦路斯局势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和多方面的。首先，它是在希腊军政府支持下，格里瓦斯亲自率领的主要由希腊族人组成的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针对土耳其族人的一系列事件中最突出的一起。希腊军政府希望通过格里瓦斯的军事行动尽快解决土耳其族人问题，为实现“意诺西斯”扫清道路。但是，该事件却使已有所缓和的希、土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致使土耳其做出强烈反应。11月17日凌晨，土耳其政府向希腊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召回格里瓦斯；撤回自1964年派驻塞浦路斯的所有希腊军队；对被杀的土耳其族人及其财产

进行赔偿;解除包括国民警卫队在内的所有希腊族人武装;取消对土耳其族人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号召国民献血,做出武装干涉的架势。希腊也开始清理防空设施,两国军队沿塔夫罗斯河形成对峙。11 月 24 日,土耳其总统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警告,土耳其准备"一次性而且彻底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在土耳其决定对塞浦路斯进行武装干涉,并因此可能导致希、土两国战争的关键时刻,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北约秘书长和美国总统特使共同促使希、土两国谈判,并于 26 日达成了协议。尽管一场战争避免了,但土耳其政府从此确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惟一可接受方案,就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联邦制。

其次,希腊族领导人与希腊军政府的分歧加大。马卡里奥斯坚决拒绝接受除联合国以外的任何组织提出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方案,主张塞浦路斯的未来,是既不受土耳其制约也不受希腊影响的独立国家,而不是"意诺西斯"。

再次,圣锡奥多罗斯—科非努村事件终于使希腊族领导人认识到,土耳其族人是应该受到保护并拥有合法权益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共和国的"反叛者"。希腊族人思想认识上的这一变化,开启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自冲突以来直接谈判的大门。

最后,圣锡奥多罗斯—科非努村事件,是 1974 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发动军事政变,并因此而导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序幕。

两族和谈的背景

"圣锡奥多罗斯—科非努事件"后,岛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希腊族方面而言,土耳其迫使希腊政府召回了格里瓦斯,撤

回了驻扎在塞浦路斯的1万多名希腊人国民警卫队战士。这一举动虽然解除了希腊军人对马卡里奥斯的直接制衡,但也大大地削弱了希腊族人的整体实力,尤其是抵御土耳其可能入侵的能力。其次,希腊族人内部出现了政治多元化,成立了许多政党,其中包括克莱里季斯建立的统一党,虽然这种变化并没有影响马卡里奥斯的政治地位,1968年1月他仍以95.45%的绝对优势再次当选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但是新的政治环境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途径。与此同时,希腊族人中还出现了一个较激进的组织——"民族阵线"。该组织极力主张"意诺西斯",凡阻挠实现其目标的任何人,包括马卡里奥斯在内都将是其袭击对象。再次,马卡里奥斯等希腊族领导人对土耳其族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耳其族人不再是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反叛者",而是受到土耳其政府强有力支持的拥有军事力量的政治军事实体,必须承认和正视它的存在。最后,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恶化。

就土耳其族人而言,自两族冲突以来,希腊族人对土耳其族人实行的经济封锁,致使土耳其族人地区的经济衰微,尽管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援助,但其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联合国1966年12月报告,土耳其族人中大约有1/3需要某种程度的救济。所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内部因素的变化,是促使两族走向直接谈判、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内因。

两族和谈也符合外部各方的需要。塞浦路斯问题严重影响着希、土两国的内政和外交,致使两国多任首相被迫辞职和政府倒台,使希、土两国濒临战争边缘,甚至使土耳其结束了自1947年以来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关系,双方关系趋于冷淡乃至恶化。所以,

希、土两国都希望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恢复国内政治稳定和发展与盟国的合作关系。

两族直接和谈也符合美国的需要,既可避免希、土两国可能发生的战争,也避免了在北约或西方联盟内解决该问题遭到苏联的强烈指责和反对,同时也避免在联合国解决该问题导致苏联介入。同样,它也符合苏联反对北约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要求。另外,英国也清楚地看到两族直接对话解决纷争,既避免了某些国家对英国的不断指责,使英国推脱其责任,还可以保证其主权军事基地不会受到挑战。在符合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及有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努力下,塞浦路斯局势趋于稳定。同时,在联合国的积极斡旋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终于走上了和谈之路。

两族和谈的经过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和联合国的斡旋下,1968 年 6 月 3 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和谈预备会议。6 月 24 日,在尼科西亚开始了自 1963 年 12 月冲突以来两族直接对话的第一轮谈判。希腊族谈判代表是克莱里季斯,土耳其族谈判代表是登克塔什,另外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福尔。两族代表都很重视这次谈判,会谈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提出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并在谈判程序上达成共识:首先解决宪法问题,然后再过渡到对相关条约问题的谈判。但是,双方谈判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到关于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问题上,即土耳其族人要求在独立的共和国中央政府下,土耳其族人拥有自治的地方政府。希腊族代表拒绝接受,谈判陷入僵局,并于 1968 年 8 月 28 日结

束。

尽管本轮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两族代表均承认共和国宪法存在着问题，并同意对此进行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双方能够达成这一共识本身，就是此轮谈判取得的巨大成就。因为在此之前，土耳其族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一直坚持认为，《苏黎世—伦敦协定》和以此为基础的 1960 年共和国宪法不容谈判。另外，双方在会谈结束时同意以后继续谈判，也是双方对会谈持积极态度的具体体现。在双方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本轮谈判双方对宪法的框架和基础交换了意见，我们可以说，对此议题双方有许多一致的观点，另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也不存在困难，但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需要耐心谈判……为了使双方有时间对业已交换的观点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和进一步审视，暂停谈判是必要的。"可见本轮谈判是在相互理解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在第二轮谈判中，土耳其族代表提出如果双方能在土耳其族人地方政府自治问题上达成协议，土耳其族将做出一系列让步，其中包括：放弃土耳其族人副总统的否决权；将土耳其族人在政府、众议院代表、公共服务系统和警察部队中的比例，由原来的 30% 减少为土耳其族人的实际人口比例（大约 20%）；取消众议院议长、副议长分别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族社议会的绝对多数选举产生的要求；接受希腊族方面提出的以众议院简单多数为基础的建议。土耳其人做出的这些让步，实际上就是接受了 1963 年马卡里奥斯"十三点修正案"的多数条款。土耳其族代表登克塔什认为，如果宪法中能够明确规定地方自治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土耳其族方面将做出上述让步。但马卡里奥斯反对土耳其族人从宪法上得到这些权力，只承认土耳其族人在宗教、教育、文化和个人身份等

方面享有自治权。实际上，马卡里奥斯把土耳其族人仍然仅仅作为少数民族看待。对此土耳其族人深感失望，认为希腊族人“不愿提供和谈的基础”。双方在本轮会谈结束时的联合声明中称，双方就司法、警察、立法、地方政府和行政问题交换了看法，“我们相信，只要继续保持当前的平静气氛，在耐心、理解和善意之下，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公正、可行的方案”，但是本轮会谈以未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

在第三轮会谈开始后，土耳其族代表对地方政府的功能与权力问题更明确地限定为：地方政府必须以土耳其族人聚集的村庄为基础，不考虑这些村庄在地理上的联系；两族有各自的中央政府职权；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应该在宪法中得到确认，而不能以立法机构的代表权取而代之。实际上土耳其族方面又做出了某些让步，不再要求与希腊族人划界而治，但希腊族方面拒绝了土耳其族代表的上述三个要求。两族对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问题分歧太大，都不愿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做出让步。最后，登克塔什取消了对地方政府功能与权力的上述要求，同时也收回了在其他方面所做出的让步。登克塔什不无遗憾地对克莱里季斯说：“似乎对我来说，不要提出地方政府的形式，而直接寻求可能解决宪法问题的方案也许更有用……当然，你知道，我所提出的以地方政府形式保护土耳其族人的权利，是土耳其族人至今所能寻找到的令人满意的、惟一可接受的方案，虽然我承认《苏黎世—伦敦协定》所赋予土耳其族人的某些权利应该被删除，但是，我明确告诉你，如果你方能够接受地方政府自治原则，可以被删除的东西比你方所接受的还要多。”登克塔什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希腊族能在宪法中确保土耳其族的自治权，土耳其族人愿意放弃《苏黎世—伦敦协定》所赋予

土耳其族人更多的权利。

1970年9月21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在尼科西亚展开了第四轮谈判。由于在地方政府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互不妥协，近一年的谈判毫无进展，整个谈判面临彻底失败。1972年7月4日，希腊、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参加了两族的谈判。尽管希、土两国施压和联合国斡旋，也未能使两族达成任何协议；持续了6年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和平谈判于1974年7月彻底宣告失败，再次丧失了和平解决两族纷争，实现塞浦路斯和平的机会。

两族和谈失败的原因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长达6年的直接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最后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既有岛内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就岛内因素而言，首先是缺乏互信。英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后，土耳其族人丧失了作为统治民族的特权，成为与曾经被自己统治的希腊族人一样的被统治者。而希腊族人公开要求与希腊合并，并通过“埃欧卡”的武装斗争推进“意诺西斯”，土耳其族人感到其安全受到威胁。因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土耳其族代表提出的地方自治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问题成为谈判的结症，双方互不相让。土耳其族人要求把地方自治政府的权力和功能明确写入宪法，这样才能保护土耳其族人的权利，因为土耳其族人一直怀疑希腊族人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与希腊合并。马卡里奥斯等希腊族领导人的言论，更使土耳其族人的疑虑不断加深。

土耳其族人希望通过谈判实现三个基本目标：增加土耳其族人控制区；增加土耳其族人自治的权力，或要求在共和国中央政府

之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各自拥有地方自治政府；扩大希腊和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事务的参与权。此三方面与 1963 年市政机构之争同出一辙，正是希腊族人所坚决反对的。希腊族认为这是土耳其族人为最终实现塞浦路斯分治迈出的第一步。土耳其族领导人的某些言论，也使希腊族人的疑虑有增无减。1963 年 4 月，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在对土耳其族童子军讲话时说："我们的旗帜是 8 万勇士用鲜血染成的。"他发誓："土耳其族人决不能成为少数民族，也不能让塞浦路斯并入希腊。"两族领导人诸如此类的言论，无不鼓动本族的狭隘民族意识和对对方的仇恨情绪，加深了两族之间的矛盾。一方越是坚持的立场，另一方就越是反对，彼此对对方立场的动机也就更加怀疑，深陷互相猜疑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次，双方没有抓住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积极因素，争取达成协议。从谈判一开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就达成首先解决宪法问题然后再过渡到条约问题的共识，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因为自 1963 年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改宪法废除相关条约后，土耳其族和土耳其政府一直认为是希腊族违反了宪法，坚持共和国宪法不容谈判，必须严格实施宪法。但在此次谈判中土耳其族代表坦率地承认，1960 年宪法规定土耳其族人占公共服务系统人员的 30% 和设立单独市政，"抽走了土耳其族私营企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才之士，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土方愿将公务人员比例降为实际人口比例"。这一点正是两族在 1963 年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土耳其族代表能坦率承认，可见土耳其族是本着诚意和善意，希望在此次谈判中真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从此两族能和睦相处、共建国家。

在第二轮谈判中，土耳其族代表要求在两族冲突期间，无论是

自愿还是被迫撤离的土耳其族人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庄，但希腊族方面没有给予积极回应，丧失了一次两族全面和解的契机。土耳其族领导人希望逃往土耳其族聚集区的散居土耳其人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庄，表明土耳其族领导人并没有完全认定土耳其族人与希腊族人就不能生活在一起，说明土耳其族人愿意与希腊族人和睦相处。但是希腊族人的态度的确让土耳其族人感到失望，为和谈蒙上了阴影。

最后，塞浦路斯问题本来就是外部势力干涉的结果，这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谈判的失败，也与外部势力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就土耳其而言，因塞浦路斯问题导致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冷淡，土耳其希望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恢复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土耳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彻底分治，这样既可保护土耳其族人的安全，同时也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有利，但是分治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经历过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反对，不易实现。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认为，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内实行土耳其族自治，也不失为良策。所以土耳其政府坚决支持土耳其族领导人在谈判中所持立场，即把土耳其族地方自治政府的权利和功能写入宪法，在这一立场上决不让步。土耳其族人实行地方自治，应该说比较符合塞浦路斯的社会现实，是一条较为客观的解决两族矛盾的途径。但这一解决途径既遭到了希腊族人的反对，也没有得到希腊军政府的支持。当时的希腊军政府，更倾向于接受曾被希腊文官政府拒绝的美国“艾奇逊方案”，希望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然后给土耳其一定补偿，而且为了实现此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导致与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关系恶化。此外，美国仍热衷于推销其“艾奇逊方案”，没有

认识到土耳其族实行自治的现实可行性。而苏联乐于看到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继续冲突,导致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爆发战争,造成北约东南翼崩溃,以便浑水摸鱼,有机可乘。这些外部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两族谈判起到了消极影响。

四、对外政策与经济建设

亲西方的不结盟政策

塞浦路斯是在《苏黎世—伦敦协定》和英、希、土三国的保证下建立的共和国,它不仅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确定了塞浦路斯这个新诞生国家的政体、国体及未来走向,尤其是对外政策。

《苏黎世—伦敦协定》是在北约和西方盟国的框架内达成的,而英、希、土三个保证国均属北约成员,在塞浦路斯均有重要利益和影响力。英国拥有两个主权军事基地,而且塞浦路斯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占塞浦路斯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与希腊和土耳其同宗同源,分别称之为"祖国"。希、土两国也依据协定在塞浦路斯有驻军,而且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司令及各级军官均由希腊军人担任。所以,独立之初塞浦路斯的对外政策,较大程度地受英、希、土三国的影响,特别是希腊的影响。独立伊始,塞浦路斯总统兼外交部长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率先访问了美国、希腊和土耳其,寻求美国对塞浦路斯国家安全的支持和经济援助。美国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三处监听站,并使用英国军事基地,1960~1962 年向塞浦路斯提供了 1,700 万美元的援助,主张促进

声明，谴责外国势力对塞浦路斯的干涉，并多次向联合国提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议案。实际上，塞浦路斯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与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印度所持立场基本相似。在冷战期间，印度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左右逢源，但更倾向于苏联，最终在1973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前与苏联缔结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友好条约，然后在苏联的支持下成功地肢解了宿敌巴基斯坦。对于蕞尔小国塞浦路斯而言，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要得到西方盟国对塞浦路斯国家安全的保证，而且希望获得苏联的支持，向土耳其施加压力，防止其进行武装干涉分治塞浦路斯，同时希望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对塞浦路斯在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从建国之初到1974年土耳其入侵前，塞浦路斯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立足西方，亲近苏联，倡导不结盟。

摆脱依附型经济

由于岛国的特点和长期遭受外国统治，尤其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塞浦路斯形成了严重的依附型经济结构，其特征是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主要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换取外汇，用以进口日用工业品。

塞浦路斯是一个农业国，全国绝大多数人口是靠天吃饭的农民，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0%，但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却相当低，农业长期受浇灌不足和耕地分割太小而不利于机械化生产所困扰。工业只有简单的食品、饮料、服饰加工、采掘和传统手工业，规模小，雇佣的工人少，没有形成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工业企业。

塞浦路斯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在塞浦路斯经济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的出口尤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矿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曾给塞浦路斯带来大量投资和丰厚利润，但是矿产品属不再生资源，只能是不断减少。正如英国殖民当局的财政处长向殖民政府的报告所言："塞浦路斯经济以及当地人民享受的生活水平，现在是依靠矿业资源和无形输出。问题就在这种依靠的程度。前者是逐渐减少的资产，而后者在船运旅游服务局完成计划以后，一定也要减少。今后的问题在于开展新的财源，以便人口虽然增加，而现有生活标准仍然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塞浦路斯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英国进口了塞浦路斯全部出口的一半，塞浦路斯进口的1/3又来自英国。同时作为塞浦路斯经济支柱的矿产业，却被美国人通过美国塞浦路斯矿业公司所控制，美国森林石油公司取得了在塞浦路斯的石油开采特权和油矿租让权，这样一来，国家的经济命脉被美国人控制了。此外，在塞浦路斯有125家外国公司控制了保险业、贸易和银行业，对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有严重影响。塞浦路斯经济对英美等国家有较大程度的依赖性。其二是外国军队在岛上的消费开支成了塞浦路斯的间接"外援"，而这一外援性的外汇收入高达国民收入的15%。这一状况是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以色列的建立以及英国在埃及军事基地丧失后，英国军队被迫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驻军大量增加所致。

独立后的塞浦路斯政府尽管面临诸多政治问题，还是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奇特的依附型经济结构。制定了加大农业生产和促进工业化运动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

1966年)完成后,实现经济年平均增长率5.7%,超过5.5%的计划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年)实行后,经济有较快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7.4%。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年)因土耳其入侵而陷入停顿。在实施五年计划期间,塞浦路斯政府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是"要求农村土地自动合并,然后进行合理的重新分配",以适应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同时由于塞浦路斯没有常年不干的河流,相对缺水,而农业又离不开水,塞浦路斯政府通过国家投资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兴修水利,增加浇灌面积。从1960年到1974年,共修筑拦水坝和蓄水坝20座,浇灌面积从1960年的25,800公顷增加到37,600公顷,大大改善了水源不足的状况。

此外,塞浦路斯政府科学地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收割起止日期,确定农产品的基本售价,鼓励农民增产增收。政府还责成塞浦路斯国立农业研究院和各地研究站,进行改进耕作方法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挖掘农业潜力。在继续加大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同时,增加畜牧业和渔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猪在岛上几乎灭绝,独立后,塞浦路斯政府鼓励养猪,从1963年到1970年,塞浦路斯养猪头数增加了3倍。1970年,畜牧业约占塞浦路斯农业总产值的35%。

塞浦路斯政府在加大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促进工业化运动,确立工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经济范围内有选择地鼓励工业发展。例如政府参与了在兰尼卡的综合炼油厂的建设,以带动整个经济向前发展。此外,政府还有效地利用关税政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凡遇到某种工业,从质量和价格的角度看,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即给予一定的保护"。对一个新成立的企

业，除投资补助外，在经营的前三年享受免税。另外塞浦路斯政府还鼓励国民“购买国货”，为发展民族工业创造条件。

尽管受到1963年底开始的两族冲突的不利影响，经过实施两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塞浦路斯的经济结构有较大调整，基本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依附型经济结构，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第八章　1974年至80年代的塞浦路斯

一、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

马卡里奥斯的"意诺西斯"立场

自1950年马卡里奥斯担任大主教后，领导希腊族人展开了全面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运动。但是，随着"意诺西斯"运动的深入发展，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关系不断恶化，土耳其的介入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就在1958年10月英国宣布实施可能导致塞浦路斯分治的"麦克米伦方案"之际，马卡里奥斯毅然决定选择塞浦路斯独立，既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和解创造了条件。但许多观察家认为，马卡里奥斯选择独立只是实现其最终目标——"意诺西斯"的一个跳板。对此说法，我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塞浦路斯实现了独立，许多希腊族民众尚未从"意诺西斯"的思维定势中转变过来，某些激进组织仍然在为"意诺西斯"摇旗呐喊，其中包括原"埃欧卡"军事领导人格里瓦斯。在这种民情和政治背景下，马卡里奥斯的言论也不时迎合民众，倾向"意诺西斯"。1962年9

月 4 日，马卡里奥斯对其家乡帕纳伊亚村的乡亲们说："除非这一小撮土耳其族人被驱逐到土耳其，否则'埃欧卡'英雄们的任务就永远不能算完成。"1964 年 10 月 17 日，马卡里奥斯与来访的希腊国防部长会晤时说："希腊已经包容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希腊的一部分，我坚信，争取与祖国希腊合并的泛希腊化斗争即将取得成功，这一成功将是希腊辉煌新纪元的开端。"甚至在 1970 年 8 月 19 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期间，马卡里奥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我从未食言，我从未偏离过我的目标，我渴望'意诺西斯'，并为实现该目标而忠贞不渝。"但是，在马卡里奥斯鼓吹"意诺西斯"的同时，他的实际行动却体现了维护塞浦路斯独立自主的另一面。

1959 年，在共和国希腊族人族社议会选举中，马卡里奥斯领导的"大主教党"与劳动人民进步党合作，劳动人民进步党在议会中获得了 5 个席位。该党的前身是塞浦路斯共产党组织，该组织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一贯主张塞浦路斯独立。马卡里奥斯奉行的中立、不结盟和积极发展与苏联、埃及等国的关系，据认为都与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影响有关。塞浦路斯的共产主义势力曾一度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担忧。1962 年马卡里奥斯访问华盛顿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曾特别要求马卡里奥斯遏制塞浦路斯的共产主义势力。同时，据分析家认为，马卡里奥斯之所以支持劳动人民进步党，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得劳动人民进步党在选举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力量，制衡希腊族人内部的"意诺西斯"势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 1963 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爆发冲突以来，马卡里奥斯一直坚持拒绝北约和西方盟国的调解，要求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充分体现了马卡里奥斯维护塞浦路斯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意愿。

而且马卡里奥斯为了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不惜与一贯被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认为是祖国的希腊政府发生争执。

此外，马卡里奥斯也适时地抓住了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民情和经济状况好转的有利时机。尽管塞浦路斯独立后受到两族冲突的不利影响，但在1962~1966年塞浦路斯政府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当然，塞浦路斯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英国等国家的援助，以及从1964年3月开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塞浦路斯的消费。希腊族人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祖国”希腊政局一直不稳，尤其是1968年以后军人独裁统治形成了明显反差。希腊族人对他们的民族愿望——“意诺西斯”产生了动摇，更愿意继续保持塞浦路斯独立。所以，当希腊国民警卫队被迫撤离塞浦路斯后，马卡里奥斯似乎显得更加自信。1968年1月12日，他首次公开宣布，他的政策是“寻求灵活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意诺西斯’”，而且适逢1968年2月塞浦路斯第二届总统选举之前。其后马卡里奥斯以95.45%的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总统，而他的竞争对手——反对共产主义、倡导“意诺西斯”的“民主民族党”（简称DEK）领导人塔基斯·埃乌德卡斯（Takis Evdo Kas）的得票率仅为3.71%，充分反映了马卡里奥斯在希腊族民众中的绝对权威和希腊族人对“意诺西斯”态度的变化。

实际上，从马卡里奥斯的“十三点修正案”到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以及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出，其目的就是要把塞浦路斯转变成既不受土耳其制约，也不受希腊操纵，而由塞浦路斯多数民族——希腊族人领导的，真正独立、自由、统一的共和国；土耳其族人不是政治上平等的伙伴，而是其权利受到保护的少数民族。在1968年至1974年两族和谈中，希腊族坚决拒绝土耳其

族人提出的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马卡里奥维护塞浦路斯独立和共和国中央政府权威的思想。当然，马卡里奥斯从思想深处背离“意诺西斯”，也导致他与希腊政府关系紧张。

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关系恶化

马卡里奥斯拒绝接受美国的修订后的“艾奇逊方案”，与希腊军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张。1968年8月13日，塞浦路斯政府希腊族人内政部长，涉嫌卷入刺杀希腊军政府首脑帕帕佐普罗洛斯的未遂事件，不久该部长神秘地被暗杀了，这一事件标志着希腊军政府与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彻底恶化。

1969年塞浦路斯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马卡里奥斯，以实现“意诺西斯”为目标的激进组织，如“民族阵线”、“阿克里塔斯组织”、“意诺西斯青年先锋队”、“佩福斯民族青年”、“民族拯救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受希腊军政府的支持，发起了一系列针对马卡里奥斯及其支持者的恐怖活动。1970年3月8日，激进组织袭击了马卡里奥斯乘坐的直升机，飞行员被打死，马卡里奥斯险遭毒手。3月23日，“民族阵线”竟然占领了利马索尔警察局，抢劫了枪支弹药。1971年9月，一贯坚持“意诺西斯”的前“埃欧卡”总指挥格里瓦斯，再次潜入塞浦路斯，整合“倒马”势力，并于次年成立了秘密军事组织——“埃欧卡—B”。

为了应对各种激进组织和“埃欧卡—B”不断升级的挑衅，同年马卡里奥斯组建了辅助警察部队，保护希腊族领导人的安全和公共设施。马卡里奥斯的行动招致希腊军政府的强烈不满。1973年2月11日，希腊军政府要求马卡里奥斯改组塞浦路斯政府，甚至要求把格里瓦斯吸收到政府中去。马卡里奥斯被迫做出妥协，

其坚定支持者、希腊族人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被迫辞职。6月，塞浦路斯政府改组，“埃欧卡—B”成员渗透到政府各部门。此时，希腊军政府已经填补了自“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事件”后，因被迫撤出1万多名国民警卫队战士在塞浦路斯影响力削弱所形成的空缺，各种激进武装组织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希腊军人手中。另外，根据《苏黎世—伦敦协定》在塞浦路斯长期驻有950名希腊分遣队士兵。这些由希腊军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武装组织，都成了反对马卡里奥斯、实现“意诺西斯”的有生力量。

1973年2月，马卡里奥斯第三次当选塞浦路斯政府总统，极端组织则加紧了“倒马”进程，策划了代号为“阿波罗”、“格罗索斯”、“阿佛洛狄特3”等一系列针对马卡里奥斯的暗杀活动，但马卡里奥斯一次次躲过劫难。1973年11月16日，布里格迪尔·约安尼季斯将军取代帕帕佐普洛斯成为希腊军政府首脑。早在1964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期间，约安尼季斯与尼科斯·桑普森共同指挥塞浦路斯的国民警卫队，二人曾向马卡里奥斯建议彻底解决土耳其族人，即对土耳其族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遭到马卡里奥斯的断然拒绝，并被马卡里奥斯斥之为“罪犯”。现在作为希腊军政府首脑的约安尼季斯，甚至认为格里瓦斯也过于“温和”。1974年1月27日，格里瓦斯死后，他任命了更加激进的希腊军官指挥国民警卫队，加速“倒马”进程，推进“意诺西斯”。1974年4月21日，“埃欧卡—B”的政治代言人——“争取意诺西斯合作委员会”控制的报纸(Ethniki)称：“我们决不允许叛国者危害民族利益的政策继续下去，这是希腊官员和我们国民警卫队的神圣使命，这一使命不容受到共产党和牧师的破坏。希腊已无法容忍尼科西亚叛国者的屈辱，对他们迷途知返已不抱幻想，在没有产生政治危害之前，必

须毫不迟疑地干掉马卡里奥斯。”

1974年4月25日，已经无处退让的马卡里奥斯终于决定取缔极端组织，宣布“埃欧卡—B”为非法，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7月2日，马卡里奥斯发表了致希腊共和国总统吉齐基斯将军的公开信。公开指责自1971年9月雅典军政府支持格里瓦斯潜入塞浦路斯成立“埃欧卡—B”以来，该组织在塞浦路斯制造了许多麻烦，“在倡导‘意诺西斯’的爱国旗帜下从事着罪恶的勾当”，“埃欧卡—B”已成为塞浦路斯的“政治杀手”，而它的人员和资助者正是由希腊官员控制的希腊族国民警卫队。马卡里奥斯要求将这些希腊官员全部撤出塞浦路斯。马卡里奥斯还写道：“总统先生，我歉意地说，罪恶之根很深，来自遥远的雅典，正是在那儿罪恶之树被培育生长、向外扩散。军政府的某些核心人物支持和指挥‘埃欧卡—B’这一恐怖组织的活动。……我常常感到，有一只从雅典伸出的无形之手正在企图把我掐死。”

7月7日，塞浦路斯的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载了马卡里奥斯的公开信，把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是希腊军政府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希腊军政府和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军官既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私下向马卡里奥斯施加压力，要求马卡里奥斯收回公开信。希腊军政府正在加紧制定和实施推翻马卡里奥斯的行动计划。

希腊军政府的“赫米斯”行动

马卡里奥斯致希腊总统的公开信，促使希腊军政府加快制定和实施推翻马卡里奥斯的“赫米斯”行动。1974年7月2日，也就是马卡里奥斯致希腊总统公开信的当天，在希腊军政府首脑波纳

诺斯(Mbonanos)的办公室里,波纳诺斯、约安尼季斯、戈尔基特西斯(Georgitisis)和帕潘达克斯(Papadakis)开会,最后确定了代号为"赫米斯"的军事政变计划。该计划由戈尔基特西斯和帕潘达克斯具体负责实施。为掩人耳目,转移塞浦路斯政府的注意力,7月12日,希腊军政府召回了希腊驻塞浦路斯政治代表。"赫米斯"行动开始实施。

1974年7月15日凌晨8时,坦克和枪炮声打破了首都尼科西亚的宁静。由控制希腊族人国民警卫队的希腊军官,希腊军政府派往塞浦路斯专门执行"赫米斯"行动的希腊特种部队,和希腊依据《苏黎世—伦敦协定》派驻塞浦路斯的希腊分遣队组成的政变部队,开始猛烈炮轰塞浦路斯总统府,完成政变的首要目标——炸死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当总统府在密集的炮火下轰然倒塌后,政变者确信马卡里奥斯已经葬身废墟之中。随后政变者很快占领了尼科西亚的各重要位置和电台等设施。政变者通过塞浦路斯广播电台发表公告:"国民警卫队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制止希腊族人的内讧,维护塞浦路斯的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告诫和安抚土耳其族人,"该事件完全是希腊族人内部之事"。政变者还威吓马卡里奥斯的支持者,"马卡里奥斯已死,国民警卫队已控制了塞浦路斯的整个局势,抵抗者将格杀勿论"。同日,桑普森被雅典军政府扶上了傀儡总统的宝座,桑普森立即成立了临时政府,还任命了各部部长。

希腊族人听到政变的消息后感到震惊和愤怒,自发组织进行抵抗,尤其当他们听到他们的总统马卡里奥斯仍然活着,并号召他们继续抵抗的声音后,在尼科西亚市东北部的大主教辖区卡马克利、利马索尔、佩福斯、索利(Solea)、马纳索萨(Marathasa)和莫尔富

等地，形成了抵抗政变者的中心。此次军事政变的第二步行动是镇压抵抗者。希腊族极端组织“埃欧卡—B”的成员和国民警卫队的部分官兵参加了镇压抵抗者的战斗。

实际上，在政变者炮轰总统府时，马卡里奥斯在总统卫队的保护下逃到了佩福斯。在佩福斯，马卡里奥斯通过一家私营的“自由塞浦路斯广播电台”，号召希腊族人继续抵抗政变者，捍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自由和民主。随后马卡里奥斯乘直升机逃到阿克罗蒂里的英国主权军事基地，由英国飞机送往马耳他，17 日到了伦敦。英国政府表示继续承认马卡里奥斯是塞浦路斯民选的合法总统。

1974 年 7 月 15 日的塞浦路斯政变，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塞浦路斯局势的高度关注。土耳其政府强烈谴责政变，宣称塞浦路斯现状不容改变。而希腊军政府坚决否认卷入此次政变。希、土两国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向塞浦路斯增派舰队。在 16 日召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苏、美展开了激烈交锋。苏联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确保塞浦路斯的独立和统一，而美、英则坚持塞浦路斯局势尚不明朗，认为“采取行动还为时过早”。安理会最终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而休会。

7 月 18 日，马卡里奥斯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政府称其为塞浦路斯正教会大主教，而不再是从前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在 19 日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美国竟企图让桑普森政变当局的代表与马卡里奥斯平等发言，遭到了多数成员国的反对。马卡里奥斯指责希腊军政府“无视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无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公开侵犯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军政府已将其独裁之手伸向了塞浦路斯……政变之后，臭名昭著的尼科斯·桑

普森被希腊军政府扶植为总统,而部长们则全部是'埃欧卡—B'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和领导人"。

美、英的极力阻挠致使联合国不能及时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令土耳其政府大失所望。希腊军政府策划的塞浦路斯政变正在朝美、英和希腊始料不及的方向发展,给塞浦路斯民众酿成了无穷的灾难。

二、土耳其的入侵与大国反应

土耳其的"和平行动"和"阿提拉"计划

土耳其对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策划的军事政变立即做出了反应。当日土耳其总统主持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土耳其政府认为,塞浦路斯现状不允许改变,不接受"任何既成事实"。土耳其军队已处于完全戒备状态,而且不断向土、希两国边界和距塞浦路斯仅 80 公里的土南部海岸基地增兵。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土耳其建议与英国共同根据英、希、土三国签订的《保证条约》进行干涉,但随后的土、英谈判未能达成共识。英国认为这是希腊族人的"内政",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愿军事介入。英国的考虑有二,一是政变尚未影响到英国的主权军事基地;二是英国介入干涉必然会遭到希腊和塞浦路斯政变当局的反对,反而可能会威胁到主权军事基地。但是,英国也坚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地位不容破坏,因为政变当局如果谋求与希腊合并,也会影响到英国军事基地的存在。所以,英国尽管口头上支持马卡里奥斯,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甚至对政变的指责也不那么强烈,在马卡里奥斯与政变者之间

都给自己留有退路,两面派手法暴露无遗。

美国从心底里希望政变成功,进而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从而彻底杜绝苏联向塞浦路斯的渗透,但前提是避免引起希、土两国战争,这等于是毫无代价地实现了美国的"艾奇逊方案"。但是在防止希、土两国爆发战争方面,美国已不可能像 1964 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时那样向土耳其大力施压,美国担心过分施压反而将其推向苏联的怀抱,如果失去了土耳其,等于折断了美国苦心经营的北约东南翼,为苏联打开了通往地中海的大门,弹丸之地的塞浦路斯也就失去了战略价值。

土耳其对英、美的想法心知肚明,这为其采取单方面行动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让土耳其感到时机成熟的还是土、苏关系的改善。1964 年两族冲突时土耳其声称要单方面采取行动,当时苏联支持希腊并对土耳其发出了军事威胁,而现在情况完全相反,苏联强烈谴责希腊军政府参与塞浦路斯政变,支持土耳其采取行动以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土、苏关系的改善始于约翰逊书谏,从此土、美关系从"蜜月"转向冷淡,而土、苏关系却不断改善和加强。

希腊支持的塞浦路斯政变为土耳其的武装干涉提供了口实,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土耳其政府认为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对于可能引发希、土两国战争方面,土耳其的军事实力近乎于希腊的 3 倍,土耳其的干涉可谓胜券在握。

土耳其要求希腊立即解除通过政变上台的桑普森的总统职务,从塞浦路斯撤出希腊官兵,希腊政府没有给予积极回应。1974 年 7 月 20 日凌晨,土耳其开始实施"和平行动"计划。土耳其军队分别在土耳其族人控制的塞浦路斯北部城市基里尼亚登陆,同时空降部队在尼科西亚与基里尼亚公路之间的土耳其族人控制区实

施空降，并出动飞机轰炸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的希腊族国民警卫队兵营，次日，进入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已达8千人。

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希腊立即宣布全国总动员，并向希、土两国边界增兵，同时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在安理会，这次轮到苏联采取拖延战术，给土耳其军队争取进军时间，会议最终通过了安理会第353号决议，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立即停止一切外国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干涉；呼吁英、希、土三个保证国立即进行谈判。22日，在英、美的斡旋和压力下，希、土两国接受联合国决议实施停火，此时土耳其军队已占领了塞浦路斯领土的20%。

在希、土双方宣布接受停火协议的第二天，希腊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希腊军政府被迫辞职，由流亡海外的前首相卡拉曼利斯回国组成了文官政府。同时，塞浦路斯政变当局总统桑普森也宣告下台，由塞浦路斯众议院议长希腊族人克莱里季斯接任代总统。25日，英、希、土三国外长在日内瓦开始了第一轮谈判，希、土双方达成了自停火之日起不得扩大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共识，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从停火线建立隔离区，双方交换了战俘和人质。但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间建立平等的自治政府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

8月8日，在联合国和美、英的斡旋下，希、土两国外长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克莱里季斯和登克塔什开始第二轮谈判。谈判自然是以希腊和希腊族代表为一方，土耳其和土耳其族代表为另一方进行。谈判的焦点仍然是建立两个平等的地方自治政府问题。与1968~1974年两族谈判截然不同的是，希方要求以实施1960年宪法为谈判的基础，而土方则认为该宪法被证明不可行要

求彻底废除。可见希、土双方谈判地位的逆转。

8月13日,土方提出建立联邦制的土耳其族人自治州的建议,希腊族代表克莱里季斯要求给予36小时对土方的建议进行研究。因为在希、土第二轮谈判开始后,马卡里奥斯在伦敦发表声明,宣称事先未经他同意所达成的任何协议他将不予承认。土方严辞拒绝了克莱里季斯的要求,认为希方是在为希腊向塞浦路斯增兵争取时间。据英国外交大臣卡拉汉回忆,14日上午,土耳其外长"居内什从我们坐的谈判桌旁起身,毫无礼貌地离开了,他的随从也跟着走了"。居内什立即向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打电话,他用暗语说:"我女儿正在度假。"两个小时后,土耳其军队开始了入侵塞浦路斯的第二步行动——"阿提拉"计划("阿提拉"为5世纪时匈奴领袖的名字)。

土耳其军队的第二步入侵行动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接连通过了第354号、第355号和第357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立即严格遵守停火",但是直到16日土耳其军队攻占了塞浦路斯西北部的重镇莱夫卡和莫尔富后土耳其政府才宣布接受停火,至此土耳其军队实现了第二步军事行动的目标——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划定了分界线——"阿提拉线",即从塞浦路斯西北部的莱夫卡村,经过尼科西亚延伸到东部的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北部的大片地区,约占塞浦路斯总面积的37%,实现了分割塞浦路斯面积1/3,建立土耳其族人自治州的既定目标。

土耳其入侵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彻底破坏了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相邻而居达4个世纪的传统,使居住在"阿提拉线"以北的近20万希腊族人,背井离乡逃往南部希腊族人控制区,沦为难民。同样有近8万居住在南部的土耳其族人逃往北部。

在土耳其军队的保护下，控制了37%领土的12万土耳其族人，与60万希腊族人隔“绿线”对峙，两族积怨越来越深，为两族和解设置了天然屏障。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已荡然无存。

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

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的危机，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争夺的间接后果。美国在该地区的整体战略，就是确保由希腊和土耳其构筑的北约东南翼的稳定，遏制颇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的共产主义势力，防止苏联向塞浦路斯渗透，竭力避免因塞浦路斯问题引起盟国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甚至战争。美国对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政策的任何变化总是以此战略目的为轴心。

1967年4月政变上台的希腊军政府，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但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认与支持，美、希关系不断加强。1974年7月15日，希腊军政府策划塞浦路斯政变，推翻了主张中立、坚持不结盟、支持塞浦路斯共产主义势力和积极发展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马卡里奥斯合法政府。此次塞浦路斯政变，正中美国下怀，美国政府早就把马卡里奥斯看作眼中钉。政变发生后，美国以“塞浦路斯局势尚不明朗”为由，采取“冻结”策略，孤立联合国安理会对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影响，阻止安理会及时采取任何积极措施。美国政府把逃离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总统也改称为塞浦路斯大主教，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还会见了政变当局的“外交部长”。

希腊军政府策划的塞浦路斯政变，是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第一步，这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既可以把塞浦路斯纳入西方

联盟体系，彻底杜绝苏联向塞浦路斯渗透，也可以把塞浦路斯作为北约的军事基地，强化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加强北约东南翼，实际上是毫无代价地实施了美国曾提出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艾奇逊方案”。所以美国在等待、默认塞浦路斯既成事实的同时，极力劝说土耳其，防止后者的武装干涉，以免引发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

塞浦路斯距离土耳其本土仅有80公里，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土耳其当然决不希望这一战略要地被自己的宿敌希腊所控制。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军队武装干涉之后，当美国得知土耳其军队已在塞浦路斯成功登陆，此时美国的迫切任务不是阻止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的行动，而是极力规劝希腊保持克制，避免希、土两国爆发战争。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土耳其现在是而且今后仍然是美国的盟国，希腊现在是而且今后也仍然是美国的盟国，保证使希腊仍然是土耳其的盟国是符合希腊和土耳其人民的利益的……它们如果成为敌人，就会失去一切。”美国不但没有指责土耳其的入侵行为，而且“对促使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采取行动的压力和干涉表示遗憾，对于这种压力，希腊必须承担一份严重的责任”。美国在希腊军政府策划塞浦路斯政变时不向希腊施加压力，现在已导致土耳其入侵才要求希腊承担后果，可见美国在对希、土两国政策上的变化。

当美国未能有效地阻止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后反而对土耳其采取纵容立场，引起了希腊政府的强烈反对，希腊总理强烈指责“那些应当而且也能够阻止”土耳其干涉而采取容忍立场的人，并拒绝接受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邀请希腊外长访美。而土耳其对美国在危机中的作用“极为高兴”。实际上，不论是希腊控制塞浦路斯

还是被土耳其占领，或者由希、土两国瓜分均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另外，美国对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也不可能再像1964年那样向土政府大力施压，担心这样会适得其反，把土耳其进一步推入苏联的怀抱，导致北约东南翼崩溃，不排除可能形成美希与苏土军事对抗的局面。所以，美国在未能说服和制止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后，反而为土耳其的行动辩解，认为这是希腊军政府策划塞浦路斯政变造成的，甚至指责是马卡里奥斯1974年7月2日给希腊总统的公开信，要求希腊军政府撤回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官兵所造成的连锁反应。总之，不论牺牲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哪一方的利益，均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土耳其入侵之后，美、土关系从入侵前的冷淡转而开始恢复和加强。9月，美国向土提供了40架"鬼怪式"战斗机，拉拢土耳其，抑制土、苏关系升温。尽管此举激起了希腊民众的反美情绪，希腊政府随后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但希腊仍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希、苏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与苏联的唆使和支持关系很大。塞浦路斯政变推翻了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马卡里奥斯政府，岛上的共产主义势力必然受到遏制，苏联苦心经营多年企图在地中海东部寻找一个立足点的图谋也将彻底破灭，尤其是如果政变当局逐步推行与希腊合并政策，北约在地中海东部的力量就将会大大加强，苏联绝对不想看到这一结局。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恢复马卡里奥斯合法政府，强烈谴责希腊军政府策划此次政变，要求希腊军官立即撤出塞浦路斯，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但在联合国安理会，苏联的建议受到美、英的阻挠，苏联便煽动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在1964年，当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激烈冲

突时，土耳其为保护土耳其族人的安全曾多次扬言要进行武装干涉，但土耳其并未行动，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劝阻和施压，而更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威胁土耳其政府，如果土耳其胆敢武装干涉塞浦路斯，苏联将攻击土耳其。从此，美、土关系趋淡，而苏、土关系转暖。也许正是这一事件使土耳其充分认识到，要最终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苏联的作用不可忽视。苏联的支持使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采取行动充满了信心。

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苏、美在联合国再次围绕塞浦路斯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美国要求土耳其立即停火并撤出军队，而苏联则要求先按 1974 年 7 月 2 日马卡里奥斯致希腊总统公开信的要求，撤出希腊官兵，由于观点不一致使安理会紧急会议推迟数小时才召开。最后法国提出了折衷建议，在撤出土耳其军队的同时，也要求撤出希腊官兵。而且苏联坚持必须恢复马卡里奥斯的总统权力，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在土耳其入侵期间，苏联官员与土耳其驻苏联大使接触频繁，苏联有 7 个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苏联舰艇也在地中海东部水域活动。美国驻欧洲的空降部队和地中海部队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苏联在塞浦路斯的基本战略目标就是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中立，进一步向塞浦路斯渗透，谋求在塞浦路斯拥有一个舰艇停泊地。所以，苏联既反对希腊控制塞浦路斯，尤其是与希腊合并，同样也反对土耳其完全占领和控制塞浦路斯。当土耳其的第二步入侵行动开始后，随着美国对土耳军事行动的容忍和美、土关系迅速恢复，苏联开始担心土耳其的进一步行动，可能导致美国和土耳其所希望的希、土两国分割塞浦路斯，即所谓的“双重意诺西斯”的局面。所以，苏联在联合国也强烈要求立即停火，一切外国军队撤出

塞浦路斯,恢复塞浦路斯政变前的局面。

此时值得关注的另一变化是,美、英未能阻止土耳其的第二步入侵,在希腊国内引起强烈的反美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基辛格是凶手"、"美国海军滚出去"等反美口号,示威者甚至呼吁苏联支持希腊与土耳其开战。尼科西亚的反美示威者还冲进美驻塞浦路斯大使馆,打死了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希腊外长也拒绝了基辛格的访美邀请。希腊官员与苏联接触频繁,希腊的共产党机关报《黎明》复刊,"共产党将被准许参加新的选举"。希腊政府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将其军队调往希、土两国边界。

在联合国,苏联也不再指责希腊,而是把矛头转向了北约,指责北约集团企图颠覆塞浦路斯主权,把塞浦路斯变为北约的军事基地。苏联建议召开由 15 个安理会理事国和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三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美国、土耳其和土耳其族领导人坚决反对,而希腊和希腊族领导人表示接受。显而易见,苏联与希腊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默契与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对希腊而言只是向美、英施加压力,以争取美英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的筹码,但对苏联来说,却是显示其实力、在北约内部制造分裂的良机。

在此次塞浦路斯危机中,充分体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激烈争夺,希、土两国只是美苏对弈中的两个棋子,尽管他们与美、苏的关系冷暖反复,但万变不离美、苏在全球的战略利益。1947 年至 1964 年的美、土"蜜月期",尽管美、希也保持友好关系,但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苏联大加指责土耳其,甚至对土耳其发出军事威胁,而对希腊则表示支持。随着美、土关系趋淡,苏、土关系不断改善,美、希则密切合作,苏联强烈指责希腊军政府策划了

塞浦路斯政变，支持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但随着土耳其军事干涉的成功和美土关系的恢复，苏、希关系也开始转暖。各方关系的微妙变化无不体现出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主导地位，一切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各国在一系列变化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就国家利益而言，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举动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国在塞浦路斯是既得利益者，其首要目标就是确保塞浦路斯两个主权军事基地的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塞浦路斯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与塞浦路斯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的良好关系，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反对"意诺西斯"或"双重意诺西斯"。因为不论是"意诺西斯"还是"双重意诺西斯"，都可能使英国丧失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在这一点上，美、英存在利益上的分歧。当政变发生时，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驻军完全有能力阻止政变继续，但英国的策略是既保护马卡里奥斯的安全，又任凭政变者自由行动。英国在马卡里奥斯、政变当局和希腊政府三者之间都给自己留有活路，在口头上承认马卡里奥斯合法地位的同时，支持美国的"冻结"政策，拒绝土耳其联合干涉的请求，静观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同时，英国向塞浦路斯基地增兵，增加威慑力。

当土耳其出兵入侵塞浦路斯后，英国仍然是坐山观虎斗，既不帮助任何一方，也不得罪任何一方。尽管希腊暗中指责英国"应当而且也能够制止"土耳其入侵而采取了容忍态度，但停战后英国仍然是希、土两国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的当然召集者和调解者。苏联在联合国多次指责《苏黎世—伦敦协定》和英国的基地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希、土两国和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支持。英国在此次塞浦路斯危机中实现了保护基地安全的既定目标。这

次危机的受害者则是包括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内的整个塞浦路斯。

三、南北分治局面的形成

马卡里奥斯回岛复职

土耳其武装干涉结束后，塞浦路斯代总统克莱里季斯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多次会晤，谈判解决土耳其入侵造成的大量难民问题。塞浦路斯的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此时政变中侥幸逃生流亡英国的马卡里奥斯计划回岛复职，在岛内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对马卡里奥斯是否应回塞浦路斯恢复其总统职务，希腊族人内部意见不一。拥有武装的“埃欧卡—B”强烈反对，担心马卡里奥斯复职后对他们曾参与“倒马”政变进行报复，该组织约有2,000名武装成员，是此次政变的中坚。克莱里季斯接任代总统后，为了避免希腊族人内讧，分化抗击土耳其入侵的力量，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另外，对于代总统克莱里季斯而言，虽然与马卡里奥斯并无矛盾，也并未计较因马卡里奥斯复职而使自己丧失权力，但两人在内外政策上存在分歧。马卡里奥斯对土耳其族人较为强硬，对外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而克莱里季斯对土耳其族人持温和立场。在1968～1974年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中，克莱里季斯希望希腊族做出让步，与土耳其族人实现和解，由于马卡里奥斯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在对外政策上，克莱里季斯极力主张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尤其在土耳其入侵后该主张有增无减，希望通过美

国对土耳其施压，使后者做出较大让步。而且克莱里季斯基本接受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内，以地理为基础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实行联邦制的解决方案。克莱里季斯曾公开表示希望马卡里奥斯推迟回岛，给他足够的时间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进行谈判，解决难民和交换战俘等急迫的问题。但他无意妨碍马卡里奥斯回岛，而且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为马卡里奥斯顺利回岛做必要的准备。

土耳其族人强烈反对马卡里奥斯回岛复职，认为他是自 1963 年底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以来，土耳其族人遭屠杀和 1967 年"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村事件"的元凶，是"一个有极端主义观点的人，他曾用武力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另外，土耳其族人也担心马卡里奥斯回岛，可能导致希腊族内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武装冲突，从而殃及少数仍定居在南部的土耳其族人的安全。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甚至威胁，如果马卡里奥斯回岛，可能导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业已进行的谈判中断。

土耳其政府明确表示反对马卡里奥斯回岛复职。1974 年 11 月 30 日，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鉴于最近塞浦路斯紧张局势可能加剧"，决定把土耳其四个省的戒严期再延长一个月。希腊的卡拉曼利斯政府虽然对马卡里奥斯即将回岛深感不安，但不想造成干涉塞浦路斯内政之嫌，表示要"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选择"，同时希腊军队也加强戒备以防不测。

虽然各方对马卡里奥斯回岛复职反应各异，但此时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戒备的措施。1974 年 12 月 5 日，马卡里奥斯从伦敦飞往雅典，与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会谈，协调双方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12 月 7 日，马卡里奥斯飞抵尼科西尼，向欢迎他的

20万希腊族民众发表讲话，宣布对政变的参与者实行大赦，呼吁希腊族人团结起来，希望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民团结，致力于解决目前的问题。

如此众多的希腊族民众欢迎马卡里奥斯的归来，再次验证了马卡里奥斯在希腊族人中的地位："不论塞浦路斯形势如何变化，马卡里奥斯都是他们的最佳领导人。"

土耳其族邦的建立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和占领，使得土耳其政府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一直所声称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宗教因素，变成了从地域上彻底分割开的两族两区，为其分治塞浦路斯的既定目标提供了现实基础。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通过与希腊族人谈判等方式，将还生活在塞浦路斯南部希腊族人控制区内的数千名土耳其族人，迁到北部的土耳其族控制区。1974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主持下，南部利马索尔区托尼村的229名土耳其族人，带着自己的牲畜和其他财产迁到了尼科西亚土耳其族区。1975年1月15日，在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族人的强烈要求下，英国不顾希腊族人反对，同意将逃到英国阿克罗蒂里军事基地的8,500名土耳其族难民转往土耳其。这些人经土耳其回到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控制区，这是土耳其入侵后最大规模的土耳其族人迁徙。

另外，土耳其政府还有计划地向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族人控制区移民，增强土耳其族人的势力。与此相反，在土耳其入侵期间被驱逐或因安全因素，逃难到南部希腊族人控制区的20万希腊族人沦为难民，不仅土耳其族领导人坚决反对他们返回家园，而且

居住在北部的希腊族人因担心土耳其族人迫害，还不断向希腊族区迁移。实际上在土耳其军队的帮助下，土耳其族人真正实现了前土耳其族领导人库楚克所言："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绝对不能成为少数民族"的誓言。

分治的事实已经形成，有3.5万名装备精良的土耳其军队作为后盾，登克塔什还要名副其实。1975年2月13日，登克塔什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族邦"。登克塔什对媒体解释说，"土耳其族国民议会的这个决定，既不意味着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也不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它意味着土耳其族自治政府有了一种新的结构，这可能就是未来的塞浦路斯联邦的一个邦"，"在两个地理地区的基础上继续与塞浦路斯希腊族统一在一个联邦体制之中"。2月23日，土耳其族邦成立了由50人组成的制宪议会，议员宣誓要"尊重人权、尊重在法律和凯末尔思想指导下的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原则"，"维护塞浦路斯联邦土耳其族邦的存在，为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邦的继续存在、繁荣和昌盛而努力"。6月8日，土耳其族邦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批准实施土耳其族人自己制定的宪法。根据新宪法登克塔什当选为土耳其族邦总统。至此，土耳其族人在土耳其枪炮的帮助下，在土耳其军队的军事占领既成事实的基础上，为实现塞浦路斯分治从政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邦的建立，是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沉重打击。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强烈谴责土耳其族的单方面行动，并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塞浦路斯局势。除土耳其政府表示尊重土耳其族人的决定，并希望全世界也表示同样的"谅解和尊重"（土耳其总理语）外，国际社会为之震惊，对土耳其族的单方面行动纷纷表示指责、遗憾或关注。希腊指责

土耳其族的行动是非法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美国将继续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是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承诺仍然对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负有责任。英国政府继续把登克塔什看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和土耳其族人领袖。但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族人的分治行为所表示的“遗憾”、“关注”，令希腊族人和希腊政府感到失望。在塞浦路斯希腊族控制区和希腊，爆发了大规模反美、反英示威游行，要求希腊族领导人请求苏联帮助。示威者高呼“发给我们武器去战斗，不要分治，要一个统一的塞浦路斯，让难民返回家园”、“马卡里奥斯去莫斯科，我们才会得救”的口号。示威者还在希腊使馆前要求“希腊应该战斗，你们对我们负有这种义务”。

实际上，土耳其族人在推进分治的进程中既掌握节奏，也密切注视着岛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在两族会谈中推进分治，在局势紧张时又提出会谈。1975 年 1 月 14 日和 17 日，正当登克塔什与克莱里季斯在尼科西亚会谈期间，2 月 13 日，登克塔什突然宣布建立土耳其族邦，塞浦路斯局势骤然紧张。次日，登克塔什便提出两族会谈的九点建议，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转交希腊族领导人。这九点建议是：(1)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宗教性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2)为按地区组成的、由两个民族构成的联邦制定一部宪法；(3)在希腊族邦和土耳其族邦之间建立一种联邦结构，决不允许有任何歧视，排除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控制另一个民族的任何可能性；(4)在联邦政府中，一个民族不会对另一个民族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5)建立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民族的联邦法院；(6)一切公民有自由进入联邦领土的任何部分并在那里定居的权利；(7)尊重人权和宪法所规定的自由；(8)建立一个临时政

府，它将工作到两族就联邦达成协议时为止；(9)1960 年的《保证条约》继续有效，直到联邦建立为止。此外，该建议还提到未来联邦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可在损害构成联邦的任何一个邦——土耳其族邦或希腊族邦的情况下处理对外关系”。

登克塔什九点建议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两族双区的联邦制国家，土耳其族邦的成立正是未来联邦制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土耳其族设想的联邦是一种松散的联邦，类似于邦联，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希腊族人认为如果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维护联邦国家的统一，那就等于是分治。同时登克塔什提出未来国家应该是非宗教性的世俗国家，这一思想应该说符合塞浦路斯的实际情况，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都非常虔诚地信仰希腊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如果未来国家是以希腊东正教为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宗教歧视，但希腊族人认为登克塔什的目的是要削弱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治权力。另外，希腊族也反对建立临时政府，认为临时政府的成立将意味着依据《苏黎世—伦敦协定》建立的、一直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将被取而代之，希腊族人将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因而坚持在新的两族联邦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前，以马卡里奥斯为总统的塞浦路斯政府应继续存在。

2 月 19 日，安理会应塞浦路斯政府要求，开始讨论因土耳其族邦成立所造成的塞浦路斯紧张局势，时间长达 3 个星期，举行了 8 次会议。西欧七国、安理会中的不结盟成员国、塞浦路斯政府、英法意等国分别向安理会提出了各自的决议草案，经过多方协商，3 月 12 日，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 367 号决议。该

决议要求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恢复两族政治会谈。虽然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均表示接受该决议，但都有若干保留。土耳其族对决议中“塞浦路斯政府”的提法颇有微词，而希腊族则抱怨该决议采取了“妥协而不触犯任何一方的措施，因而可能已经损害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根本存在”。可见两族和解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四、对外关系与紧急经济行动计划

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

希腊军政府策划对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军事政变，使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降至冰点。而政变导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也宣告了希腊军人独裁统治的结束，流亡国外的前首相卡拉曼利斯受命回国组成民主政府，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迅速恢复。

卡拉曼利斯政府严厉谴责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迫使土耳其立即撤出其占领军，希腊决不承认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制造的既成事实，坚定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但卡拉曼利斯公开声明，希腊对塞浦路斯的支持只能是外交上和道义上的，希腊不会选择以战争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希腊的克制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盟国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但是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在随后爆发的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中，就有人高喊希腊对我们负有责任，其意不仅指希腊军人策划的政变导致土耳其入侵，同时也表明两国之间生死存亡的民族情结。

塞浦路斯政府高度重视与希腊的关系，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均

保持与希腊政府沟通、磋商,采取共同立场。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曾强调,“塞浦路斯与希腊两国的团结是塞浦路斯希腊族谋求生存的基础”;“确保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塞浦路斯民族事业的最基本前提之一”。但同时强调塞浦路斯不会与希腊合并,塞浦路斯问题也不属于希土两国之间的分歧,它们无权谈判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政府领导人的类似言论,不仅表明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对塞浦路斯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二者关系是正常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塞浦路斯政府之所以重视与希腊的关系。首先,塞浦路斯政府确信,同宗同源同文化的希腊人真诚地帮助塞浦路斯,尽管“意诺西斯”已无实现的任何基础,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仍把希腊看作是他们的民族中心。其次,塞浦路斯政府认识到只有美国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使之做出让步,才能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马卡里奥斯总统病逝前几小时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在强调,“只有美国能够为塞浦路斯问题谋求一项公正的和平解决办法”。而要使美国向土耳其施压,希腊的作用极为重要。希腊既是北约成员,又与土耳其共同构筑北约防务体系的东南翼,而且美国在希腊拥有多处军事基地。希腊成为北约防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希腊能够向美国施加影响。再次,1981 年已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的希腊,可通过欧共体直接向希望加入欧共体的土耳其施加压力。最后,塞浦路斯加入欧共体也需要希腊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另外,从 1974 年开始,希腊每年向塞浦路斯提供 2,000 万美元的援助,对遭受入侵破坏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帮助颇大。

希腊政府同样重视与塞浦路斯政府的关系。希腊民众一贯把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看成是希腊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民族

情结对希腊政府构成巨大压力，策划塞浦路斯政变导致土耳其入侵的希腊军政府，正是在民众的反对声中倒台的。所以，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支持成为希腊的民族事业和希腊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在 1976 年 7 月 20 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两周年之际，所发表的告塞浦路斯人民书所言："希腊和塞浦路斯人民共患难，同斗争，为恢复你们的自由权利，希腊将坚决热情地支持你们，直到雪耻。"而且希腊不昔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以要挟西方盟国。同时，塞浦路斯对希腊的国家安全也有重大影响，保持并在塞浦路斯拥有影响力，不仅对比希腊更强大的宿敌土耳其构成牵制和夹击，而且可以利用塞浦路斯作为调节与土耳其关系的标杆。尽管希腊领导人多次强调希腊与土耳其在爱琴海之争不会影响塞浦路斯问题，但是国家间的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在所难免。

塞浦路斯与希腊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合作关系。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战争刚一结束，代总统克莱里季斯立即前往雅典，与希腊磋商处理塞浦路斯危机的共同政策，以及苏联所提出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1975 年 2 月 13 日登克塔什宣布成立"土耳其族邦"，1983 年 11 月 15 日土耳其族人单方面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在两族举行谈判或塞浦路斯政府领导人出访前，均要与希腊政府协调立场。在两国密切合作的对外关系中，集中体现为所有塞浦路斯问题均由塞浦路斯政府决定，希腊政府支持。塞浦路斯政府的决定是在与希腊政府沟通和磋商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希腊政府的支持则是明确和坚定的。希腊政府铭记前军政府的狂妄行动给希腊民族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教训。

1981 年 2 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访塞浦路斯，这是希腊历

届政府总理首次访问塞浦路斯。帕潘德里欧对数以千计的欢迎他的希腊族人说，要发动一场圣战使全世界都知道塞浦路斯的情况，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他慷慨激昂地高喊：“塞浦路斯的战斗就是我的战斗”，“我向你们保证，希腊政府及其人民将继续毫无保留地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违反塞浦路斯人民的根本权利的任何妥协，将不仅给塞浦路斯，而且也会给希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83 年 4 月，基普里亚努蝉联总统后首次正式访问希腊，受到隆重接待，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上与希腊政府进一步统一立场。

1983 年 11 月 15 日，土耳其族人单方面成立“北塞”，希腊全国为之愕然，希腊内阁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在总理帕潘德里欧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会后帕潘德里欧向卡拉曼利斯总统作了汇报。希腊政府保持克制，不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强烈指责土耳其违背国际法，破坏国际协定，是对联合国决议的挑战。同时要求希腊和塞浦路斯两国民众保持冷静和以坚决的态度应对。另一方面希腊政府利用外交上的有利地位，展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以获得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希腊的这次外交攻势方式多，范围广，不仅向各国驻雅典使节通报塞浦路斯情况，同时通过希腊驻各国的外交官与各国政府进行联系，而且还派出众多政府部长前往许多国家及一些重要国际机构进行活动，要求他们谴责土耳其，不承认“北塞”非法政权，并要求他们施加压力使土耳其族收回独立决定。希腊政府甚至在尚未证实孟加拉国政府承认“北塞”的情况下，便宣布与孟断交，以示强硬立场。

1987 年 10 月，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在出访土耳其之前接受土耳其记者采访时称，“如果有人要求，巴基斯坦愿成为除

土耳其外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北塞'的国家"。哈克在安卡拉访问时又公开发表讲话说，巴基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是希腊的敌人，但我们确实感到我们更接近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邦"。巴领导人的言论引起希腊政府的强烈反应。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希腊政府在维护塞浦路斯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当然，塞浦路斯与希腊土关系也有其另一面，即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与希腊政府及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土耳其族认为希腊长期致力于把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损害土耳其族人的利益，而且至今仍然不承认土耳其族作为塞浦路斯主体民族之一的客观事实。由于希腊政府一贯不承认"北塞"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交往，惟有相互指责。如果塞浦路斯问题不能得到公正合理解决，土耳其族与希腊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塞浦路斯与土耳其关系

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小国寡民的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根本不是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土耳其军队的对手，土耳其军队经过两个阶段的军事行动，达到占领塞浦路斯1/3领土的目的后，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双方实现停火，但土耳其军队长期驻扎塞浦路斯北部拒不撤出，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至今与土耳其尚未签订和平条约，实际上两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国小言微的塞浦路斯政府长期致力于通过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等西方盟国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撤军，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塞浦路斯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利用

各种途径谴责土耳其的侵略行径和对塞浦路斯的长期占领，甚至要求欧洲人权委员会对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侵犯人权进行谴责。土耳其和"北塞"政府对塞浦路斯政府不断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努力颇为反感，认为此举损害了土耳其的形象，因而拒绝向塞浦路斯政府做出任何让步。同时，土耳其认为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根据《苏黎世—伦敦协定》，是为了维护塞浦路斯现状，防止希腊军政府将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保护土耳其族人的利益。同时，土耳其认为自1964年后，完全由希腊族人把持的塞浦路斯政府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认为在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地位平等的政府。1983年11月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后，土耳其政府立即给予承认，并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认这个新诞生的国家，次年4月双方还互派了大使。从此土耳其坚定地支持"北塞"的独立地位，公开宣称塞浦路斯存在两个国家。1984年2月，土耳其副总理埃杰维特访问"北塞"，这位在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时的土总理对土耳其族民众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了，但世界上还在争论是否承认这一新国家的问题，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了，不能再讨论他是否能出生。独立对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来说已经成了事实。"而且土耳其顶住了包括美国的武器禁运和欧盟在土耳其入盟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态度坚定，毫不妥协，足见其支持"北塞"独立地位的决心。

实际上，塞浦路斯与土耳其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塞浦路斯政府与土耳其的敌对状态，双方相互指责，断绝交往。同时也体现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与土耳其的特殊关系。"北塞"的建立依赖土耳其，"北塞"的生存仍然依赖土耳其。"北塞"获得土耳其的大量经济援助，对外贸易主要与土耳其之间进行，而且"北塞"没

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一直使用土耳其货币——里拉。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北塞”领导人与土耳其保持密切磋商，每次塞浦路斯两族举行谈判，土耳其族领导人均首先与土耳其政府进行磋商，协调一致，采取共同立场。只要土耳其拒绝从塞浦路斯撤军，塞浦路斯的分治状态就会继续维持，目前国际上所公认的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政府，就不可能与土耳其实现关系正常化。

塞浦路斯与美国关系

塞浦路斯虽系蕞尔小国，但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它与希腊和土耳其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关系，从而使得这个小小岛国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塞浦路斯与美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塞浦路斯政府希望美国谋求一项较为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塞浦路斯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是立足西方，尤其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对塞浦路斯国家安全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塞浦路斯独立伊始即与美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62 年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访美，加强两国关系。

1974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美国政府态度暧昧，正如 1975 年 2 月 6 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社论《塞浦路斯：基辛格博士的一次失败》所言：“当这场危机最初爆发时，这位美国国务卿实际上并不关心。”在美国政府看来，不论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还是希腊与土耳其分割塞浦路斯，均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样不仅将塞浦路斯纳入北约范围，而且可以完全杜绝苏联向塞浦路斯渗透，但前提是防止因此引起希、土两国的战争。美国对塞浦路斯危机的暧昧立场最终未能制止土耳其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土耳其军队入侵塞浦

路斯后，在塞浦路斯引起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认为，美国能够制止土耳其入侵而未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认为美国间接地支持了土耳其的侵略行径，因为土耳其利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入侵塞浦路斯。1975 年 2 月 14 日，塞浦路斯议长克莱里季斯在雅典说："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土耳其去年夏天是不会发动对塞浦路斯的入侵。"1983 年 7 月 4 日，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阿什拉夫·哈迈·福阿德，在采访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时问道："美国在塞浦路斯冲突中能起什么作用?"基普里亚努总统直言不讳："入侵和占领塞浦路斯是用美国为了防御提供给土耳其的武器进行的。直截了当地说，是美国公民在资助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并认为美国对塞浦路斯和马卡里奥斯政府的支持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积极的步骤"。

尽管如此，塞浦路斯政府不仅没有淡化与美国的关系，反而积极沟通，向美国政府表达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的要求。马卡里奥斯回岛复职后不久，在 1975 年 4 月参加英联邦牙买加会议时强调："我们认为，只有美国能够影响土耳其或者对它施加压力，要它比较讲道理一点。"他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要求美国向土耳其施加压力。美国国会决定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但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并不是为了偏袒土耳其，而是为了西方的共同防御。当我们为了影响一个纯粹战术的问题而开始停止援助时，我们就会使联盟的团结和西方的安全在一时间遭到破坏"。美国政府反对把塞浦路斯问题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援联系起来，但承认土耳其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关键作用。1977 年 5 月卡特总统与土耳其总理会谈时曾指出："大家都希望塞浦路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虽然这是要由塞浦路斯希腊

族和土耳其族决定的问题，但是，土耳其总理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并有很大影响力。”在美国政府的极力要求下，1978 年美国会取消了对土武器禁运，但条件是美国总统必须定期向国会提交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进展的报告。塞浦路斯政府反对取消禁运。马卡里奥斯认为：“只有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让步，才能取消禁运。”

实际上，美国非常关注塞浦路斯问题，并多次派特使进行斡旋。1982 年美国任命了塞浦路斯问题特别协调员，而且副国务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许多国会议员先后访问塞浦路斯，寻求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1982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以 405 票对 6 票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1983 年 11 月 15 日，当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后，美国参众两院立即通过决议，反对土耳其族宣布独立，要求土耳其族领导人收回这一决定，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号召所有成员国拒绝承认“北塞”的决议，16 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称土耳其族宣布独立是“一只吱吱叫的老鼠”。1984 年 2 月，美国接连派出国务院特别顾问德文斯和塞浦路斯问题特别协调员哈斯访问塞浦路斯，帮助联合国秘书长进行调解。11 月，里根总统致信土耳其总统埃夫伦将军，要求从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在美国的压力下，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确做出较大让步，但遗憾的是两族未能抓住机遇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塞浦路斯政府仍然认为美国所做的努力还不够，没有发挥它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而且对美国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进展报告中的某些提法，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土耳其采取了建设性态度”等极为不满。塞浦路斯政府曾在 1979 年为此对美国提

出严正抗议，并致使后来卡特总统拒绝会见来访的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事实上，从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到80年代末，美国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确实向土耳其施加了一定压力，只是因为土耳其在这一民族事业上拒绝让步，使得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进展。尽管塞浦路斯政府对此不满，但因为仍需美国的帮助，塞浦路斯领导人频繁访美，塞浦路斯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其次，美国尽力把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限制在北约范围内，极力避免苏联介入，这是由美国在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利益所决定的。美国在塞浦路斯拥有3处监视站，并使用英国基地，美国U-2飞机曾利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监视阿以停火实施情况。早在50年代末，美国极力反对在联合国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曾两度否决希腊提出的要求联合国主持在塞浦路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的提案，要求英、希、土三个北约成员国协商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塞浦路斯独立后出现的民族冲突，美国仍要求这三个保证国协商解决，并要求北约秘书长进行斡旋，曾试图派北约部队在塞浦路斯维和，遭到塞浦路斯政府拒绝。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希、土两国爆发战争，避免为苏联的介入造成可乘之机。尽力安抚希腊，又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但把握尺度，以免适得其反，将土耳其推入苏联的怀抱。其后，在塞浦路斯和平进程中，美国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尽管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称赞该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1975年4月5日马卡里奥斯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所言）。美国仍认为该建议是苏联为介入塞浦路斯事务寻找契机。苏联《新时代》1977年8月11日的文章《谁需要“地中海三角？”》中

写道:“北大西洋集团的庇护者仍然希望关起门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狭隘圈子里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同时,在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组成上,美国也主张在西方盟国范围内,反对苏联领导的华约集团成员国介入。美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主持的塞浦路斯两族会谈,致使苏联从未介入。80 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国内形势趋紧,苏联已无暇他顾,塞浦路斯问题完全在美国的支持下由联合国进行调解。

再次,美国长期向塞浦路斯提供经济援助,其中 1960 ~ 1962 年,美向塞浦路斯政府提供了 1,700 万美元的援助。1974 年以后,美国为塞浦路斯政府每年提供 1,500 万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成为塞浦路斯经济快速恢复并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塞浦路斯与苏联关系

塞浦路斯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最早始于党际交往,即 1926 年成立的塞浦路斯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密切关系。1960 年塞浦路斯宣布独立后即与苏联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 1964 年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武装冲突中,苏联曾通过埃及等第三国向希腊族提供了价值超过 1,000 万英镑的武器,其中包括坦克等重型武器。塞浦路斯政府希望得到苏联对塞浦路斯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苏联根据其战略利益,反对把塞浦路斯与北约成员国希腊合并,或希、土两国分割塞浦路斯。为加强两国关系,1971 年马卡里奥斯总统应邀访苏。

在 1974 年 7 月 15 日希腊军政府策划政变后,苏联担心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但遭到美英等国的反对,故而支持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并在联合国采取拖延手段,为

土耳其辩护和争取时间。难怪1974年9月16日苏联副外长访问希腊和塞浦路斯时,希腊外长马夫罗斯指责苏联"在塞浦路斯危机开始时所持立场,那时它本来可以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马卡里奥斯也说苏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对土耳其采取"暧昧"立场。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苏联多次发表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声明,要求召开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安理会成员国及相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政府为了向美国施加压力,公开支持苏联建议,并积极向苏联靠拢,塞浦路斯希腊族民众甚至高呼要求马卡里奥斯到莫斯科去,请求苏联帮助。9月30日,塞浦路斯政府委托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巴巴约安访苏,寻求苏联的外交支持。巴巴约安谴责美国和"最反动的北约集团出于战略目的而要分治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为美国建立滩头堡"。1975年2月28日。苏联驻塞浦路斯大使阿斯塔文和劳动人民进步党领导人,一致要求马卡里奥斯反对美国飞机使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基地。1975年5月7日,塞浦路斯内政兼国防部长赫里斯托祖卢·韦尼明,在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司令阿希利季斯准将陪同下访问苏联,谋求苏联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这一时期,塞浦路斯与苏联关系有较快发展。1975年8月18日,马卡里奥斯在塞浦路斯与苏联建交15周年之际对塔斯社记者说:"苏联是塞浦路斯1960年宣布独立后,立即同塞浦路斯建交的最初几个国家之一,从那时起苏联和塞浦路斯就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方面建立了紧密合作,我们的关系在健康发展。"1982年,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和外长拉查斯先后访苏,双方发表公报称,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接近和吻合。同年10月,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斯特劳马尼斯访问塞浦路斯。11月,基普里亚努总统再次赴苏参加勃列日

涅夫葬礼。

塞浦路斯与苏联的经济文化关系也有较大发展。1975 年 5 月，苏联向塞浦路斯提供设备建造两座硫酸和磷酸厂，此前，苏联为塞浦路斯利马索尔港提供了 6 台自走式起重机，并完成了对瓦利科水泥厂的设备安装工程。9 月，塞浦路斯财政部长安德列亚斯·帕察利季斯访苏，讨论经济合作问题及苏联对塞浦路斯重建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塞浦路斯与苏联签订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为扩大两国经贸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6 年 5 月 18 日，两国又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规定双方在历史、教育、考古、科学、美术、音乐和体育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还规定苏联向塞浦路斯学生提供在苏联大学学习的奖学金。11 月，塞浦路斯与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定。1978 年 1 月两国签订航空议定书，同年苏联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建成塞浦路斯最大的“文化中心”。1984 年两国又签订海运协议。塞浦路斯与苏联关系向纵深发展。

尽管塞浦路斯与苏联关系在政治、经贸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两国关系仍然受各自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制约。塞浦路斯政府积极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一方面是希望得到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对塞浦路斯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尤其在外交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向苏联及其阵营靠近给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迫使美国重视塞浦路斯问题，但塞浦路斯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从未超越塞浦路斯立足西方的对外政策基线。同时塞浦路斯政府也深知苏联对塞浦路斯的支持是很有限的。1974 年 8 月苏联支持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政府要求苏联提供武器时，遭到苏联拒绝。1983 年 11 月 15 日，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后，苏联开

始只是转载了此新闻和其他国家的立场，直到 17 日塔斯社才发表声明，明确反对塞浦路斯北部成立“独立国家”，足见苏联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是以不严重影响苏联与耳其土关系为前提，表明苏联与塞浦路斯关系在苏土关系中的配角地位。

1986 年初，苏联再次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新建议，并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起一系列外交攻势。苏联三次派特使访问塞浦路斯，与总统基普里亚努、议长里萨利迪斯、外交部官员及各政党领导人进行广泛的、长时间的磋商。由于美英等国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在安理会反对苏联建议，苏联企图绕过安理会，把塞浦路斯问题直接提交 1987 年的第 42 届联大辩论，希望得到广大不结盟国家的支持，使联大做出决议，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召开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以企打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享有的垄断权，削弱西方势力，扩大苏联的影响，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取得发言权。苏联的建议要求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走全部军队和移民，把塞浦路斯的安全保证从原来规定的英、希、土三国扩大为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希腊、土耳其和不结盟运动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组成广泛的国际保障，废除任何保证国单独干涉塞浦路斯事务的权利，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塞浦路斯，使塞浦路斯实现非军事化，其矛头直指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军事设施。

苏联的外交攻势收到了一定积极效果。塞浦路斯议会的 4 个政党中，民主党、劳动人民进步党和社会党，一致表示支持苏联的建议，就连一贯亲西方的民主大会党也不便公开反对，只是借口由于美、英等国的反对，召开国际会议不现实。塞浦路斯普通民众虽然有不少人对苏联的意图存有戒心，但大部分人认为能使塞浦路

斯问题动起来总比僵着不动好。苏联的建议仍因多方反对未能如愿。实际上，苏联的建议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可能付诸实施，因为苏联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是英美，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土耳其。苏土关系如果因此受到损害，对苏联而言是极不合算的。苏联该建议的另一目标是阻碍两族会谈，因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及其它们各自的“祖国”在谈判目标和利益上虽然背道而驰，但在两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双方均接受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会谈，承认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问题与塞浦路斯问题没有直接联系。对此，苏联表面上虽然不便持异议，但心怀不满。苏联一直担心塞浦路斯两族会谈最终将导致按美国的方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维护西方的既得利益，会对苏联产生不利影响。其后在美苏对话中，苏联认为塞浦路斯问题也是严重的地区冲突，应列入苏、美会谈日程，并多次向美国提出要求，而美国未曾理会。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趋于解体，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关注也减少了，但塞浦路斯政府仍然重视苏联（及其之后的俄罗斯）在联合国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塞浦路斯与苏联之间继续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1989年，两国贸易总额达8,000万美元。

土耳其入侵造成的破坏

土耳其入侵并占领塞浦路斯，不仅造成了塞浦路斯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使独立后塞浦路斯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几乎丧失殆尽，其中46%的工业、48%的农产品出口、41%的牲畜、56%的采矿业和采石业、40%的学校、20%的森林、65%的旅游业、87%的旅馆、法马古斯塔港口83%的货运设施遭到破坏，使塞浦路斯丧失

了整体经济能力的70%。工厂停工，土地荒芜，港口瘫痪，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

不仅如此，入侵使20多万相邻而居数世纪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为了安全或迫于无奈，背井离乡，逃往本民族所控制的区域。其中有20万希腊族人从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塞浦路斯北部，逃到南部希腊族人控制区，希腊族难民达希腊族总人口的1/3，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负担。在入侵中有1,500名希腊族人失踪，至今杳无音信。仍生活在土耳其族人控制区的希腊族人和马龙派教徒仅有590人。

土耳其的入侵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塞浦路斯北部的教堂遭到了战争和人为的破坏。据塞浦路斯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有77座希腊东正教教堂被改造成了土耳其族人的清真寺，133座教堂和修道院遭亵渎，18座教堂被用作土耳其军队的弹药库，13座教堂作为仓库，1座教堂改成了旅馆，1座教堂当作学校。另外，无数的古币、宗教艺术珍品及考古发现的文物被抢劫和盗卖。希腊族人还抱怨土耳其族人把许多希腊语地名改成了土耳其语名称。

经济等物质的破坏尚可通过重建得到恢复，然而入侵给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却难以愈合。土耳其族人认为两族不能生活在一起，土耳其政府把两族分治作为解决两族分歧的最佳方案。但塞浦路斯政府并未过多地怨恨土耳其族人，而是大加指责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内政，只有土耳其撤走占领军，塞浦路斯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紧急经济行动计划

面对土耳其人侵所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和20万难民亟待安置，南部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被迫停止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75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紧急经济行动计划”，解决难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恢复经济。

1975年，塞浦路斯政府通过了恢复经济的第一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1975～1976年），颁布新的经济法规和政策，在大力扶植农业、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鼓励私人和外商投资，在首都尼科西亚市郊区和沿海城市规划工业区，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工业项目，重点发展和扶植投资少见效快的出口加工、旅游和食品加工、服装、鞋帽、皮革等使用劳动力多的项目，尽快安置难民，减少失业人口，改善难民的生活条件。第一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完成后，1975年塞浦路斯出口5,600万塞镑（约合9,520万美元），1976年出口达10,590万塞镑（约合18,90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89%，主要向英国、黎巴嫩、叙利亚、沙特、利比亚、苏联、中国、迪拜、卡塔尔、巴林、也门、荷兰等国，出口塞浦路斯生产的水泥、服装、香烟、柑橘、含酒精饮料、土豆、鞋类和新鲜蔬菜等。

在第一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1976年10月，塞浦路斯政府公布了第二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1977～1978年），把增长率定为每年8.5%，要求把总的固定资金积累从6,980万塞镑增加至10,080万塞镑，该计划的重要目标仍然是降低失业率，将失业人口从16,800人降到7,900人，即达到3.8%的水平。1979年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发表的经济形势年度报告显示，第二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规定的8.5%，

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达到入侵前1973年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3.2%，到1979年达到了6.41亿塞镑，为入侵前的1.8倍，同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667亿塞镑，旅游收入超过1.551亿美元，外汇储备3.374亿美元。基本实现了解决失业和住房问题的目标，不仅恢复了经济，重建了家园，而且使农业、旅游、建筑、交通运输等部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把国民经济提高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实施第四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1982～1986年）过程中，塞浦路斯政府开始进行经济调整，一是改变前三个计划中经济增长过快、对工业投资少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状况，规定经济年增长率为4%，年出口增长在17%～18%之间，年进口增长控制在15%，以稳定国内价格，减少国际收支逆差；二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实现充分就业；三是吸引外资，加大对工业投资，实现工业现代化。该计划总投资额为20亿塞镑，其中私人投资占75%。为了切实实现上述目标，塞浦路斯政府制定了新的政府保证计划，改进税收激励制度，大力鼓励国内外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努力扩大出口，建立新的工业区，把塞浦路斯建设成为中东地区的服务中心。

顺利完成四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后，塞浦路斯取得了可喜的经济发展成就。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4.49亿塞镑（1塞镑合1.623美元），人均收入4,800美元，通货膨胀率为5%，失业率仅为3.5%，几乎人人有活干。不仅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改变了落后面貌，而且成为中东地区除产油国外首屈一指的富国。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进步提供了基础，文化、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也有了较大提高和改善，80%的人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平均寿命男性为75.3，女性则高达79.8，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九章　塞浦路斯和平进程

一、70 年代后期的和平进程

维也纳会谈

土耳其入侵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又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族邦”，塞浦路斯局势仍然相当紧张，根据安理会第 367 号决议，责成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两族会谈。由于两族缺乏互信，积怨甚深，竟对谈判地点也争执不下。希腊族和联合国建议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便于工作繁忙的秘书长协调。但土耳其族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应由两族直接谈判解决，反对联合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或组织干涉，反对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认为尼科西亚是最佳会谈地点，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小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化影响。最后双方妥协，将会谈地点放在了维也纳。

1975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主持下，希腊族代表克莱里季斯与土耳其族代表登克塔什举行了首轮会谈，双方互相听取了对方的意见，第一天双方达成共识，建议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问题。随后会谈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领土问题

和难民问题。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问题，自 1974 年土耳其入侵并占领塞浦路斯北部后，土耳其族人一直坚持认为，塞浦路斯未来的国家，是由两族两地区构成的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权力有限，这样才能避免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统治，保障土耳其族人的安全，防止 1964 年和 1967 年事件重演。希腊族人基本接受了联邦制国体的设想，但不是两族两地理区域，而是两族多地理区域的联邦制，甚至可能包括 4 个或 5 个邦，而且联邦中央政府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保障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希腊族人的联邦构想把土耳其族人分成若干区，实际上是削弱了土耳其族人的整体力量，旨在遏制土耳其族人走向分治。所以，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问题，充分反映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严重的不信任。土耳其族邦的成立，既是土耳其族人按照自己的联邦设想制造的既成事实，也使希腊族人担心土耳其族人分治的疑虑加大，这也是克莱里季斯与登克塔什在此问题上互不相让的原因所在。

领土问题是会谈的另一核心问题。土耳其入侵后，占塞浦路斯总人口 17.4% 的土耳其族人控制了塞浦路斯 37% 的领土，每次会谈双方均提出解决领土问题的建议。希腊族要求土耳其族控制的领土不得超过 20%，但土耳其族坚持在该问题上让步有限。难民问题成为会谈的另一焦点。由于英国政府已同意将滞留在阿克罗蒂里英军基地的 8,500 名土耳其族难民，经土耳其转往北部土耳其族区，控制着近两倍于人口比例领土的土耳其族区容易安排难民，而且土耳其族占有了从北部逃难到南部希腊族区的 20 万希腊族人的房屋等设施。20 万希腊族人难民主要聚集在南部的拉纳卡和利马索尔周围的难民营里。所以，难民问题就是这 20 万希腊族人能否返回他们的北部家园的问题。希腊族坚持必须让这些

难民返回自己的家园，土耳其族曾一度允许，但只是口头承诺，并未付诸实施。

难民问题非常复杂，它实际上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族控制区的土耳其族人口不过12万，土耳其族人担心如果让20万希腊族难民重返家园，在土耳其族控制区将会重新形成土耳其族人成为少数民族的局面，土耳其族邦也就不能完全成为土耳其族人的天下，必然影响土耳其族人的安全，最终可能导致马卡里奥斯所倡导的多地理区域联邦的状况。所以，土耳其族始终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实际上，第一轮会谈对上述三个核心问题没有形成任何共识，惟一取得的进展是双方同意重新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该机场自土耳其入侵后一直由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但该协议实际上也未能实施。

1975年6月5～7日的第二轮会谈，因土耳其族坚持将于6月8日举行批准成立土耳其族邦及土耳其族邦第一部宪法的公民投票，使会谈草草结束。7月31日至8月2日的第三轮会谈达成如下协议：(1)目前在塞南部的土耳其族人如果愿意，可有计划地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协助下携带其财产迁往北部；(2)目前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希腊族人可以留下来，并将得到包括教育、宗教和医疗等设施在内的一切援助，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和行动自由；(3)允许目前在北部的希腊族人根据自愿，在不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迁居南部；(4)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自由进出北部希腊族人的村庄和住处；(5)在履行上述协议时将优先考虑使家庭团聚，其中包括目前在南部的一部分希腊族人迁到北部的问题。尽管所达成的上述协议与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相距甚远，但它毕竟大大缓解了两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大批居住在南部的土耳其族人北迁，同时也有少

数希腊族难民迁往北部与家人团聚。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谈判总是在乐观时突然逆转，在悲观中柳暗花明。当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后，土耳其族方面却不按原计划提出有关未来联邦制国家的宪法和领土结构的具体建议，致使第四轮会谈在没有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情况下就草草结束。土耳其族方面的拖延，据认为主要是土耳其政府不想在10月12日美国国会重新讨论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问题之前，做出任何屈服于美国压力的举措。

第四轮会谈失败后，1975年11月20日，联大通过了由不结盟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势力停止干涉塞浦路斯事务；外国军队尽快撤出塞浦路斯；有关各方采取紧急措施，为自愿返回家园的所有难民提供方便；两族立即恢复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的、有诚意的和建设性的谈判，寻求达成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要求各方不要采取违反1974年11月1日联大决议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其中包括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结构的行动。土耳其族对联合国拒绝承认土耳其族邦政府，与马卡里奥斯领导的塞浦路斯政府享有同等地位极为不满，要求维和部队应与土耳其族邦缔结一项单独的协议，甚至以要求维和部队撤出相要挟。

在12月北约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美国、西德和法国倡议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恢复会谈，美国部分恢复了对土耳其的武器援助，对恢复两族会谈起了促进作用。土耳其也象征性地撤走了1千名驻塞浦路斯士兵。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积极斡旋下，1976年2月17～21日，克莱里季斯与登克塔什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五轮会谈，集中讨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以及领土问题，但双

方分歧依旧，只达成了在6周内为下次会议提交有关上述两个问题书面建议的共识。1976年4月，希腊族谈判代表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克莱里季斯因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与马卡里奥斯意见分歧而辞去了谈判代表，接替其职的帕帕佐普洛斯于2003年当选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五任总统)与土耳其族谈判代表乌米特·苏莱曼·奥南如约提出了书面建议。土耳其族建议的主要内容是：(1)建立一个由两个明确的地理区域组成的联邦制共和国；(2)成立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中央政府，两族在中央政府中享有同等权力；(3)新政权要得到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4)新宪法将禁止希腊族区与希腊合并，或者土耳其族区与土耳其合并；(5)成立过渡性的临时联合政府；(6)两个区应具有单独的预算、单独的军事力量、单独的海运和空运。

希腊族提交的建议在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功能方面立场未变，同时强调塞浦路斯是一个由两族多区、单一领土组成的联邦而非邦联，排除塞浦路斯与希腊或土耳其合并或分治；领土方面要求按人口比例分配，土耳其族最多只能控制20%的领土。显而易见，双方分歧颇大，土耳其族拒绝在领土上让步，只有“互相调整边界的可能”。希腊族指责土耳其族提出的成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的建议，是要“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地位”。双方彼此拒绝接受对方的建议。5月4日，联合国宣布两族会谈无限期推迟，直到1977年2月12日，马卡里奥斯与登克塔什会谈达成四点协议后，两族才恢复了第六轮维也纳会谈。但在核心问题上仍然没有任何突破，历时两年的维也纳会谈，就这样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地结束了。

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

维也纳第六轮会谈的无限期推迟，主要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定于1976年下半年的选举有关，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双方都表现得更加强硬和不妥协。土耳其族人对1964年和1967年所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仍然心有余悸，对他们现在拥有的“安全”倍加珍惜。而希腊族人对1974年7月土耳其入侵造成的悲惨现状和心理创伤难以愈合，尤其是占希腊族总人口1/3的20万难民，至今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他们不仅对希腊族代表在谈判中的任何妥协反应强烈，而且也是影响选举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6年7月11日，马卡里奥斯的忠实支持者、塞浦路斯政府前外长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建立了民主党，准备参加大选。该党支持马卡里奥斯的强硬政策，支持塞浦路斯政府与雅典改善关系。同时，辞去希腊族谈判代表之职的议长克莱里季斯，在原来的统一党的基础上，于7月4日组成了民主大会党。实际上，克莱里季斯的辞职完全因与马卡里奥斯对谈判问题的分歧所致，克莱里季斯主张希腊族应注重现实，向土耳其族妥协。早在1974年11月7日他就曾对记者说：“在目前情况下，所有关于一个统一的塞浦路斯的议题，如果在土耳其入侵之前还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现在这一方案已经不现实了”，“我看不到存在着土耳其族人除接受在某种地理基础上建立联邦的解决办法之外，接受其他任何解决方案的前景”。这是克莱里季斯第一次公开表示同意建立联邦。他认为在土耳其入侵之前，希腊族人对塞浦路斯的构想，是建立在“虚假的幻想和可怕的错误”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土耳其族人简单地当作一个少数民族对待，而没有考虑它得到拥有3,300万人

口的土耳其的支持”,“实际上我们才是少数,我们不应该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不应该把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与可能得到的东西混为一淡”。另外,克莱里季斯对马卡里奥斯的传统不结盟政策持怀疑态度,主张亲西方,认为只有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向土耳其施加压力,才能使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并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主张应迅速与土方达成折衷解决方案,否则,目前事实上的分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成为永久性的分治了。但是克莱里季斯的这些现实主张,既与总统马卡里奥斯号召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不相符,而且也遭到塞浦路斯最大政党——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强烈反对。该党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主张不结盟。1976 年 8 月,劳动人民进步党与统一民主中心联盟(又称社会党,成立于 1970 年 5 月),以及“民主阵线”组成“共同阵线”,支持马卡里奥斯。这次奇特的选举方式也对克莱里季斯极为不利,总统选举就是回答“是否支持马卡里奥斯总统传统的不结盟政策,以及他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采取的‘长期斗争的方针’”,结果共同阵线囊括了全部 35 个席位(1960 年宪法规定塞浦路斯议会设 50 个席位,希腊族 35 席,土耳其族 15 席,自 1963 年 12 月土耳其族退出塞浦路斯政府后,土耳其族的 15 席一直空缺)。克莱里季斯领导的民主大会党一席未得,支持马卡里奥斯路线的基普里亚努取代了克莱里季斯当选议长。这次选举充分说明了遭受入侵之苦的希腊族人的心态和政治倾向,在这种民情和政治气氛下,现实的妥协主张自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1976 年 6 月 20 日,登克塔什再次当选为土耳其族邦总统。在土耳其族邦议会选举中,登克塔什领导的民族团结党遥遥领先于部族解放党、土耳其族共和党和人民党。选举后登克塔什表示:

“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观点。”“这次选举向世界——我希望也向马卡里奥斯表明，没有任何法律、道义、物质、国家或国际方面的障碍，可以阻止我们单方面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邦，我希望希方最终接受这一事实，并尽快找到一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实际上，这是土耳其族人向希腊族人、向希腊和全世界表明，为了土耳其族人的安全和利益，他们决不妥协。

两族选举结束后再次面对和解问题。美国新当选总统卡特在竞选中曾得到希裔集团的大力支持，他在竞选活动中曾多次指责基辛格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对土耳其太软弱。卡特政府加大了对土耳其的压力，同时卡特也要求欧共体在该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土耳其政府意识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特别是去年的土美武器协议现在还待国会的批准。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可以由一个包括土耳其族各党派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督促登克塔什恢复会谈。另外欧洲人权委员会关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也增加了对土耳其的压力。国际社会对土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土耳其族方面越来越孤立。在此背景下，1977 年 1 月 9 日，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致函马卡里奥斯，建议两人举行高级别会谈。1 月 27 日，在尼科西亚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区的莱德拉宫，马卡里奥斯与登克塔什举行了自 1963 年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首次会谈。当然登克塔什自封为土耳其族邦总统而非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但无论如何，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到一起直接会谈，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及希、土两国各大媒体，对这次会晤均作了积极肯定的报道。

1977年2月12日，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参加下，两位领导人在尼科西亚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双方在互有让步的情况下达成了四点协议：(1)在塞浦路斯应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联邦共和国；(2)两族各自管辖的领土将根据土地的经济特点、生产特点和财产情况来确定；(3)中央政府应确保两族联邦国家的统一；(4)在讨论行动自由、定居自由和财产自由方面，应考虑到两族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和土耳其族的某些实际困难。瓦尔德海姆对本次会谈的评论是："我们取得了突破，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我第一次感到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可能性了"。

在马卡里奥斯与登克塔什会谈取得进展的鼓舞下，1977年3月31日至4月7日，中断一年的维也纳第六轮两族会谈也恢复了，但是双方没有沿着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继续寻求解决方案，反而对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框架性协议做出了不同解读，具体反映在各自提出的建议中。土耳其族主张拟议中的两族联邦，首先应该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国家，然后再向某种形式的联邦过渡。这当然不为希腊族所接受。而希腊族认为土耳其族只能拥有20%的领土，根据希腊族提供的地图，土耳其族应将尼科西亚以西的出产柠檬的莫尔富和莱夫卡、法马古斯塔地区的一些村庄及该市东部的海滨胜地瓦罗沙归还希腊族。土耳其族代表奥南拒绝了希腊族的建议，双方分歧太大无法弥合。5月20日，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双方在尼科西亚继续会谈，但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实际上，双方会谈再次陷入了对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功能和领土问题的争执之中。尽管两族对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有不同解读，但该协议

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两族后来的谈判所遵循。

美英加三国方案

1977 年 8 月 3 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病逝。塞浦路斯议会选举议长基普里亚努为代总统,并在 8 月 31 日的总统补缺选举中正式当选为塞浦路斯总统,完成马卡里奥斯总统为期 5 年的剩余任期。在 1978 年 2 月的总统大选中,基普里亚努再次当选。基普里亚努 1932 年 10 月 28 日生于利马索尔,1954 年毕业于英国格雷因法律学校,1952 年和 1954 年曾两度担任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秘书,1956~1959 年先后担任马卡里奥斯办公室驻纽约和伦敦代表,1960 年塞浦路斯独立后任司法部长,1962 年至 1972 年任塞浦路斯外交部长,是马卡里奥斯 1963 年单方面修改宪法的积极支持者。基普里亚努就任总统后继续奉行马卡里奥斯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1978 年 7 月 22 日,基普里亚努以 20 万希腊族难民必须全部返回家园为由,拒绝了土耳其族方面提出的首先让 3.5 万名希腊族难民返回法马古斯塔定居的建议。法马古斯塔百名要人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政府的草率决定,在希腊族民众的压力下,两天后塞浦路斯政府又接受了土耳其族的建议。

土耳其族的妥协性建议与美国即将审议对土耳其的武器援助有关,美国取消对土耳其武器禁运后派特使积极斡旋塞浦路斯问题,并于 1978 年 11 月,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共同提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美英加三国方案。该方案建议:(1)塞浦路斯是一个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个选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任何选区不得与任何其他国家合并。(2)新宪法在西方建议框架、1977 年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协商制定。

(3)新宪法应包括塞浦路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4)联邦政府负责外交、国防、通货、中央银行、两族之间的商贸、对外贸易、交通、联邦财政、关税、移民和民航。(5)建立两院制的联邦立法机构，上院由相等数量的两族代表组成，下院则按两族选民的比例选举产生，任何提案须得到两院通过，如果上院否决，下院有 2/3 多数通过可将上院的否决推翻。联邦政府设总统和副总统，分别由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担任。总统和副总统共同任命内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各自拥有的部长职位不少于 30%。总统和副总统能够共同否决任何立法，但如获得两院 2/3 票的支持，可以推翻总统和副总统的共同否决。联邦最高法院由一名希腊族人、一名土耳其族人和一名非塞浦路斯人组成，拥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两族平等参与公共服务系统。(6)两个选区政府不隶属于联邦政府。(7)建立一个由一位希腊族人和一位土耳其族人共同领导的区域合作协调机构，促进两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并努力促进国家的统一。(8)两区域领土划分根据诸如经济特点、生产特点、财产所有权、安全、人口类型和历史因素等综合考虑，为了达到此目的，土耳其族应该同意做领土方面的调整。(9)应规定帮助难民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区域，对不愿返回者应提供补偿。(10)除条约规定之外的所有非塞浦路斯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并考虑实现塞浦路斯的非军事化。(11)成立一个塞浦路斯和解基金，为发展项目提供资助。该基金的资金由联邦政府提供，两个区域共同管理。(12)大力促进两族建立互信，瓦罗沙的重新定居由联合国监督实施。

英、美、加三国方案没有得到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积极响应而被搁置，但后来希腊族内部对政府没有接受该方案提出强烈批评，甚至一度引起政府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再次说服双

方打破僵局，恢复会谈，促成了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的最高层会谈。

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

1979年5月18～19日，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主持下，基普里亚努与登克塔什在尼科西亚举行会谈，尽管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但双方达成了继续会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十点协议。后来以“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见称，它与“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一同成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的框架性协议。

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规定：(1)继续举行两族谈判；(2)谈判仍以1977年2月12日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以及联合国决议为基础；(3)共和国所有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必须得到保证；(4)谈判解决所有领土和宪法方面的问题；(5)优先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归还(法马古斯塔的)瓦罗沙区的协议，同时开始关于宪法和领土问题的谈判，以便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关于瓦罗沙区的协议一旦达成应立即生效，无需等待其他问题谈判的结果；(6)双方同意不采取可能阻碍谈判的任何行动，并注重可能促进友好、互信和恢复正常关系的实际措施；(7)设想塞浦路斯非军事化，并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所有问题；(8)有效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反对其他国家吞并塞浦路斯的所有领土或部分领土，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治；(9)举行两族谈判时中间无需休会期，以避免拖延时间；(10)两族谈判在尼科西亚举行。

希腊族、土耳其族和国际社会对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

协议表示满意。根据该协议,6 月 15 日,在联合国特别代表的主持下,希腊族代表约安尼季斯与土耳其族代表奥南在尼科西亚恢复了中断两年的和平谈判。22 日双方在瓦罗沙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谈判又一次中断了。土耳其族要求希腊族接受双区和安全原则才能恢复谈判,两族和谈再次陷入僵局而结束。

其后希腊族继续通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塞浦路斯问题,向土方施加压力,甚至要求联合国对土耳其实行制裁。土方对希腊族不断寻求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等地区或国际性组织介入,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努力颇为反感。为了对希腊族的这一行为进行报复,1979 年 11 月 23 日,土耳其族发表了一个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声明,"它是土耳其族所采取的分阶段反应之一,而且可能不是第一个"。虽然它不是土耳其族方面宣布独立的正式声明,但它给希腊族和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实际上,迄今为止,两族和谈不仅没有弥合双方分歧,反而在和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80 年代的和平进程

联合国的"过渡性协议"

1979 年在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基础上的谈判陷入僵局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内部出现了要求本族领导人做出让步,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呼声。1980 年初,希腊族内部对美、英、加三国方案产生激烈争论,批评政府拒绝该方案,从而丧失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机会;要求政府必须转向西方,只有西方联盟

才能帮助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一贯主张向土耳其族人妥协的反对党——民主大会党领袖克莱里季斯,发起了大规模群众性集会,指责基普里亚努总统没有贯彻马卡里奥斯已接受的双区政策,而坚持强硬的"长期斗争方针"。曾经支持基普里亚努当选总统的劳动人民进步党,也发表声明抨击基普里亚努政府,要求进行彻底改组,建立一个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实际上,这既反映了马卡里奥斯逝世后希腊族内部出现的政治动荡,也反映了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塞浦路斯局势的影响。

在土耳其族内部也出现了趋向赞成与希腊族达成折衷解决办法的新倾向。在1984年的土耳其族邦议会选举中,尽管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干涉,特别是在土耳其移民中做了某些工作,但登克塔什领导的民族团结党仅得40个席位中的18席,比上届减少了12席,而比较倾向于两族达成解决办法的族社解放党和土耳其族共和党共得19席,比上届增加一倍多。土耳其族人思想的转变,与土耳其族邦的经济环境不断恶化有关。希腊族对土耳其族长期实行经济封锁,土耳其族除与经济环境更加窘迫的土耳其有密切往来之外,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状态,而土耳其不断向塞浦路斯北部移民,也造成了土耳其族人失业率不断上升。虽然原因不同,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紧迫感。在此背景下,1980年秋至1981年冬,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进行了积极斡旋,并提出了由他制定的恢复两族和谈的"过渡性协议"。

"过渡性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重新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作为民航机场使用;把法马古斯塔以南的瓦罗沙交由联合国管理;希腊族部分解除对土耳其族的经济封锁。该协议促成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约安尼季斯与奥南之间的一系列

会谈。会谈是在以瓦尔德海姆为领导的联合国制定的“公开声明”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开声明”要求：(1)双方确认1977年马—登四点协议和1979年基—登十点协议的有效性；(2)双方支持两区联邦制方案；(3)双方同意可将安全问题提出并在会谈中讨论，即可以对土耳其族人安全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塞浦路斯的统一问题进行讨论；(4)双方请求联合国秘书长继续主持会谈。另外，“公开声明”还涉及以1979年基—登十点协议为基础的瓦罗沙定居协议；促进善意、互信和恢复正常关系以及宪法和领土问题。

尽管双方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公开声明”的四项原则，但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问题上分歧依旧，对两区也有不同解释。希腊族认为两区联邦就是在接受联邦制原则基础上的两个没有严格边界地区的联邦，中央政府必须足以维持国家的统一。两区(biregional)是指两个地区，它与多区(multiregional)相对而言。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指出：“我们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目标是一个两区的联邦，而两地理区(bizonal)是指两个分开的领土而言，一个分治的联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认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两地理区(bizonality)是完全错误的。”但土耳其族坚持认为，希腊族人接受的两区就是指两地理区(bizonal)。登克塔什认为“两地理区(bizonal)意指一个国家的领土——两个联邦国家之一，在许多方面拥有主权。我们的主权是绝对的，任何人也不能将它剥夺”。土耳其族人把两区联邦看成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向邦联目标的过渡。实际上双方会谈并未取得进展，但双方同意建立在维和部队控制下的尼科西亚的莱德拉宫每周进行对话的机制。瓦尔德海姆对此次两族会谈的评价是：“我有理由相信双方准备在宪法和领土问题上，正在向争取达成折衷协议的方向努力。”尽管瓦尔德海姆的“过渡性

协议”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突破，但却为两族在“戈比建议”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平了道路。

1981年10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雨果·戈比提出了另一个两族和谈的新建议，后来称之为“戈比建议”。该建议包括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功能、领土问题、前期讨论过的瓦罗沙重新定居问题，以及两族建立善意和互信的具体措施等。其特点是“等距离观点”和“一致观点”。“等距离观点”就是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存在着一个中间位置，也就是说双方在分歧之间做出等距离的让步，通过谈判努力寻求折衷点。“一致观点”就是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关于领土问题，戈比在塞浦路斯地图上划了一条线，即“戈比线”，要求双方根据自己的要求分别做出解释，戈比希望以此确定双方在领土方面的真正要求。两族代表于1981年10月至1982年1月间就戈比建议进行了讨论，但在关键性问题上“等距离观点”没有任何突破。土耳其族在领土上也拒绝做出太多让步，谈判仍然在以前的僵局中徘徊。

在这期间，德奎利亚尔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他曾任瓦尔德海姆的塞浦路斯事务特别代表，熟悉塞浦路斯问题。德奎利亚尔不仅重视两族高层领导人会晤的重要性，同时保持与希腊和土耳其的接触，以促进和谈进程。但是希腊族对土耳其族在宪法，尤其在领土方面的强硬立场极为不满，仍然积极寻求通过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向土耳其族和土耳其施加压力。1982年5月，37个国家代表在芬兰举行声援塞浦路斯大会，要求对土耳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迫使其从塞浦路斯撤军。1983年2月，塞浦路斯政府又建议不结盟国家会议对塞浦路斯问题做出谴责土耳其的决议。同时塞浦路斯政府积极回应苏联一贯主张的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解决

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而且还积极促使欧洲人权委员会谴责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严重侵犯人权。1983 年 4 月，塞浦路斯政府在希腊的支持下，要求联合国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实际上是对土耳其没有履行联合国决议的上诉。5 月 13 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占领军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另外，希腊还要求欧共体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向土耳其施加压力。土耳其族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对塞浦路斯政府和希腊政府努力将塞浦路斯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企图极为反感，土耳其族认为希腊族的行动破坏了“过渡性协议”和“戈比建议”要求两族采取措施表现善意和促进互信的和谈基础。1983 年 6 月，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扬言要宣布北部独立，两族关系再度紧张。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根据联大决议的要求，再次展开了恢复两族和谈的斡旋工作。1983 年 8 月提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建议。该建议包括三项内容：(1)总统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轮流担任，以此来保证国家的统一；(2)设立两院制议会，上院两族代表相等，下院则按两族的人口比例选派代表；(3)中央政府行政系统人员希腊族人占 60%，土耳其族人占 40%，土耳其族所占领土应由现在的 37%减少为 24% ~ 29%。该建议实际上是要求希腊族在中央政府的权力上妥协，而土耳其族则应在领土上做出让步。但是，希腊族认为该建议没有包括三个基本自由和难民返回家园问题而拒绝接受。据认为，希腊族领导层对该建议意见不一。总统基普里亚努反应冷淡，而外长罗兰季斯愿意接受，进而导致罗兰季斯辞职。罗兰季斯指责“基普里亚努先生并不想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希腊族争取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和对联合国秘书长

和谈建议的再次拒绝，使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族领导人非常愤怒，被激怒的土耳其族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决心完成实现分治塞浦路斯的最后目标——独立。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

尽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未能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但两族领导人基普里亚努和登克塔什愿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高级别会晤。但是，双方此次会晤的目的却截然不同。登克塔什并不是要像在1977年和1979年那样，分别与马卡里奥斯和基普里亚努会晤，达成了两族和谈的框架性协议，而是要“澄清双方的地位”，要为土耳其族邦政府争得与塞浦路斯政府平等的国际地位。

1983年11月15日，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宣读了当天由土耳其族议会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新国家将奉行不结盟政策，同时土耳其族议会任命登克塔什为总统。土耳其族人为他们新国家的诞生举行了公开的庆祝活动。次日，登克塔什呼吁全世界承认塞浦路斯有两个国家。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在塞浦路斯北部的第二个国家，我们正向另一边伸出友谊之手。”12月2日，土耳其族议会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由70名议员组成的新议会。12月6日，新议会召开第一次制宪会议。1985年3月20日，土耳其族议会通过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独立宪法”。

土耳其族宣布独立后，土耳其政府立即给予承认，并把土耳其族的建国决定，归咎于希腊族方面未能使持续了长达9年的两族和谈达成一个解决办法。土耳其外长蒂尔克告诫希腊族人和希腊

政府，“对这个新建立的共和国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起到妨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作用”。他希望希腊政府“明智地接受这一决定”。

土耳其族单方面宣布建立独立国家的决定，再次使希腊族人和国际社会震惊。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立即表示“决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指责“土耳其族领导人一直在为土耳其占领的塞浦路斯的领土脱离塞浦路斯共和国创造条件”。呼吁国际社会“现在是不能容忍弱肉强食原则和允许一个国家把它的条件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时候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严重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塞浦路斯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土耳其族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当天，尼科西亚数万名希腊族学生举行了反对瓜分塞浦路斯的和平示威游行。但希腊族人的社会秩序正常，隔离两族的“绿线”附近也没有发生事端。希腊族民众的平静反应表明，他们对土耳其族领导人可能采取的这一步骤已在预料之中。面对塞浦路斯的严重事态，塞浦路斯政府明确表示将通过联合国加以解决，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在土耳其族宣布独立后的第三天，塞浦路斯政府关闭了两族控制区的边界。

希腊政府指责土耳其族方面的行动是非法的，强烈要求西方各国政府为抵制这一非法行动而努力。针对这一事态，希腊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军事调动，但在外交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在对孟加拉国承认“北塞”的传闻尚未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就宣布与孟断交，表明希腊的严正立场。

美国对土耳其族的行动表示愤怒，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反对土耳其族宣布独立，要求土耳其族领导人撤销独立的决定。美

国担心土耳其族的这一行动，有可能会引起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冲突，在向土耳其方面施压的同时，极力要求希腊方面保持克制，不要做出草率反应。英国表示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并要求英、希、土三个保证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土耳其族的决定，但没有得到希、土两国的回应。希腊对美、英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土耳其族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欧共体、不结盟国家和苏联及其阵营国家均表示拒绝承认“北塞”的独立地位。

1983 年 11 月 18 日，应塞浦路斯政府、希腊和英国的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了第 541 号决议(巴基斯坦投了惟一的反对票，约旦弃权)，要求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当局撤销独立决定，号召所有成员国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时至今日，这个土耳其族人国家仍然只有土耳其一国承认。

两族“间接会谈”

由于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和平谈判中断。塞浦路斯出现的新危机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土耳其族的单方面行动遭到普遍指责的同时，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面临着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国内外压力。1983 年 11 月底，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基普里亚努和登克塔什分别进行了会谈，同时德奎利亚尔还分别与希腊和土耳其外长接触，要求两国政府向塞浦路斯两族施加影响。1984 年 1 月 11 日，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其前提是土耳其族必须收回独立声明。该建议包括实现塞浦路斯非军事化，塞浦路斯的和平与安全，由联合国领导的与塞浦路斯问题无关的

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承担，并由在塞浦路斯没有利益的国家提供保证，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同时建议土耳其族应将其控制的领土由37%减少到25%，把东部的法马古斯塔和北部的莫尔富归还希腊族。在宪法方面，基普里亚努提出：(1)希腊族人担任总统，土耳其族人担任副总统，部长会议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7:3的比例组成；(2)建立一院制或二院制议会均可，如是采纳后者，下院按人口比例选派代表，上院代表据其功能确定；(3)联邦最高法院由两族相等数量代表构成；(4)联邦政府负责外交、通讯、护照、海关和关税等；(5)联邦公民在全国范围内享有行动自由、定居自由和财产自由。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与联合国秘书长讨论了基普里亚努的五点建议，登克塔什拒绝接受。

为了尽快恢复中断的两族和谈，1984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分别与登克塔什和塞浦路斯外长会晤，随后提出了五点计划：第一，希腊族不再进一步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化；第二，土耳其族停止争取独立的进一步行动；第三，双方必须向联合国秘书长承诺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不再向塞浦路斯增强军事力量，同意让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监督检查；第四，土耳其族当局把瓦罗沙转交联合国暂时管理；第五，双方接受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两族高级别会晤和恢复和平谈判的呼吁。针对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登克塔什的答复是："北塞"可以停止为争取独立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只要希腊族人不再声称他们是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而且不再把土耳其族人看成是少数民族；如果希腊族人停止争取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土耳其族允许希腊族在瓦罗沙部分地区定居，但在这方面的保证必须至少在一年内有效，而且必须由联合国秘书长向全世界宣布，只有完全取消了对土耳其族人的

经济封锁，才有可能向希腊族人开放整个瓦罗沙地区；在最终找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之前，塞浦路斯的外交事务应该由土耳其族人和希腊族人共同管理。在这期间，为向土耳其施加压力，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停止向土耳其提供2亿美元的军援，直到土耳其族人把瓦罗沙归还希腊族人为止。但是，土耳其政府没有屈服美国的压力，反而在1984年4月18日与“北塞”互派大使，其强硬立场有增无减，使恢复两族和谈更加困难。

希腊族坚持土耳其族收回单方面独立声明后才能恢复和谈，而土耳其族决心维护其独立。尽管两族观点相去甚远，但联合国仍然继续斡旋。1984年8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提出了一系列“工作要点”，要求两族领导人分析评估后再做出回答。该“工作要点”的内容是：(1)法马古斯塔交由联合国控制，并最终让希腊族人返回该地定居；(2)尼科西亚国际机场重新开放，由联合国主持，两族共同管理；(3)希腊族立即停止使塞浦路斯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同时土耳其族也停止寻求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际承认；(4)接受1977年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和1979年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5)达成过渡性政府的协议并制定出详细的联邦宪法。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采用四点问答的方式确定双方对恢复和谈的态度，两族均做出了积极回应。希腊族要求如果土耳其族不撤销独立声明，便决不恢复谈判。塞浦路斯外长公开宣布，对土耳其族的任何让步，就等于“被奴役慢性死亡”。但劳动人民进步党支持总统基普里亚努接受该建议。劳动人民进步党与苏联关系密切。苏联在塞浦路斯的目标就是保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防止塞浦路斯北约化。美国已在北塞浦路斯建有军

用机场，塞浦路斯北部独立给苏联的战略将构成严重威胁，苏联担心可能会导致“双重合并”，即北部加入土耳其，南部并入希腊，这将大大加强北约的东南翼，实际上将塞浦路斯变成北约的军事基地。希腊族内部经过一番争论后最终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和谈建议，从而为两族的“间接会谈”铺平了道路。

1984年9月10日至1985年1月20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作为中间人，主持了由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举行的三轮“间接会谈”。会谈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84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里根致信土耳其总统埃夫伦将军，要求土耳其政府从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虽然积极发展与苏联的贸易，但在经济上尤其是军事上仍然依赖于美国。土耳其族宣布独立使土耳其陷入外交困境，所以对美国总统的要求也不敢充耳不闻。在两族第三轮会谈进行至第三天，德奎利亚尔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要求双方休会10天，各自讨论后再签署。

休会后，登克塔什前往安卡拉与土耳其政府讨论该协议草案。11月30日，登克塔什宣布完全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新建议，准备在领土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即从现在所控制的37%减少到29%；并放弃轮流担任联邦国家总统的要求；同意内阁部长按7:3的比例组成，不再坚持先前提出的对等原则。同时，土耳其族同意分三个阶段将瓦罗沙和另外六个地区交由联合国暂时管理，以便让希腊族难民重返定居；土耳其族人副总统的否决权限制在只与土耳其族直接有关的问题上。另外，土耳其族还提出更慷慨的让步。驻塞浦路斯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两族控制线的一条狭长的地带上，它是由希腊族提供的，以此作为缓冲区，这条地带

占塞浦路斯总领土的3%。登克塔什现在建议采取对等措施，也愿让出与之比邻的3%的领土，以便建立一个两族共管的双族区。登克塔什愿意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在两族和谈史上尚属首次。

登克塔什的主动行为，实际上是把球踢到了希腊族一边，无论希腊族接受与否，均使土耳其族人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希腊族拒绝，国际社会就可能指责希腊族毫不让步的强硬政策，出现对人口居少的土耳其族人的某种程度的同情，也可能为伊斯兰国家承认“北塞”开辟了道路。如果希腊族接受秘书长的和平建议，就必须在政治上做出重大让步，放弃对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塞浦路斯惟一合法政府的控制权，与土耳其族人做出一项过渡性联合政府的安排。尤其使希腊族举棋不定的是，秘书长的建议只是为土耳其撤军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而不是保证使土耳其立即撤军。休会后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立即与希腊族各政党及希腊政府讨论秘书长提出的协议草案。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对两族达成和平协议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乐观，他对媒体说，“只需要同两族代表会晤一小时就可以解决遗留的所有问题”。在复会时他告诫基普里努和登克塔什：“如果你们决心达成一项协议，现在就是惟一的一次机会。假如丧失了这次机会，我相信机会是不可能再有了。”果然不出所料，双方丧失了达成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协议的绝佳良机。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对秘书长的协议草案产生了不同理解。登克塔什要求双方立即在协议草案上签字，而基普里亚努则认为，协议中所包含的土耳其撤军、三项基本自由、保证国和希腊族难民返回家园四大问题，需要举行高级别会谈来进一步谈判，对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签署，因此拒绝立即签署秘书长提出的协议草案。

1985年1月20日，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历时4个月的两族高级别“间接会谈”以失败告终。

此次“间接会谈”中土耳其族所做出的让步，是自1974年7月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土耳其族所做出的幅度最大的让步，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对达成协议充满信心，但由于希腊族领导人缺乏远见卓识和对现实的洞察力，在谈判中又缺乏灵活性，丧失了自土耳其入侵后的10余年，也是时至今日的近30年中最有可能达成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协议的一次良机。

“间接会谈”失败后，1985年3月12日，土耳其族议会通过了“北塞”独立宪法。该宪法与1975年制定的宪法不同，新宪法没有提及将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可能重新统一的问题。6月9日，土耳其族举行了自1983年11月15日宣布独立以来的首次总统大选，登克塔什以70.5%的绝对优势当选“北塞”首任总统。在6月23日的土耳其族议会选举中，登克塔什领导的右翼民族团结党没有获得绝对多数，而左翼的土耳其族共和党和族社解放党却出人预料地赢得了22个席位，占总选票的37.13%。选举中左翼政党席位的增加，表明土耳其族内部希望尽快实现两族和解力量的上升。土耳其族的选举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实际上土耳其族的选举，也是对两族在“间接会谈”中未能达成协议的报复。

“间接会谈”的失败在希腊族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85年2月22日，在前议长克莱里季斯领导的民主大会党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支持下，塞浦路斯议会进行了两天的电视辩论并通过了一项动议，批评基普里亚努总统对“间接会谈”处理不当，致使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要求总统立即接受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协议草案，否则将要求举行总统选举。5月，民主大会党和劳动人民进步党，分别

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对基普里亚努总统的示威游行。11月1日,两党支持议会通过了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议案。两党决心通过议会选举获得修宪所需的席位,进而迫使对土耳其族持强硬立场的基普里亚努下台。但是,在12月9日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大会党和劳动人民进步党所得的席位,仍未达到修宪所需的在议会中占2/3的多数。两族“间接会谈”失败在希腊族内部引起的政府危机,并没有迫使基普里亚努正视现实,改变对土耳其族的强硬立场。

国际社会对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高级别“间接会谈”未能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失望,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并未气馁。从1985年底至1986年初,他分别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进行会晤,于1986年3月提出了修改后的“框架性协议草案”。“北塞”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对该建议态度积极。而希腊族方面提出了包括难民返回、三项基本自由和土耳其族人的否决权等6条反对意见,而且要求与土耳其族领导人首先就土耳其撤军、三项基本自由和国际保证问题进行谈判,认为必须对上述问题通过谈判解决后才能签署协议。希腊政府也支持基普里亚努的观点,要求双方一旦达成协议,土耳其就应立即从塞浦路斯撤军,而不是制定撤军的时间表,致使再次丧失两族和解的良机。

三、塞浦路斯问题的新变化

土耳其族争取国际承认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出现缓和,阿富汗、安哥拉、南部非洲和中

东问题出现和平解决冲突的势头。在此背景下，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开始寻求通过对话解决争端。1988年1月，在瑞士的达沃斯，希、土两国总理会谈达成了被称之为“达沃斯精神”的一系列协议，接着2月又在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上继续推进两国和解。一贯主张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苏联也表现出积极态度，表示塞浦路斯内部问题应由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谈判解决，国际方面的问题应通过国际会议加以解决。

希、土两国关系的缓和，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恢复和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8年2月，新当选的塞浦路斯总统瓦西里乌已意识到早日结束塞浦路斯分治，实现和平统一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充分利用有利形势努力营造和谈气氛，表示愿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无条件地进行会谈，这在自1974年土耳其入侵并控制塞浦路斯北部后，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十多年的和谈中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瓦西里乌先后访问了希腊、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西德、比利时、芬兰、卢森堡和梵蒂冈等国家，寻求国际社会对塞浦路斯和谈的支持。

1988年8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斡旋下，两族领导人恢复了中断三年多的直接会谈。经过历时近一年的三轮谈判，双方在未来国体、政府结构、议会席位分配、国际保证、土耳其撤军、两族居民的行动自由、定居自由和财产自由等所有重大问题上，不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由于长期谈而不决，两族间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在此次谈判中，希腊族在要求土耳其撤军的同时，还要求自1974年至今从土耳其移居到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区的土耳其移民，也必须同时撤出塞浦路斯。这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双方在移民的数目上各执一词，希腊族认为土耳其移民有

6.5万人，而土耳其族认为没有那么多，许多土耳其人是季节性工人，不在土耳其族区常住。据较为客观的估计，土耳其移民在3.5万～4.5万人之间，已有不少移民与土耳其族人结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会愈加复杂。

1989年7月，为了使陷入僵局的谈判能够继续进行，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双方的立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塞浦路斯政府很快做出响应，愿在联合国折衷方案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但登克塔什以该方案是联合国官员与希腊族人合作炮制出来的而拒绝接受，而且登克塔什扬言如果联合国不撤销该方案就退出谈判。

在两族和谈陷入僵局之际，两族内部各政党对谈判施加影响。土耳其族的族社解放党和土耳其族共和党，尖锐抨击登克塔什及其领导的民族团结党对和谈的消极态度，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2.6万多名土耳其族人签名支持两族和谈，建立两族双区联邦制统一国家，要求登克塔什坐下来认真谈判。在希腊族内部，前总统基普里亚努领导的民主党、现任议长里萨利迪斯领导的社会党以及教会力量坚决反对和谈，反对举行无条件谈判，要求把撤走土耳其军队和移民、国际保证和公民的三个基本自由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认为目前的谈判不可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希腊族社会党甚至主张制造危机，引起国际社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关注，以此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在1989年7月19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15周年之际，希腊族内部反对和谈的势力组织了数千名妇女冲击联合国维和部队守卫的“绿线”，要求返回家园。土耳其族军警抓走了108人，押到土耳其族法庭进行审判并处以罚款。登克塔什指责希腊族仍然想欺压土耳其族，认为两族居民不可能和睦相处，两族和解行不通。

“7·19事件”在两族间制造了新的对抗情绪，给一年来的两族和谈蒙上了阴影。8月下旬，土耳其族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仅反对在联合国折衷方案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而且首次正式提出要求希腊族方面和国际社会对“北塞”的地位予以承认，这是自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并控制塞浦路斯北部，1975年成立“土耳其族邦”，1983年又单方面宣布成立“北塞”之后的第三步战略性目标——争取实现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拥有独立主权的土耳其族人国家。在此后的所有和谈中，承认问题也就成了两族漫漫和谈道路上的另一大障碍。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国际形势变化对土耳其族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和“北塞”的合法化较为有利。尽管不同民族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即承认，但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美国却丝毫没有松口，这也使那些打算承认塞浦路斯分治既成事实的国家望而却步。即使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在美国中东战略价值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坚持原有立场，布什总统访问安卡拉时谈及该地区主要国家领导人，如土耳其总理厄扎尔、希腊总理米佐塔其斯和塞浦路斯总统瓦西里乌，却有意不提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可见美国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国的态度使塞浦路斯政府颇感欣慰，但土耳其族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争取“北塞”合法化的努力，仍然是塞浦路斯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申请加入欧共体导致两族矛盾激化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进行了四轮100多个小时的谈判失败后，联合国官员及美国塞浦路斯问题协调人莱德斯基，多次访问

尼科西亚、雅典和安卡拉，极力促成两族领导人回到谈判桌上。但双方立场不仅没有松动，反而因塞浦路斯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导致两族矛盾激化。

1990 年 7 月 4 日，塞浦路斯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希腊族的这一行动如巨石击水，立即在土耳其族和土耳其引起强烈反应。土耳其认为，没有得到“北塞”同意，塞浦路斯政府的申请“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效的”，在塞浦路斯分治的情况下，塞浦路斯政府无权代表整个塞浦路斯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认为，希腊族的决定是对两族和谈的“致命打击”，宣布将平时供外交人员和外国游客出入的两族之间的惟一关卡——尼科西亚莱德拉宫关卡，关闭 24 小时以示抗议，同时还宣布将瓦罗沙的控制权由土耳其军队移交给“土耳其族保安部队”，扬言要在瓦罗沙安置土耳其族居民。瓦罗沙是希腊族人的聚集地，位于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之南，1974 年之前曾是繁荣的旅游胜地，毗邻海岸高楼林立，1974 年 7 月土耳其入侵后控制该地并逐出了所有居民，至今这块长 4 公里宽 1.5 公里的地方仍用篱笆围着无人居住。瓦罗沙一边朝海，其他三边在土耳其族人控制区的包围之中，这一特点也增加了谈判解决该问题的难度。安理会 1984 年做出决议要求将瓦罗沙交由联合国管辖，让其合法居民返回定居，但一直被土耳其族和土耳其拒绝。

7 月 20 日，土耳其对希腊族申请加入欧共体做出更强烈反应，驻“北塞”的土耳其军队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 16 年之际，在绵延 180 公里的“绿线”附近调兵遣将，炫耀武力。希腊族方面也不甘示弱，10 月 30 日，以庆祝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之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将近年来从法国等国家购进的新型坦克、大

炮和反坦克火箭等军事装备，浩浩荡荡地通过尼科西亚的主要大街。同日，土耳其族一侧再次举行了大规模阅兵式。两族领导人还互相指责对方企图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实际上双方形成了严重的军事对峙局面，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从两族的军力对比看，希腊族明显处于劣势。希腊族国民警卫队的总兵力约9,500人，加上按1959年《苏黎世—伦敦协定》所规定的希腊驻军950人，总共也不过万余人。而土耳其族武装力量虽然只有4,300人，但土耳其在"北塞"驻军3.5万（土耳其族认为只有2.5万人）。土方坦克数量是希腊族的10倍，在海空力量方面土方也占绝对优势。

为了缩小悬殊的军力对比，希腊族采取了一系列增强军事力量的措施，包括开始征用女兵服役，斥巨资从西方国家购置先进的武器装备，努力使军队现代化。此外，希腊族多次要求希腊增兵塞浦路斯，以抗衡驻扎在土耳其族区的土耳其军队，但希腊担心引起新的危机，而且希腊族和希腊的军事力量远非土耳其的对手，所以希腊政府对希腊族的要求反应谨慎。

土耳其族和土耳其在极力反对塞浦路斯政府加入欧共体的同时，积极推进双方的一体化。双方签署了包括互免签证和经济合作等一系列协议。土耳其族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如果塞浦路斯政府加入欧共体，"北塞"将与土耳其合并。

塞浦路斯政府对"北塞"和土耳其的举动无可奈何，曾将塞浦路斯问题与科威特相提并论，要求国际社会像对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样迫使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并敦促土耳其向土耳其族施压，使双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但是海湾战争后，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作为中东地区的区域性大国，其军事力量举足轻

重，美国等西方国家很难向土耳其过分施压。只要土耳其不让步，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就很难取得进展。塞浦路斯总统瓦西里乌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无可奈何地承认："世界认为不会倒塌的柏林墙不是也终于倒塌了吗，但塞浦路斯之墙却日益成为事实。"

联合国的"整套设想"

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矛盾激化，严重军事对峙的局面，以及土耳其族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和不懈地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努力，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关注。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开始了新一轮斡旋。

早在1990～1991年，在与两族领导人和希、土两国讨论的基础上，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就提出了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1992年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在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三国四方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在德奎利亚尔方案的基础上推出了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整套设想"。"整套设想"内容涉及总体目标、指导原则、宪政安排、领土调整、难民安置、经济发展以及过渡时期的安排等问题共101条款。建议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两族双区的联邦制国家，两族分别管理自己的邦国，并保证两族在各自邦国内的人口和土地所有权占优势；联邦政府不得侵犯邦国的权力和职能，两个邦国也不得相互侵犯对方的权力和职能；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塞浦路斯将保持单一国家、单一主权、单一国籍和领土完整；两族安全将通过1960年的《保证条约》和《同盟条约》加以保障；除1960年条约所规定的希、土两国分别在塞浦路斯驻军950人和650人外，其他非塞浦路斯军队分批撤出塞浦路斯（不涉及英国的主权军事基地）。同时规定

三个自由权问题待“整套设想”谈判确定之后，根据1977年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谈判解决。

1992年6月至11月，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下，两族领导人瓦西里乌与登克塔什在纽约举行了间接会谈，首先就希腊族最关心的领土问题和难民问题进行了谈判。根据加利秘书长制定的划分两族领土的地图，土耳其族人控制的领土由原来的37%减少到26%，这与土耳其族人先前能够接受的29%相差不远，应该有谈判达成协议的余地。但是地图上把土耳其族最主要的生产区莫尔富划归希腊族，土耳其族认为这既违反了1977年的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中规定的按经济能力划分领土的原则，而且将会造成3.7万土耳其族人的迁徙。另外还把至今荒废的瓦罗沙划归希腊族，登克塔什拒绝接受这样的领土调整。在难民返回北部土耳其族区问题上，登克塔什同意“整套设想”的基本原则，但同时提出许多限制条件和资格审检，实际上等于否定了难民返回的权利。宪政问题的谈判更是困难重重，土耳其族不接受“整套设想”的“主权来自希、土两个族社”的提法，而要求明确确定构成联邦国家的邦国的主权不受联邦国家主权的限制，也就是要求组成两个拥有主权国家的邦联。这当然不能为希腊族所接受。这次在“整套设想”基础上，两族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连1977年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所规定的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基本原则也未能遵守。土耳其族对主权的要求成为谈判取得突破的最大障碍。

“整套设想”方案看似全面具体，其实它既不全面也不具体，核心问题模糊不清。首先，“整套设想”规定将三个基本自由问题待领土调整之后再谈判解决，其实该问题不只是宪法中的一个“自

由"问题，它与领土问题直接相关。早在马卡里奥斯在世时，克莱里季斯就提出了将土耳其族所控制的领土问题应与三项基本自由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占塞浦路斯总人口 17.4%的土耳其族人控制着 37%的领土，如果允许行动自由、定居自由和财产自由，人口密度过大的希腊族人将会大量涌向土耳其族人控制区定居，这样在土耳其族人控制区很快就会形成某些地区土耳其族人居少数的状况，领土调整也就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所以此问题必须与领土、宪法等问题同时考虑。

其次，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了便于两族谈判并达成协议，有意将某些难处理的问题模糊化，这样一来使"整套设想"反而核心问题不突出。例如对土耳其族人如何称谓和界定，希腊族人一贯认为土耳其族人是塞浦路斯的少数民族，而土耳其族人自己认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塞浦路斯的两大主体民族之一，应该在所有方面与希腊族人平等共享权力，同时他们认为拥有民族自决权，为"北塞"的合法性寻找依据。这一点类似于 20 世纪 40 年代印度的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提出的"两个民族"理论。但加利秘书长在称谓土耳其族人时，仍沿用了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中的族社（Commuity），而没有使用土耳其族人自 1990 年起用的"人民"（Peoples），这一用语使得土耳其族在谈判时缺乏激情。另外，有意淡化构建中的新国家与 1960 年成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区别，这样使得在国体与宪法问题的谈判更加困难。当然，该问题的谈判没有能继承以前谈判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像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和 1979 年的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等，此次谈判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倒退。

最后，"整套设想"中未提及土耳其移民返回的问题。因为移

民不仅改变了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人口比例，而且移民势力也削弱了两族达成协议的可能。尽管“整套设想”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仍不乏为联合国为争取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次积极努力，因为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突破都可能为全面解决问题打下基础或铺平道路。在双方会谈前后，安理会相继通过了第 750 号、第 774 号和第 789 号决议，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努力和包括划分两族领土的地图在内的“整套设想”，尤其是 1992 年 11 月 24 日通过的安理会第 789 号决议，要求土耳其族领导人对“整套设想”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但是，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陷入僵局。1992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欧共体卢森堡会议开始讨论塞浦路斯加入欧共体的谈判，使两族在“整套设想”基础上的谈判彻底失败。土耳其族表示，任何谈判的恢复决不能在“整套设想”的框架内进行，而且不能是两族之间，而应是塞浦路斯两国之间的对等谈判。

“建立互信措施”

在“整套设想”基础上的两族谈判失败后，美国对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拒绝接受该方案颇感愤怒。塞浦路斯问题久拖不决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苏联解体后苏联向塞浦路斯的渗透已不复存在，但是北约继续向前华约阵营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东扩，因塞浦路斯问题而引起的希、土两国关系的紧张，不仅成为北约东南翼的不稳定因素，也对北约东扩极为不利。另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的亲西方政策，也有利于美国要求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为了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重新拉回谈判桌，1993 年 1 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制定的“整套设

想”,同时号召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实施“建立互信措施”,作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突破口。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对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塞浦路斯问题调解员和联合国秘书长一致认为,一方面是该问题很复杂,另一方面是两族缺乏互信。美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从错综复杂的问题中,选择两个较易解决,同时对两族都有利的问题,要求两族对等做出让步,加以解决,促进建立两族互信。1993 年 3 月,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在纽约会谈,确定谈判“建立互信措施”。5 月 24 日,克莱里季斯、登克塔什进行直接会谈,集中讨论“建立互信措施”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瓦罗沙重新定居和重新开放自 1974 年关闭的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美国要求土耳其族将瓦罗沙交由联合国管理,然后让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原有居民返回定居,作为回报,希腊族相应地同意尼科西亚国际机场在联合国的管理下重新开放,两族人或外国游客均可从任何一方出入该机场。它对土耳其族的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

美国和联合国选择这两个问题作为“建立互信措施”的突破口,要求双方对等让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步骤。一方面部分解决希腊族的难民问题,两族商人可以在该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和旅游等,两族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实际上就是把瓦罗沙重新建设成为一个旅游度假胜地和自由贸易区,对处于孤立状态的土耳其族经济尤有促进作用。尼科西亚国际机场对两族和其他国家重新开放,也将极大地促进两族尤其是土耳其族的对外交往和贸易。

1993 年 5 月 24 日,在加利秘书长的主持下,克莱里季斯、登克

塔什举行上述两问题的直接谈判。在谈判进行中,登克塔什请求短暂休会回去磋商。起初他向土耳其总理伊诺努介绍了解决瓦罗沙和尼科西亚国际机场问题对土耳其族的好处,伊诺努公开表示支持,但当登克塔什回到"北塞"组织专家研究后发现,所谓的对土耳其族方面的好处实际上没有提供技术性保证。他前往安卡拉对土耳其议会作了长篇解释,要求土耳其政府和议会对"建立互信措施"持谨慎态度。由于土耳其深知该措施的后台是美国,没有对登克塔什的要求立即做出响应。登克塔什离开后,土耳其议会展开了激烈辩论,认为土耳其政府应对处于孤立无援的土耳其族领导人给予支持。土耳其民众也普遍支持登克塔什,认为"建立互信措施"从一开始就更多地考虑了希腊族的利益。登克塔什回到"北塞"后,土耳其族议会也反对该措施,认为这是联合国在蚕食土耳其族的利益,将会使土耳其族丧失谈判优势,要求对塞浦路斯问题应予全面解决。

对实施"建立互信措施",希腊族内部也担心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地对"北塞"予以某种程度事实上承认的后果。而克莱里季斯当选后更注重加强塞浦路斯与欧共体的关系,寄希望于欧共体在土耳其加入问题上对其施压,这样才能把塞浦路斯问题彻底解决,才能更有力地发挥希腊的影响力,甚至包括使用否决权。但是,不论是希腊族方面还是土耳其族方面,他们对"建立互信措施"的反对和担心只限于他们内部,双方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或拒绝参加会谈。1994年年初,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特别代表克拉克的主持下,双方在接受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举行具体实施"建立互信措施"的间接谈判。由于双方都缺乏诚意又无力承担拒绝的后果,所以就成了为谈判而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提出诸多问题,直到

1994年年底仍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美国支持由联合国主持的“建立互信措施”并没有能够实施。

此次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建立互信措施”谈判的失败，与希腊族方面的政策调整关系很大。克莱里季斯一改过去一贯坚持的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对土耳其族做出让步，尽快达成折衷解决方案的原则立场。1993年11月中旬，克莱里季斯对希腊进行了正式访问并达成了新的共识，抛弃了近20年来两国遵循的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由“塞浦路斯政府决定、希腊政府支持”的方针，改为重要决策由两国共同决定。

塞浦路斯政府政策的调整也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塞浦路斯政府曾一直把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美国向土方施压，使土方改变立场。但在海湾战争后，随着土耳其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土耳其的重视，塞浦路斯政府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向土方过分施压，而且以前的经验也表明土方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所以塞浦路斯政府也就不再把美国看成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惟一希望，相应地把目标转向了欧共体，尤其注重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同宗、同源、同文化的欧共体成员国希腊的作用，希望希腊在土耳其加入欧共体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土耳其做出较大让步，以获得更有利于希腊族人的解决方案。但是，希腊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是基于希腊的国家利益，例如希腊把塞浦路斯问题与希、土两国爱琴海争端联系起来，把塞浦路斯当成调节希、土两国关系的杠杆，这样反而妨碍了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施被迫推迟，第一阶段的过渡期延长。1977年和1980年，塞浦路斯政府与欧共体两次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备忘录，塞浦路斯在财政、科技、文化等方面得到欧共体的援助。1980年11月，在欧共体外长会议上，塞浦路斯与欧共体达成第二阶段的联系协定。1984年双方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6亿塞镑(约合8.8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1987年5月，塞浦路斯政府与欧共体草签关税同盟协定，10月19日，双方正式签订关税同盟协定，塞浦路斯成为第一个与欧共体签订关税同盟的非欧共体成员国。协定规定继续实施第二阶段的过渡，并要求到2001年，最晚至2002年将执行共同关税政策，双方消除所有关税和所有工业品及大部分农产品(主要包括西红柿、柑橘类水果、蔬菜和葡萄酒)的配额限制，塞浦路斯应于1997年年底前完成转换，适应欧共体的共同关税政策。为了实现此目的，1984～1988年欧共体向塞浦路斯提供了3,600万美元的第二次财政援助。1989年11月，塞浦路斯与欧共体又签署了欧共体向塞浦路斯提供3,200万塞镑(约合6,400万美元)的第三个议定书。随着关税同盟协定的签署和塞浦路斯与欧洲委员会及其他欧洲组织关系的发展，备受鼓舞的塞浦路斯政府于1990年7月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1993年6月30日，欧洲委员会公布了对塞浦路斯申请加入欧盟的意见，确认了塞浦路斯的欧洲特征，认为"塞浦路斯符合入选欧盟成员国的条件，只要塞浦路斯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欧盟将准备启动塞浦路斯最终加入欧盟的程序"。同时该意见也提出了解决塞浦路斯分治现状的要求。因为按照欧盟条约，在欧盟各成员国内部必须实行基本自由，尤其是货物、人员、服务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设立机构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广泛认同的

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只有在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意见进而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意味着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达成永久性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协议，建立互信，建立共同管理整个塞浦路斯的两族联合政府。

1993 年 10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委员会的意见，并表明了其积极立场，认为塞浦路斯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委员会还支持欧洲委员会提出的与塞浦路斯政府密切合作，促进塞浦路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换，最终使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入欧盟的设想。欧盟委员会请求欧洲委员会与塞浦路斯政府开始实质性磋商，帮助塞浦路斯政府做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入盟谈判的准备工作。

1993 年 11 月至 1995 年，欧洲委员会与塞浦路斯政府开始实质性磋商，帮助塞浦路斯政府提高管理水平，以熟悉欧盟现行的各项条约、政策、法律和法规。1994 年 6 月，欧盟卢佛会议评估了塞浦路斯与欧盟关系，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初级阶段已经完成，决定欧盟下一波扩大将包括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该决定在随后的欧盟埃森会议（1994 年 11 月）、戛纳会议（1995 年 6 月）、马德里会议（1995 年 12 月）和佛罗伦萨会议（1996 年 6 月）上进一步得到确认。而且在戛纳会议上，欧盟决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入盟谈判，将在 1996 年 3 月开始的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的 6 个月之后开始进行。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欢迎欧盟原则上决定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确定谈判日期，称这一决定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打开了大门。

1995 年 3 月 6 日，欧盟理事会议决定建立欧盟与塞浦路斯在内政、司法、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领域的对话机制，而且得到同年 7

月 17 日欧盟理事会的确认。5 月，欧盟“三驾马车”代表团访问塞浦路斯，双方进一步沟通与磋商。6 月 12 日，塞浦路斯—欧盟联系委员会第 9 次会议文件称，欧盟与塞浦路斯建立对话机制的目的是“帮助塞浦路斯实现加入欧盟的目标，对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与实现塞浦路斯和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联系委员会将保持与塞浦路斯政府的协商和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必要的接触，在对话机制中欧盟只起中间协调人的角色”。并通过了欧盟对塞浦路斯的第四次财政援助，其金额是 7,200 万欧洲货币单位，帮助塞浦路斯按照入盟要求完成其经济转换。

1997 年 2 月 26～28 日，欧盟外事委员会专员范登布鲁克访问塞浦路斯，与两族领导人会谈，重申塞浦路斯的入盟谈判将无条件地于 1998 年初开始，并指出 1997 年对塞浦路斯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希望两族实现和解。3 月 16 日，在荷兰召开的欧盟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再次保证塞浦路斯入盟谈判将在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 6 个月开始。6 月 26～29 日，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前往阿姆斯特丹参加 12 国会议，听取欧盟首脑会议对塞浦路斯入盟问题的意见和建议。7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2000 年日程》文件，决定欧盟首批东扩 6 国名单，其中包括塞浦路斯。10 月 6～7 日，欧盟—塞浦路斯混合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塞浦路斯政治形势和入盟进程的报告。8～11 日，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赴法国参加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第二届欧洲委员会首脑会议，并同欧洲委员会主席桑特就塞浦路斯入盟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会谈。12 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决定将塞浦路斯及其他 5 国列为首批入盟候选国。1998 年 3 月，欧盟 15 国与塞浦路斯等 11 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欧盟东扩开幕式”，塞

浦路斯等6个首批候选国与欧盟举行政府间会议，塞浦路斯等国入盟谈判正式开始。11月，欧盟15国外长与塞浦路斯等入选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议，回顾6个入选国为达到入盟标准所取得的进展，并就今后的努力方向问题进行了谈判，标志着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实质性谈判的开始。

1999年，欧盟决定不再把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为塞浦路斯入盟的先决条件。2000年3月，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访问法国，在塞浦路斯问题及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上争取法国的支持，法国明确表示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4月，塞浦路斯与欧盟就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社会和就业政策、渔业以及公司法等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6月双方开始就农业问题进行谈判。8月，塞浦路斯与欧盟签署财政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将向塞浦路斯政府提供477万欧，支持塞浦路斯的改革及社会发展等项目。9月，欧盟负责塞浦路斯入盟事务的官员利奥波得·莫勒访问塞浦路斯。10月，塞浦路斯与欧盟签署开放空运业的协议。同月，塞浦路斯宣布，将于2001年6月前，结束有关入盟一体化的29个领域的谈判，塞浦路斯入盟的日期大约在2003年1月1日到2004年1月1日之间。塞浦路斯为之奋斗40年的目标即将变为现实，以希腊文化为特征的塞浦路斯希腊族即将进入欧洲文明圈。

土耳其族坚决反对凸显两种文明差异

塞浦路斯政府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加入欧盟的条件基本成熟，1990年向欧盟提出正式申请，但塞浦路斯政府的举动遭到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强烈反对。首先，土耳其族认为，完全由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更不能代表整个塞

浦路斯申请加入欧共体。由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代表整个塞浦路斯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自 1963 年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改宪法导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后，1963 年 12 月 21 日土耳其族退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联合政府，当时曾出现过对塞浦路斯政府合法性的质疑。由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激烈冲突，联合国急于向塞浦路斯派驻维和部队，而联合国向任何国家派驻维和部队首先必须得到该国政府的同意。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不容联合国迟疑，在征得塞浦路斯总统、希腊族领导人马卡里奥斯的同意后，联合国维和部队于 1964 年 3 月正式开始在塞浦路斯维和。联合国也就把完全由希腊族人所把持的塞浦路斯政府，作为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除了土耳其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都承认这一事实。1974 年土耳其入侵并至今占领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的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也失去了国际社会道义上的支持。1975 年土耳其族成立了土耳其族邦，1983 年又单方面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除了土耳其之外国际社会至今拒绝承认，土耳其族的举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反而使得国际社会对希腊族更加同情，进一步强化了希腊族领导的塞浦路斯政府的惟一合法性。

对于塞浦路斯政府推动加入欧共体，在最初的十多年里，一方面由于推进的速度慢，另一方面也由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占人口 17.4%的土耳其族人却控制着 37%的领土，而且土耳其族人占有了逃往南部的 20 万希腊族人的财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希腊族人不仅失去了领土，而且要安排 20 万难民，在头十年的确经历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所以，起初土耳其族对塞浦路斯政府加入欧共体的行动虽然反对，但并不那么强烈，只是更多地抱怨塞

浦路斯政府自1979年以来把欧共体对塞浦路斯财政援助的2.1亿美元几乎全部占为己有。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意识形态的敌对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竞争,国际政治中经济因素进一步突出,此时塞浦路斯南北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处于孤立状态的"北塞"不仅经济规模较小,而且受80年代土耳其经济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相比之下,南部的塞浦路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紧急经济行动计划,再加上较多的外援,到1979年经济已完全恢复至土耳其入侵前的水平,其后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此背景下,当1988年塞浦路斯总统瓦西里乌宣布塞浦路斯将申请加入欧共体时,"北塞"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一方面指责塞浦路斯政府只能代表希腊族,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申请加入欧盟。另一方面,土耳其族认为欧共体的人员、货物、资金和服务等自由流动政策,尤其是农业、渔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政策,目前在塞浦路斯根本不可行。所以当1990年塞浦路斯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时,引起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矛盾激化,形成了沿"绿线"两侧军事对峙的紧张局面。

1993年6月30日,根据塞浦路斯政府的申请,欧共体委员会向欧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塞浦路斯状况的评估报告。由于"北塞"反对加入和不予合作,该评估报告中有关土耳其族区的所有统计数据,完全是由塞浦路斯政府根据所能得到的土耳其族人的有关资料提供的,其中也不乏对土耳其族人的偏见。但是欧洲委员会据此报告得出结论:塞浦路斯可作为欧共体的候选国,塞浦路斯和解问题很快会达成协议,欧共体准备开始塞浦路斯入盟谈判。但是欧共体委员会评估报告中,关于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很快会实现和解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两族在联合国制定的"整套设

想”基础上的谈判失败了。欧洲委员会认为,塞浦路斯局势必须根据两族在谈判中所持立场重新做出评估,塞浦路斯加入欧共体的事宜应在 1995 年 1 月重新考虑。但实际上欧共体并未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进行重新评估,而且在 1993 年至 1994 年美国号召实施“建立互信措施”的谈判也未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在 1994 年 6 月 24 ~ 25 日的欧共体卢佛会议上决定,“欢迎塞浦路斯在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督促加快在下轮欧盟扩大中接纳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谈判进程”。在 1994 年 12 月的埃森欧盟峰会上决定,下轮欧盟扩大将包括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这一决定在随后的多次欧盟会议上进一步得到确认。

其次,土耳其族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 1960 年宪法,认为土耳其族有权对涉及塞浦路斯共和国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使用否决权。同时土耳其族依据《苏黎世—伦敦协定》,认为塞浦路斯不能加入希腊和土耳其尚未均是其成员的国际组织。虽然希腊已于 1981 年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但土耳其长期努力加入欧盟的目标尚未实现。1995 年 3 月,土耳其外长也表达了土耳其政府在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土耳其认为《苏黎世—伦敦协定》继续有效,其中第八款规定:塞浦路斯共和国只能加入希腊和土耳其都是其成员的国际组织或联盟,否则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任何一方均可合理使用其否决权。所以土耳其认为在土耳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塞浦路斯无论其整体或部分均不能成为欧盟成员。土耳其威胁称:“欧盟把塞浦路斯接纳为其成员的决定,将会导致塞浦路斯永久地分治”,“土耳其从法律、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土耳其族反对希腊族单方面申请加入欧盟”,而且土耳其扬言如果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土耳其将加速推动“北塞”与土耳其

的一体化进程。1995 年 12 月 28 日，在欧盟与土耳其建立关税同盟协定生效前夕，土耳其总统与“北塞”“总统”发表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上述立场。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在议会阐述土耳其对外政策时也再次强调，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安危是土耳其的民族事业，土耳其不会屈从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根据《苏黎世—伦敦协定》，土耳其有权反对塞浦路斯加入土耳其尚未是其成员的欧洲联盟。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 1960 年宪法，土耳其族也有权使用否决权，反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但是，1974 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3.5 万土耳其军队长期驻扎在塞浦路斯北部拒不撤出，土耳其的行动已严重破坏了《苏黎世—伦敦协定》，而 1983 年土耳其族单方面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也违反了塞浦路斯共和国 1960 年宪法。如果遵守《苏黎世—伦敦协定》和塞浦路斯共和国 1960 年宪法，首先应该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欧盟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

独立后的塞浦路斯面向西方，重视与欧洲的交往。1961 年 5 月 24 日加入欧洲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的第 16 个成员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关系密切，欧共体自然也关注塞浦路斯问题。欧共体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欧共体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1959 年欧共体支持保证塞浦路斯独立的《苏黎世—伦敦协定》。1974 年 7 月 15 日，希腊军政府策划政变推翻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合法政府，次日，欧共体九国立即磋商塞浦路斯局势并发表联合公报，“反对旨在损害塞浦路斯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干涉或干

预”,并因此终止了希腊作为欧共体联系国的地位。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也在其声明中强调,“应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与完整”。当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欧盟部长委员会立即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对土耳其的草率行动深表遗憾。1975 年 2 月 13 日,当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宣布成立土耳其族邦后,虽然欧共体的声明中没有明确谴责土耳其族的行动,但是通过引用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表明欧共体完全反对土耳其族的单方面决定。土耳其族人在分裂塞浦路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欧共体的立场也就更加明确和强硬。当 1983 年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后,欧共体十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土耳其族的分裂行动,要求其他国家不要承认土耳其族人单方面宣布成立的国家,坚持基普里亚努政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声明承诺欧共体各成员国“无条件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并支持联合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斡旋和调解。

1990 年 6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在都柏林发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声明:“欧盟委员会密切关注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坚持原有立场,根据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指出“塞浦路斯问题影响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号召“努力消除影响两族通过有效对话公正和灵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障碍”。1993 年的欧盟宣言认为,“塞浦路斯现状的继续存在是不能接受的,它造成了该地区局势的不稳定”,要求“土耳其政府遵守联合国决议,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出占领军,号召用联合国维和部队取代土耳其军队”,以维护塞浦路斯和

平。1995 年 12 月 15～16 日，欧盟马德里会议再次强调，“把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在两族双区联邦制基础上努力实现公正、合理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欧洲议会也采取类似立场，号召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第二，欧盟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调解。从 1994 年开始，欧盟决定向塞浦路斯派观察员，其职责是：一方面定期向欧盟报告塞浦路斯执行欧盟准则的进展；另一方面及时反映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状况。其中首位观察员在其提交欧盟的三份报告中均承认，“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成为两族会谈和关注的焦点之一，建议欧盟委员会“在塞浦路斯入盟问题上放弃欧盟卢佛会议的立场，采取积极态度，努力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

1995 年 7 月 12 日，欧盟在关于塞浦路斯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决议中称：欧盟“认为塞浦路斯是一个单一实体，拥有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合法政府，塞浦路斯现状是不能接受的”。欧盟坚定地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和两族高层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为基础，为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做出的努力，支持 1977 年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和 1979 年基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所确定的，建立一个统一的两族双区联邦共和国设想，认为该设想“既保证了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保证了所有塞浦路斯人在政治、文化和公民权上不受任何歧视或限制”。

1996 年，欧盟委员会决定由欧盟轮置国主席派代表了解塞浦路斯和平进程，1 月意大利派出了首位代表，其后是爱尔兰。这些

代表在报告中均建议,欧盟应继续支持联合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调解,积极参与塞浦路斯和平进程,让一个统一、和平、繁荣的塞浦路斯进入欧盟。

第三,欧盟在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坚定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而且给塞浦路斯政府财政援助,帮助塞浦路斯政府尽快适应欧盟的各项政策及经济法规。但是由于塞浦路斯问题长期拖而未决,欧盟担心一旦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将会把冲突带入欧盟,影响欧盟的稳定。因此在1993年欧洲委员会对塞浦路斯政府申请加入欧盟的评估意见中,尽管确认"塞浦路斯符合入选欧盟成员国的条件",但前提是"只要塞浦路斯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显而易见,欧盟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态度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合理持久解决之后,"才能启动塞浦路斯最终加入欧盟的程序"。而且欧盟内部对塞浦路斯加入问题也有不同观点,特别是英国,由于它在塞浦路斯仍然保留有两个主权军事基地,对塞浦路斯有着重要影响。在70年代英国曾积极推动塞浦路斯加入欧共体,但当发现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极力反对时,英国对塞浦路斯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开始持谨慎态度,担心一旦引起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新的冲突,会殃及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利益。英国首相梅杰在对下院的讲话中称,由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意见不一,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还很遥远。1995年1月,梅杰与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会晤时认为,在欧盟与塞浦路斯政府开始进行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最后谈判之前,必须搞清楚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离达成和解协议还有多远。欧洲委员会也曾表示过类似的谨慎态度,但没有进一步明确要求以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法国也曾强烈反对将军事冲突引入欧盟。但是欧洲委

员会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将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早日解决起积极的“催化”作用，所以在积极促进塞浦路斯入盟的同时，加大了对“北塞”施压的力度。1994 年 7 月 5 日，欧洲法院以“北塞”产品没有由塞浦路斯政府颁发的“合格证”为由，做出了禁止“北塞”向欧盟各国出口产品的禁令，此前英国已经禁止进口“北塞”的柑橘类水果和马铃薯。

“北塞”主要出口柑橘类水果和农产品，欧洲法院的裁决结果对“北塞”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以沉重打击，“北塞”立即终止了与希腊族的进一步谈判。1994 年 8 月 28 日，“北塞”议会通过决议：“如果欧洲法院不撤销其禁令，如果希腊族继续单方面寻求加入欧盟，‘建立互信措施’的谈判就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结果；‘北塞’的独立、主权必须得到承认；任何谈判必须考虑到政治上的平等和土耳其族的权利。”而且强调“北塞”与土耳其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针对土耳其族的立场，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不能再对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忽视或视而不见”，应采取措施督促土耳其族接受安理会 1994 年 7 月 29 日通过的第 939 号决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方案必须保证塞浦路斯国家的单一主权、单一国际地位和单一国民”。

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紧张关系促使联合国再度积极斡旋。1994 年 10 月，在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古斯塔夫·费索尔的主持下，克莱里季斯与登克塔什在尼科西亚举行了五次会谈。克莱里季斯建议，如果土耳其族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希腊族愿意接受土耳其族曾要求的瑞士式的联邦，而且还可推迟加入欧盟直到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建立起联邦国家。但是土耳其族方面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克莱里季斯的建议。土耳其族认为如果土耳其

族支持希腊族加入欧盟，就等于承认由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的合法性；其次，土耳其族希望在联合国“整套设想”和“建立互信措施”框架内全面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首先就联邦形式、领土调整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避免化整为零的解决方案使土耳其族丧失其优势，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后，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应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另外，土耳其族还拒绝了克莱里季斯提出的难民有限返回，以换取土耳其族在领土上做出较大让步的建议。希腊族还愿意以总统轮换制换取塞浦路斯的完全非军事化，但土耳其族认为塞浦路斯的完全非军事化，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土耳其对他们安全的保证，因而拒绝接受。

1995年1月20日，登克塔什提出了进一步表明其立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该计划并没有突破历次谈判中土耳其族所持的立场，如建立两族双区的联邦制国家，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有限，而两个邦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联邦，这当然不为希腊族所接受；又如提出建立由两族领导人组成过渡性机构促进塞浦路斯的政治进程，希腊族认为必须在达成建立联邦的协议后才能组成过渡性政府，否则就意味着否定了塞浦路斯政府的存在，变相承认了土耳其族的不合法政府。尽管联合国和美国认为该计划有积极因素，但希腊族拒绝接受。希腊族认为只有土耳其族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才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欧盟于1995年3月决定在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6个月之后开始同塞浦路斯政府举行入盟谈判。欧盟的这一决定旨在促使加快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希望看到两族能共同组成代表团参加谈判。尽管土耳其和土耳其族坚决反对欧盟同塞浦路斯政府举行入盟谈

判，并以将“北塞”与土耳其合并相要挟，1997 年 7 月，欧盟再次确定把塞浦路斯和东欧 5 国作为首批入盟对象，入盟谈判也将于次年 4 月正式开始。欧盟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土耳其和土耳其族的强烈反应。土耳其副总理埃杰维特因此出访“北塞”，同“北塞”当局签署联合宣言，正式提出土耳其与“北塞”合并的步骤。8 月 6 日，土耳其外长杰姆再访“北塞”，同土耳其族当局签署了一项具体协议，声称如果欧盟不放弃同希腊族方面的入盟谈判，土耳其将同“北塞”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实行全面合并，在安全、防务和外交领域实行部分合并。土耳其此举旨在向欧盟施加压力，增加土耳其族在谈判方面的筹码。

此后，塞浦路斯政府展开积极外交活动，特别是希腊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 1999 年 12 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确定土耳其为欧盟正式候选国，但前提条件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得到解决后，才可以开始入盟谈判。同时向希腊承诺，当满足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后，塞浦路斯就可以加入欧盟，不再考虑其分裂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这样，欧盟 15 国放弃了塞浦路斯统一这一原来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附加的先决条件。2003 年 3 月，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访问法国，争取法国在塞浦路斯问题及其加入欧盟问题上的支持，法国明确表示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欧盟各国放弃了永久性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作为其加入欧盟的条件，接纳一个分裂的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这在欧盟历史上尚属首例。

欧盟希望通过确定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谈判向土方施加压力，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尽快解决。但欧盟过分地受到了希方的影响。例如 1995 年初的欧盟考察报告和 1995 年的欧洲议会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决议，其观点基本依从了希腊族对塞浦路斯问

题的立场。就塞浦路斯政府而言，虽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贯承认它是代表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但在具体斡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仍然要与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接触磋商，而欧盟对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毫不置疑，而且认为它在事实上也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对土耳其族权力机构视而不见。欧盟在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问题上只与希腊族人谈判，对于“北塞”只是鼓励其工商界人士赴欧盟考察，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忽视了登克塔什政府的控制权，其结果不仅没有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起到“催化”作用，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甚至加速了塞浦路斯的分裂。

另外，欧盟促进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确对土耳其族产生了一定压力，但是，欧盟只是向土耳其族施压，而没有劝导希腊族在谈判中持积极态度，欧盟似乎成了希腊族向土耳其族加压的筹码，欧盟的这一立场并不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欧盟和希腊族似乎都忘记了尽管他们有政治和经济筹码，但土耳其族也有可以藐视一切的军事杠杆，其结果只能是僵局依旧。

二、两族关系趋紧　英美与联合国促和

“冲击绿线事件”与“导弹风波”

在希腊政府的支持下，希腊族人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加快了加入欧盟的进程。但是，土耳其族以希腊族人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为由，要求在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前，必须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还根据《苏黎世—伦敦协定》要求塞浦路

斯加入欧盟必须以土耳其是欧盟的成员为前提。土耳其族的极力阻挠使希腊族颇感愤怒，在希腊族的努力下欧盟禁止进口“北塞”产品，给本来就处于困境中的“北塞”经济巨大打击，新仇旧恨使两族矛盾进一步激化。1996年8月，希腊族示威者冲击“绿线”缓冲区，两名试图爬上旗杆撕下土耳其国旗的示威者，被土耳其族军队开枪打死，土耳其族军人也有一死一伤。塞浦路斯政府没有对希腊族示威群众进行有效控制，希望通过制造事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督促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土耳其族当局的过激行动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也招致了国际社会包括某些土耳其族人和土耳其人士的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国旗只是“一块布而已”，无须反应如此强烈，但土耳其外长吉洛则严正警告：“任何人胆敢侮辱我们的国旗，我们将打断他的手”。

“冲击绿线事件”发生后，希腊和土耳其总理先后飞抵塞浦路斯，分别对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表示支持和声援。10月，希腊和希腊族、土耳其和土耳其族分别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希、土两国均派出战机飞临塞浦路斯领空进行投弹和轰炸等实战演习。次年1月4日，希腊族又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价值6亿美元的武器合同，计划购置俄制S—300地对空导弹，从而又引发了一场“导弹风波”。

这次“导弹风波”是希、土两国大肆插手塞浦路斯事务的结果。自1994年希腊与希腊族达成联合防务协议后，仅1996年，除塞浦路斯政府从俄罗斯购进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外，希腊170亿年军备采购计划中，其中20亿美元的装备要布置在塞浦路斯。此次欲购的俄制S—300地对空导弹，射程150公里，不仅可以打击侵犯塞浦路斯领空的土耳其战机，而且还可打击离塞浦路斯仅80公里

之遥的土耳其境内的其他目标。希腊族在佩福斯修建的空军基地也已完成,可供希腊战机使用。希腊族人的整个军事发展计划,不仅为防御土耳其的进一步入侵,而且是要对日益频繁侵犯塞浦路斯领空的土耳其战机构成威慑,希腊也企图通过增强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本身的军事力量,达到牵制土耳其的目的。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政府购置俄罗斯导弹反应强烈,认为它直接威胁到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土耳其外长吉洛声称,如果有必要土耳其将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此俄罗斯也做出回应:“不能容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的威胁。”尽管苏联解体后继承了前苏联主要军事设施的俄罗斯,其整体实力远不及前苏联,但对北约咄咄逼人的东扩仍存有戒心,企图在塞浦路斯制造事端,引起希、土两国关系紧张,给北约的东南翼制造裂痕,以牵制北约的急剧东扩。但是俄罗斯表面上仍然称它向塞浦路斯出售导弹仅仅出于商业目的。美国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土耳其保持克制,认为土耳其无权向希腊发出威胁,并派负责南欧事务的官员凯里·卡瓦纳穿梭协调,在得到俄罗斯承诺 16 个月内不会交付布署导弹的保证后,希、土双方的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

“导弹风波”不仅使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以及希、土两国本来就已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而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使土耳其更坚定了不能从塞浦路斯撤军的决心。土耳其和土耳其族一致认为,希腊族在希腊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不仅对土耳其族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影响,因此,土耳其在“北塞”的军队必须长期保持下去。其次,土耳其与“北塞”高层互访频繁,签订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协议,其中最突出的是在 1997 年 1 月 20 日双

方签订的《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宣言》，该宣言是在新形式下对 1995 年 12 月 28 日双方签订的《联合宣言》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次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也做出了批准该宣言的决议。该宣言称土耳其将始终不渝地支持“北塞”，确保土耳其族人的安全；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必须保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政治平等，承认塞浦路斯存在两个主权国家，采取邦联方式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机会；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必须在两族达成政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协议后，在两族代表共同参与下才能讨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条件，而且必须是塞浦路斯与土耳其同时加入欧盟。同时，土耳其与土耳其族一致发出威胁，如果希腊族单方面加入欧盟，他们将加速“北塞”与土耳其的一体化进程。1997 年 1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向“北塞”提供 2.5 亿美元援助的议案。

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希望尽快加入欧盟，然后通过欧盟再对土耳其和“北塞”施加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迫使土方妥协，所以故意淡化土方的威胁，认为那是“虚张声势”。但从塞浦路斯独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看，土耳其从威胁要武装干涉到入侵塞浦路斯，从土耳其族声言要独立到正式宣布独立，实际上土耳其族为了自身安全，不会做出妥协，而且在土耳其看来，塞浦路斯问题是土耳其的民族事业，没有任何妥协或退让的余地，不论遇到外部多大的压力也要勇敢地面对。

英美与联合国促和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缓和，但地区性的民族、宗教和极端分裂势力造成的地区冲突加剧，塞浦路斯局势充分反映了这一新特点。

塞浦路斯问题的久拖不决且时有激化，从而导致希、土两国关系紧张，对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感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紧迫感。因为塞浦路斯问题一天不解决，北约的东南翼就不能算真正稳固。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承诺要在任期内争取解决塞浦路斯问题。1995 年 11 月，克林顿总统派特使詹姆斯·贝蒂访问塞浦路斯，促使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发表了一项承诺政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联合公报。1996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要求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边防军司令会晤，缓解沿"绿线"的军事对峙，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土耳其族响应了奥尔布莱特的要求，但希腊族以土耳其占领军的继续存在为由拒绝派代表参加。仅仅时隔一月，1996 年 8 月就发生了希腊族示威者冲击"绿线"事件。

"冲击绿线事件"发生后，英国派特别代表戴维·汉内前往塞浦路斯斡旋，提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十点建议，强调通过联合国、欧盟和美国的合作解决塞浦路斯问题。1996 年 12 月，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赖福克德访问塞浦路斯时，将汉内的十点建议正式提交两族领导人考虑。其实这十点建议并无新意，只是对 1992 年联合国秘书长制定的"整套设想"和 1994 年"建立互信措施"的概括，它既没有"整套设想"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又缺乏"建立互信措施"希望打破谈判僵局的创意。尽管该建议把塞浦路斯希腊族控制的南部和土耳其族控制的北部称为"两国"，要求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然后再进行加入欧盟的谈判，这个提法得到土耳其族的喝彩，同时该建议要求实施安理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但未明确土耳其的保证国地位，也使土耳其族颇感不悦。希腊族官方没有做出反应，只是内部各党派批评该建议未提及土耳其军队和

移民撤离塞浦路斯，以及希腊族难民返回家园等问题。实际上两族领导人并未对英国的建议给予足够重视。

自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英国逐渐远离了这个越理越乱的塞浦路斯问题，在20多年中，仅仅在1978年协助美国制定过"美英加三国方案"。英国担心介入调解塞浦路斯问题，任何建议如果得到一方的支持，必然要遭到另一方的反对，因为双方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几乎都是截然相反，搞不好就会危及自身的利益。英国在结束其对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时，不仅与希、土两国同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的保证国，而且于1960年与塞浦路斯政府签订了《设立军事基地条约》，至今英国仍然在塞浦路斯拥有两个主权军事基地，即利马索尔以西的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和拉纳卡以东的德克利亚陆军基地，两个基地占塞浦路斯总领土的3%，均在塞浦路斯南部的希腊族控制区。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目标就是确保其军事基地的安全，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免得引火烧身，引起任何一方对基地的存在提出疑义。尽管如此，英国仍然与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基本持中立立场，因而每个塞浦路斯和平方案均把英国作为理所当然的保证国。

另外，英国一贯坚持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的有效性，坚持塞浦路斯政府仍然是代表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该立场不仅是其主权军事基地存在的合法依据，实际上它在中立的同时也偏向希腊族，因为其军事基地均在希腊族人控制区，所以在塞浦路斯的和平谈判中，希腊族不断强调塞浦路斯的非军事化，也仅指土耳其撤军问题，从来未涉及英国的军事基地。此次英国提出十点建议，一方面

由于美国的积极斡旋，美国也督促在塞浦路斯有重要影响和作为保证国的英国发挥其影响力；另一方面，塞浦路斯政府申请加入欧盟使欧盟已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之中，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的英国自然有义务调解塞浦路斯问题。此外，近年来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关系紧张，一旦发生冲突也可能殃及英国的利益。有限地参与调解不仅可以继续保持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影响力，而且如果塞浦路斯两族能够达成和解，也缺少不了英国继续作为保证国的地位。如果它被排挤出保证国，那么它的主权军事基地必然要受到影响。但是，英国的斡旋并没有阻止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关系的继续恶化，不到一个月就又发生了"导弹风波"，两族矛盾达到了近年来的顶点，也给本来就因爱琴海大陆架之争而关系紧张的希腊和土耳其火上浇油，希、土两国处于战争的边缘。

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紧急出访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三国，联合国和欧盟也积极斡旋。1997 年 7 月 9～12 日，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在纽约的特劳特贝克举行了直接会谈，按照秘书长的要求，双方讨论了未来塞浦路斯宪法问题和《联合声明草案》。由于土耳其族获知欧盟已同意无论两族能否达成协议，欧盟都将开始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谈判，而且在 2000 年的入盟候选国中没有土耳其，登克塔什立即退出了谈判。随后，土耳其领导人埃杰维特访问"北塞"，庆祝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 20 周年，双方发表了新的土耳其—"北塞"《联合宣言》，强调双方将在经济、财政和国防方面采取联合行动，以及在对外事务上进行合作，其中包括"北塞"代表作为土耳其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塞"无权参加的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建立一个由国会议员和相关部长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督促实施该宣言所达成

的新协议;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减轻因欧盟禁止进口“北塞”产品所造成的损失;在国防方面重申任何对“北塞”的进攻将被视为对土耳其领土的进攻;为了解决“北塞”的缺水问题,土耳其决定将直接向“北塞”供水。土耳其和“北塞”积极推进一体化的具体措施,使曾认为土方是“虚张声势”的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深感担忧,向联合国和欧盟提出抗议。

在联合国和美、英的斡旋下,1997 年 8 月 11 日,克莱里季斯和登克塔什在瑞士的格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但是在会谈前,登克塔什明确表示,鉴于欧盟已决定在两族达成协议前开始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谈判,他参加会谈不是要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是来解释土方的立场,他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助理提交的《联合宣言草案》最终未能签署。

对于土耳其强烈反对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积极推进与“北塞”的一体化,在土耳其族内部也有不同观点。土耳其族的主要左翼政党土耳其族共和党和族社解放党(两党分别占 70 个议席中的 13 个和 5 个),反对把“北塞”与土耳其合并,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态度,与希腊族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统一的两族双区的联邦制国家。土耳其族共和党领导人、前“北塞代理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塔拉特,甚至指责推进“北塞”与土耳其的一体化,必将“北塞”推向灾难的深渊。有相当一部分的土耳其族人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他们可以自由地到欧盟各国旅游和定居。另外,土耳其族的青年人认为,繁荣的南部经济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1997 年 11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95% 的土耳其族人希望加入欧盟,但同时要求两族必须首先达成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协议,其中有一半人还以土耳其首先成为欧盟成

郑重声明,我们不会考虑由希腊族提出的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申请,无论其结果如何,我们不参与这一国际骗局,否则,我们将永无成功之日”。随后土耳其官员访问了“北塞”,双方达成共识:国际社会不承认“北塞”,“北塞”就不再参加联合国主持的任何会谈。11月11日,美国总统特使霍尔布鲁克再次前往塞浦路斯斡旋,但无功而返。

三、塞浦路斯问题的未来走向

两族关系的内部因素

塞浦路斯问题的核心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纷争使两族积怨很深,1963年12月底两族实际上已经分开,1974年土耳其的入侵形成了两族隔“绿线”分治的既成事实。分治没有给两族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首先,尽管土耳其族方面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土耳其军队的长期占领和保护下,土耳其族人有了“安全感”,但是“北塞”成立近20年,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做了不懈的努力,而国际社会仍然只有土耳其一国承认,美、英、俄等大国以及联合国均指责“北塞”为非法,不予承认,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从目前各大国的立场来看,“北塞”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处于封闭状态的“北塞”,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得到较大改善。“北塞”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均受到很大限制,虽然每年得到土耳其2,000万~3,000万美元的援助,但

同时也受到土耳其经济长期不景气的负面影响，所以土耳其的援助只是杯水车薪，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相比之下，塞浦路斯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每年获得 5,000 万 ~ 7,0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恰当的经济政策使塞浦路斯南部经济飞速发展，到 1979 年已恢复到土耳其入侵前的水平。1997 年，希腊族人均收入高达 1.4 万美元。由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土耳其族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土耳其族领导人的强硬政策极为不满，他们要求与希腊族实现两族、双区的联邦，与南部一起加入欧盟，民众的呼声对土耳其族领导人产生了一定压力。土耳其族族社解放党领导人穆斯塔法·阿肯哲主张与希腊族达成两族、双区的联邦制解决方案，实现民族和解，共同建设新国家。1997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阿肯哲在土耳其族人中的威望仅次于登克塔什，可见土耳其族内部促和的力量正在增加。

虽然希腊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但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也有紧迫感。第一，塞浦路斯问题的久拖不决将对希腊族不利，时间的筹码掌握在土耳其族人手中，长期拖延下去可能使事实上的分治变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国家。伊斯兰国家一直对同为穆斯林的“北塞”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这种道义上的支持说不定会变为公开承认。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长期在克什米尔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上相互支持。1997 年 8 月底，意大利外长公开称在塞浦路斯有“两个民族、两个政府和两个共和国，两族必须同时加入欧盟”。尽管在塞浦路斯政府的抗议下意大利政府收回了这一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事件可能还会发生。所以，形势迫使塞浦路斯政府必须面对现实，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希腊族领导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

第二，希腊族认为，加入欧盟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催化剂”，能迫使土耳其和土耳其族转变立场，因此，希腊族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密切与希腊的关系，推进入盟进程。1999 年 12 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不再以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但事实上欧盟 15 国能否确实兑现这一承诺，还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曾强烈反对将军事冲突带入欧盟。正如一位欧盟谈判代表所言，“赫尔辛基决定是在希望而不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且土耳其早就宣称，如果塞浦路斯政府单方面加入欧盟，土耳其将宣布“北塞”与土耳其合并。痛苦的经历使希腊族对土耳其有深刻的认识。土耳其曾威胁要武装干涉，果然在 1974 年入侵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宣称要宣布独立，在 1983 年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希腊族对土耳其的威胁言论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希望最好能在入盟前真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避免像土耳其所说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同时塞浦路斯问题的尽快解决，也将加快塞浦路斯入盟进程。

第三，虽然希腊族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但塞浦路斯问题不解决，两族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甚至发生像 1996 年那样的军事对峙局面，尤其是土耳其至今仍在“北塞”驻有 3.5 万余军队，希腊族人总有不安全感。而且希腊薄弱的军事力量及塞浦路斯与希腊相距遥远，使希腊对希腊族的支持仅限于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历史证明，希腊不可能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武装干涉。所以，希腊族迫切希望与土耳其族和解，在两族、双区联邦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统一的塞浦路斯，与希腊和土耳其发展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

塞浦路斯问题的核心是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民族冲突，目前两族都有和解的愿望，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塞浦路斯问题解决的关键，还要看希腊和土耳其的立场及其两国关系改善的状况。

希土两国在塞浦路斯的利益

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取决于两国在塞浦路斯的利益。就希腊而言，希腊政府对希腊族的"意诺西斯"从不支持、不赞成，到支持甚至通过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政变来实施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由于这一惨痛经历及其由此导致土耳其入侵的严重后果，希腊族已彻底放弃了"意诺西斯"，希腊也不再抱超越本国实际能力的幻想。但是，希腊在塞浦路斯仍然有重要利益。首先，通过塞浦路斯问题可以调节与土耳其的关系。希、土两国长期不和，积怨甚深，除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激烈争执外，两国在爱琴海权益划分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两国在爱琴海权益上的争夺常常与塞浦路斯问题互动，为了在爱琴海权益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双方都在打塞浦路斯牌。1996 年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军事对峙，就与希、土两国在爱琴海权益的争夺有关。希腊希望通过塞浦路斯问题向土耳其施压，能在爱琴海问题上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毕竟爱琴海对希腊来说更为重要。欧盟曾建议希、土两国把爱琴海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希腊表示同意，但土耳其以"法律与公正有时不一致"而拒绝接受。但是从形势发展来看，由于希腊和欧盟在对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施加压力，土耳其最终接受通过海牙国际法庭解决爱琴海争端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如果爱琴海争端得到解决，将为希、土两国

关系的改善和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扫除一大障碍。

其次，支持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虽然"意诺西斯"已寿终正寝，但希腊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支持并没有改变。自 1993 年克莱里季斯当选塞浦路斯总统后，希腊与塞浦路斯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双方在塞浦路斯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总是采取一致立场。在军事上，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虽然在军力上希腊远远劣于土耳其，但希腊每年把军费预算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塞浦路斯，而且在塞浦路斯拥有一个空军基地，企图通过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军事力量达到牵制土耳其的目的。希腊的做法反而刺激了土耳其，使土耳其更不愿从"北塞"撤军，因而也就增加了塞浦路斯问题解决的难度。在经济和政治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希腊坚定地支持塞浦路斯政府加入欧盟，通过塞浦路斯入盟向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施加压力。实际上希腊利用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权力，已经对土耳其产生了不少影响。如 1995 年希腊曾试图否决土耳其加入关税同盟，但在多方的压力下没有这样做；又如 1996 年希腊否决了欧盟对土耳其的财政援助计划。但是，希腊将如何恰当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才能使土方做出适当让步，改善希、土两国关系，促使塞浦路斯问题朝着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这还需要希腊政府谨慎权衡，过分的行为反而适得其反，在这方面已经有惨痛的教训。近年来希腊在处理与塞浦路斯政府关系上比较谨慎，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支持主要倾向于政治和经济方面。同时，希腊也积极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避免直接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主张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两族领导人直接谈判。

与希腊相比，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介入较深。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国家安全战略；第二，作为与希

腊和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第三，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安全。塞浦路斯离土耳其仅80公里，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土耳其一贯坚持决不能允许宿敌希腊控制塞浦路斯，所以，当1974年希腊军人发动塞浦路斯政变后，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可能性增大时，土耳其毫不犹豫地采取军事行动。正是希、土两国的干涉，造成了塞浦路斯现在分治的恶果，当然这也与冷战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有关。冷战结束后，防止苏联向塞浦路斯渗透、阻止塞浦路斯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因素已不复存在，在美国单极主宰世界的国际形势下，土耳其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外部势力利用塞浦路斯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程度已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除。如1996年希腊族与俄罗斯签署购置S—300地对空导弹时，土耳其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宣称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见塞浦路斯在土耳其国家安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那么，要使土耳其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使塞浦路斯实现非军事化，这又与保护土耳其族人安全的第三个目标紧密相联。

实际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与保护土耳其族人的安全具有一致性，这也是近年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和谈的焦点问题之一。早在1993年，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就提出塞浦路斯非军事化的建议，主张土耳其撤军，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武装部队把武器交给联合国维和部队，由联合国派遣一支多国部队进驻塞浦路斯。克莱里季斯的建议虽然得到了俄罗斯等国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土耳其和土耳其族的断然拒绝。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认为，土军驻扎在“北塞”，符合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撤走土军就会使土耳其族失去了保护，土耳其族人就没有了安全感。保护

土耳其族人的安全成为土耳其拒不撤军的“合理”借口，也是塞浦路斯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意识形态上的对峙让位于以经济、科技和国防现代化水平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利益也正在转向把塞浦路斯作为与希腊和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目前这一目标比第一和第三目标更为重要。在与希腊的关系上，土耳其通过在塞浦路斯的优势向希腊施压，企图使希腊在爱琴海权益上做出让步，但两国都有同样的想法，不仅使分歧不能得到解决，反而给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更多的障碍。加入欧盟问题成为土方近年来关注的焦点。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坚决反对欧盟与塞浦路斯政府举行入盟谈判，强调必须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之后，塞浦路斯才能入盟。另外，土耳其方面根据1960年宪法，坚持塞浦路斯必须在土耳其入盟之后才可加入欧盟，土耳其甚至以促进与“北塞”合并来要挟欧盟。但是，希腊极力推动塞浦路斯的入盟进程，同样向欧盟发出威胁，宣称如果欧盟不接纳塞浦路斯为新成员，希腊将使用否决权阻止欧盟的扩大计划，其中包括土耳其的入盟问题。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最希望得到的欧盟正式候选国地位，当然前提条件是只有在一些政治问题——首先是塞浦路斯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入盟谈判才可以开始。同时欧盟向希腊做出承诺：当塞浦路斯满足必需的政治、经济条件后就可以加入，排除了土方要求的必须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之后才能入盟的前提。欧盟部分地满足了希、土两国的要求，但更倾向于希腊方面，这也显示了欧盟希望通过塞浦路斯的入盟向土方施压，从而达到使塞浦路斯问题尽快解决的目的。

土耳其的欧盟牌并不好打。2000年塞浦路斯已开始了入盟谈判,2004年即将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实际上,土耳其面临着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是继续坚持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宣布与"北塞"合并,冒国际社会,其中包括欧盟及其亲密盟友美国制裁的危险,使国家陷入孤立,经济上可能付出沉重代价;还是继续奉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制定的面向西方、融入欧洲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塞浦路斯问题虽已历经30多年,但对于一个国家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而言,只是历史的一瞬间。放下历史包袱,顺应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也许更能体现土耳其政治家们高瞻远瞩的政治魄力。当然这也需要卷入塞浦路斯问题的希腊表现出同样的宽广胸怀。

2000年初,塞浦路斯开始了入盟谈判,土耳其政府和民众反应平淡,没有像1997年那样土耳其族领导人退出联合国主持下的两族和谈,这表明土耳其政府立场正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幅度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从1999年开始,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有较大改善,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探讨关于巴尔干安全、科索沃问题、反对恐怖活动、旅游、环境保护、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1999年夏末,在希腊、土耳其发生严重地震时,两国人民间表现出的团结互助,表明希、土两国人民正在努力消除敌对,走向合作。希、土两国人民的和睦相处,也必将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互相尊重、团结合作做出表率,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彻底解决铺平道路。

美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影响

塞浦路斯问题本来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塞浦路斯激烈

争夺的国际大背景下，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纷争，希、土两国干涉而产生的，所以两族和谈同样也需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从90年代开始，美国和欧盟对塞浦路斯问题显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约东扩必须以北约内部的团结为前提，塞浦路斯问题一直是影响美国的亲密盟友、北约重要成员希、土两国不和甚至对峙的核心因素。美国积极参与塞浦路斯的和平进程，其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希、土两国改善关系，稳定北约的东南翼，促进北约东扩，同时极力排挤北约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介入。

对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美国一贯向希、土两国施加压力。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美国曾对土实施武器禁运，这一措施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后被迫取消。海湾战争之后，土耳其在美国中东战略的地位提高，而且里海能源的开发，也凸显了土耳其的价值，所以，美国也就很难向土耳其过分施压。因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首先就涉及土耳其撤军问题，如果土耳其不做出让步，塞浦路斯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对于希腊和塞浦路斯希腊族方面，美国不能不考虑英国的两个主权军事基地都在希腊族人控制区，而且还有不少英国侨民的因素。另外，在美国国内，12.5万希裔对美国大选和国会决策一直有着重要影响，而美国的土裔人不过5.4万人。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只能持相对中立。中立立场并不意味着不发挥作用，美国的作用不可或缺，因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首先涉及土耳其撤军，及其撤军后的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美国参与并做出妥当安排。

希腊族否决安南统一方案

1999年12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建议下，塞浦路斯总统、希腊族领导人克莱里季斯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在纽约举行了首轮“近距离间接谈判”。2000年2月，双方在日内瓦再次进行谈判。此后，双方又举行了三次间接谈判，就塞浦路斯的权力分配、安全保障、领土和财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年11月，间接谈判因登克塔什退出而中断。登克塔什坚持认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2002年1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两族领导人开始直接谈判，至8月27日，双方共举行了六轮直接会谈。希腊族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单一主权的统一国家，而土耳其族则坚持两族各自建立主权平等的国家。双方分歧严重，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200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有关各方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新方案。安南建议仿照瑞士联邦的模式，建立由“希腊族州”和“土耳其族州”平等组成的“共同国家”政府。土耳其族拒绝接受。

2003年3月，应安南的邀请，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五任总统、希腊族领导人帕帕佐普洛斯，与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在海牙举行三方会谈，讨论由安南制订的塞浦路斯统一方案。安南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族将所控制的领土由37%减少为30%；近一半希腊族难民返回北部土耳其族控制区，给希腊族人总计300亿美元的补偿；土耳其驻扎在“北塞”的3.5万军队逐渐减少至《苏黎世—伦敦协定》所规定的650人；两族在政治上平等，内部事务自治。由于两族在领土和移

民等问题上分歧太大，会谈以失败告终。

土耳其政府对两族和解采取了积极态度，2003年3月刚上任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寻求改善与欧盟关系，推进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表示如果联合国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发挥作用，土耳其愿意考虑尽快实现塞浦路斯统一问题。这是土耳其政府自1974年以来，首次提出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时，随着欧盟决定2004年5月1日将正式接纳塞浦路斯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欧盟希望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能够通过实质性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欧盟也支持联合国继续进行调解。在此背景下，2004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再次邀请帕帕佐普洛斯和登克塔什，以安南方案为基础，在尼科西亚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双方对安南统一方案提出60多处的修改意见，但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为了表明国际社会对塞浦路斯统一的支持，安理会对安南的塞浦路斯统一方案进行了表决，俄罗斯一票否决，安理会未能通过支持塞浦路斯统一方案的决议。但俄罗斯表示将接受塞浦路斯公投结果。2004年4月24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别对安南的统一方案进行全民公投，参加投票的土耳其族人有64.91%支持安南的统一方案，而参加投票的希腊族人有75.83%反对该方案。安南方案遭希腊族否决，安南表示尊重塞浦路斯公投结果。塞浦路斯丧失了一次统一的良机，国际社会对此无不感到遗憾。

在公投之前，塞浦路斯总统帕帕佐普洛斯公开要求希腊族人投反对票，甚至指责安南方案有偏袒土耳其族人之嫌。首先，安南方案要求建立一个松散的塞浦路斯联邦制共和国，实际上就是土

耳其族人所一贯要求的中央政府权力有限的两个独立国家的邦联，这是自马卡里奥斯总统以来历届塞浦路斯政府所坚决反对的，希腊族认为这将导致塞浦路斯的永久分治。其次，在领土方面，安南方案要求土耳其族将所控制的领土由原来的37%减少到30%，实际上土耳其族在领土上的让步，没有超出在1984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主持的两族间接谈判中，登克塔什承诺将所控制领土减少到29%的范围，仅占人口12.3%的土耳其族却控制30%的领土，希腊族人难以接受。再次，在难民返回问题上，安南方案主张有限返回，即20万希腊族难民可允许一半返回，这样在土耳其族控制的北部就不会重新出现希腊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局面，保证了土耳其族的绝对优势地位。最后，希腊族认为，拒绝安南方案，既无损于南部塞浦路斯政府已经享受了30多年的国际社会承认的地位，也不影响其加入欧盟进程。相反，接受安南统一方案，不仅使“北塞”获得了与塞浦路斯政府平等的地位，而且“北塞”的孤立状态将获解脱。

对于安南统一方案，土耳其领导人登克塔什起初也持否定态度，担心统一后的南部希腊族会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控制“北塞”的经济命脉，但在土耳其政府的劝导下，同时安南方案也更多地满足了土耳其族在国际地位、安全保障和经济等方面的要求，所以最终接受了该方案。

公投结果使南部塞浦路斯政府备受指责，无形中却给“北塞”的国际孤立解冻带来机遇。4月26日，欧盟外长卢森堡会议决定，将尽快解除对“北塞”的经济制裁，向“北塞”提供2.6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取消“北塞”销往欧盟的水果和蔬菜的所有关税。更让土耳其族人感到欣慰的是，5月欧盟将在“北塞”设立欧盟驻“北

塞"办事处。另外,美国也在考虑取消对"北塞"的贸易制裁。"北塞"将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希腊族否决安南方案,使塞浦路斯统一前景暗淡,但并未走入死胡同。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设计的这次公投规则,如果两族均否决安南方案,那么,塞浦路斯的统一问题将"死亡和无效",今后也不再举行第二轮公投,但现在是北部的土耳其族人同意,而南部的希腊族人反对,因而按照规定,在征得南部塞浦路斯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仍可在南部希腊族区举行第二轮公投。经过一定时间的冷静思考,希腊族领导人和希腊族民众能否接受安南方案,实现塞浦路斯统一,目前尚难确定。

四、对外政策的调整与经济状况

对外政策的调整

塞浦路斯对外政策的基点是立足西方,倡导不结盟并积极参加其活动,主张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一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即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而更集中地体现在有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缓和,但地区冲突加剧,民族冲突尤为突出。塞浦路斯政府对小国的安全保障深感担忧。在此国际背景下,塞浦路斯的国内政治亦发生了变化,1993 年 2 月 14 日,一贯主张亲近西方,对土耳其族做出妥协,以便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民主大会党领导人克莱里季斯当选总统,塞浦路斯对外政策开始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塞浦路斯与希腊建立共同防务。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密切，由来已久。在塞浦路斯对外关系中，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居于首位。塞浦路斯自独立以来，对外政策一贯立足西方，主张不结盟，不介入任何具有军事性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塞浦路斯曾极力反对美国企图将塞浦路斯北约化的努力。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特殊，但也没有脱离所奉行的不结盟的基线。鉴于 1974 年 7 月希腊军政府策划对塞浦路斯合法总统马卡里奥斯军事政变的惨痛教训，从 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对于一切重大事务，凡塞浦路斯政府决定的，希腊政府立即给予支持。1993 年 2 月克莱里季斯就任塞浦路斯总统后，11 中旬对希腊进行正式访问，双方达成共同防务协议，将塞浦路斯纳入了希腊的防务范围。当日，土耳其外长即表示，塞浦路斯与希腊此举将对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带来“消极影响”，说明希腊“继续否认土耳其族的存在，把塞浦路斯视作希腊的一个岛屿”。但塞浦路斯和希腊两国没有理会土耳其的反应。1995 年 3 月，希腊国防部长阿尔塞尼斯正式访问塞浦路斯，同塞浦路斯政府领导人讨论进一步落实共同防务问题。同年 5 月，克莱里季斯总统率民委会赴希腊，与希腊政府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讨论，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9 月，希腊空军首次参加塞浦路斯军事演习。1998 年 4 月，希腊军队总参谋长卓加尼斯访问塞浦路斯，同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议长基普里亚努和国防部长奥米鲁等会谈，并视察了新建成的佩福斯空军基地。6 月，希腊总统斯特凡诺普洛斯访问塞浦路斯，与克莱里季斯总统讨论两国进一步加强共同防务信条等问题。8 月，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率外长、国防部长等前往雅典，与希腊总理西米蒂斯就塞浦路斯和希腊两国共同防务信条及俄制 S—

300导弹等问题进行磋商。10月，希腊国防部长卓哈卓普洛斯参加塞浦路斯独立38周年阅兵式，声称只要土耳其坚持扩张政策，塞浦路斯与希腊两国就会继续加强共同防务信条。2000年1月，希腊海军向塞浦路斯国民自卫队移交"克诺索斯"号巡逻艇。希腊国防部长表示，希腊与塞浦路斯两国在反对威胁，确保国家安全及维护地区和平方面负有共同的责任。5月，希腊海军与塞浦路斯国民自卫队在塞浦路斯拉纳卡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0月，希腊与塞浦路斯两国海军又联合举行代号为"胜利者"的军事演习。

那么，塞浦路斯为何与希腊建立军事同盟，双方频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原因有三：其一，冷战结束后，国际趋势缓和，但地区冲突加剧，塞浦路斯政府对塞浦路斯的国家安全甚为担忧，塞浦路斯政府曾经把国家安全寄希望于美、英、苏等大国的支持。但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时，这些大国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对塞浦路斯遭受入侵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惟有希腊采取了它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其中包括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在塞浦路斯和平进程中，美英等西方国家没有向土耳其施加足够压力，使其做出让步，而苏联更是只说不做，只有希腊坚定地支持塞浦路斯政府的立场，并利用欧盟向土耳其施加压力。塞浦路斯政府和希腊族人认识到，只有希腊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其二，土耳其战机屡屡侵犯塞浦路斯领空，对塞浦路斯构成现实威胁。仅1997年，土耳其战机三次侵犯塞浦路斯领空。1998年6月18日，6架土耳其战斗机超低空飞越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上空，然后降落在北部的莱夫科尼科机场。此外，自1974年8月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土耳其至今在塞浦路斯驻扎有3.5万余军队拒不撤出，而且土耳其与"北塞"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塞浦路斯政府认为，他们面对

的不是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而是强大的土耳其。其三，强化与希腊特殊关系，充分利用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权利，一方面促进塞浦路斯入盟进程，另一方面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施加压力。欧盟曾把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但希腊威胁如果欧盟不给塞浦路斯入盟谈判确定时间表，希腊将阻碍欧盟扩大，最终欧盟放弃了这一先决条件，加快了塞浦路斯入盟进程。与此同时，希腊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态度强硬，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企图迫使土耳其和土耳其族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否决欧盟对土耳其的财政援助计划。

其次，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海湾战争充分展示了美国独立主宰世界事务的能力，塞浦路斯总统瓦西里乌曾万分感慨地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相提并论，认为美国有能力使土耳其改变对塞浦路斯立场，促其做出让步。尽管在美国的战略星盘上土耳其与伊拉克无可比拟，但美国在处理地区冲突上的能力却是无可置疑的。一贯亲西方的克莱里季斯当选总统后，更加注重与美国的关系，塞浦路斯政府官员频繁访美。塞浦路斯政府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主要有三方面的目标。一是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在全球的影响力，继续维护塞浦路斯政府作为整个塞浦路斯的惟一合法政府，避免除土耳其外其他国家承认"北塞"土耳其族人国家。在当今向多极化发展的世界格局中，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二是希望美国承担起塞浦路斯国家安全的责任，防止任何势力尤其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因为土耳其族和土耳其多次声称，如果塞浦路斯政府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北塞"将与土耳其合并，而塞浦路斯政府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日期

已经确定,因而这种威胁的现实性日益增大。三是希望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使其做出让步,以和平方式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实现国家统一。

美国政府也关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1995 年 1 月和 12 月,美国总统特使比蒂两次访问塞浦路斯。克林顿总统也致信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表明美国支持两族双区联邦制解决方案,强烈要求两族领导人努力实现建立互信措施,还鼓励双方积极寻求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途径。克林顿总统还相继任命总统特别顾问斯代凡诺普洛斯、总统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霍尔布鲁克、国务院塞浦路斯问题特别协调员汤姆斯·米勒多次访问塞浦路斯,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途径,促进两族会谈。仅在 1998 年,美国国务院塞浦路斯问题协调员米勒就四度访问塞浦路斯,霍尔布鲁克穿梭于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塞浦路斯政府正是听从美国的意见,决定将购置的俄制 S—300 导弹易地部署在希腊的克里特岛。2000 年 3 月,美国总统特使莫塞斯与国务院塞浦路斯问题协调员维斯顿访问塞浦路斯,以推动恢复两族谈判。4 月,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访美,争取美国对土耳其及土耳其族施压,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8 月,美国副总统戈尔表示,美国将继续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而努力,认为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及该地区其他争端,关系到该地区的稳定和欧洲安全。9 月,克林顿总统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塞泽尔时表示,塞浦路斯问题的最终解决对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以及希、土两国都十分重要,符合各方利益。

再次,日益重视欧盟的作用。塞浦路斯政府希望首先加入欧盟,然后通过欧盟的共同防务条约保障塞浦路斯的国家安全,同时

利用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特殊权力直接或间接对土耳其和土耳其族施加压力，以尽快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塞浦路斯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只重视希腊、美国和欧盟的作用，淡化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塞浦路斯政府的立足西方，倡导不结盟，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只是侧重点有所变化。而且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关系步入了一个友好合作、互利交往的新时期。

快速发展的塞浦路斯经济

1974年土耳其的入侵给塞浦路斯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塞浦路斯政府及时制定并实施了四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不仅恢复了经济，妥善安置了20万难民，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塞浦路斯政府并没有产生满足感和坐享其成的思想，而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继续制定和实施第五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1987～1991年）。在该计划中，塞浦路斯政府从塞浦路斯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以出口生产为目标，重点发展加工制造业，积极开发旅游业，大力扶持农业，以促进出口贸易的正确发展方针，使加工业和旅游业得到迅猛发展。1989年，塞浦路斯的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出口价值达2.03亿塞镑，其成衣销往近40个国家，其中阿拉伯国家是最大的买主。塞浦路斯制造的服装已取代英国服装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服装市场的传统地位。同时塞浦路斯政府充分利用塞浦路斯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大旅游设施建设，旅游人数从1976年的16.5万人猛增至1989年的137.7万人，创汇达9.5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成了弥补外贸逆差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贸易、旅馆

和餐饮业的兴旺。

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是，塞浦路斯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而是大力扶持农业，采取了对农业大量投资，确保农业改革的力度；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采用现代化的喷灌技术；调整农业布局，在粮食生产满足国内生活和工业生产需求的前提下，强调发展养殖业和产值高、竞争力强的农作物，如早熟蔬菜、水果、土豆等。此外，充分利用塞浦路斯多山和丘陵的特点，鼓励发展经济林业和畜牧业。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缩小了城乡差别，有利于社会安定。

冷战后的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潮流，不同国家、地区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塞浦路斯政府不失时机地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把发展潜力大的旅游业、制造业、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强化和推进。旅游业最具潜力，1999年来塞浦路斯旅游者为240万人次，创汇达20亿美元，比1989年旅客137.7万人和创汇9.56亿美元分别增长了74.29%和109.2%，真可谓突飞猛进。其他行业也均保持继续增长势头。旅游业的迅猛增长，已成为塞浦路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据塞浦路斯政府经济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90亿美元，人均收入近1,400美元，通货膨胀率1.5%，失业率3.6%，经济增长率4.5%。其整体经济特征突出表现为“两低一高”，即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高。从1989年至1997年的近10年来，这三个指标分别平均为2.3%、4.66%和5.46%。这种良好的经济运行态势为世人所称道。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塞浦路斯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从业人口2.69万人,占劳动总人口的9.3%,与独立之初农业人口占40%的状况相比,真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保险和旅游等服务业产值35.61亿塞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从业人员占劳动总人口的68.37%,其中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4%。一系列经济指标表明了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已将塞浦路斯列入发达国家行列。

塞浦路斯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外界看来,塞浦路斯一直是动荡之地,冲突之源,实际情况则不然。自1974年土耳其入侵造成塞浦路斯南北分治后,尽管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和解和国家的统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两族沿"绿线"而治,长期处于不和也不战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且在占塞浦路斯总面积3%的缓冲区(绿线)有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监督和巡逻,维持了塞浦路斯军事状态的稳定,防止了新的武装冲突的发生。实际上,近30多年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是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和平共处",为塞浦路斯政府控制下的南部希腊族区,赢得了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其次是塞浦路斯政府能够按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经济的目标明确,政策灵活,措施得当。而且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适时地调整经济结构,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计划、分步骤地驱动新的经济部门刺激经济增长。70~80年代中期,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加工制造业,尔后,加工制造业又被服务业,尤其被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所取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每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无不立足于充分发挥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优

势和自然环境特点。旅游、航运、金融保险、出口加工、海水养殖、丘陵经济林都成为塞浦路斯的特色经济。当然，塞浦路斯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增长，也与塞浦路斯人口增长缓慢，没有现实的人口压力有关，这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

再次，国际援助是塞浦路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从1975年开始，塞浦路斯政府每年接受外援约5,000万美元，如今则超过了7,000万美元，包括每年欧盟提供3,600万美元，希腊提供2,000万美元，美国提供1,500万美元。而塞浦路斯政府对外援资金合理投资，监管严格，为塞浦路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此外，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开支和英国在塞浦路斯两个军事基地的消费，几乎成为塞浦路斯政府的间接“外援”。1964年至1995年期间，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开支近8.2亿美元，仅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的经费预算就有4,300万美元，这些经费使塞浦路斯产品“内销”也能“创汇”。

最后，塞浦路斯拥有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人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软资源”。塞浦路斯教育发达，早在上世纪80年代，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而且出国深造率很高。这些高素质人才保证了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完善的体制使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了良性循环，相互促进，人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1998年塞浦路斯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以来，塞浦路斯政府开始按照入盟要求对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长期实行钉住欧元制定汇率的外汇政策，政府对中央银行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影响，资本不能自由流动。1999年，塞浦路斯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增设间接税，减少公共开支，多年来的财政赤字状况得以改

善。2000 年 5 月，塞浦路斯议会通过新的税收法案。2001 年 1 月，塞浦路斯宣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塞浦路斯已经具备欧盟的基本要求，加入欧盟将给塞浦路斯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北塞”经济发展状况

自 1963 年底因马卡里奥斯修宪导致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土耳其族退出塞浦路斯联合政府后，土耳其族人在其狭小的控制区成立了临时行政机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实际上已经分开。由于希腊族人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对土耳其族人进行经济封锁，土耳其族区经济相当困难，完全依赖于土耳其的经济援助。

1974 年土耳其入侵导致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南北分治。控制塞浦路斯领土 37% 的土耳其族区拥有全塞浦路斯经济资源的 20%，水资源的 20%，矿产资源的 10%和森林资源的 20%。土耳其入侵造成的 20 万希腊族难民曾给塞浦路斯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相对人口较少的土耳其族难民，逃到北部后占有了希腊族人留下的房屋等财产，经济相对宽松。1975 年和 1976 年，由于土耳其的大量援助和投资，土耳其族邦的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高达 62%和 30%。1978 年，土耳其族邦开始实施发展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78～1982 年），但由于土耳其的通货膨胀，土耳其族邦流通的土耳其货币里拉贬值，造成土耳其族邦资金短缺，建设工程停滞不前，发展速度逐渐放慢，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建设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分别从 1975 年的 38.93 亿里拉和 27,410 里拉，增加至 1979 年的 91.09 亿里拉和 54,790 里拉，分别增长了 134%和 99.9%。

1983 年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塞浦路斯政府的经济制裁。由于其地域狭小，基础薄弱，人口少，内需不旺，再加上80年代土耳其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影响，“北塞”经济发展相当缓慢，投资缺乏，通货膨胀严重，完全依赖土耳其的经济援助。1986年“北塞”进出口总额2.023亿美元，而外贸赤字近1亿美元，同年土耳其的援助为1.3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高达49%，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人均收入从1982年的1,200美元至1990年才增至1,575美元，与同期南部希腊族人均收入9,860美元形成较大反差。

冷战后的90年代，当南部塞浦路斯政府控制区经济步入快速发展之时，“北塞”仍未摆脱经济疲软之态，既严重依赖土耳其的经济援助，同时又深受土耳其金融动荡和经济深陷泥沼的巨大影响，无法走上经济自主发展之路，当然这与“北塞”与土耳其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有关。至1999年，“北塞”国民生产总值仅9.41亿美元，人均收入4,553美元，与希腊族人均收入14,000美元无法比拟。随着塞浦路斯政府控制的南部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北塞”当局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第十一章　塞浦路斯与中国关系

建交前的两国交往

中国和塞浦路斯虽然相距遥远，国家大小悬殊，但是共同饱受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统治之苦，都进行了反对外国入侵的斗争，为中国和塞浦路斯人民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和塞浦路斯人民之间即开始了民间和党际交往。1952 年 9 月，参加亚非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塞浦路斯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1954 年 9 月，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团来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进行参观访问。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埃柴吉耶斯·巴巴约安给毛泽东主席发来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盛赞“中国的解放鼓舞着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成为中国和塞浦路斯人民增进了解和友好往来的开端。

50 年代中后期，塞浦路斯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决斗争的高潮，中国人民对塞浦路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1957 年 2 月 21 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致电塞浦路斯妇女团体，声援塞浦路斯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同时，塞浦路斯人民对新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给予了应有的支持。1958 年 10 月 10 日，塞浦路斯劳动人民

进步党的机关报《黎明报》发表评论，痛斥美国向中国挑衅。实际上，中国和塞浦路斯人民肩负着同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武装干涉的历史使命。

1959年和1960年，塞浦路斯文化代表团、统一民主青年组织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农民协会代表团相继来华访问，双方民间和党际交往逐步加强。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致电祝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致电表示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希望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塞浦路斯共和国首任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致电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人民的祝贺和支持表示感谢。这是中国和塞浦路斯两国政府间的首次交往。

独立后的塞浦路斯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但是，由于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个北约成员国是塞浦路斯独立的保证国，因此塞浦路斯的对外政策自然要受到西方阵营的影响。1960年9月，塞浦路斯与中国台湾“建交”，对中国和塞浦路斯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961年，某些敌视中国的国家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时，塞浦路斯代表团支持了诬蔑中国的决议。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塞浦路斯人民的正义事业，当1963年年底马卡里奥斯总统因修宪导致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后，中国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英美干涉塞浦路斯。1964年2月，中国青联和学联致电塞浦路斯统一民主青年组织、塞浦路斯全国学生联合会及塞浦路斯留英学生联合会，强烈谴责英国和美国企图出兵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同时，中国对安理会通过决议向塞浦路斯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持否定态度，希望塞浦路斯问题应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协商解决，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

权和领土完整。在此期间，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终止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但中国和塞浦路斯之间的民间交往并未因此而间断。1966 年 5 月，中国工会代表团赴塞浦路斯访问。1967 年中国记者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采访时，凡采访到的塞浦路斯普通民众，无不对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主席表示崇敬。中国和塞浦路斯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成为推动两国关系走出低谷，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主要力量。

建交后的两国关系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 1971 年 8 月 4 日和 1972 年 4 月 29 日，塞浦路斯问题的直接介入者土耳其和希腊先后与中国建交，对一向坚持不结盟，重点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塞浦路斯产生了重要影响。塞浦路斯政府重视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地位，希望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1970 年 11 月，马卡里奥斯总统在出席联大会议和对日本访问回国途经中国香港时，在香港机场对记者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塞浦路斯对接纳中国问题弃权，不采取任何决定，塞浦路斯只是一个小国。1971 年 11 月，塞浦路斯外长基普里亚努在联合国总部，向出席第 26 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建交的愿望，经过双方协商，1971 年 12 月 14 日，中国与塞浦路斯建交，1972 年 1 月 12 日发表了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公报。次日，中国台湾“外交部”被迫宣布终止与塞浦路斯的外交关系。6 月，中国在塞浦路斯设立大使馆，并派驻临时代办。1981 年 6 月，塞浦路斯政府任命塞浦路斯驻澳大利亚高

级专员兼任驻华大使,未设使馆。

中国与塞浦路斯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较快。1974 年 5 月,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访华,对毛泽东主席的会见表示高兴,他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分歧,称赞中国是“芙蓉国里尽朝晖”。马卡里奥斯总统还与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总理阐明了中国政府希望塞浦路斯两族团结和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

实际上,马卡里奥斯总统访华是在塞浦路斯国内局势相当紧张,塞浦路斯希腊族内部强烈要求与希腊合并的极端势力不断指责马卡里奥斯政府,甚至多次企图暗杀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形势下进行的,足见马卡里奥斯总统对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的重视。马卡里奥斯访华回国不久,即 7 月 15 日,由希腊军官控制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国民警卫队发动政变,推翻了马卡里奥斯合法政府,马卡里奥斯幸免于难,逃往英国主权军事基地,经马耳他前往英国。20 日,土耳其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安全为由入侵塞浦路斯。在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中国代表郑重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和颠覆。塞浦路斯问题应当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来解决。目前特别要警惕超级大国利用塞浦路斯局势乘机插手,浑水摸鱼。”“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由塞浦路斯合法的国家元首——大主教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塞浦路斯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对塞浦路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破坏。”7 月 20 日,中国代表团在比利时大使馆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明确表示,“马卡里奥斯总统是合法的塞浦路斯国家元首和塞

浦路斯人民的代表”。

中国人民及时给予塞浦路斯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支持马卡里奥斯合法政府，反对外部势力“侵略和颠覆”塞浦路斯的同时，由于土耳其的入侵给塞浦路斯造成20多万难民，1974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两度向塞浦路斯难民捐赠物资，并及时运往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帮助塞浦路斯人民恢复正常生活。

1981年6月，塞浦路斯外长洛兰季斯访华，中方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一贯立场，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1984年6月，塞浦路斯第二任总统基普里亚努访华，李先念主席在会见基普里亚努总统时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表示中国不赞成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独立。换言之，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单方面宣布成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中国政府坚定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分裂行为的立场，是对塞浦路斯政府的莫大支持。

但是，中国政府与塞浦路斯政府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塞浦路斯问题应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尤其是反对苏联乘机介入塞浦路斯问题。苏联一贯主张召开包括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政府对苏联的主张也表示支持，而且积极寻求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但中国认为，苏联所谓的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是企图将超级大国的干涉合法化。中国反对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观点与美英的立场基本一致，实际上，这是受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与塞浦路斯党际交往得到恢复和发展。受六七十年代中

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一度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而且紧跟苏共多次指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国与塞浦路斯建交后，两党关系也未能及时恢复。8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关系开始恢复。1985年5月，塞浦路斯社会党率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次年5月，应塞浦路斯社会党邀请，中联部有关领导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塞浦路斯，努力恢复和发展与塞浦路斯各党派之间的联系。1987年3月，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范蒂斯和检委主席奥林皮奥斯率该党代表团访华，双方友好地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但在对苏联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交往。1988年11月和1990年1月，中联部有关领导分别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塞浦路斯。1990年7月和10月，中国共产党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代表团再次实现互访，两党关系有所发展。1993年5月，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政治局常委、中央国际部书记赫里斯托菲尼斯访华。1995年5月，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代表团访华。

两国文化交流

中国与塞浦路斯建交后，两国文化往来逐渐增多。1973年3月，北京杂技团首次赴塞浦路斯演出，受到塞浦路斯人民的欢迎。1976年10月，中国在塞浦路斯举办剪纸艺术展。1978年8月，北京杂技团再次出访塞浦路斯，受到了塞浦路斯众议院议长的接见，塞浦路斯代总统基普里亚努还亲自观看了北京杂技团的演出。1976年12月，塞浦路斯新闻代表团访华，受到中国文化部领导的

接见。

中国与塞浦路斯签订了一系列文化交流协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中国与塞浦路斯友好关系的加强，两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1980年7月，中国文化部与塞浦路斯外交部秘书长乔治·贝拉德亚斯，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为实现本协定，双方连续签订了中国与塞浦路斯文化协定1982~1983年执行计划、1984~1985年执行计划、1986~1987年执行计划、1988~1989年执行计划、1990~1992年执行计划、1993~1995年执行计划和1996~1997年执行计划。另外，两国还签订了旅游合作协定、新闻合作协定、中国广播电视部与塞浦路斯广播公司合作议定书。这些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与塞浦路斯文化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两国在文化、艺术、新闻、电视、旅游和友好组织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保证。

80年代以来，中国与塞浦路斯文化交流频繁。先后有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1981年)、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1982年2月、1990年)、新闻代表团(1985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代表团(1986年12月)、旅游代表团(1986年5月)、新华社代表团、中国青年代表团(1988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团(198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团(1991年)和中国文联代表团(1998年12月)等访问塞浦路斯。同时塞浦路斯文化代表团(1980年、1986年、2000年3月)、记者协会代表团、广播公司代表团(1984年)、教师代表团(1985年)、新闻代表团(1986年)、卫生代表团、记者团(1987年)、塞浦路斯与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1988年)、摄影协会代表团(1990年)等来华访问。两国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在

此基础上，中国天津歌舞团、广西右江民族歌舞团、陕西杂技团、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族艺术团、河南濮阳舞蹈团、中国少数民族青年舞蹈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文艺团体先后到塞浦路斯访问演出，而塞浦路斯民间艺术团、小提琴家乔治·瓦斯也曾来华演出交流。

此外，中国与塞浦路斯还互相举办艺术展览。中国在塞浦路斯举办了中国国画展、中国工艺挂屏展、湖北民间艺术展和中国民间玩具展。塞浦路斯方面也来华举办了塞浦路斯版画展、塞浦路斯民间工艺和摄影作品展、塞浦路斯现代绘画展。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正在向更深层次的交往发展。

两国经贸往来

中国与塞浦路斯建交后，两国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1973 年 8 月，塞浦路斯工商部长米切尔·科洛卡西德访华，签订了中国与塞浦路斯贸易和支付协定，为中国与塞浦路斯经贸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年 9 月，中国首次派展览团参加塞浦路斯国际博览会，展出了两千多种中国产品，其中包括纺织品、食品、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在展览会期间，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议长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和内阁部长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国馆。

1981 年 2 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塞浦路斯，签订了两国新的贸易协定，将记账贸易改为现汇贸易。中国向塞浦路斯主要出口纺织品、瓷器和小五金，从塞浦路斯进口羊皮等。1982 年 11 月，塞浦路斯工商部长安德列乌率贸易代表团访华，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塞浦路斯经贸关系的发展。1984 年 6 月，基普里亚努总统访华时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90年8月，塞浦路斯第三任总统瓦西里乌访华，并应邀对中国和塞浦路斯政府官员及工商界人士作了题为“塞浦路斯与中国贸易前景广阔”的演讲。瓦西里乌总统认为，从1985年至1989年，尽管塞浦路斯对中国出口从2万美元增至130万美元，进口从200万美元增至1,400万美元，但这些数字以塞浦路斯的进出口总额来衡量，几乎微乎其微，因此，塞浦路斯与中国有“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的巨大潜力”。在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会谈中，瓦西里乌总统表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塞浦路斯经贸关系的发展，“使之达到像两国很好的政治关系那样的水平”。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能性和进行运输合作等事宜。同时，以塞浦路斯工商会主席埃皮法里欧为团长的塞浦路斯工商代表团，与中国十多家对外贸易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人士进行了洽谈。据中国海关统计，1989年中国与塞浦路斯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917万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1,431万美元。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有铬矿砂、羊皮、废船、葡萄干等，出口以纺织品、工艺品、轻工产品和粮油等为主。

在中国与塞浦路斯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90年10月，中国和塞浦路斯第二次经济贸易和科技混合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签订了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关系的议定书，并签署了关于对所得税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双方经济合作范围迅速扩大，已有中国商船在塞浦路斯注册。到1991年，中国与塞浦路斯贸易总额已达6,344万美元，是1989年双方贸易总额的三倍多。

全面发展的两国关系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的逐渐缓和以及世界多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塞浦路斯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与塞浦路斯虽然大小悬殊，情况各异，但都面临着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磋商，密切合作。在中国与塞浦路斯建交伊始，塞浦路斯政府终止了与中国台湾的"外交关系"，关闭了台湾驻塞浦路斯"使馆"，但仍保留着台湾在塞浦路斯的商务办事处。随着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的快速发展，塞浦路斯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交往，不给台湾驻塞浦路斯机构人员外交待遇，同时塞浦路斯外交部要求政府官员不得参加台湾商务办事处举办的任何活动，使台湾商务办事处进一步受到限制。1991年5月，塞浦路斯政府最终关闭了台湾驻塞浦路斯商务办事处，为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1997年9月16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52届联大上发言，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拒绝把台湾问题列入联大议程中的提案。2000年6月，塞浦路斯第四任总统克莱里季斯访华时表示，塞浦路斯政府不支持台湾在任何国际组织中谋取席位。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塞浦路斯政府立即谴责这一违犯国际法准则的暴行，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给予支持。

中国对塞浦路斯问题一向十分关切，认为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和安理会有关塞浦

路斯问题的决议应得到切实执行，希望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下，通过谈判缩小分歧，互让互谅，建立互信，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找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1999 年 6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同来访的克莱里季斯总统会谈时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的顺利发展，得益于双方在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基础上的密切交往。相互尊重是交往的前提，交往是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民主大会党、民主党、社会党保持着良好关系，双方互访频繁，尤其是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关系密切。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是塞浦路斯最大的政党，虽然该党从未推举候选人竞选总统，但它对塞浦路斯政治和对外政策影响巨大。90 年代，两党在密切交往中增进了了解，消除了分歧，对重大理论和国际或地区性问题的看法趋于一致。实际上，冷战后不断加强的中国与塞浦路斯党际交往，促进了两国关系向纵深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与塞浦路斯议会之间保持着交往。1993 年和 1999 年，中国人大代表团先后访问塞浦路斯，增强两国在立法部门的合作。同时，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强。1995 年 4 月，中国司法代表团访问塞浦路斯，双方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2001 年 9 月，双方又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部在民防和基层选举管理领域的合作协议》。

另外，两国在文化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再次签订了中国

与塞浦路斯1998～2000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并于2000年11月，塞浦路斯在中国成功举办“塞浦路斯文化周”，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中国与塞浦路斯已互派有留学生。

两国经贸发展迅速。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1年两国贸易总额达1.1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1.16亿美元，进口额为133万美元，比1998年有了显著增长。

2001年年初，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塞浦路斯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多项经济、文化合作协定。胡锦涛副主席访问塞浦路斯，标志着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塞浦路斯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中国与塞浦路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两国关系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主要参考书目

一、外文参考书目

1. Alastos, Doros. *Cyprus in History: A Survey of 5,000 Years*, ZENO, 1955.
2. Attalides, Mighael A. *Cyprus: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 Martins, New York, 1979.
3. Attorney-General of Cyprus Alecos Markides: *Cyprus and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Important Legal Documents*, Nicosia, 2002.
4. Bitsios, Dimitri S. *Cyprus: The vulnerable Republic*, The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Theessaloniki, 1975.
5. Bolukbasi, Suha.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Third World: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 and Cypru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Boston, 1988.
6. Costas, Yennaris. *From the East: Conflic and Partition in Cyprus*, Elliott & Thompson, London & Bath, 2003.
7. Denktash, R.R. *The Cyprus Triangle*,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1982.
8. Dodd, C.H. *The Cyprus Imbroglio*, The Eothen Press, England, 1998.
9. En Tipis Voula Kokkinou Ltd, *Cyprus: On the Way to EU Membership*,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yprus, Nicosia, 2001.
10. En Tipis Voula Kokkinou Ltd, *The Position of the EU on Cyprus: References*,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yprus, Nicosia, 2001.
11. Euraconsult LTD, *Cypru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rognosis Publishing House, Nicosia, 1991.
12. *European Stand on the Cyprus Problem*,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Re-

public of Cyprus, Nicosia, 2001.

13. Fouskas, Vassilis K. and Richter, Heinz A. *Cyprus and Europe: The Long Way Back*, Biblopolis, 2003.

14. Green, Pauline. *Embracing Cyprus: The Path to Unity in the New Europe*, I.B. Tauris & Co Ltd, London, 2003.

15. G. xydis, Stephen. *Cyprus Reluctant Republic*, Mouton, Paris, 1973.

16. Hatzivassiliou, Evanthis. *The Cyprus Question*, 1878 ~ 1960: *The Constitutional Aspect*, Unvi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2002.

17. Hadjidemetriou, Katia. *A History of Cyprus*, Dorographics Ltd, Nicosia, 2002.

18. Hill G. History of Cyprus. 4V. Cambridge, 1949 ~ 1952.

19. Hitchens, Christopher. *Hostage to History: Cyprus From the Ottomans to Kissinger*, Noonday, London, 1989.

20. Hunt, David. *Footprints in Cyprus: A Illustrated history*, Trigraph-London, 1990.

21. Joseph, Joseph S. *Cyprus: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Threshold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cmillan, London, 1997.

22. Karageorghis, Vassos, *Ancient Cyprus*: 7,000 *Years of Art & Archaeolog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aton Rouge, 1981.

23. Karageorghis, Vassos. *The Cyprus: Ancient Monuments*, C. Epihaniou Publications Ltd, Nicosia, 1989.

24. Kyrris, Costas P. *History of Cypru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ography of Cyprus*, Nicocles Publishing House, Nicosia, 1985.

25. Mirbagheri, Farid. *Cypru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making*, Hurst & Company, London, 1998.

26. Panteli, Stavros. *A New History of Cyprus: on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East-West Publications, London, 1984.

27. *Report On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Cypriot Communities (Rapporteur: Mr CUCO, Spain, Socialist)*,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yprus, Nicosia, 2000.

28.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e Cyprus Problem, 1964 ~ 2001,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yprus, Nicosia, 2002.

29. Sonyel, Salahi R. *Cyprus the Destruction of a Republic: British Documents*

1960 ~ 1965, The Eothen Press, 1997.

30. Stearns, Monteagle. *Entangled Allies: U. S. Policy Toward Greece, Turkish and Cypru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1992.

31. Stefanidis, Ioannis D. *Isle of Discord;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Cyprus proble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

32. Tatton-Brown, Veronica. *Ancient Cyprus*, British Museum Press, London, 1997.

33. *The Republic of Cyprus: An Overview*, 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yprus, Nicosia, 2003.

34. Yuva, Mehmet. *The History of the Partition of Cyprus and President Makarios in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and Relation*, 1878 – 1974, PH.D. 1997.

二、中文参考书目

1. [俄]列夫臣柯著,包溪译:《拜占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2. [意]卢多维科·加托著,祝本雄译:《马背上的圣战:十字军东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C.斯布里达奇斯:《塞浦路斯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5.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编:《罗马尼亚、扎伊尔、塞浦路斯》,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

6. 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王振华:《英联邦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8.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9.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 休特利等著:《希腊简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11. 迈克尔·李、汉卡·李:《塞浦路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2.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 杨灏城等主编:《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15.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 年版。
16. 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年版。
17. 赵国忠:《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8. 唐逸:《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19.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0. 钱乘旦等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1.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22.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23.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与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24. 彭树智主编:《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5.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6.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27. 彭树智主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8.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
29. 董友忱主编:《万国博览·亚洲卷》,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30. 韩文宁、洪霞:《塞浦路斯、马耳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31.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
3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编　后　记

一

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历来是中东文明交往史上的最核心内容。民族与宗教矛盾是当代中东地区动荡不宁的主要内在原因。当代中东的民族与宗教矛盾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持久，还在于它是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和各种文明交往的聚散地区。

中东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复杂性，从内部交往而言，主要表现为五大民族和三大宗教的错综交织。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波斯民族、库尔德民族这四大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不但教派林立，库尔德族也毗连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并兼有社会和国际因素。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在人数上虽不是大民族，但它建立的以色列国却使之成为强势民族。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埃及的科普特族也称不上大民族，然而这两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所在国处于重要地位，尤其是前者在塞浦路斯，堪称举足轻重。

中东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激化为冲突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往类型。这一类型交往有的成为中东问题核心，如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之

间的长期冲突；有的成为久悬不决的问题，如塞浦路斯的希腊民族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争执。第二类型是不同民族的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这一类型的最突出和有影响的事件，是产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前的库尔德民族和阿拉伯、土耳其、波斯民族之间的广泛而持久的争端；还有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之间的纠纷，以至于发生了伊拉克和伊朗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型是同一民族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多次纷争与和解，都属于这一类型。

中东的民族与宗教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历史上形成的积淀因素，其中不乏交往活动中诸多负面遗留。但最重要的和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是西方殖民体系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殖民政策或加深、或引发、或制造了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西方列强维持中东霸权的手段。

20世纪50～60年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在西方殖民体系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本是中东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大好时机，不幸的是，曾经在建立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起了前导和推动作用的民族主义，独立以后，却向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非理性的极端性，也在教派之间蔓延，并且和民族冲突相结合，表现为宗教价值系统的强烈政治归属性。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利己和排他性，民族和宗教负面作用的情绪化、盲动性、狂热性，被政治集团或大国干涉行动所利用，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新建立起来的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它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局经常变动的脆弱体系。塞浦路斯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员，表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在民族与宗教交往中的共同点和

独特性。

塞浦路斯问题必须从上述大背景下观察,才能寻找到它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历史性、国际性和长期性。它的根本而内在的悲剧在于因缺乏塞浦路斯国籍认同而演化为民族主义的极端性。深入探讨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交往问题,不能不从时间、空间和人间这三个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上,去探究其联系和变化。

二

时间,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经线。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交往,首先运行在这条历史轨迹的经线上。

从时间段上,民族和宗教交往可分为四个大的时期。

第一时期:希腊基督教文明与早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时期。这是塞浦路斯历史长时间段中最复杂、最缓慢、最远程的时期。

早期塞浦路斯的历史是一部移民文化史,而真正使塞浦路斯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是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希腊人的多次移民浪潮。这种移民如此强劲,它同化了古塞浦路斯人,它用希腊语取代了塞浦路斯—米洛斯语,它把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带入了塞浦路斯,以致形成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后迈锡尼文化"。

塞浦路斯从公元前6千纪最早的居民聚落开始,中间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这个漫长的时期的终点,是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亚述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法兰克文明、犹太文明、威尼斯文明的各种形式和频繁的交往中,既形成了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基本民族群

体，也确立了希腊文明的主体地位。

希腊人在塞浦路斯岛上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民族的入侵、征服和统治。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前，对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有最重要影响的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统治阶段。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托密勒王朝的统治，特别是罗马帝国对塞浦路斯近400年的统治，以及后来融汇希腊、罗马文化的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加强了塞浦路斯希腊人对本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希腊化和基督教化的浪潮，席卷塞浦路斯。公元448年、629年，塞浦路斯正教会两度被确立为独立地位，1448年，该教会脱离安提阿教会牧首管辖而宣布自主，这些都是本时期塞浦路斯民族和宗教交往最重要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后来希腊族人的塞浦路斯正教会，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正教会，由大主教统领岛上的6个教区，对塞浦路斯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时期：希腊基督教文明与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交往时期。这是1571～1878年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时期，也是塞浦路斯历史上除了希腊民族之外，外来民族和宗教交往带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在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上，增添了新的族群——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

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初，便把塞浦路斯作为它南部领土的一部分，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阿拉雅等四州组成一个总督区，目的是为了维护帝国霸权的海上联系通道的安全。为了同一目的，奥斯曼帝国采取留驻官兵人员和迁徙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移民等方式，并且以免税3年等优惠条件，先后促使4万多贫苦的土耳其农民和手工业者移居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逐渐成为仅次于希腊人的塞浦路斯第二位居民群。他们带来了与希腊族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不

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同北邻土耳其本土保持着密切联系。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这两个同居一岛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族群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土耳其人作为统治民族，对被统治的希腊族人最初采取了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承认并且赋予正教会的岛内行政、文化自治权和大主教的教民首领的特权，而且把拉丁人统治者剥夺的土地，归还给希腊族人。

2.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之间不但平安相处，而且一段时间中，彼此接触较多而且变得友好起来。有资料说明，有些希腊族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穿着一如土耳其人，有的甚至还同穆斯林妇女结婚。

3. 但是好景不长，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塞浦路斯的上述情况只是昙花一现。这个时期两个大混处小集中的民族和宗教交往，最重要的特征，是各自固守本民族和宗教生活习俗，彼此缺乏作为共居塞浦路斯人的思想情感交流和国家认同感。历史研究者曾统计过，1862 年，全岛共有 605 个村镇，其中基督教徒村镇 248 个，穆斯林村镇 118 个，两族共居村镇 239 个。民族、宗教之间的隔绝封闭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同居一村，也很少往来。这种缺乏情感交流、经济交往、文化沟通的状况，难以在心理上形成对塞浦路斯国籍的认同感，为以后历史，特别是为建国以后长期民族与宗教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4.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各自背靠自己的母国，不但在宗教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归属上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发展趋势。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对希腊族基督徒的迫害，加上 1830 年希腊摆脱奥斯

曼帝国统治而获得独立之后，奥斯曼帝国1831年承认了塞浦路斯基督徒加入希腊国籍的权利，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起来。在此期间，有些教士鼓吹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思想，开始了后来“意诺西斯”(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运动)的先河。

总的说来，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除了1821年“迫害时期”对希腊族在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数百人的大屠杀之外，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还不尖锐。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没有从共同地域生活中产生塞浦路斯国家意识。

第三时期：塞浦路斯希腊族、土耳其族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交往。

1878~1960年英国对塞浦路斯长达82年的统治时期，是英国的西方强势文明对弱势的希腊族、土耳其族弱势文明之间的复杂交往时期，也是希腊、土耳其两国深深介入和国际关系大变动的时期。这个承上启下的文明交往的关键时期，孕育了日后塞浦路斯问题许多直接或间接的缘由。土耳其族成为失去统治地位的民族。希腊族虽和英国同属西方基督教文明，但在政治上仍处于被统治地位。英国文明带给塞浦路斯的，是昔日罗马帝国的“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以及与此政策相联系的西方民主的政治形式——立法委员会。这一切做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把塞浦路斯变成“东地中海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变化迅速、剧烈而复杂的时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在塞浦路斯未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以前，素以老奸巨猾著称的英帝国，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玩弄“借土安希”的推拖拉拢手段。特别是对待当时方兴未艾的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同希腊合

并的“意诺西斯”运动采取的转嫁手段，把矛盾推到奥斯曼帝国具有“宗主权”问题上。这样，既取得希腊族人谅解，又缓和土耳其族人不满，还为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吞并塞浦路斯创造条件，可谓一箭三雕。

2. 英国统治者利用处于少数地位的土耳其族人的依附情绪，实施平衡和对抗约占居民 4/5 希腊族人的策略。开始时曾拟将俄土战争中逃到土耳其难民中的 1 万人迁至塞浦路斯，以增加土耳其族的人口比例。此计不成后，又搬出西方英国式的殖民地型政治文化的立法会议，用土耳其族 3 名成员，加上官方代表 6 名成员，以对抗 9 名希腊族成员。当然这是以人口调查比例为口实，迫使土耳其族就范的“分而治之”政策。

3. 1923 年塞浦路斯沦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以后，软硬兼施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把“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推向高峰：一方面实行镇压，另一方面又宣布各种半自治宪法方案，甚至声言要投资 3800 万英镑来发展塞浦路斯经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一步利用土耳其族对“同希腊合并”运动的恐惧心理，把原先反对由土耳其和希腊瓜分塞浦路斯的主张，改说成“瓜分可能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总督哈丁 1957 年 7 月语），并且把瓜分的思路作为以后各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出路之一。

4. 随着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矛盾的激化，随着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人之间流血冲突的扩大，随着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干预，英国在塞浦路斯失去了主导权。在 1958 年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高潮中，英国以保留两个主权军事基地的条件，“为了留下而走”地退出了塞浦路斯。希腊族领袖马卡里奥斯放弃了与希腊合并的主张，而提出由联合国来解决塞浦路斯独立建国问题。历史

面临着转机。

第四时期: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围绕国家问题的交往。这是塞浦路斯最近时间段的历史,是从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以来的历史。这也是一个变化快、变数多、变度大、变程难以预测的时期。

这个时期塞浦路斯内外交往的中心,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国家问题。塞浦路斯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崩溃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民族独立国家。它是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和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一员。它也是在塞浦路斯国家观念和国籍认同尚未充分形成,和希腊族、土耳其族领导人争夺权力冲突的条件下建立的。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阴影遮蔽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视国家独立带给他们的良好机遇,在权力讨价还价和互争互斗中蹉跎岁月。统一问题的解决,尚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实践体验和探索过程。

塞浦路斯作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一开始就强烈反映着外国的干预因素。英国保存着99平方英里的军事主权基地。希腊、土耳其不但有驻军权,而且两国都成为塞浦路斯的"保证国"。后来者美国以"调解人"的身份而进行干预。这些,都使塞浦路斯问题更为复杂化。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独特性,表现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的"同国异梦"上。他们一开始都按旧思维、旧行动行事,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埃奥卡领导人,仍坚持与希腊合并运动,从而导致了流血冲突。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两个"母国"对新兴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事干涉行动,结果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形成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和平进程总是因为错过了多次有利的历史

机遇而延宕。直到 2004 年 2 月，仍然在不能谈拢的情况下，希腊族的塞浦路斯政府单独于 5 月加入了欧盟。塞浦路斯问题昭示着一个理念：愈是难以判断发展前途的事物，其中必然包含着历史活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工作，不是为了寻找终极的结论，而是在疑问、困惑中拓展历史智慧。

最后，塞浦路斯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特别是民族和宗教之间的交往，在时间段上往往超出了一般人思维想像力所能达到的漫长程度，从而持续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中。民族和宗教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主要因素，是历史上异乎寻常的创造物，它如此古老而年轻，又如此强大而持久，过程既曲折又复杂，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蔽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光阴就是时间，在中东的百代的过客中，哪一代过客能不带有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基因而在交往的时间段上匆匆走过，并且留下自己的文明创造踪迹呢？

三

海岛塞浦路斯文明画卷的每一历史时间，都处在一个空间之中，都有一个实在的空间背景和舞台。

如果我们从时间的文明交往论角度，转移到空间的文明交往论角度，来观察塞浦路斯这个海岛舞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两个交往互联网络：人类的居住空间地域，限制和决定着居住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在所处空间地域的人们不是孤立于周边环境之外，而是同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交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相近文明圈辐

射和扩展带来的影响。

塞浦路斯具有独特的地域文明特点。它是地中海东部的“文明灯塔”。这个灯塔地处海域的地中海文明、北非文明和西亚文明的要冲，从它的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这三个空间段，照耀着东西方文明交往之路。

地理位置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坐标。民族和宗教无论大小，在地图上必定会显示出各种形态的坐标位置。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历史的地理基础”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归结的“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和人周围的自然”概念一样，塞浦路斯文明交往的本质特征，首先取决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它的面积有9,251平方公里，是地中海中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第三大岛。它远离地中海文明中心，又近靠西亚、北非文明边缘。前者因希腊移民潮的涌入，从而使希腊族得以较早形成为主体民族，弥补了塞浦路斯与西方文明交往不够密切的缺陷；后者因长期与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交往密切，特别是北邻的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长期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在人口构成和文化内容上注入土耳其族和伊斯兰教因素。这两个毗连接触面的地缘特征，制约着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之间交往关系的独特性。

塞浦路斯这种两个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的文明，同地中海总的文明比较起来，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它的地理位置对地中海极为重要，但总是受制于亚、非、欧强势文明的影响；它既先进，又落后；它既有对地中海扩张运动的开放敏感，又有对北邻土耳其伊斯兰教文明冲击的威胁感，还有两种对立文明内部社会活动的孤立闭塞状态；它在发展上常处于保守与革新、分散与集中、狭隘与极端

的两极对立与分化进程之中。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围绕希腊和土耳其两个主体民族政治平等、分裂与统一、建立世俗联邦国家等问题的酝酿,已走过漫长的过程,今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悲观预测往往总是正确的。内部的近距离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交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时候,塞浦路斯问题解决的步履总是显得那样的蹒跚而踯躅。

如果说,塞浦路斯近距离交往陷于长期内争、内耗的艰难处境,那么,它同地中海中心沿岸地带的中距离交往,却显示出了在空间的优越性。这座"东地中海的灯塔",在历史上曾辉照四方:西方从 360 公里外罗德岛直到希腊文明的本土;北方从 80 公里的安纳托利亚海岸直到伊斯兰文明圈的土耳其本土;东方从 90 公里外的叙利亚海岸直到新月带和阿拉伯半岛的西亚远古文明圈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圈的中心;南方从 439 公里外的苏伊士运河直到北非远古文明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大国埃及。据说,塞浦路斯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 1450 年的埃及文献。塞浦路斯是连接意大利向地中海航路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衔接点。这种地理大环境也有其不利之处,即历代大国为争夺商贸和军事重地竞相角逐,后来的大国干预,都给当代的塞浦路斯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留下诸多难题。

塞浦路斯在远距离交往中,因在空间上处于世界历史进程走廊的中继站位置,因而扮演了东西方文明交往前台的角色:多少个民族往这里迁徙,多少个帝国在这里征战,多少个宗教在这里传播。塞浦路斯人注意的是它与历史上"蔗糖之路"的关系。蔗糖起源于印度,是由阿拉伯人在 7 世纪或 11 世纪传入塞浦路斯。虽然在传入时间上有争议,但由阿拉伯人传入和起源于印度这两点上,

王朝豪华宫廷在15世纪向西方传播中国唐朝服饰一事，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就是唐朝圆锥形女式高帽和尖长的翘头鞋经塞浦路斯西传问题。这既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塞浦路斯参与国际交往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活动感到惊叹；又使他们为其传入法国和查理六世宫廷之慢，胜过某些星球的光传到地球而感到惊讶；还使他们从塞浦路斯国王那里接受这笔遥远的遗产而兴奋。

远距离的文明交往过程是复杂的，中距离的文明交往是多样的，近距离的文明交往是多变的；同时，这三种空间的文明交往是相互交叉和互为补充的。文明的边界虽然可以用好多的文明圈、文明区和文明带来界定，但其边界必定因文明交往中的引进和输出而变化。在16世纪以前，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所带来的相互影响，是缓慢的、一点一滴来临的。旅途的遥远，行程的曲折和交通的不发达的限制，文明交往对塞浦路斯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但是，无论如何，塞浦路斯的内部文明特征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四

时间、空间、人间，这是文明交往的三个重要条件。时间即机缘，空间即地缘，而机缘，地缘，都是为人所用。人是主体条件。历史时间是人化的时间，历史空间是人化的空间。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体性活动，就无法认识时间和空间。“人以群分”，人类最基本、最稳定的划分是民族。民族是人类群体演变至今最高级的群体形式，而民族又能够以共同体的范畴，同宗教相结合、相重叠、相联系在一起。民族和宗教之间的交往，是人际间交往见之于族群

与信仰人群之间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就是人类在一定时间、空间环境中，进行交往活动的一种表现。

人们创造历史的交往活动，首先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人虽为主体，却受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制约。人的本质取决于他与周围事物的交往关系。塞浦路斯与中东许多国家不同，它之所以在空间上重要，不是石油，而是它地缘政治中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海上战略地位。塞浦路斯与中东许多国家更大的不同之处，是处于这个海岛上的两个民族，缺乏历史时间上的国家认同。从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上，希腊族更多的是欧洲的属性，而土耳其族更多的是土耳其属性，两者的塞浦路斯观念因缺乏文明之间的密切交往而显得相当淡薄。这对当代塞浦路斯问题造成了历史的、地理和文化的难题，成为政治认同的深层根源。

人类在时间上世代更替于这座历史舞台，经历着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频繁、复杂而多变的交往。它不仅仅是冲突和争端，也有和睦相处和合作的交融。下面我把一位英国作家和艺术史学家的塞浦路斯之旅的游记要点，摘录于后，以窥见人间的民族和宗教在这里的某些具体历史联系。

这位作家就是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1905～1945年)。他是英国诗人乔治·拜伦(George Byron，1788～1824年)的后辈远亲。他有两本游记：《先到俄罗斯，再到西藏》(First Russia, then Tibrt, 1933年)和《穿行内陆亚洲》(The Road to Oxiana, 1937年)。Oxiana，即乌浒河流域，今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或平原。《穿行内陆亚洲》这本书2003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了中译本。

1933年8月29日，罗伯特·拜伦到达塞浦路斯时，以深厚的历

史感书写了这本游记的开篇语:“这座岛屿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给人以某种心理上的负担。”历史感赋予了他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既赋予他以绵延的表层外在图景,又赋予他以深远的潜层内在心态。以下便是他实际观感的要点:

1. 他是从宗教这个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内容来叙述塞浦路斯丰富历史带给他的心理负担的:“公元45年,塞浦路斯岛萨拉米斯(Salamis)地方人士巴纳巴斯(Barnabas)与使徒保罗(Bul)共同促使该岛居民皈依基督教。”他写道,《新约·圣经》人物拉撒路斯(Lazarus),即耶稣曾使他死里复活(《约翰福音》11、12章),据说即长眠于此。肯恩主教的两个侄儿伊恩(死于1693年)和威廉(死于1707年)都葬于此。他对基督教文明越过自己的文化边界而进入塞浦路斯的最初交往的记载,对于这个地区后日的影响与作用,是意味深长的。不仅如此,他还见到了东方教会的亚述人领袖马席孟(Mar Shimun)。此人因英国政府背弃诺言,不允许亚述人建国,1933年被伊拉克政府流放于塞浦路斯,并关进监狱。罗伯特·拜伦叹息地写道:“这是英国外交背叛史上又一案例,它有终结的一天吗?”在这里,他清楚表明了对英国政府殖民统治者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择手段的交往的不满。

2. 可贵的是,他不仅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还如实地记载了塞浦路斯在民族和宗教交往史上所形成的政治文化特征:法马古斯塔(Famagusta)为土耳其族人居住,瓦罗沙(Varosha)为希腊族人居住,“中间连接着英国人居住的郊区,那里有政府的办公室,英国俱乐部”。同时,他讽刺地写道:“如果塞浦路斯属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那么今天造访法马古斯塔的观光船只,就会像罗得岛那样络绎不绝。在英国统治之下,那种刻意的腓力斯人作风令

人裹足不前。"腓力斯人(Philistia)是《圣经》中提到的巴勒斯坦古国居民,他在这里引申为"平庸的、没有教养的"等贬义词,用来讽刺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无能。

3. 在尼科西亚,他特别记述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 1931 年争取与希腊合并起义。这是一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的事件,起义者摧毁了政府大楼,但遗址仍然存在。虽然大楼已为新的政府大厦所代替,但大厦外陈放着 1527 年英王亨利八世给耶路撒冷圣约翰修会的赠品——一门加农炮,炮上镌刻着都铎王朝的纹徽。他诧异地回顾过去一段民族与宗教交往:"但是,1928 年为纪念英国统治 50 周年时所铸造的纪念钱币上,采用的却是狮心王理查的徽饰,他于 1191 年征服此岛,并在此完婚。这里说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时,英王理查 1192 年在塞浦路斯与王后贝伦加里娅举行婚礼的事件。

4. 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他特别注意到了塞浦路斯东郊小镇基提(Kiti)教堂内美不胜收的镶嵌画:"圣玛利亚的袍子是深紫色的,几近于木炭的色泽。她旁边的天使则穿着白、灰及黄色打褶衣衫;她们的绚丽翅膀呼应着手中所拿的绿球。脸部及手脚所使用的嵌块比其他部位小。整体的构画极富韵律。由于人物的尺寸不会超过真人大小,加上教堂又相当低矮,因此可以凑近到只隔 10 英尺的距离细细欣赏屋顶的这幅杰作。"据介绍,这是 6 世纪拜占廷时代的作品。这是当时修道院相对安静生活环境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修士修女从事宗教艺术活动的遗存,也是正教会所处的多种文明交往地区特征的表现。不过,罗伯特·拜伦从技巧手法上断定,它应属于 10 世纪的作品。

5. 罗伯特·拜伦没有忘记对塞浦路斯空间地缘特产的考察,

他细心地注意到了当地的农业状况，如葡萄园、山羊、麻黄、丝柏、风车、蜡蜡花和正在采集、供牛饲料的角豆。这个考察使我想起1850年鲁西格南王朝的后裔——埃斯安讷神甫在一本有关塞浦路斯“奇花”“异草”书中的记载。这位神甫说，当时的牲畜饲料是用棉籽和切细的棉秆混合在一起搅拌而成的。他在书中还提到，有一种酷似石榴树、开着像成串葡萄花的“塞浦路斯树”，其叶子煎水可作成橘黄色染料，通常是被贵族们用来染马尾巴的。但罗伯特·拜伦没有谈到这些，也许这两种植物在20世纪30年代已不复存在了。

6. 罗伯特·拜伦还记述了城堡外一群囚犯挖地和下海午浴的场面。岛上负责保管文物的老人杰弗里给他拿出一张13世纪当地地基的平面地图，并且告诉他，这些地基开始于鲁西格南王朝时代，是当时囚犯们强迫劳役的地方。他登上沿岸山上的圣赫拉里昂堡（St. Hilarion's Castle），发现“在60英里外的碧蓝大海的另一边，隐约可见到小亚细亚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的轮廓”。那里曾经是统治过塞浦路斯的奥斯曼帝国，而此时是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共和国。

罗伯特·拜伦是走出西方文化边界而步入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汇聚地——塞浦路斯的旅行者。苏轼的“快意雄风海上来”的诗句，也许能折射出他的地中海和中东文明之旅的交往视野。他的旅行游记是一本打开了塞浦路斯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明交往之书。文明交往对于知识贫困者、对于闭目塞听者、对孤立于外界者，无异是一本合着的书。只有知识富裕者、视野开放者、广为交往者，才能开启和解读文明交往的奥秘。塞浦路斯的历史长度是无限的，它的空间是有限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却重复着一种崇

高的、艰难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就是希望之所在。

塞浦路斯的事例，表明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在文明交往史上的至关重要性。任何文明都是在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交往中延续，在不同时间、空间及人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商贸、文化、技术诸多领域的交往中得以丰富和发展。民族和宗教是文明内在的重要文化基因，它和外在文化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文明交往的活力源泉。历史上一切变动，无论是政治、民族、宗教，无论是经济、生产、社会，都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交往的或明显或不明显的表现。历史归根结底是文明和文明交往的历史。历史学家对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的文明理论持有疑议，不是没有根据的。研究者不能总是翱翔于宏观的"高明之见"的天空上下不来，也不能总是沉湎于微观的"考索之功"的低层次上上不去，更不能宥于政治偏见而陷于思维的片面性。文明和文明交往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众多历史个案的总体思考和对现状事件的阐明与客观实践检验的厚实基础之上，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彭树智

2004年4月4日写于北京松榆斋

5月10日改于西安悠得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东国家通史　　塞浦路斯卷
作者＝彭树智主编
页数＝４０７
ＳＳ号＝１１９２２８５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０７

前言

目录